

CSSCI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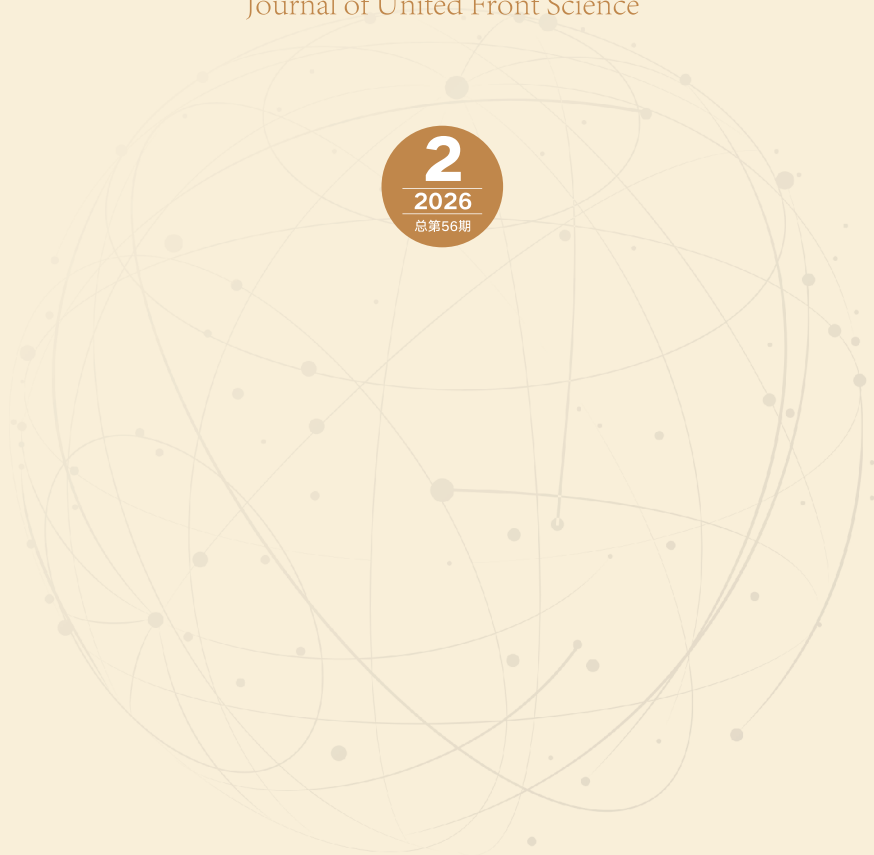
2
2026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主办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
2026
总第56期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6 年第 2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毛 平

主 编：王 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目录 | CONTENTS

2026 年第 2 期（总第 56 期）
双月刊
2017 年创刊
第 10 卷

01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TONGYIZHANXIANXUE YANJIUQIANYAN ZHUANTI

统一战线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	/ 丁俊萍 何炫达	5
从“法宝”到“学科”：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阶	/ 李超民 章子怡	20
从“外部规划”到“内在自觉”：元理论视域下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	/ 梁百川 徐海峰	38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结构、重大命题与实践路向	/ 樊士博 陈 娜	51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维度与实践路径	/ 黄洪凯	63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形塑发展、重要特征与构建指向	/ 刘宗灵 严浩月	76

统战工作与正确政绩观研究

论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应当把握的基本关系：基于现代政治过程的分析	/ 董亚炜	91
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场景、逻辑与路径	/ 邓海龙	103
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演进、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	/ 俞佳奇	116

未来产业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机遇、困境和着力点	/ 徐 政 占智勇	128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进程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 潘智璇	140

- ◎ CSSCI (2025—2026) 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十五五”时期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与实践路径

/ 牟春伟 张 翔 153

02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TONGYIZHANXIAN HUAYU HE XUSHI TIXI GOUJIAN ZHUANTI

坚持正确历史观与防范西方伪史观渗透研究

算法社会的数字统战：范式转型、运作机制与伦理规范

/ 高 进 黄种兴 166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创新与实践启示

——基于《太平年》热播的分析

/ 胡芑齐 冯熙茹 杜俊华 179

从断裂叙事到共同体认知：“1644史观”的话语逻辑、
现实风险及学理应对

/ 梁 山 192

“台独”史观的系统性解构与批驳

/ 钟厚涛 206

从“嵌入式”走向“体系化”：国家法律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规定的优化进阶

——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基干

/ 杨继文 张若曦 223

03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GUOJI REDIAN SHIJIAN DE TONGZHAN GUANCHA ZHUANTI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内在张力与实践路径

——基于2026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分析

/ 戴维来 235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限度与应对

/ 王京菁 林华山 252

封三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期刊基本参数: CN50-1215/C*2017*B*16*272*ZH*P* ¥20*2120*19*2026-03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6 No.2(Sum No.56) Vol.10

- 05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mpirical Insights Ding Junping&He Xuanda
- 20 From "Magic Weapon" to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United Front Theory Li Chaomin&Zhang Ziyi
- 38 From "External Planning" to "Internal Awareness": Constructing the "Three Systems" of United Front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Theory Liang Baichuan&Xu Haifeng
- 51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Major Proposition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an Shibo&Chen Na
- 63 The Core Dimens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New Type of Party System Huang Hongkai
- 76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Key Features and Constructive Direc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Liu Zongling&Yan Haoyue
- 91 On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s to be Addressed in Upholding a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 in United Front Work: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Modern Political Process Dong Yawei
- 103 A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 Leading Self-Reform: The Context, Logic and Pathways for the Party to Address the "Four Question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Deng Hailong
- 116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herent Law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he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Front Yu Jiaqi
- 128 Systematic Planning for Future Industri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Key Focus Areas Xu Zheng&Zhan Zhiyong
- 140 The Logical Mechanism,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Investment in Material Good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n Zhixuan
- 153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Promoting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Scenario Innov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Mu Chunwei&Zhang Xiang
- 166 Digital United Front in the Algorithmic Society: Paradigm Shift,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Ethical Norms Gao Jin&Huang Zhongxing
- 179 Narrative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Education on the Chinese Nation's View of Histor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opularity of Taiping Year Hu Yuanqi&Feng Xiru&Du Junhua
- 192 From Fragmented Narrative to Community Cognition: The Discursive Logic, Realistic Risks and Theoretical Responses of the "1644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ang Shan
- 206 A Systematic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Historical Narrative Zhong Houtao
- 223 From "Embeddedness" to "Systematizati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for Provisions o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National Laws —Based on the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Yang Jiwen&Zhang Ruoxi
- 235 The Generative Logic, Internal Tens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an International Anti-Bullying United Front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2026 Venezuelan Crisis Dai Weilai
- 252 U.S. Interference in China's United Front Sectors During the Trump 2.0 Era: Risks, Limits and Countermeasures Wang Jingjing&Lin Huashan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

丁俊萍 何炫达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性得以彰显的必要条件,更是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得以推进的根本保证。从理论内涵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根本标志、服务于人民大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知识体系。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超越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这种超越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并通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个维度的独特机制实现。从历史脉络看,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古代和近代知识体系为文化基础,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重塑知识体系自主性的丰富探索为历史基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变革为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与知识体系命运紧密结合,在新时代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任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条件在新时代全面成熟。新时代新征程上开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新境界,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注重增强系统观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引领;中国理论;知识生产;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005-15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01

作者简介: 丁俊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炫达,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022);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重大委托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学理性研究”(24ZXHYW03)

引用格式: 丁俊萍,何炫达.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5-19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实际、深刻反映中国的创新实践。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要立足中国实际、汲取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就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关键作用。近代以来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2]。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1] 19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 194}。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性得以彰显的必要条件，更是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得以推进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光明前景。正确认识和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关联已引起学术界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三方面共识。一是将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作为建构这一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点。有学者认为，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最核心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4]。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提供科学思想指引，又构成这一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关键内容、明晰了发展方向^[6]。与此同时，学术界还高度重视坚持“两个结合”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两个结合”恰恰是理解“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7]。“两个结合”有利于在实践指导、拓展内容、实践创新等方面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8]。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建构这一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点。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一创举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9]。中国式现代化是回答“现代化之问”的全新范式，体现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10]。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对当代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人类社会形态转型这一伟大社会变迁过程的理论呼应^[1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应当在哲学高度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决定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12]。三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建构这一知识体系的政治基点。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能够从群众实际和实践需要出发、不断取得发展的关键原因，因而党的领导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保障^[1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核心议题设置、知识生产机理和学术话语表达等各方面，都必须立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政治逻辑^[14]。

上述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可以深化拓展的空间。首先，中国共产党引领知识体系建构机制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有待深化。现有大多数研究成果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等某一方面领导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影响，但对核心政治领导力量影响特定知识体系建构的整体作用

机制的分析囿于片段化和表面化,不利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何以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根本性、基础性作用。其次,“知识体系”范畴的理解有待拓展。完整的知识体系应涵盖自然、社会、人文等人类知识基本领域,应包括经验知识和科学理论知识两种基本形态,如果仅仅将“知识体系”局限于社会知识领域或者主要在社会科学领域加以讨论,必然会忽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逻辑;如果仅仅将“知识体系”局限于科学理论知识范畴,必然会忽视知识的地方性、民族性特点,看不到知识由经验逐步升华为理论的过程。最后,对于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衰弱—重塑”历史脉络的梳理有待增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时代任务,唯有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考察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才能全面准确理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度、广度与内在规律。鉴于此,本文紧扣“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关联,在尽可能完整准确理解核心概念基础上阐述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历史脉络和主要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开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新境界贡献绵薄之力。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准确把握“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概念的核心意涵与实质,梳理归纳政治力量影响知识生产与体系建构的基本模式,可以为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共产党要引领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议题打开思维空间。

(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视域下“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刻意蕴

知识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15]。依据人类认识发展的来源,认识的结晶——知识可以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别: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15] 282-283},因而人类的知识首先指涉如何认识、改造自然的自然知识。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有赖于人们的协作,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时形成了对于生产协作关系的最初认识,而在物质生活基础上,人类“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15] 283},由此产生的是指涉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知识。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逐步由低向高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15] 283}。根据认识所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和分析层次的系统性、复杂性,知识可以分为经验知识和科学理论知识两种基本形态。经验知识依赖于感性直观,是关于事物印象与外部联系的初步认识,是初级形态的知识;科学理论知识则依赖理性抽象,是对经验素材和感性认识加以整理和改造的思维产物,是关于事物本质、全体与内在联系的认识,是高级形态的知识。

知识体系是对特定领域中若干知识进行筛选、分类、联结从而实现系统整合的思维产物。就整体而言,知识体系可以划分为自然知识体系和社会知识体系两个基本方面,完整知识体系同时

包含经验知识和科学理论知识两种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与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知识体系的科学化水平也整体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状态,科学理论在知识体系中的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就作用而言,知识体系旨在揭示一定领域中知识生产与应用的价值取向、整体秩序和内在规律,一般包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核心要素。其中,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是按照研究对象的类目性质划分形成的门类系统,旨在划定知识边界、整合知识资源、进行人才培养、支撑知识创新。学术体系则是在学科体系框架下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学说,旨在指导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以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创新,这是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话语体系是指承载、表达、传播知识的语言系统,包括概念、范畴、术语、命题等构成要素,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外显形式。

自主知识体系是反映认识主体具有认识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范畴。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对象性产物,知识体系并不天然具备自主或依附的属性,其所具备的自主性根源和取决于这一体系的生产者、拥有者、应用者、评价者——认识主体也即人本身的自主性。因此,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一般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依据一定的观念、需要和动机反映和创造认识客体,能够主动运用一定的物质工具、思维工具和语言符号提高认识水平、传播认识成果。二是知识评价的自主性。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是思维的抽象物,社会实践性是认识主体的本质属性,人类在认识活动中形成的知识,“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15] 284},知识的有用性和真理性才得到证实。具有自主性的认识主体必然要依据社会历史条件 and 实践情况独立自主确定评价知识价值的适当方法、尺度和标准。三是知识体系建构与发展的鲜明主体性。自主是与依附相对而言的,知识体系具有自主性,归根结底是指创造和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能够在与外部知识的互动中、在汲取一切有益成分以实现既有知识体系更新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本我,“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6]。这是认识主体具有“主体性”的鲜明表现,也是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自主性”的关键所在。

(二)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核心政治领导力量影响特定知识体系建构的一般模式

在考察人类的政治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的关系时,常有这样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观点,即认为政治活动不应当影响知识生产和知识体系建构,知识生产尤其是科学研究应当排斥政治力量的干扰。在这种观点下,政治与知识、技术、科学之间的理想状态,应当是政治活动完全按照科学的要求展开,也即“政治的科学化”,“官员、军人和政治家,在行使他们的社会职责时,按照严格的科学建议来办事”^[17],政党等政治组织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应当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和最小范围,对于知识生产和科学事业发展根本谈不上“引领”。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它忽视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性,忽视了政治统治与知识生产的紧密关联并非从来就有、更非一成不变,忽视了造成政治统治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8],“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

支配”^[19]。这即是说，政治、知识、科学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存在的根本制约；政治活动和知识生产活动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内容，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不同社会形态中政治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截然不同的关系。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人们不得不实行绝对的生产集体主义和消费平均主义，人与人关系绝对平等，无剥削、无阶级，维持社会组织运转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20]，而非暴力强制。这里的“风俗”即氏族成员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道德观念、原始宗教意识、图腾等原始符号崇拜，实际上是原始知识生产的最初成果。这些知识成果为氏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作用于生产力的整体提升，原始政治活动（实质上是社会管理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并无明显张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发展，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私有制渐渐取代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人类社会逐步进入阶级社会。私有制和分工造成了政治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的对立冲突，“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1]。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立造就了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阶层，该阶层并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其赖以生存和用以开展知识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资料源自其所所属的社会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全部）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甚至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就是该社会主要的知识生产者，例如神权制下的教士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知识体系的生产者和应用者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其所属阶级的利益诉求，即使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在阶级社会中也不可避免受政治影响，完全真空的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

阶级社会中的知识生产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政治力量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被归纳为两种相关联的状态。一方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意图改造既有知识生产秩序，藉由思想创新影响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夺取政权并改变生产关系。“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22]另一方面，夺取政权后的新兴阶级要建立新的知识生产秩序，从而将这个阶级的思想变成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8] 178}，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总是其所构建的知识体系的主体部分，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总是对包括自然科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在内的一切知识生产活动具有统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定义及其独特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影响，既体现阶级政党影响特定知识体系建构的一般模式，又反映马克思主义政党超越一切剥削压迫阶级政治力量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决定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建构方向，具有超越性的实质内容。

历史地看,知识生产与创新带来的是科学技术革命、思想文化革命,而这些革命运动最终要作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最终要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推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和文明发展。因此,考察一种政治力量与知识生产活动的关系,归根结底要看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基础的内在关系。剥削阶级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曾因其与先进生产方式的密切联系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扮演过进步角色,也曾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并留下了宝贵文明财富。但是,剥削阶级只是将知识尤其是科学作为一种更高效攫取阶级利益、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工具,生产知识、发展科学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从来都不是它们的本来意图。正因为如此,人们总能看到剥削阶级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却反过来压制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现象,这只是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剥削阶级政治统治集团的利益,这就是“靠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中组织起一个统治阶层”^{[19] 395}的体现。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23],将推动“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19] 395}作为自己的使命。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8] 413},而是自觉地将自身视作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群众繁荣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推进社会革命以奔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具备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引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所要引领构建的是什么样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呢?首先,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知识体系。当代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复古,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的复刻,更不是资本主义知识形态的复制。这一知识形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24],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持开放态度,能够不断汲取其他知识体系的合理成分并实现自身发展。其次,它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根本标志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25]。这一知识体系划分为四个基本层次: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尤其包括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这是该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导理论;第二层次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全部科学技术部门,是用以指导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科学理论;第三层次是应用基础科学理论的技术科学,是直接作用于改造客观世界、作用于发展物质生产力的技术方法的集合;第四层次是尚未系统化的、在长期实践活动中积累形成的经验知识或生活常识,这是该知识体系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再次,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知识体系。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知识的生产归根结底要依赖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形成的直接经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切知识成果为人民群众所共享的知识体系,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最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引领建构的知识体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这一知识体系具备上述三大基本特征的政治根基。

据此,可以从四个方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独特作用机制。一是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确保知识体系建构工作具备强有力政治保障。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确保党始终具备引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政治能力,确保科学技术文化事业始终服务于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目标。二是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确保知识体系建构工作始终具备正确方向指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抵御错误思想干扰。三是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确保知识体系建构工作具备不竭的动力源泉。充分引领激发人民群众作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性和积极性，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转化为亿万群众自己的事业。四是发挥党的社会号召力，确保知识体系建构工作具备良好的整体环境。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统战工作，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24]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求索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突破的必然。分析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世界历史境遇、探索历程与现实条件，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生成拓展的内在规律。

（一）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中国既有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危机及其重塑契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 669} 这对于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亦是同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是凭空创造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26]，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自主性的古代知识体系，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重要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已包含一定的学科门类系统，如以“经、史、子、集”为主体框架，涵盖古代社会主要知识的“四部之学”。同时，这一知识体系还包含着以儒、释、道、墨、名、法等各家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思想流派。就内容而言，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25] 5}，而且还包括一部分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27] 中国古代知识体系是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孕育生成的，其首要功能在于维系奴隶主和封建君主的统治利益和政治秩序，因而具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明显著的连续性和包容性，这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能够不断走向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

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和世界秩序，中华民族在知识生产、评价与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的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具有世界历史性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8] 404}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知识生产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这种知识生产秩序宣称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西方文明具有优越性、西方知识体系相较于其他一切民族的知识体系具有先进性。借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化释放的强大生产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文化霸权，长期占据知识生产垄断地位。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的

近代先进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应对外来强势文化冲击，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由此构建起来的是中国近代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相当有限：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体仿照西方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缺乏认可度，居于世界知识生产秩序的底端和末端，形成了对外部知识的依赖；一些知识甚至是在不加鉴别、不考虑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的情况下直接由西方照搬过来的。

客观来说，在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既有知识体系造成严重冲击的危局中，也蕴藏着中华民族重塑其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重要契机。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思想体系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秩序尤其是封建思想的沉重桎梏，有利于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近代先进中国人不断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其结果却是“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8]。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8] 1514}。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用以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真理，由于有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心骨，“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28] 1516}。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重塑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长期实践探索

挣脱文明蒙尘的窘境，打碎西方文化殖民的枷锁，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引领中国人民重塑自身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求索，这为新时代正式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奠定了历史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2] 4}，一个政治上不具备独立地位的民族不可能创造和拥有具有鲜明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造成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危机的根源。为了“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9]，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推进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30]的历史性命题，创立毛泽东思想，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引；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创造了以延安整风为代表的党内集中教育模式，提高了领导文化事业的实际能力；着力加强根据地的思想宣传工作、教育工作、文化文艺工作，广泛开办夜校、平民学校、半日制学校、识字班，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和新闻广播电台的舆论阵地作用，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文化娱乐活动，使劳动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加强对理论研究和学术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工作方针政策，推动“学术中国化”“哲学中国化”等学术运动。这一时期党对科学文化建设的坚强领导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建构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和平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探索引领中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道路。为“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

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31]，党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为加强党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事业的引领，党领导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工业和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和学术建设工作的领导，党明确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党还领导开启大规模扫盲运动，推进工农业教育和知识普及，大力发展中小学、全面调整高等学校院系。党领导人民在这一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无疑为建构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工作，使党所领导的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着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领导并推进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主动扩大了对外来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的学习借鉴范围。

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和平演变”政策，社会主义中国在学习引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又不可避免遭遇西方强势资产阶级文化侵扰，这在客观上导致一定历史阶段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抬头，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使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改革、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得以在复杂激烈的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站稳脚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在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更具活力的体制保证，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知识生产环境、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条件的成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目标，其本身意味着实现这一任务目标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并基本成熟，而这种现实条件的成熟，依赖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探索积累，更取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彰显，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引领科学文化事业方面，明确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32]、“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32] 38}等重要制度建设与改革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成和各层次

各方面制度建设的战略任务与改革目标，其中就包括“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33]等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则划定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战略方向。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科学技术人才发现培养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制度进一步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一系列制度建设层面的深度变革释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2]36}，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人类意识活动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水平，根本上取决于一定历史阶段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截至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4年，我国经济规模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7%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34]，强大经济为高端科学技术研发、先进知识生产、知识产品国际传播提供有力物质保障。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研发经费投入屡创新高，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高端芯片等前沿领域形成的科技创新成果为拓宽认识视野、增强知识生产能力提供了有力技术保障。在强大经济与科技支撑下，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庞大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截至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已达757万人年，全年发表科技论文达229万篇，国内专利申请数达565.3万余件^[35]，各项数据均居于世界前列。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无疑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物质支撑。

最后，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2]46}，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思想理论指引。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26]291}。“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党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打开了理论创新空间。党着力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思想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领导推进的教育强国建设已取得突破性进展。202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1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8%^[36]，世界上规模最大且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已经建成，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显著提高。这为中国自主知识的生产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也为自主知识产品的传播、消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新

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2] 61}，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历史性任务的现实条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坚实根基。

四、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经验启示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事业，考察中国共产党引领这一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脉络，能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理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决不能羞羞答答、语焉不详，决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3] 22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重塑其精神独立性、政治独立性、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表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缺乏对意识形态工作和科学文化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正确领导，就必然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37]，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面临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首先，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6] 477}要着力巩固和健全“两个维护”制度体制机制，强化党中央决策制度体制建设，健全巩固请示报告制度、重大决策精神落实问责机制，确保党中央对于科技发展、文化建设、教育普及、社会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能够迅速落实。其次，要以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牵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把党的正确领导落实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各领域各环节。党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要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以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和依托。同时要认识到，“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38]，为此，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和贯彻正确的执政方针和治理思路。最后，要着力提高党对知识生产共同体的全面领导。要坚持正确的人才工作方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服务人民的高水平人才队伍，要注重引领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健全优化学术生态、规范学术行为的法规制度体系。

（二）必须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自觉用中国

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成功之道。”^{[26]102}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是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部分，更是指引这一体系建构的根本指导理论。开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新境界，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

首先，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推进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健全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事业发展的制度机制。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其目的是“用以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26]491}。必须着力增强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突出服务社会需要的现实导向，力戒理论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增强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的高度自觉。其次，要在坚守理论创新的魂与根基础上不断开拓理论视野，做到坚持主体性和维护多元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根脉，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必须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深度贯通，必须注重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自觉的价值观念深度融通，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正向思想引领和丰富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都可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26]96}，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拓宽理论视野，勇于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增强立足中国经验设置中国议题、提出中国方案的能力，促使我国尽快摆脱世界知识生产秩序中的被动地位、增强中华文化和中国理论的世界影响力与话语权。最后，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加强思想理论武装的同时为学术思想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25]28}

（三）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

“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亿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加在一起，谁能比得过？”^{[26]98}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服务 14 亿中国人民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有赖亿万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开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新境界，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充分激发亿万中国人民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于知识体系构建而言是一个根本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其生成与应用都离不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因此，必须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人民群众在生动社会实践中的现实需要作为科技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知识体系建构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其次，正确处理知识生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品不可避免要进入流通领

域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由此形成的经济收益为促进知识再生产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是，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为此，要增强科技产业、文化产业投资有效程度，“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6] 162}，引领知识生产兼顾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极从人民群众和基层实践中汲取推动知识创新的宝贵经验。“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26] 99}知识生产绝非由少数人垄断的工作，知识分子用以进行知识创造的经验归根结底来自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只有走出书斋、走出机关投身基层一线、融入人民群众，只有广泛倾听群众呼声、汲取群众真知灼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才能提炼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引领力、凝聚力的创新知识成果。

（四）必须注重增强系统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39]中国共产党引领建构的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作用范围广泛、内容层次复杂的巨大系统，开辟这一知识体系建构新境界，必须增强和掌握全面系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

首先，就知识体系的外部联系看，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高度重视高新技术对于知识生产与应用的革命性作用。物质文明对于精神文明具有决定作用，物质工具的进步为人类进行知识生产提供物质基础，科技革命为人类知识革命、文化革命创造重要的物质条件。同时，精神文明又对于物质文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一个社会精神世界丰富与否影响着这个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方向。要高度重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及时将当代新兴前沿科技发展成果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量子计算技术应用于知识生产，不断形成新型知识生产力，占据世界知识生产高地。其次，就知识体系的内部要素看，要实现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一体化推进和融合式发展，打通知识体系各层次各领域内在联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对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探索^[40]。现代知识密集程度、技术集成程度、科学研究深度相较过去已取得重大突破，那种固守传统学科界限、缺乏跨学科融合发展思维难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要高度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流和融合发展，着力发展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不断提高知识共同体的合作水平、协同能力和创新精神。

五、结语

作为一个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全人类解放崇高事业的伟大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一个曾创造璀璨文明成果、近代以来历经劫难又浴火重生的伟大民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必然要在创造民族复兴奇迹的同时摆脱知识生产的“依附地位”、形成文化意义上的坚定

自我，必然要在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摆脱“学徒状态”以提出学术意义上的自我主张、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理论。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以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应有之义。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在实践中不断开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新境界，继续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2.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5.
- [3]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6.
- [4] 白刚．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维度[J]．中国高等教育，2024（Z3）：32-37.
- [5] 庞立生，孙安民．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8）：26-33.
- [6] 陶文昭，徐林芳．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教学与研究，2026（1）：40-54.
- [7] 孙乐强．“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3（7）：10-18.
- [8] 张荣军，邵云贺．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兰州学刊，2024（6）：5-13.
- [9] 翟锦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价值取向与构建的实践基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40-49.
- [10] 李林海．中国式现代化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贡献[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8-11，99，153.
- [11] 杨述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呼应社会转型变迁[J]．理论月刊，2024（8）：5-14，159.
- [12] 田鹏颖．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自主知识体系[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15）：4-13.
- [13] 杨东，徐信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纲[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3）：7-10.
- [14] 黄海．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基点[J]．现代哲学，2024（6）：1-8.
-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8.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 [17]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97.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0.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 [20]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28.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5.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七五年七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2.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92.

- [24]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04-26 (1).
- [25]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5月17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8.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5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285.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2卷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69.
- [28]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0.
- [29]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5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51.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
- [3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4.
- [3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1-22.
- [34] 中共国家统计局党组.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J]. 求是, 2025 (19): 47-52.
- [35] 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创新发展篇) [J]. 求是, 2025 (23): 79.
- [36] 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共享发展篇) [J]. 求是, 2025 (22): 79.
- [3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5: 3.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28.
- [39]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30.
- [40] 王丰, 何宇霞.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着力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 1-14, 325.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卢媛

从“法宝”到“学科”：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

李超民 章子怡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遵循“实践自觉产生经验知识—理论建设形成系统知识—学科建制固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实现了知识形态从策略性、碎片化向学理化、系统化的范式跃迁。当前,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标识性概念集群得到系统提炼与阐释;方法论意识增强,跨学科借鉴深化;学科化建设在学位点设置、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该体系建构仍面临深层困境:在学术建制上,存在“制度附着型”特征明显、学科目录身份缺失等外在危机;在知识体系内部,呈现理论基础薄弱、核心概念学理化不足、知识生产“碎片化”与“悬浮化”等内生挑战,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建构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要采取系统路径:以基础理论创新为根基,系统集成标识性概念与知识体系;以学科体系建设为载体,构筑知识生产的学术共同体;大力创新研究方法 with 话语转化方法,推动知识生产与话语传播;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推动自主知识体系赋能国家治理。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化是“两个结合”指引下中国实践智慧向系统知识建构的升华,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确立的体现。统一战线学的目标不仅是成为一门“在中国的学科”,更要成为一门能够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为理解人类“政治整合”与“共识政治”贡献独特智慧的“中国的学科”。

关键词: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020-18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2.002

作者简介: 李超民,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章子怡,湖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概念、范畴与学理框架研究”(2024MZD006);湖南省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项目“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究”(TZLX2025035)

引用格式: 李超民,章子怡.从“法宝”到“学科”: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20-37.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运用和落实到教学实践中。”^[2]这为包括统一战线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发展指明了建设和发展方向。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定位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从“革命的统一战线”到“爱国的统一战线”，再到“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展现出“强大法宝”功能，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目标是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核心机制，已经从“治术”发展为“治道”^[3]，是解读中国政治、阐释中国治理、供给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重要知识资源。“法宝”是对统一战线功能地位的政治论断和历史总结，而“学科”则是其知识形态系统化、学理化的必然归宿。当前统一战线理论面临着从“革命法宝”向“系统学科”升华的范式转换任务。

当前关于构建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其成果可归纳为如下研究范式。其一，价值图景与时代使命范式，聚焦体系建构“为何必要”的元命题。相关研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构建“团结学”的基石^[4]，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实践进行理论升华、回应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诉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其二，内在结构与内容体系范式，聚焦体系“具体包含什么”的核心架构。学界普遍认为，其主体内容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5]。其中，学科体系建设关乎知识建制的合法性与规范化，要创设统一战线学科环境，激发学术创造活力^[6]；学术体系包括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是构建统一战线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制度^[7]；话语体系建设则重在凝炼标识性概念与创新传播叙事，要推进话语转换，拓展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对话空间。其三，历史演进与理论动力范式，聚焦体系生成的“内在动力”。相关研究强调，百年统战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实践演进提供了历史素材^[8]，“‘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9]。其四，协同推进的实践进路范式，聚焦体系“如何落地”的操作路径。相关研究围绕加强人才培养、深化学术理论研究、提升话语权等具体策略展开，还有研究强调“立足统一战线的中国性问题，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更新、概念创建和概念家族的成长”^[10]。这些研究成果凸显了统一战线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紧迫性、复杂性、战略意义与价值。

统一战线理论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知识建构长期面临学科自主性阙如的困境。统一战线在治国理政中具有“重要法宝”地位，但是其理论建设却面临“有政策无学科、有实践无体系、有经验无学理”的境地；“概念碎片化、知识供给不足”^[11]、体系化滞后与独立性欠缺等问题，也成为制约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效能的“瓶颈”。这种滞后性导致其在学术体系中“失语”“失声”，主要表现为三重局限。一是学科依附性，相关研究多依附于中共党

史党建、政治学等已有学理框架，缺乏独立的学科本体论与方法论支撑。二是政策依附性，侧重于解读会议精神和政策文件，难以实现超越具体政策的一般化理论抽象。三是历史叙事依附性，多从史学角度梳理统一战线历程，鲜少从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审视其理论演进机理与学理知识产生发展规律。这种依附性发展模式进一步造成历史脉络与知识逻辑的割裂，使史实梳理未能同步呈现知识形态的演变；实践总结与理论抽象的割裂，导致丰富的统战工作实践难以萃取为深层的学理体系；学科建制与知识创新的割裂，使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实务工作中难以高效运用知识和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理论内容。

鉴于此，本文聚焦统一战线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旨在系统梳理和阐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如何作为源头活水，催生分散的与政策性的知识观点，如何通过持续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学术争鸣将这些知识观点逐步发展为理论体系，以及成熟的理论体系如何呼唤并推动学科建制形成。本文遵循“实践自觉产生经验知识—理论建设形成系统知识—学科建制固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演进逻辑，探索统一战线知识内容呈现从隐性到显性、从碎片到整合、从依附到自主的范式跃迁的过程机理。

二、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与实践根基

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凭空建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统战实践中逐步生成、凝练、升华的时代产物。“党的百年统战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历史。”^[12]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根植于领导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丰富实践，积累了关于“联合谁、如何联合、如何领导”的深刻经验。这段时期，统一战线主要作为革命策略和战略存在，但已蕴含知识化“萌芽”。知识发展的脉络始于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初步确立了联合战线的思想，其核心知识贡献在于确立了“联盟政治”的基本范式。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奠定了阶级分析和同盟军理论的基石。党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等一系列核心策略原则。这一知识演进过程的标志性成果体现于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总结为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法宝论”的提出将统一战线确立为“政治制胜机理”，并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团结多数、孤立敌人”的方法规律，初步阐明了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的命题^[14]，标志着党开始从“专门科学”的高度对统一战线实践进行理论升华，开启了对其系统化知识属性的自觉认知。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理论对统一战线性质、领导权及对象的系统界定，奠定了早期分析范畴；提炼了“求同存异”方法，形成处理阶级关系与政党关系的独特策略，突破了传统联盟理论。但此时统一战线仍主要作为“革命术”而非“政治学”存在，知识形态呈现策略性、应时性特征，尚未形成超越具体革命阶段的系统学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从巩固

新生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对象和任务不断调整，实践内容极大丰富，为理论提炼提供了深厚土壤。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制度化；1954年宪法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理论也实现了从革命斗争策略向治国理政系统理论的升华，统一战线知识形态开始向“制度之学”深入拓展，理论知识贡献聚焦于“政党关系”与“国家建构”领域。

“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15]党明确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多党合作的基本准则，超越了苏联制度模式，形成了“执政党—参政党”关系的中国范式。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概念的提出，将统一战线范围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两个联盟”理论的深化与分析框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对统一战线内部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五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原则也日益明晰和系统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也因此迎来理论发展的重大契机与良好环境。20世纪70—90年代，知识体系与学科意识开始探索发展。统一战线研究主要从属于统战工作实践，侧重于政策阐释、历史经验总结与工作方法探讨。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分析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同年8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9月，邓小平指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范围以宽为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概念并沿用至今。这一时期，党重申和深化了统一战线作为“科学”的认识。1979年3月，李维汉重申“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提法，强调“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是一门科学，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摸到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统战部有关报告中肯定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1985年2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文件形式转发了会议情况报告，进一步明确“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要政策文件和会议精神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撑和建设方向，也推动了知识生产的自觉展开。

此间部分学者开始思考统一战线的理论定位，提出了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设的初步构想。相关讨论多见于学术会议与论文中，其“知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服务于现实工作的需要，聚焦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合法性论证。其核心任务是论证统一战线学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为后续学科化探索做好了初步的理论准备与舆论铺垫。如1989年，朱真的《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出版，这是第一本统一战线学原理性专著。阎志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1990年）、王世豪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1993年）、蔡世藩与肖阳明主编的《中国统战学》（1995年）等著作相继问世，标志着学界进一步明确了统一战线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涵、标识性概念和观点，其学术创新性意义不容忽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学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这一重要论断将统一战线“科学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对统战干部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也内含着对建构统一战线知识体系的深远考量。同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内第一部关于统战工作的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此后,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入了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展现出体系化、学科化与自主性的追求。统一战线学学科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重要契机,学科建设与发展也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明确支持。2020年,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对象、任务作出全面规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权威的政策依据。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既是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论断,这为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学理支撑和重要的理论源泉。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实现根本性创新”。“统一战线在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过程中,破解各领域实际难题,形成标识性概念集群,确立了一套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16]特别是随着“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等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之后,统一战线理论的知识建构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战略价值。

前期大量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探索直接推动了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界重点探讨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归属、基本范畴、发展规律、研究方法等元理论问题,系统讨论“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通识性知识体系”等议题。学界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根基,以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为主体,旨在形成一套根植中国实践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学知识系统,构建层次分明、逻辑贯通的自主知识体系。

三、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主要成绩与重大议题

统一战线从“法宝”到“学科”的演进,从策略性知识向体系性学科的跃迁,完成了统一战线从“革命术”到“政治学”知识形态蜕变,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拓展了知识原创范畴,深刻彰显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政治实践领域的重要贡献。

(一) 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主要成绩

学界已经初步阐释了其基本属性、功能定位与理论框架。经过长期努力,统一战线作为一门“科学”的论断已深入人心,并逐步向建制化的“学科”迈进。从学科属性看,统一战线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科学性、应用性的综合性新兴学科,而战略性则决定了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与功能。统一战线学本质上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政治联盟、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社会党的政治学”,以统一战线的本质与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形成系统化

的知识体系，具有科学性，并服务于统战工作实践，解决现实难题，凸显强大的社会应用性。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核心，形成“十二个必须”体系化表述，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逻辑严密的顶层设计。从功能定位看，统一战线学承担着理论阐释（揭示统一战线规律）、知识生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人才培养（打造专业统战队伍）、实践指导（服务统战工作大局）和话语建构（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的使命，旨在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团结话语”与“同心共识”。在学科理论架构层面，学界初步形成了以“论（基础理论）、史（历史发展）、方法（方法论）、实践（工作实务）”为主干的学科框架。

学界系统提炼与深度阐释核心概念与标识性概念。“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实现‘术语的革命’，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基础。”^[17]学界对“统一战线”“法宝”“领导权”“同盟者”“求同存异”“大团结大联合”等传统核心概念进行了历史溯源和当代阐释，夯实了理论根基，也紧密结合新时代统战工作实践，提炼并阐释了一系列新的标识性概念。

表1 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内在逻辑	标识性概念					
	关键概念	概念群与主要阐释				
为什么建设统一战线	法宝；强大法宝；重要法宝	大团结大联合；团结斗争；团结精神；大团结与真团结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最大的政治；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	领导权；独立自主	人心与力量；同心与共识
	统一战线理论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统一战线理论
	统一战线史	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爱国统一战线
建设什么样的统一战线	五大关系	政党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协商；参政党	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五个认同	宗教关系；宗教中国化；政教分离	海内外同胞关系；一国两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爱国爱港力量	阶层关系；两个健康；建设力；亲清政商关系
	四者联盟	民主党派；党外代表人士；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人士	宗教界人士	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怎样建设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学	领导者；同盟者；共同利益；政治联盟	“同”与“异”；“合”与“分”	统一战线学学术体系；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	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统一战线学叙事体系	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大统战工作格局	基层统战	网络统战；数字统战	文化统战；统战文化	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侨务工作	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
	十二个必须	一致性与多样性	联谊交友；广交、深交党外朋友	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有理有利有节	原则坚定性；策略灵活性	聚同化异；求同存异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学界不仅对“统一战线”这一普遍性政治联盟现象进行了历史与理论的比较与提炼,将“爱国统一战线”“大统战工作格局”“新型政党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从中国深厚治理实践升华为特定表述,与“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等蕴含普遍治理智慧的隐喻性概念进行了有机结合与学理提升。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扎根中国经验,又旨在揭示跨文化、跨制度背景下政治团结与合作普遍机理,并由此提炼出相应的概念谱系与理论分析工具,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兼具本土实践典型性与普遍理论解释力的标志性成果。

方法论意识与范式探索的自觉性持续提升。一是学界不再满足于简单移植现成方法,而是着力自主性思考,形成较强的方法论意识。学界注重系统引入政治学的比较制度分析、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历史学的文献考证、法学的规范分析等综合方法研究,这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研究方法论注入新的活力,深度体现了研究的主体性反思。二是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更呈现出一种积极的自觉“建构”,致力于实现从“政策阐释”到“学理建构”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具有学科特质的研究范式。学界强烈呼吁并具体探索统一战线学概念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的辩证关系及建设任务,开始超越单纯的经验总结和政策解读,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范式的自主性,尤其是强调坚持“两个结合”和系统观念构建概念体系,尝试构建“本体—关系—应用”的概念体系框架,实现从政治概念到学术概念的学理化转化。

自主知识体系在回答时代课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彰显实践的主体性。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成绩体现为问题导向与时代回应的协同推进。基于“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其实践的主体性体现在如何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对凝聚共识提出的新要求 and 目标。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凝聚共识提出的战略要求,统一战线理论深化了对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从“求同存异”的基本规律出发,凝练出“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方法论原则,为处理多元社会的团结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面对数字社会崛起对统战工作创新带来的范式挑战,统一战线理论及时将研究视域从物理空间拓展至虚拟空间,催生了“数字统战”“网络统战”等新兴研究方向,推动统战工作从工具性应用走向范式性变革。面对国际话语竞争中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使命,统一战线理论致力于将“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圆”“新型政党制度”等标识性概念进行国际化表达,将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正是这种问题导向与时代应答的自觉与自主意识,推动统一战线理论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彰显了以理论创新回应实践需求,使自主知识体系保持开放性和时代性。

深度拓展跨学科知识借鉴与融合,统一战线理论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体现在跨学科知识视野的持续拓展与知识借鉴的深度创新。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对象涉及范围广,“五大关系”领域都涉及多学科的理论积淀与方法资源,具有天然的复合性与交叉性特征。学界在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想资源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吸收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步构建起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这种知识借鉴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在统一战线独特的问题意识观照下,实现了其他学科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统一战线学从经验总结走向学理建构提供了丰厚的多学科理论借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从毛泽东思想中的“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爱国统一战线”,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为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统一战线学在学科交叉的“沃土”中不断生长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逐步实现从“科学探索”走向“成熟学科”的历史性变迁。

（二）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大议题

建构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涉及学科定位、概念生产、范式转换、方法创新的系统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作为国家学术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项取向直接反映了国家层面的研究布局 and 战略导向。这些项目的选题、资助规模和学科分布，既是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的“风向标”，也能够从侧面揭示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受到优先关注的议题、亟待突破的理论瓶颈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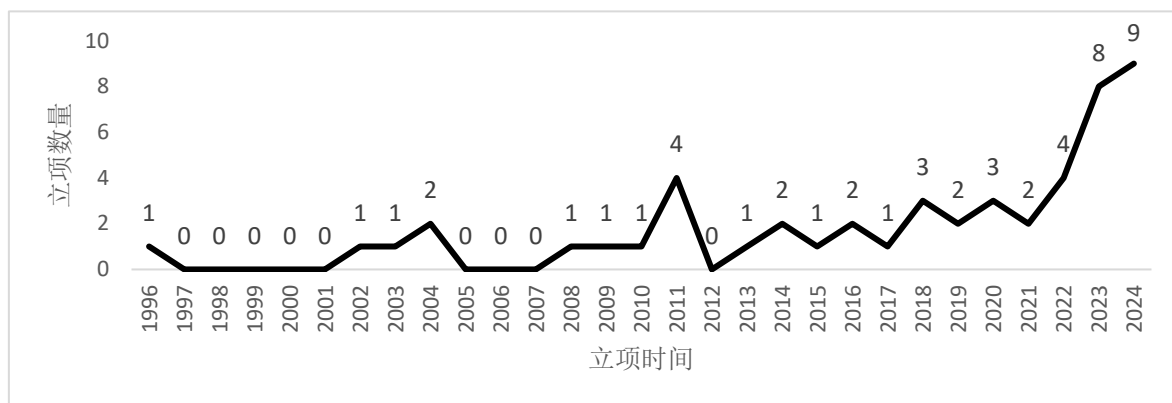


图1 统战理论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梳理与分析基金立项数据，不仅可以验证学界已有研究趋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程中的结构性焦点与现实性难点。如图1所示，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中以“统一战线”或“统战”为主题检索，累计立项43项；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查询系统中开展同类检索，累计立项7项。总体来看，资助项目数量相对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以来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当年立项总数达到8项。从2023—2025年立项项目的主题分布观察，基金资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见表2）：统战工作的历史演进与经验总结，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与完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建构，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机制的实践与创新等。这些选题与当前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强调历史根基、突出体制机制、聚焦话语转换等维度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体现出基金资助对政策导向与实践需求的积极响应。基金项目的布局呼应了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实践导向和话语构建的重点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何在资助机制上进一步引导基础理论的原创性突破，如何推动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以增强理论穿透力，以及如何支持更具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与传播实践。

表 2 2023—2025 年统战理论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情况

项目来源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立项时间
国家社科基金	肖存良	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重大专项	2025
国家社科基金	颜苗苗	全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年度项目	2024
国家社科基金	丁 凌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研究	年度项目	2024
国家社科基金	方付建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研究	年度项目	2024
国家社科基金	郭 帅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统战经验研究（1927—1937）	年度项目	2024
国家社科基金	张 凯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统战宣传与经验启示	年度项目	2024
国家社科基金	张雪梅	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工作研究（1941—1954）	后期资助	2024
国家社科基金	彭玉峰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统一战线研究	后期资助	2024
国家社科基金	潘启亮	完善海外大统战工作格局研究	重大项目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蓝善康	统战视野下的抗战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研究	一般项目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王贞威	大统战格局下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研究	一般项目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李 均	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研究（1921—1949）	青年项目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马 楠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社团统战工作历史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青年项目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胡 凤	文化统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新闻人才培养研究（1931—1945）	后期资助	2023
国家社科基金	冯育林	中国共产党对西南地区土司头人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1949—1956）	西部项目	2023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张录全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	2024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杨荣国	新时代中国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研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青年基金	2024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张振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逻辑体系研究	专项任务	2023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从已有论文来看，学界关于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尚处于破题阶段，整体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仍显不足。截至 2026 年 3 月，笔者在中国知网以“统战学学科”进行主题词检索，发现学术文献仅有 84 篇，其中 CSSCI 期刊来源仅有 4 篇；以“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进行主题词检索，发现学术文献仅有 62 篇，其中 CSSCI 期刊来源仅有 3 篇。按这两类主题词检索，重复的非 CSSCI 期刊来源约有 30 多篇。如以“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主题词检索，发现学术文献仅有 7 篇，与政治学、教育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比较来看，统一战线学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研究存在相对滞后的现象，这种状况与统一战线在治国理政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相称。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大议题和学术争议点，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学科属性与定位问题。这涉及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制度保障，本质上是对其知识自主性的确认过程，也决定着知识生产的关键主体与深层场域。早期研究（1980—1995年）多从“部门政治学”角度定位，如萧超然（1988年）认为统一战线学是“研究统一战线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支；王金钮（1992年）主张其为“特殊政治学”，研究政治联盟的特殊规律。当前学界的主要观点大致分为四类：“政治学归属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归属论”；“独立成为一级学科论”；“交叉综合论”与“应用学科论”。这些讨论和争议的背后，本质是对统一战线知识主体性与普遍性的不同判断，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统一战线知识属性的认识，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长期纠结于“是否独立学科”的形式问题，忽视了知识体系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建构，未能充分体现中国“统一战线”的独特性。

二是重点关注核心概念的生成与理论框架的提炼。学术争议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第一，如何实现“统战工作”与“统战理论”的转换。研究阐释中央精神、政策文件，对于统一思想、指导实践至关重要，但在知识生产的“原创性”与“理论增量”上贡献相对有限。如何对具体的统一战线实践进行理论抽象，以“通约性”“一般性”为指导，在不同领域的统一战线实践中提炼归纳出反映统一战线实践本质的核心概念集^[18]，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第二，如何实现“历史叙事”与“理论抽象”的平衡。对如何提升理论的穿透力与范式意义，将概念与实践智慧进行有效的国际化学术转化，与西方政治学中的“联盟理论”“协商民主”“共识政治”等议题展开批判性对话与互鉴，不少学者从对象、意义、词汇、场域等要素构建标识性概念的分析框架，或强调推进概念的生产、演进、拓展等一系列概念供给，这本身也体现了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创新，但整体上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四、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化推进与建构困境

自“统一战线学”作为学科方向被提出并试点建设以来，在制度构建、人才培养、学术平台等方面取得诸多成绩，但也暴露出知识体系建构不足的结构矛盾。

（一）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化推进

一是形成了较厚实的学科建设基础。虽然学界对学科基础理论如学科归属、基本范畴、学科特点等方面^[19]尚存在分歧，但对学科建设的基础已取得共识。第一，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理论，俄国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经验^[2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天下为公”理念和“合纵”“连横”观点等是统一战线学的理论基础。第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统一战线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思想和新要求，是统一战线学学科化的实践基础。第三，推动学位点建设。2014年，山东大学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设立统一战线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实现了从“研究方向”到“学科实体”的跨越；2018年起，教育部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该二级学科。这一模式使统一战线学进入国民教育序列，获得事实上的学科建制地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明确规定“把统一战线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内容”^[21]，《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指出“具备条件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可以与国内有关高校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22]，这些规定为统一战线学学科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搭建了专业的知识生产平台。经过十余年探索，统一战线学已形成以学术期刊、实体研究中心、品牌论坛为核心的专业研究网络，覆盖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及各类智库。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作为全国性学术组织，在全国设立 11 家研究基地，在协调研究力量、组织课题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在研究阵地建设方面，《统一战线学研究》杂志于 2017 年创刊，成为国内首本以“统一战线学”命名的专业学术期刊，已于 2025 年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于 2025 年进入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这标志着统一战线领域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获得了权威认可。这两本刊物与各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学报共同构成了统战理论成果发表的主阵地。一些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开辟“统一战线学”专栏，扩大了学术影响力。定期举办的“统一战线学论坛”等学术交流平台，为学者们提供了交流空间。

三是建立了专门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当前统一战线学的人才培养已形成四种主要模式。一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与部属高校合作培养模式。2015 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与山东大学正式开始联合培养统一战线学研究生。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学院的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在“坚持联合办学、开放办学，汇聚优质资源，提高办学质量”上实现里程碑式跨越，也标志着统一战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纳入国民教育行列，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和统一战线专业人才培养步入正轨。二是省级社会主义学院与省属高校合作培养模式。2020 年，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签署联合培养统一战线学研究生合作协议，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在研究生培养工作实践层面首次得以真正贯彻落实。此外，还有如广西师范大学（2022 年）、山东师范大学（2024 年）、浙江工业大学（2024 年）以及四川师范大学（2024 年）等高校，分别与所在省份的社会主义学院签约，联合培养统一战线学硕士研究生。三是高校与党政部门合作培养模式。2025 年，重庆大学与重庆市委统战部联合培养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方向研究生，是培养模式的重要创新之举。四是高校或党校独立培养。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自主开设了相关研究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于 2024 年调整组建统一战线教研部，并招收统一战线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这标志着党校系统在统战领域人才培养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高校（党校）+社院”的联合培养机制，普遍实行由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学者与统战部门实务专家共同指导的“双导师制”，具有一定推广性。

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目前基本形成以必修课程（公共必修、学科必修）、选修课程以及补修课程（跨专业考生选修）为主体的架构体系。以湖南师范大学为例（见表 3），该校课程以政治学核心课程为基础，并进行统一战线方面的专业深化，体现了“政治学基础理论+统战专门知识”的复合型培养思路。

制度建构的逻辑要求通过学科目录设置、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为知识生产提供稳定的建制支撑。虽然统一战线学取得显著进展，但其尚未正式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仍属于高校自主设置范畴，其知识生产与制度支撑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仍制约着从“有形建制”向“成熟学科”的深度转化。

表 3 湖南师范大学统一战线学方向硕士生课程（2025 年）

课程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公共必修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3	硕士学位英语课程	48	3
学科必修	1	政治学原理专题	36	2
	2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名著选读	36	2
	3	政治学研究方法	36	2
	4	比较政治制度专题	36	2
方向限选	1	统一战线学原理	32	2
	2	参政党理论专题	32	2
	3	中共统一战线史	32	2
任意选修 （统一战线）	1	统战前沿问题研究	32	2
	2	统战重要文献导读	32	2
	3	统战工作研究讲座	32	2
	4	党外代表人士研究讲座	32	2
补修	1	政治学一级学科综合基础课程	36	2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二）学术建制困境：统一战线学学科化的外在危机

学术建制是保障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外部规则体系和外在制度环境。具体而言，统一战线学学科建制困境主要指向其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社会制度保障与资源支持体系尚不完善，集中体现在学科管理制度、学术组织、学术出版交流、高校人才培养、建设经费等社会资源的有限获取。从学科生成路径看，统一战线学作为一门新兴综合性应用型学科，其创立与发展主要源于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遵循的是典型的“外在后发型”路径，这与那些由于长期知识积淀而自然形成的“内在自生型”传统社会科学存在显著区别。在我国现行的学科管理制度框架下，这一特性使统一战线学呈现出明显的“制度附着型”特征。统一战线学因未被正式纳入国家学科目录体系，目前仅作为高校“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该领域的研究与人才培养长期依附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等学科框架内，仅作为其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或“附属领域”存在，直接导致了统一战线学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学位授予、学术评价等方面缺乏独立的制度依据和标准，发展自主性严重受限，难以形成规模化、可持续的支撑体系。如统一战线教研室的设立多依托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成熟学科，其独立性有限，学术评价、职称晋升等仍需遵循所在学科规则，难以形成真正独立的学术生态。当前统一战线学面临的困境恰恰在于，制度构建

先行，知识体系建设滞后。如果知识生产水平不足，则难以支撑学科建制的独立性，那么学科建制就难免流于形式。

（三）知识体系困境：统一战线学学科化的内生危机

“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由理论性知识、制度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组成的知识体系。”^[23]目前，统一战线学虽已完成从“实践经验”到“制度建制”的初期跨越，但其学科化进程面临“悬浮化”“碎片化”的内生危机，直接制约学科从“政策推动”到“学术自觉”的突破。一是理论基础薄弱。诸多基本概念边界不清、内涵不明，如对“党外知识分子”与“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认定标准等，在政策规定与法规制度之间存在差异。二是知识体系呈现“悬浮化”状态，话语转换融通有限。如丰富的统战政策话语“同心圆”“最大公约数”“亲清政商关系”等，这些话语政治性强、传播力强，但其学理性与解释力尚待深化。三是知识体系呈现“碎片化”状态，缺乏有效的系统整合。基于狭义范畴的统一战线话语研究占比较高，而立足广义视野的宏观研究相对匮乏。能跳出具体领域，从大历史观、大统战观，从学科站位角度出发，对统一战线话语进行战略性研究的成果较为少见。此外，统战理论知识生产的敏感性与学术开放性之间存在张力。统战工作涉及政党、民族、宗教、港澳台、海外等诸多敏感领域，有的方面“涉密级别高，往往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有的方面“重‘做了不能说’的潜绩”。这直接导致一些重大现实问题难以成为公开的学术研究对象，研究者难以及时总结有关经验教训与系统的实践启示。

五、统一战线理论迈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路径

面对学科独立性、知识本土化、话语权提升等多重挑战，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亟需在根基、载体、方法与实践创新四个维度协同发力。这既是回应学科自身发展诉求的内在需要，也是赋能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

（一）以基础理论创新为根基，系统集成标识性概念与知识体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实现“学理自立”。这要求统一战线学研究必须彻底摆脱对西方政治学概念的依附性移植和对国内政策文件的简单阐释，完成从“经验描述”到“理论创造”的范式革命。

一是思想溯源与元理论深耕。系统的理论建构始于清晰的思想脉络。必须深度梳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演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所蕴含的“十二个必须”等规律性认识，将其系统化、学理化。同时，要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大一统”“天下为公”等政治智慧，阐明其与现代统战理念的内在契合，为知识体系奠定深厚的文化根脉与理论合法性，这是确保知识所有权和主体性的“源头活水”。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加强对统一战线基本原理的研究，深入探讨统一战线的本质、规律、价值等元理论问题。

二是实践抽象与标识性概念凝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实践的超越性解释。当前统一战线理

论领域已形成了一批标识性概念，如“大团结大联合”“法宝论”“同心圆”“新型政党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结构、历史演进的研究，提升其学术性、解释力、可对话性。例如，可将“法宝作用”升华为关于“政治力量整合核心机制”的系统理论。此外，还要从统一战线丰富实践中提炼新的概念，提炼一批如“政治联盟韧性”“共识生产机制”“统战网络嵌入性”和“建设力”等兼具中国情境特殊性与理论对话普遍性的标识性概念群，实现解释中国与对话世界相统一。

三是系统集成与理论体系形成。零散的概念需整合为有机的知识网络。应依据“史（思想史与制度史）、论（基础理论与方法论）、方法（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实践（各领域工作）”四大主干，系统构建理论框架。比如，撰写具有权威性的体系化著作，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范畴、基本原理、方法论边界和理论演进逻辑，形成逻辑自洽、层次分明、开放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为统一战线学长远发展提供稳定的理论内核与导航。

（二）以学科体系建设为载体，构筑知识生产的学术共同体

统一战线理论的知识生产亟需以坚实的学科体系为依托，从“知识传承系统”和“学术生态系统”两个维度协同发力，以学科自觉驱动知识体系落地与深化，构建一个充满活力、持续创新的学术共同体。

一是完善知识传承系统，教材、课程与人才培养一体化。组织跨机构、跨领域的权威学者与实务专家，共同编写覆盖本科通识、硕士专业、博士研究各层级的系列化、标准化教材，填补当前权威系列教材严重缺失的空白。教材内容应体现基础理论的系统性与前沿实践的动态性，成为知识体系标准化传播的核心载体。要设计贯通本、硕、博的连贯性课程体系，形成循序渐进的知识阶梯。强化“理论+方法+专业+实践”的课程结构，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包括理论基础课（如统一战线学原理、统战思想史）、方法论课（统战研究方法、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专业方向课（政党、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等各领域研究）、实践研讨课（案例教学、模拟协商、实地调研）。不断扩大现有“高校（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部门”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积极论证和推动高校设立“统战专业硕士”，定向培养高层次、专业化的应用人才。

二是优化学术生态系统，平台、期刊与评价机制协同化。健康的学术生态系统是知识持续生产的基础和前提。要强化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及其各研究基地的枢纽功能，定期举办高层次、专业化的学术年会、专题论坛和青年学者工作坊，将分散的研究力量整合为有凝聚力、有共同话语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同时，鼓励成立跨高校、跨机构、跨地域的统一战线学研究联盟，促进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打造高水平学术期刊阵地，引领学术话语权建设。重点支持《统一战线学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专业期刊，鼓励综合性社科期刊开设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栏，持续提升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建立符合学科特性的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原创研究、服务统战工作的现实需求的清晰导向。

三是强化学科体系，夯实知识体系生产和建制的制度基础。全力推动统一战线学进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这是提升学科合法性、吸引稳定研究队伍、获取制度性资源的根本举措。积极总结“中共党史党建学”成功升为一级学科的经验，加强论证与协调，争取教育主管部门支持，推动统一战线学入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从近期目标来看，可力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独立二级学科；而从长远来看，则应朝着建设独立的成熟一级学科的方向努力。要持续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构建并巩固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党校（行政学院）、科研院所、统战部门“五路大军”之间的常态化、机制化交流合作网络，形成建制性力量与学术性力量相互促进的格局。

（三）大力创新研究方法 with 话语转化方法，推动知识生产与话语传播

一是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融合与方法论创新。统一战线学需超越传统的历史叙述与政策解读，构建一套独具特色、逻辑自洽且能与现代社会科学对话的分析范式。建设“联盟分析”范式旨在为此提供核心框架。统一战线的本质是政治力量的联合，其最深层的动力与成效在于“人心”。应将“人心向背”“政治认同”与“社会团结”确立为核心分析变量与终极解释逻辑。这要求发展精细化的测量工具，例如开发具有信度与效度的量表，量化评估不同策略对特定群体政治态度的影响。同时，深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动态分析统战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密度、中心度）如何影响信任建立与共识形成，将“凝聚人心”转化为可观察、可分析的关系数据与过程机制。借助调查实验与行为洞察探究不同群体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深度案例研究、过程追踪揭示政策协商、共识达成的复杂微观过程。推动研究从定性思辨为主，走向“量化—计算”与“质性—深度”并重的多元格局，提升统战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

二是拓展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强化比较研究与理论对话，纵向开展比较历史分析，提炼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逻辑；横向进行跨体系比较，与西方政党联盟、利益集团政治比较，凸显中国统一战线的“领导性、协商性、长期性”特征；与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进行对话，在互鉴中锚定自身理论坐标，提炼关于“政治整合”更具一般性的中层理论。以核心问题为牵引，打破学科壁垒，形成知识创新的集群效应。推动构建支撑交叉创新的机制，在科研立项中设立“统一战线交叉研究”专项基金；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实验室平台；定期举办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促进深度对话与合作。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交叉融合从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实践。

三是推动知识话语体系转换，完成从“政策阐释”到“学术建构”与“国际对话”的跃迁。知识体系的价值需要通过有效的话语体系来承载与传播。要主动推动话语体系的战略性转换，以清晰有力的话语呈现学科知识。第一，推动政策话语的深度学术化转译。对“大统战工作格局”

“画出最大同心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富含中国智慧的政策理念，进行严谨的学术化提炼与概念化，明确其核心内涵、边界条件、构成维度、测量指标，将其从政策表述转化为可检验、可发展的学理命题。第二，促进学术话语的公共化转化与传播。鼓励撰写高质量通识读物与普及作品，如用生动案例与清晰逻辑，阐释统一战线与中国治理、社会整合的关系，将专业学术话语转化为社会可理解的公共知识。第三，着力实现中国话语的精准国际化表达与对话。要在核心概念对外翻译中坚持主体性与精准性，如对“统一战线”（United Front）等概念，需通过学术语境附注阐明其与中国政治实践相关的丰富战略意涵，区别于西方临时性“联盟”。主动在国际主流学术平台发表研究成果，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提供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实现从话语“出海”到理论“对话”的深刻转变。

（四）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推动自主知识体系赋能国家治理

一是深化实践驱动的理论建构路径。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数字时代认同弥散、全球性议题合作、代际价值变迁等前沿治理挑战。可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实践、共识会议、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国际组织中的多边协调、跨国倡议网络、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等多样化“合作实践”进行系统性比较。如建立常态化的“跨情境实践案例比较研究机制”，鼓励学者深入国内外社区治理、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多利益攸关方合作等多样化“团结实践”场景，开展参与式与比较性调研。从成功的协商模式、共识构建机制、多文化环境下的冲突调解等案例中“提炼通则”，抽象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模式、新概念，如“动态信任构建体系”“异质性组织协同网络”“跨国/跨文化认同融合机制”等，并将之系统化为更具包容性和迁移性的中观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普遍性团结合作知识体系。这有助于将统一战线学从一门“中国特殊学问”提升为对“政治整合”这一普遍性命题具有重要贡献的学科领域。

二是强化理论指导实践创新。着力推动学术成果向多层次治理实践的转化应用。构建“政—学—研”协同的决策咨询与知识转化平台。强化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及各研究基地的智库功能，推动其从学术交流平台向高质量决策支持系统升级。鼓励学者围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增强统一战线法宝效能”“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风险”等重大议题，开展前瞻性、储备性、针对性研究，形成具有扎实学理支撑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咨询报告、改革方案设计、风险评估模型与效能评估体系。建立常态化的需求对接与成果报送机制，确保学术研究紧扣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与实践中的真问题，将关于网络结构、社会资本、协商效能、心理共识等前沿交叉学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供不同层级决策部门参考的“诊断工具包”“策略选项集”和“效能评估模型”。

三是健全知识生产与应用互促的制度化保障。完善统战理论研究成果向政策制定、实践创新、国际对话等多向度输送、采纳与反馈的闭环机制。在相关领域的治理效能评估中，纳入对理论创新与实践结合成果的考量。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学术研究、政策实验、实践反馈与国际比较之间的通道顺畅、互动及时，最终形成具体实践并为理论提炼提供丰富样本；抽象理论又为更广泛、更复杂的治理实践提供诊断工具和策略选择的协同演化格局，形成源于实践又超越实践的团结合作知识体系。如从成功的实践创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有效运作模式、网络平台正能量共识引导机制）中，抽象出具有解释力的中层概念与理论模型，如“弹性组织化整合”“数字时代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复合型共识达成机制”等，使“中国经验”真正转化为可表述、可分析、可迁移的“中国理论”。

四是知识内容需积极回应前沿治理挑战，引导理论创新方向。理论研究需保持前瞻性，主动设置研究议程，回应数字技术革命、社会结构变迁、全球秩序调整带来的根本性挑战。积极运用生动案例和现代传播手段，阐释统一战线与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个人成长的关系，增进全社会的认知认同，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运用传播学、认知科学等理论，创新适应不同文化与圈层的话语表达与叙事方式，提升团结合作的感召力与说服力。例如研究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如何影响社会意见整合与政治共识形成（数字统战与智能治理）；分析人口结构变化、代际更替对政治认同基础的影响；探讨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

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应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具备解释和应对未来挑战的理论储备。

六、结语

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破立并举有序推进。“破”就是确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正确方向,实现理论创新、落地落实与落准落细;“立”就是要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的学术体系为切入点,推进概念体系、问题体系、数据体系、对策体系各方面全面深入,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创新性、主体性和时代性^[24]。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逐步构建起系统化、规范化的“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从“法宝”到“学科”,是理论自信的结晶,是时代所需的知识创新。这一转化过程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建设、改革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系统化、学理化、建制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统一战线学的孕育与发展,不是对西方政治学概念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对政策话语的机械复述,而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自主知识形态,深刻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统一战线领域实现了从实践智慧自觉到系统知识建构的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体性确立与彰显的典范。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仍然面临如何超越政策阐释,实现深度的理论原创与逻辑自洽?如何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整合进统一的理论叙事?如何完成关键概念的“术语革命”,使其既保持中国本色,又能进行有效的国际学术对话?未来的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建构需要始终按照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深入挖掘“两个结合”过程中的实践与理论资源,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深化对统一战线“中国逻辑”的学理思考,加强跨学科协同发展与国际比较,使统一战线学不仅成为一门“在中国的学科”,更成为一门能够为理解人类政治联盟与共识政治贡献独特智慧的“中国的学科”。这既是中国学术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知识宝库的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2] 习近平.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J]. 求是, 2025(11): 4-9.
- [3] 何虎生, 赵文心.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 法宝、和合与平衡[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1(1): 123-133.
- [4] 张献生. 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J]. 政治学研究, 2023(5): 3-16, 207.
- [5] 刘春泽, 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68-182.
- [6] 李超民, 王梦婷. 论统一战线学科化与学科建设[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5): 122-136.
- [7] 李小宁, 路璐. 扎实推进统一战线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4): 14-24.
- [8] 陈明明, 杨东光.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1-12.
- [9] 肖存良.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12.

- [10] 龚少情,李承红.论问题导向与统一战线学自主概念体系的构建[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3):107-130.
- [11] 魏崇辉,夏洋.统一战线学概念体系的核心要义、标识性特征与构建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5-16.
- [1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4.
-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5.
- [15]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8.
- [16] 林华山.建设力:统战工作一个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样本[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1):5-12.
- [17]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24(7):38-51,204-205.
- [18] 李艳霞.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时代使命、知识基础与学术空间[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1):87-96.
- [19] 周述杰,朱小宝.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研究综述[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6):49-53.
- [20] 何虎生,董佳,李桂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8-9.
- [2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
- [22]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 [23] 柯增金,侯勇.“两个结合”视域下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1):28-43.
- [24] 韩云波.破立并举: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辩证逻辑[J].社会科学辑刊,2025(6):67-74.

责任编辑:王京菁 校对:林华山

从“外部规划”到“内在自觉”：元理论视域下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

梁百川 徐海峰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从元理论视角审视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既是夯实“三大体系”哲学根基、推动其自主知识体系从“外部规划”到“内在自觉”术语革命的理论前提，亦是厘清“三大体系”究竟“是什么”“何以可能”“以何可能”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的逻辑必然。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层面分析，当前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设面临多重挑战：学科定位上，存在“依附性”与“主体性”的结构性张力；知识生产中，面临“阐释性”与“建构性”的系统性失衡；话语表达层面，呈现“工具性”与“学理性”的功能性错位。要以元理论自觉引领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推动学科体系从“依附借鉴”走向“主体间性”，学术体系从“经验阐释”迈向“范式创新”，话语体系从“话语移植”转向“话语再造”，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元理论；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2-0038-13

DOI: 10.13946/j.cnki.jcqi.2026.02.003

作者简介：梁百川，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海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体系研究”（2023VZH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自主性发展的中国理念与实践路向研究”（24AKS017）

引用格式：梁百川，徐海峰. 从“外部规划”到“内在自觉”：元理论视域下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38-50.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任务与时代课题。在这一宏大工程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成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能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根本标志^[2]。统一战线学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的一门学科，其“三大体系”建设不仅关系到学科自身的成熟与发展，更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随着统一战线实践的不断深化和学科发展的逐步成熟，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设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学科定位看，有“独立论”与“寄生论”两种观点。“独立论”认为，作为“团结学”和“力量学”，统一战线学是有别于政治学、党史党建学的一门独立学科^[3]。“寄生论”则认为，统一战线学尚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而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党史党建等学科的二级学科^[4]。从知识生产看，有“建构论”与“阐释论”两种观点。“建构论”认为，应加强统一战线学核心概念、分析框架、理论范式等基础理论和基本理论研究，建构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5]。“阐释论”则认为统一战线学的主要任务是阐释和解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历史经验和实践案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联盟”支持^[6]。从话语表达看，有“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两种观点。“学术话语论”认为，应围绕统一战线基本问题，用系列概念、命题、论断等学术要素建构统一战线学的话语谱系和话语体系^[7]。“政治话语论”则认为，在“统战话语”向“话语统战”^[8]演变的背景下，为解决“失语挨骂”问题，应加强话语生产，创新话语方式，推进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的融合发展^[9]。伴随多学科、多理论的积极参与及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学界已初步构建了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的理论谱系与学术体系，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夯实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理论范式。然而，成绩背后仍有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为当下学界对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为何建构、建构什么、如何建构等根本性、前提性的元理论问题，尚未形成足够深入的自觉反思与系统性追问，导致统一战线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张力未能得到充分揭示与化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一战线学的整体发展。

元理论是“源于人类企望理解并不断追求理解的本性而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现象和知识形式”^[10]。任何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都离不开对自身基础性和深层次基本问题进行深刻的元理论思考，并以此构建理论的底层逻辑，彰显其逻辑自洽性和系统完整性^[11]。对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进行元理论审视，是建构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前提。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多嫁接其他学科的既定理论来阐释“三大体系”的独特内涵，鲜有关注这些理论的适配性与前提性问题；更多建构“体系的各个部件”，疏于反思“为何如此建构”这一底层逻辑问题。元理论审视的缺失，导致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建构存在“内涵模糊、外延不清、论断随意、逻辑混淆”^[12]困境，以至于“三大体系”建设呈现“外在驱动性强”而“内在理论自觉性弱”的结构性张力。因此，对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进行元理论审视，厘清“三大体系”立论根基，既是推动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外部规划”到“内在自觉”术语革命的理论前提，也是厘清“三大体系”究竟“是什么”“何以可能”及“以何可能”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的逻辑

辑必然。

二、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的元理论思考

元理论不同于对象性理论,其研究目标不是学科或理论的研究对象,而是学科或理论本身^[11]。从元理论角度分析,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分别对应元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基本理论问题。为此,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对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进行元理论审视。

(一) 本体论:统一战线学“是什么”

本体论主要探讨“存有本身”,旨在回答“什么东西存在”以及研究对象“本质为何”,是一门学科得以确立的基石。对统一战线学而言,本体论审视即反思统一战线学“是什么”,以此锚定其学科对象与学科边界这一根本问题。

近年来,针对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对象和研究边界,学界先后出现了“政治联盟说”^[13]、“关系说”^[14]以及“国家治理说”^[15]等观点,但对统一战线学“究竟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并未达成统一、明确的学术共识。本体论审视的不彻底不仅使统一战线学学科发展缺乏统一方向,而且减弱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动力,最终可能沦为寄生于其他学科的“流浪儿”。不过,从本体论角度看,虽然学界关于统一战线学“是什么”尚未达成“通约性”共识,但学界观点也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从不同维度呈现和揭示了统一战线本质的立体化图景,为进一步探秘统一战线学本体提供了多元视角与理论资源。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6]的重要论断,为统一战线学指明了本体论方向和学科定位。统一战线是“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其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这要求统一战线学应超越“策略”“工作”或“政策”的工具性、实践性认知,将统一战线提升至本体论层面,视其为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客观存在的、具有特定结构与规律的关系性存在。“一致性”是统一战线得以形成的基础,而“多样性”构成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结构特征。统一战线学正是研究这种“一致性”如何引领“多样性”、“多样性”如何丰富“一致性”及其辩证运动的一门学科。在这个意义上说,“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是统一战线学的根本性问题和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治联盟”问题。这从本体论层面厘清了统一战线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使统一战线学与以“权力”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和以“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等学科区分开来,其独特而又独立的学科定位得以确立。

在现实性上,“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并非抽象的研究对象,而是具象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一具象化不仅明晰了统一战线学的学科边界,而且廓清了统一战线学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一是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政治联盟现象最本质的特征,这一特征规定了联盟的性质与方向,使统一战线与人类历史上其他政治联盟区别开来。二是“联盟对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政治联盟虽然在不同时期内涵、称谓和构成多有变化,

但涵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海内外同胞等广泛力量的“大团结”始终没变，体现了统一战线学学科对象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三是机制规律。统一战线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联盟“形成、发展、巩固”的动态过程、特殊矛盾及其内在规律。四是价值向度。统一战线学主要围绕“五大关系”“十二个必须”等主要内容展开，落脚点聚焦联盟在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同目标等层面的治理效能。从本体论角度看，统一战线学这一特定的、聚焦于政治联盟“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的研究场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无法完全覆盖和替代的，这为统一战线学的学科体系划定了清晰的边界^[13]。

从历史维度看，统一战线学的本体论基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调整。历经发展，其本体论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学本体论的这种“变”与“不变”始终建立在“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这一元理论基础之上，其“三大体系”建构也必然以其为底层逻辑。

（二）认识论：统一战线学“如何可能”

认识论关注知识生产的逻辑、方法及有效性标准，对知识生产具有前置性、意向性和方向性作用^[11]。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必须回应“如何可能”这一认识论根本问题。这不仅关乎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关乎知识生产的逻辑与标准。

近年来，针对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学界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开展了积极的理论建构，已初步形成了统一战线“学理、哲理、道理”的理论谱系。例如，刘春泽、张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探讨了统一战线学“根基—基石—基点”三位一体的理论基础^[14]；魏崇辉、夏洋立足“本体—关系—应用”三维构建包括统一战线本体核心概念群、关系概念群、新领域新方法概念群的统一战线学概念体系^[17]。但整体而言，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生产仍处于模仿、嫁接的“初级阶段”，与建构中国特色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任务尚有一定差距。对统一战线“如何可能”这一元理论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论反思，是导致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相对不足的主要原因。从认识论角度看，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并非对既有理论框架的简单套用或对实践经验的直观描述，而是深刻把握其特殊矛盾、特殊规律基础上的系统性理论抽象与逻辑建构，具有其独特的认识论逻辑与检验标准。

首先，知识生产的逻辑前提源于“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这一原则要求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关于阶级分析、群众路线、联盟策略等方面的基本原理，以确保其理论的价值性、真理性与方向性。同时，知识生产必须立足中国大地，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党情、社情出发，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避免生搬硬套外来理论。尤其应挖掘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大一统”“协和万邦”“民胞物与”“求同存异”等思想智慧，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化根基，彰显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与独创性^[18]。

其次，知识生产遵循“实践—理论—实践”循环上升规律。“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始于经验，又终结于经验。”^[19]统一战线知识绝非书斋里的先验思辨或纯粹的逻辑推演，其源头活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统战实践。以统一战线历史为例，它历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任务重心的调整以及统战实践的变化。反过来，经过理论提炼与系统化的统一战线知识，又为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导。例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实践探索升华为理论命题后，又有力推动了统一战线在民族领域的实践创新，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能动性。理论与实践互构的认识论自觉，既确保统一战线知识生产扎根实践沃土，又实现了理论对实践的前瞻性引领。

最后，知识生产检验标准的“二重性”。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需经受“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双重检验。一方面，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必须准确反映统一战线客观规律，回应统一战线实践的“理论之问”，并经受知识生产一般意义上的逻辑论证，彰显“一般知识”所必备的“普遍真理性”。例如，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但其知识生产始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历史进程相耦合，科学解释不同历史阶段统一战线的特殊矛盾及其逻辑机理，蕴含了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凝聚力量、整合社会的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20]。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应对标“十二个必须”，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性”检验并非主观臆断或政治宣示，而是内嵌于知识生产全过程。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生产不仅要揭示“是什么”“为什么”，更要回答“为了谁”“服务谁”这一根本性价值问题。

（三）价值论：统一战线学“以何可能”

价值论关乎学科存在的价值意义与关系性评价，关乎统一战线学“以何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有学者指出，经过百年发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已从“联盟之术”走向了“强国之道”^[8]。可见，统一战线学的价值根基早已根植于中国政治实践与历史文化传统，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承诺与规范。

首先，“凝心聚力”是统一战线学的价值诉求。与西方政治学强调自由理性、权力博弈与党派竞争的价值预设不同，统一战线学将“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作为学科的价值诉求，致力于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这种价值承诺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导向和人民性底色，最终指向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百年来，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团结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力量学”，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动力学”，以及新时代的“复兴学”，其价值承诺一直聚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正是这一价值承诺，构成了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规范性基础”，确保了这一学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能够始终坚守正确的价值立场。

其次，“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学的价值引领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21]统一战线学理论建构、范畴提炼、话语表达，都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任何试图“价值中立”或偏离这一核心价值的理论尝试，都与统一战线学的价值本质相悖。这一规范性前提，明确指出了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鲜明的价值底色和政治本色。例如，在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时，不仅要考察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条件性和有效性，更要审视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

否服务于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确保策略方法的运用始终在正确的价值轨道上。如果忽视这一价值维度，统一战线学就会丧失其学科应有的政治功能。

最后，“美美与共”是统一战线学价值形成的内在机理。“美美与共”强调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合作共赢，这与统一战线“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统一战线领域，各阶层、群体、民族及其不同信仰的社会成员，如同百花园五彩斑斓的花朵，各有其独特之“美”。这种“美”既体现在各自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文化传承上，也体现在各自为统一战线所作的独特贡献上。统一战线并非要抹杀“差异”，而是致力于搭建容纳多元之“美”的政治联盟并实现合作共赢。例如，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既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一根本之“同”，也要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利益关切，保护和传承其多样之“异”，在各美其美中求同存异。这种价值机理要求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设必须充分关注不同群体、阶层和成员的合理诉求，坚持人民至上，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构建多元一体的价值共识，使统一战线成为不同社会成员各展其长、各得其所、各得其美的共同精神家园。

三、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的现实挑战

“三大体系”建构是推动统一战线学从“工作阐释”向“成熟学科”迈进的核心工程。然而，从元理论视角审视，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构建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制约着学科的独立发展与理论创新。

（一）学科定位：“依附性”与“主体性”的结构性张力

学科体系是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的基础架构。但在学科定位上，统一战线学面临“依附性”与“主体性”的结构性张力。

长期以来，统一战线学因其研究对象的实践性与复合性，在知识版图中呈现出一种“依附性”特征——理论资源、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多借鉴、移置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公共管理学等传统成熟学科。这种跨学科滋养虽具有必要性，但因缺乏充分的整合与转化，导致统一战线学“问题域”模糊，其核心关切——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团结、在多元中凝聚力量的独特规律，被稀释或掩盖在相关学科的话语体系中。其后果是，统一战线学学科边界游移不定，难以形成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概念体系独特性和方法论自觉性的坚实“主体性”内核。以至于统一战线学常常被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工作领域”或“政策领域”，而非一个拥有自主知识生产与再生能力的、稳固的“学科实体”，进而导致统一战线学长期以来缺乏对自身学科特殊矛盾、内在规律、核心范畴以及元理论问题的深度挖掘与系统性建构，更遑论形成具有学科标识度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近年来，随着学科价值的凸显，学界关于统一战线学强化“身份认同”、增强学科“主体性”的呼声不断高涨。这种主体性诉求意味着统一战线学需重新审视原有的“寄生性”学科定位，廓清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探索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逻辑必然和理论范式。但由于统一战线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聚焦政党、民族、宗教、阶层、群体等不同社会力量，涉及复杂的利益协调、政治整合、社会凝聚等问题，其研究内容又天然地与政治学中的政党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整合、历史学中的历史变迁等领域存在交叉，使其“主体性”建构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若

过度强调与其他学科区隔以凸显“主体性”，可能陷入“画地为牢”困境，失去跨学科借鉴的丰富养分，导致学科封闭与僵化；另一方面，若继续延续依附性学科路径，则“主体性”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学科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难以彰显。

“依附性”惯性与“主体性”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使统一战线学在学科定位上时常处于左右摇摆状态，时而强调与其他成熟学科的关联性以寻求学术合法性和资源支持，时而又强调独立性以彰显自身价值特质和学科必要性。这种摇摆不仅使统一战线学难以形成稳定、清晰且获得广泛认同的学科定位，而且使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缺乏强有力的学科依托和学术根基，以至于学科发展常常陷入“身份焦虑”的困境。

（二）知识生产：“阐释性”与“建构性”的系统性失衡

学术体系是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的核心，决定着其知识生产的逻辑与效能。长期以来，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面临“阐释性”有余而“建构性”不足的系统性失衡。尽管“阐释性”研究对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积累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阐释性”学术偏好，也导致统一战线学在原创性理论建构、深层规律揭示以及复杂现实问题的预见性回应等方面存在不足。

一方面，研究议题设置被动。统一战线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这本应是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的优势。但长期以来，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却因过于重视实践性而制约了其研究议题的超前性。尤其是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议题大多以“文本解读”和“经验总结”为主要内容，使其知识生产常常陷入“政策在前，研究在后”的被动窘境。长期以来，统一战线学研究议题大多围绕政策更迭而变化，缺乏超越具体政策语境的、具有持久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前瞻性成果。这种状况使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往往成为政策文本的“学术化转译”，而非基于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深度洞察与理论创新。例如，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已有成果大多聚焦其概念内涵、政策解读和经验阐释，而对其在“两个大局”背景下的独特运行机制、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优势、数智时代政党建设的适应性创新等深层次理论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未能形成具有原创性的分析框架和学理阐释。

另一方面，理论建构相对不足。系统的理论、严谨的概念、规范的范畴是知识生产的基础和重要表征。从学术史看，经过多年的学术努力，学界围绕“四个基本概念”“两对基本范畴”“两个基本规律”和“五个重点研究领域”等问题，初步建构了统一战线学的概念谱系和命题^[22]。但已有成果“大多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化命名和概念化梳理，而非遵循一种理论逻辑获取的抽象化界定”^[23]。例如，统一战线学的“联盟”“团结”“共识”“包容”等概念，仍直接沿用日常政治概念或相关学科术语，缺乏严格的、规范的学术界定与谱系化建构。理论建构的不足直接引发统一战线学核心概念提炼、理论模型构建以及因果机制解析等学术创新的相对滞后。

这种“阐释”强而“建构”弱的知识生产格局，使统一战线学学术创新和理论建构往往滞后于鲜活、生动的统战实践，理论对实践的引领和塑造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制约了统一战线学知识生产的原创活力与理论深度。

（三）话语表达：“工具性”与“学理性”的功能性错位

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不仅承载着政策宣传与实践指导的工具性价值，更彰显出统一战线学严

谨的学理支撑与学术表达的理论品格。然而，当前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面临“工具性”与“学理性”功能性错位困境，这制约了统一战线学话语的学术穿透力和叙事传播力。

一方面，统一战线学大量话语依赖政策文本的“转化”与“转述”，是政策话语的“知识化”转化。这种基于强烈而鲜明政治属性的话语生成机制，使统一战线学话语呈现出鲜明的“工具理性”。例如，从话语演进角度看，“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革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和“大统战”的话语更迭^[24]。这种以“文件话语”“政策话语”为核心的“口号式”话语，虽然在服务统战工作、传递政策意图方面具有一定的即时性和操作性，但其话语内容侧重于“做什么”“怎么做”的操作层面，而对“如何可能”“以何可能”以及“内在机理”“矛盾规律”等深层次的学理追问缺乏足够的语言自觉。“工具性”话语因无法深刻揭示实践背后的道理、学理与哲理，往往会随着统一战线阶段性任务的结束而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话语”。缺乏理论深刻检视和论证的“工具性”话语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话语谱系，导致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因缺乏持续的学理支撑而较难获得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与语言穿透力。

另一方面，部分话语在追求“学理性”过程中，又陷入过度“学术化”“抽象化”窠臼。一是西方话语的机械移植。一些研究采取“拿来主义”，直接移植西方话语概念和表达范式，如“社会资本”“身份政治”“治理理论”等，试图以此提升统一战线学的“学术品味”和“理论深度”。然而，这种脱离中国统一战线具体实践和独特语境的“学理建构”，既不能准确解释中国统战实践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优势，也难以精准反映统一战线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规律，造成“学理性”话语的“悬浮化”和“空泛化”。二是其他学科概念的直接套用。研究表明，话语体系是建立在特定感性经验基础之上，经过理性思辨而凝练的具有学科普遍性意义的概念、术语、命题以及定律、定理等知识，呈现出自身学科的系统性、逻辑性和方法论意义^[25]。但目前统一战线的“团结话语”“力量话语”生成逻辑，大多依赖于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话语框架。虽然这种套用能够短期内快速搭建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但嫁接其他学科话语概念无法精准表达统一战线学学科的内在逻辑和鲜活案例。“话语搬运”看似具有了某种“学术”外观，但其学理基础并非深植于统一战线实践沃土，不能深刻揭示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和内在规律，甚至遮蔽了统一战线话语自身的理论光芒和实践智慧。

“工具性”与“学理性”的功能性错位，使统一战线学既难以形成真正具有解释力和引领力的学术话语，也无法构建起能够有效指导实践并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认同的话语体系，制约了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的整体构建与自主发展。

四、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针对现实挑战，统一战线学需立足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推动“三大体系”从“依附借鉴”走向“主体间性”、从“经验阐释”迈向“范式创新”、从“话语移植”转向“话语再造”，以元理论自觉引领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

（一）学科体系：从“依附借鉴”走向“主体间性”

目前，针对统一战线学“学科依附”困境，有学者主张从学科论、实践论和组织方法论层面

建构其独立的学科体系^[26]，也有学者主张从“史、论、方法、实践”四个层面探索统一战线学四大主干学科^[14]，更有学者直接提出统一战线学“一级学科论”的学术畅想^[27]。以上观点均具有其合理性，也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多元化的学术视野。但从元理论角度分析，以上探讨更多停留在学科内部结构要素的调整与优化层面，尚未从根本上触及学科定位的哲学基础与基本范式。针对现实困境，构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不能简单停留在“独立”或“依附”的二元对立思维上，而应引入“主体间性”这一哲学范式审视其学科定位。“主体间性”强调统一战线学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非孤立封闭的系统，而是在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交流互动中彰显其独特价值。这要求统一战线学既要明确自身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图谱中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凸显学科主体性；又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智慧以丰富自身体系，避免因过度强调“独立”而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

为此，可从两个层面推进学科体系建构。一方面，突破单一学科知识壁垒，探索“问题导向”的学科交叉融合路径。可以围绕“如何科学阐释和有效指导政治联盟”这一核心问题，打破传统学科“一亩三分地”思维，主动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法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与资源，形成“主体间性”的学科生态。多学科交叉融合，并非简单的理论叠加或粗暴的概念移植，而是以统一战线核心问题为轴心，将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有机整合，形成既能深刻回应自身核心关切，又能与其他学科有效对话的知识生产机制。这一机制能确保统一战线学在科学阐释和有效指导政治联盟的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学科优势和不可替代的学科价值，巩固和强化学科主体性。

另一方面，构建“一体多翼”的学科架构。“一体”即坚持以统一战线基础理论为主体，系统梳理统一战线理论成果，夯实学科确立的根基性知识体系，筑牢学科基础。具体而言，构建统一战线学学科基础理论框架，包括统一战线学学科的概念范畴、内在规律、本质属性、价值功能、基本原则、组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等核心内容，形成逻辑自洽、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这是学科独立和发展的“根”与“魂”。“多翼”则是依据统一战线的多样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分化出若干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分支学科群与交叉学科方向。各学科分支在统一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统摄下，形成逻辑严密、主次分明的学科群落。例如，针对统战工作对象，可以设置政党统战学、民族统战学、宗教统战学、阶层统战学、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学、港澳台统战学、海外统战学等分支学科；基于统一战线工作方法的特殊性与专业性，可以拓展出统战工作方法论、统战心理学、统战传播学、统战管理学等应用学科。“一体多翼”的学科架构，使各分支学科和交叉方向“众星拱月”般围绕在统一战线基础理论这个“体”的周围，形成既能丰富统一战线学学科内涵，又能精准回应统一战线“实践之问”的自主学科体系。

（二）学术体系：从“经验阐释”迈向“范式创新”

学界普遍认为，当下诸如“联合、同盟、参政、合作、协商等核心概念为统一战线学提供了高识别度的理论标签”^[23]，但统一战线学的学术建构和理论创新仍相对滞后。推动知识生产从“经验阐释”迈向“范式突破”，已成为建构统一战线学学术体系的必由之路。

首先，建构高识别度核心概念群。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28]。核心概念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元素、逻辑基础与学术灵魂^[29]。目前，学界已经

初步建构了统一战线学基本框架。但总体而言,现有成果大多停留在经验阐释层面,尚未从道理、学理、哲理层面对其进行抽象化理论建构。这也导致统一战线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只能依附和嫁接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概念,难以建立自身高识别学科特征的核心概念体系。由此观之,学界必须强化理论自觉,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统战故事”,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提炼升华为“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丰富统一战线学理论谱系和学术体系。例如,对诸如“一致性/多样性”“政治吸纳/政治参与”“凝聚共识”“社会整合”等范畴进行概念化抽象、类型学划分和操作化测量,明确其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使日常政治话语转化为规范、严谨的学术概念,形成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的“核心概念群”。

其次,完善“中间理论”。“中间理论”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专注于特定领域与特定现象的一种理论形态^[30]。这一理论聚焦“有限范围内的社会现象”,通过可操作化概念实现理论建构与经验验证的有机结合^[31]。完善“中间理论”,能够弥合统一战线学“宏大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的理论鸿沟,增强其理论解释力。一方面,提炼本土化、原创性的中间理论。学界应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大地,聚焦统一战线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提炼具有理论创新性和学术解释力的本土化“中间理论”,夯实统一战线学理论基础。例如,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命题,可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不同层面认同的中间理论,为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借鉴和融合相关学科的中间理论资源,丰富统一战线理论体系。例如,可引入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统一战线组织网络中信任、规范、符号等社会资本要素对凝聚共识、整合资源的作用机制,或运用政治学中的“协商民主理论”阐释统一战线协商实践的运行逻辑与效能。这种跨学科的理论融合,为统一战线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论工具,推动统一战线学学术体系从经验描述向理论建构的深化。当然,这种借鉴绝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将其核心逻辑与统一战线的特殊矛盾与特殊规律紧密结合,从而形成具有统一战线学学科标识度的中间理论,以此提升统一战线学的学术创新力和理论解释力。

最后,创新研究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统一战线学经历了从“经验总结”与“政策阐释”为特征的单一规范研究,到科学化、技术融合与范式创新的发展阶段^[32]。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方法仍未突破传统的描述性与阐释性研究范式,尚未构建起能够揭示因果关系、预测发展趋势的解释性方法论框架。为此,需打破方法论壁垒,积极借鉴定量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前沿方法,丰富统一战线学方法论工具箱。例如,在分析新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时,可通过历史文献法梳理传统社会“士农工商”阶层互动的历史经验,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群体画像与互动图谱,并运用统计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多元方法融合揭示不同群体在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上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及其辩证关系。同时,学界还应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统一战线学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提供更为精准的实证支撑。例如,利用大数据对网络空间中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情感倾向分析与语义挖掘,实时捕捉网上社会思潮动态及其潜在影响,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对可能出现的统战对象分化、利益诉求冲突等风险进行预测与评估,为精准化、智能化统战工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话语体系：从“话语移植”转向“话语再造”

从学术史角度看，统一战线话语经历了从“以团结赢得斗争”到“以团结强国复兴”的话语演进^[14]，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统战工作的特定任务和话语特色。但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对政策话语和其他学科话语的简单移植或机械套用，否则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不仅会失去自身学科特有的“经验关怀”，而且有可能因“沉迷于话语理论的重复论证”^[33]而表达乏力。统一战线学需要告别长期以来“话语移植”的生成范式，通过“话语再造”，建构既有学科特色又有学术品格、既有解释力又有传播力、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学科魅力的自主话语体系。

首先，政策话语“学术化”。与政策话语鲜明的时效性、指令性和实践性不同，学术话语更强调学理性、逻辑性、系统性和普遍性。实现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转化，需要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重要论述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深入的学理挖掘、概念提炼和理论升华，使其成为统一战线学高度标识性话语。以“同心圆”为例，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不能仅将其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层面，而应赋予其规范严谨的学术概念，围绕圆心、半径、层次等核心要素将其演绎为具有普遍学术解释力的学术话语^[14]。这种话语再造既要保持统战话语的学科特色，又要符合理论逻辑和学术规范。政策话语“学术化”需要学界具备足够的理论自觉和学术敏感度，善于从政策实践中发现普遍性理论问题，并按照知识生产规律进行规范、严谨的话语建构。

其次，历史话语“时代化”。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法宝，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话语资源。然而，如果把历史话语不加转化地直接挪用，容易导致话语“陈旧化”和“疏离感”，难以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和话语语境产生共鸣。“话语再造”要求将历史话语置于“两个大局”宏大背景下进行重新解读与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生命力。例如，对于“又联合又斗争”这一历史话语，不应仅仅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统战工作的策略手段，而应从现代政党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整合的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智慧、辩证思维和治理逻辑，将其提炼升华为政治共同体建构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动态平衡”理论框架。通过揭示“联合”与“斗争”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统战对象中的具体表现与内在张力，使这一历史话语既保留其历史厚重感，又能为理解和指导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提供学理支撑。这种“时代化”转化，不是对历史话语的否定或割裂，而是在时空对话中，激活其内在理论潜能，使“老话新说”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话语桥梁，增强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的历史纵深感和现实解释力。

最后，本土话语“通约化”。作为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论载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思想内容和价值支撑^[34]。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其中的“和合”“兼容”“中庸”“天下为公”等理念，以及统一战线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肝胆相照”等中国特色的本土话语，是建构新时代统一战线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但长期以来，部分本土话语因缺乏有效的学术转译和概念对接，难以有效进入国际学术对话场域而陷入“自说自话”困境。“话语再造”需扎根中国实践，积极探寻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议题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结合点，推动本土话语“借船出海”，实现统一战线话语在不同文明、文化中的“通约化”表达。例如，将“和合”理念与当代全球治理中的“共同安全观”“文明对话”等议题相衔接，阐释其“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思想内

核对化解文明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话语价值；将“求同存异”原则与国际社会倡导的“多元一体”“包容发展”等理念进行对话，揭示其在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民族宗教问题以及社会群体差异方面的普遍适用性和实践智慧。本土话语“通约化”既彰显了统一战线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信和学术自觉，又能打破“文化壁垒”、破除“失语失声”困境，为统一战线学走上国际学术舞台，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支持。

五、结语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5]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构，正是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的迫切需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统一战线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唯有以高度的元理论自觉，破解统一战线学学科定位模糊、知识生产滞后与话语表达乏力等现实问题，才能推动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建构，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展望未来，统一战线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持续深化与完善，仍需学术界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扎实的研究、更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回应人民之需和实践之急。这不仅是统一战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更是其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中国智慧、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由之路。通过持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统一战线学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实践中，不断彰显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强大的学术魅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和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N]. 人民日报, 2022-04-26(2).
- [2] 刘伟, 臧峰宇, 林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和时代使命[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9): 28-32, 41.
- [3] 王军. 推进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 反思、基础、归属与对策[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5): 22-30.
- [4] 钱再见. 从科学到学科: 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4): 45-53, 242.
- [5] 杨跃进. 论统一战线概念的外延[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2): 50-60.
- [6] 闫涛, 刘浩然. 高校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的建设与践行路径[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2): 32-35.
- [7] 杨彬彬. 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机制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52.
- [8]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126-144.
- [9] 郭路.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表达——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融合[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6): 28-32.

- [10] 李振伦. 元理论与元哲学[J]. 河北学刊, 1996(6): 26-31.
- [11] 何明.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 元理论的视角[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5(6): 5-13.
- [12] 王磊. 建构统一战线“元理论”及其学术规范[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5): 47-49.
- [13] 林尚立, 肖存良, 等. 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99.
- [14] 刘春泽, 张换. 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图景与实践进路——基于“三大体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68-182.
- [15] 张献生. 统战思维: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13-21.
- [1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17] 魏崇辉, 夏洋. 统一战线学概念体系的核心要义、标识性特征与构建逻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1): 5-16.
- [18] 李勇刚. “大统战”与中华文化“大一统”传统[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3): 5-15.
- [19] 爱因斯坦文集: 第1卷[M]. 许良英,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445.
- [20] 李艳霞. 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时代使命、知识基础与学术空间[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5(1): 87-96.
- [2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N]. 人民日报, 2022-07-31(1).
- [2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 建设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学[N]. 光明日报, 2014-01-04(1).
- [23] 许奕峰. 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回溯性反思[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3): 131-142.
- [24] 张超, 曹文宏. 中共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内在逻辑[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5-24.
- [25] 虞崇胜. 知识体系的形成须遵循其发展规律[J]. 探索与争鸣, 2020(9): 14-16.
- [26] 丁三青. 关于统战学学科构建的若干问题[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3): 6-9.
- [27] 李小宁. 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情况的整体思考[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6): 4-10.
- [28] 余源培, 等. 简明哲学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230.
- [29] 宇文利.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概念体系[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5(11): 90-98.
- [30] Robert K.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39.
- [31] 胡永恒, 田士颖. 理论旅行: 中层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实践及展望[J]. 浙江学刊, 2025(6): 163-173.
- [32] 张树桐. 论中国统一战线学科性质的三个基本点[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997(1): 14-16.
- [33] 王铭铭. 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58.
- [34] 董小玉, 王雯雯. 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挑战与应对[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1): 50-58, 286.
-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1.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林华山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结构、重大命题与实践路向

樊士博 陈 娜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 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人民政协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不仅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日益完善, 也在实践中日益形成丰富完备的自主知识体系。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职能使命与实践规律的系统性知识表达。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发轫于协商建国的政治实践中, 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发展。中国共产党围绕人民政协进行的理论创新, 既为构建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依据, 也推动着知识体系的更新发展。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围绕“价值—主体—行动”的逻辑层次展开, 形成了相互联结、相互支撑的结构体系。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回应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重大命题: 提供了基于合作而非竞争的新型党际关系知识, 贡献了柔性治理与协商共治的国家治理知识, 丰富了以民主促团结、以包容求发展的社会整合知识。进一步构建富有解释力、影响力的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 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 不断提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向世界讲好人民政协的故事。

关键词: 人民政协; 自主知识体系; 标识性概念; 统一战线; 协商民主; “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051-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风腐同查同治的统合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25CDJ080)

作者简介: 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陈娜,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

引用格式: 樊士博, 陈娜.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结构、重大命题与实践路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51-6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这彰显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指出：“75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是科学、有效、管用的制度安排，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2]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政协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不仅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日益完善，也在实践中日益形成丰富完备的自主知识体系。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对制度创造实践的知识总结，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政协的理论方针政策之中，并通过学界的研究得以深化阐释与创新表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成果。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自主”，即强调本土化的知识生产，而非外源式的知识搬运。

学界对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从履职实践出发探讨人民政协的知识生产。围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核心职能，学者们阐释了由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构成的团结型政治^[3]，责任政治视角下的协商式监督^[4]，集利益、意见和社会视角于一体的复合型群体代表^[5]等概念。这些概念将人民政协实践转化为可阐释、可对话的学术命题，实现了政治形态、监督方式、代议制等方面的知识创新。其二，从特定领域出发，研究同人民政协相关的某一具体标识性概念。有学者立足全过程人民民主^[6]、新型政党制度^[7]等宏观方面分析人民政协的知识图谱；也有学者从人民政协内部运转的具体设计出发，剖析了界别^[8]、委员^[9]、双周座谈会^[10]、年度协商计划^[11]等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揭示了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其三，从大历史观出发，开展人民政协知识溯源。学者们考据了人民政协的名称改易^[12]、厘清了“政治协商”的概念由来^[13]、梳理了协商民主的历史理路^[14]，使得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在制度横剖面延展的同时，也沿着历史纵切面延伸。学界虽围绕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了多维度的知识增量，但各“知识点”仍处于碎片化状态。与此同时，相较于统一战线等关联领域已呈现出学科建制的趋向，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仍显薄弱，在学术层面的理论深度与话语转化不足。

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化，大国博弈已从经济、军事等领域向制度、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深度延展。凭借现代化的先发地位和互联网平台优势，少数西方国家提出的“民主专利论”“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体系占据着国际舆论的主导，为其霸凌行径辩护的同时，试图消解其他国家制度的合理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5]人民政协在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多元利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亟须加快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以知识上的自立自强突破西方话语围堵，在制度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阐释“价值—主体—行动”

标识性概念体系，立足比较视野展现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对国家治理中重大命题的科学解答，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增强中国制度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参考。

二、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生成

人民政协的核心政治定位经历了从“代行权力机构”到“统一战线组织”的回归，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变迁过程。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同步演进，依次聚焦了新旧政协之分、政协与人大之别、政协与其他政治组织的内在关联。

其一，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在协商筹建新中国的实践中产生。全民族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达成协议，旧政协应全国人民的期待召开。然而，由于国民党单方面撕毁政协决议，和平创建民主国家的愿望落空。尽管旧政协没能收获实质性成果，但通过召开党派会议协商国是的民主形式已被人民认可。顺应民心与历史大势，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6〕}这一呼吁得到了广泛响应，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也由此提上日程。周恩来对比新旧两种民主议事方式，深刻揭示了新政协的运行逻辑。他强调：“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 and 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16〕29}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承担了建设新中国的重大使命。同时，人民政协被写入共同纲领，得到了制度性确认，标志其自主知识体系开始确立。不同于国民党“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17〕}的党同伐异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协以团结、民主为两大主题，实现了对旧政协与旧式民主的双重超越。

其二，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在建设和改革中发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有无存在必要”的讨论悄然滋生。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传达记录，毛泽东强调：“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18〕}同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16〕211-212}。人民政协的知识生产重点转向团结与联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协实现了多方面知识增长。邓小平强调：“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6〕353-354}这进一步扩展了人民政协知识广度。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指出：“要大力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为人民政协事业更好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19〕}在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民政协性质、地位、主题、职能等相继完善并载入宪法、政协章程及中央有关重要文件，进一步丰富了知识体系的规范性和制度性内容。

其三，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在新时代得到完善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在实践基础上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深化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完善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根本方向。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15] 266} 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人民政协“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回答了人民政协“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被概括为“十个坚持”，为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划定了思想论域。此外，近年来与人民政协密切相关的“新型政党制度”“专门协商机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标识性概念使用得更加频繁，为人民政协知识生产提供了广阔视野。学界关于人民政协知识生产的主动性显著提升，相关研究从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切入，围绕网络协商议政、数字民主等时代议题进行研究与阐释，形成了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学术矩阵，提升了知识表达的丰富性。

三、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结构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分散在不同知识单元中，包含“价值—主体—行动”三个层次。价值层指向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主体层对应知识体系的生产者，行动层建立在主体与价值基础上，表达了知识体系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各个层面的标识性概念是相互联结、相互支撑的。

（一）价值层：以观念为中心的标识性概念

价值层面的标识性概念揭示了人民政协的思想追求，统摄主体层面和行动层面，在整个概念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价值层的标识性概念主要包括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民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团结大联合等。这些概念不是单纯的功能描述，更承载着政治大一统的价值观念。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个体主义逻辑，大一统是古代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形态，是一种文明认同和政治统一相结合的政治形态^[20]。“爱国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等概念彰显了中国作为现代大一统国家的深层特征^[21]。在大一统框架中，一致性追求和多样性吸纳有机统一是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组织的作用，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包容多样而不丧失主导，把凝心聚力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22] 这要求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兴，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团结的根本指向在于处理好人心和力量的关系，将社会各界的智慧转化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合力。

价值层面的标识性概念显示了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观念，为主体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在具体实践中，人民政协团结联合的重点能够根据社会结构变化和国家战略需要做出动态调整。比如，面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时，人民政协将其吸纳到相应界别中，参与政协活动，“建设力”^[23]的标识性概念被提炼出来。再如，《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我国职业主播规模 3 880 万，同比增长了 1.5 倍^[24]。网络主播影响力大，对这一部分人进行团结联合有助于传播正能量。这些实践促进了人民政协相关标识性概念的创新，构成了人民政协自主知识

体系的重要来源，传递了团结与联合的政治观念。

（二）主体层：以群体为界分的标识性概念

马克思主义将历史主体分为类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三个层级，揭示了社会实践主体的层次结构。据此而言，人民政协的相关主体可分为界别、党派和人民团体、政协委员三个层次。

界别是人民政协的组成方式。界别划分呈现包容性、稳定性、灵活性特征，旨在将分散、多元的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国家治理格局之中。2023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增设“环境资源界”，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这一调整深刻回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从知识建构的意义看，界别以群体代表制对区域代表制进行了补充，是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概念。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是人民政协中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主体。1954年，毛泽东指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16]²⁰¹ 这些主体在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强调以合作代替博弈、以协商弥合分歧，并通过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政协委员是政协履职实践的直接承担者，深度参与人民政协知识生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25] 政协委员与所代表的界别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意见表达与政治决策的中介。2025年，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6778项、联系界别群众活动11115项，参与委员21113人次，服务群众400多万人次；全年共有委员7043人次参加协商议政会议，1290人次参加视察考察调研，506人次参与理论研究，1965名委员参与提案，1443名委员反映社情民意信息^[26]。这组数据反映了政协委员在团结民主等价值观念下，将分散意见有效纳入协商程序的履职自觉。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正是在这些实践中由观念转化为行动。

（三）行动层：以实践为线索的标识性概念

价值层与主体层的标识性概念，必须落实在实践上。行动是知识生产的动态场域，塑造了知识体系的“生成性”表达。作为价值层次与主体层次的落脚点，行动层面的标识性概念以制度框架、职能履行与运行规则为基本线索，揭示了人民政协各类主体如何在价值引导下实现有序政治参与。

行动层面的标识性概念同行为主体的履职实践具有直接联系，表现为突出的过程性与机制性，可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角度把握。宏观层面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并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确立了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为多元主体有序进入协商场域提供根本依据和稳定预期。中观层面围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将制度定位具体化为明确的履职方式和责任边界，形成职责清晰的功能体系。微观运行层面涵盖调查研究、提案工作、委员联络制度、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双周座谈会等设计，实现协商成果向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行动层面的标识性概念勾勒了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逻辑与理性选择，是知识再生产的关键。以“提案”这一概念为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明确了政协委员及各参加单位作为提

案主体，并提出具体的提案规范。标识性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融通，主体层的政协委员以行动层的提案为核心，将价值层的团结观念表达出来。

表 1 人民政协相关标识性概念结构

概念层次	维度	标识性概念	功能属性
价值层	定位	统一战线的组织	人民政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导向	团结和民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团结大联合，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等	核心价值追求与工作准则
主体层	类主体	界别	明确组织本体
	群体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等	主要参与力量，彰显人民政协的广泛代表性与包容性
	个体	政协委员	履职主体，联系界别群众
行动层	宏观	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等	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达成共识、汇聚智慧的制度化渠道
	中观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核心职能
	微观	提案，委员联络制度，双周协商座谈会，网络远程协商会等	国家意志与社情民意互动、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践路径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四、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回应的重大命题

从“政党—国家—社会”三元分析框架出发，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阐释了人民政协在协调政党关系、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中的独特功能，为推动“中国之制”的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提供了学理支撑。

（一）提供了基于合作而非竞争的新型党际关系知识

政党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但其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在政党政治时代，如何处理好执政党与参政党、大党与小党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多数民主政体面临的难题。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知识凝结，其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阐释，回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命题，为构建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提供了全新知识视角。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将政治原则转化为规范的运行机制，实现了政党之间的良性互动。其一，以协商议政促进政党间的对话沟通。组织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信息交流的渠道^[27]。政党存在的理由与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于其作为表达的渠道^[28]。在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通过政治协商程序，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进行充分协商。“参政党”的设定超越了西方在野党、反对党的对抗性设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和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推动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其二，以民主监督进行政党实践的效果反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互相监督，其重点在于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29]这种监督以“协商”为基本定位，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摒弃了西方政党间“为监督而监督、为反对而反对”的恶习，在反馈闭环中增进政治互信。其三，以制度体系推动政党间的规范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提升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基于中国实际，构建了党际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心工作的知识范式。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作为公权力的国家权力第一次掌握在公共政治力量手中^[3]。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秉持团结协作、协商共赢的理念开展各项工作。比如通过持续开展对口帮扶实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脱贫篇章。反观当前西方政党政治，具有鲜明的党派竞争和短绩主义倾向，政党往往只顾短期选举、乱开空头支票，深陷极化对抗与党同伐异的治理困境。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与西方竞争性的政党知识体系并不相同，实现了对狭隘政党关系的超越。

（二）贡献了柔性治理与协商共治的国家治理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25] 68}人民政协作为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连着界别群众，通过协商民主制度让各类主体有序、深入地参与国家治理全过程，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知识。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于西方分权制衡的逻辑，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协商蕴含着“柔性治理”的智慧。有别于党委、人大、政府等，人民政协不具有直接的决策权或执行权，在国家有机体中发挥缓冲、整合、蓄力的重要作用。在国家治理层面，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协商共治”的知识。人民政协践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真民主，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真协商，努力推动协商民主向多元情境延伸，催生出如云南“院坝协商”、四川“有事来协商”、浙江“请你来协商”、重庆“渝事好商量”等各具特色的协商实践范例。这些协商形式搭建起常态化沟通平台，使得政协委员能够及时、精准地对接和反映社会各领域的群众诉求。民主国家组织运作的多样性背后，存在着一条关键的分界线，即规则与活动是旨在追求“多数支持”，还是谋求“达成共识”^[30]。西方的决策机制往往从不同的利益集团出发，对不同观点采用“竞争—妥协”议事决策方式，呈现出“赢者通吃”的特征。在这种议事方式下，公共决策本质上是利益集团的观点汇聚，无法代表社会意见。中国协商共治的方法突破了西方协商民主精英化、集团化、形式化局限，通过建立委员工作室、联络点等载体，密切联系群众，形成了纵向贯通省市县乡、横向联结各党派、各界别、各群体的多层次协商网络，将“条条”与“块

块”深度结合，凝聚起多元共治的治理智慧。

（三）丰富了以民主促团结、以包容求发展的社会整合知识

在超大规模人口与多元社会结构并存的中国情境中，整合共同体中复杂的社会结构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命题。个体对共同体存在归属性与自主性这两种既相互依存又具有张力的基本需求^[31]。这种依存与张力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就是集中和民主的关系。人民政协是维护大一统的现代政治组织，并通过统一战线从横向上将社会整合为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涉及建构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共同体、体现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执政党与宗教界人士共建社会的共同体、新的社会阶层责任共同体、港澳台与内地（大陆）的命运共同体等^[32]。

政党是有能力整合各种利益诉求光谱的机构^[33]。面对过去存在的“麻烦论”，刘少奇曾强调：“做统一战线工作是麻烦的，但是经过统一战线工作，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的大部分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的，他们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省了大麻烦。”^[34]只有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才能把“省大麻烦”的统战智慧化为凝心聚力的现实效能。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纳入同一政治场域，致力于消弭分歧、增进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增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担当，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15] 267}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以民主促团结”的社会整合逻辑，即通过统一战线广泛凝聚共识，将各界人士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不仅体现为方向的把握，更表现为对社会上不同声音的包容与吸纳，秉持“闻过则喜”的态度，将不同意见视为优化决策的知识资源，而非对抗性的异己观点。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以大一统为内核，超越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的局限，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向心力。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许多共同体既面临外部霸权主义的侵扰，也承受内部失序的压力。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所揭示的统一战线整合路径，为共同体的稳定运行与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知识参考。而西方主流的社会整合理论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假说，潜藏着社会撕裂的潜在因素。有的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和自主性往往难以兼顾^[35]，为了“现代化”盲目移植西方模式而陷入“强社会-弱国家”困境。尤其是社会构成复杂、内部异质性强的国家，民主转型往往演变为社会分裂的催化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适应，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传递出社会整合的知识表达。

五、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向

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国实践为根基进行原创性知识生产，不断提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水平，拓展国际传播路径。

（一）把握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根脉与魂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36]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的根本指南，也是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的根本遵循，要在“魂脉”和“根脉”的有机结合中进行知识创造。

首先，建构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马克思主义是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源头，对其发展具有内在规定性。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人民政协实践，建构结构完整、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其次，建构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要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文史资源，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了“和而不同”“言谏”传统、民本精神、集思广益等政治智慧，为人民政协知识生产提供了深层文化支撑。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厚植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因，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主体性。最后，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魂脉”和“根脉”有机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提炼了人民政协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又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精粹。因此，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魂脉”的引领性与“根脉”的延续性贯穿于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全过程，使其兼具理论深度与文化厚度。

（二）巩固人民政协“三大体系”的知识重点

原创性的知识既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激发生命性的学理挑战。然而，单有原创性知识的迸发尚不足以构建成熟的知识体系，还需进行系统性的知识统合与优化。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坚持系统思维，使分散的知识要素凝练为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

根据分科治学的知识惯例，学科体系是一个知识领域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构建“人民政协学”的学科构想^[37]，但始终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未能实质性推进。受人民政协的广泛实践、研究惯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民政协学科必然呈现出鲜明的交叉属性。科学研究需要扎根于现有科学传统之中，保持“必要的张力”，方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38]。人民政协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以政协逻辑整合相关学科资源，既要确立自主知识框架，又要保持开放的学科对话，形成具有现实解释力的交叉学科范式。从学术体系看，人民政协连接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宗教政策等多条学术脉络，构成了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要围绕民主模式、治理模式的探索等综合性议题的研究，建立多学科背景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人民政协相关知识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从话语体系看，要以原创性的话语叙事表达知识逻辑。一是讲好人民政协制度生成的历史叙事。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商基因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商智慧，阐明政协制度“内生性”演进的必然逻辑。二是讲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叙事，生动呈现“有事好商量”的具体场景，揭示其化解分歧、达成共识的独特机理。三是讲好治理效能的价值叙事，展现政协“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优势，以通俗易懂、融通中外的叙事提升话语影响力。

（三）促进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

当今知识、文化与思想日益突破地域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与重组，推动着不同文明

形态在交融中实现互构与创新。西方借助理论范式、评价标准与传播体系占据话语优势，形成知识霸权，对后发国家的知识生产与表达空间造成遮蔽和挤压。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主动回应这一时代背景，在文明交流中展现人民政协的科学、有效、管用以及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

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既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概念框架，也不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封闭表达，而要在文明互鉴中实现知识更新与内容传播。一方面，要在文明对话中实现知识再生产。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要聚焦不同文明与制度的差异，吸收借鉴其中合理因素，推动知识创新。另一方面，要积极在国际舞台发思想之先声，旗帜鲜明地展示人民政协作为新型文明形态的制度优势。加强知识译介与比较研究，精准提炼人民政协的标识性概念、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系统阐释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主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对话平台，鼓励政协理论研究者、实务工作者与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开展交流研讨，让国际社会生动感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有效性。构建跨国传播网络，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和内容，打造兼具思想性、传播性的产品，让人民政协知识跨越地域、语言、文化的界限，推动中国特色展现更突出的世界意义。

六、结语

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是深刻理解和有效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的学理基石。这一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政治实践中积淀、演化并走向理论自觉的成果，其生成过程深深嵌入国家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面向未来，必须深化对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结构形态、概念谱系及其所回应重大命题的系统梳理，揭示出其作为一套贯通价值理念的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从结构上看，以“价值—主体—行动”为层次的标识性概念体系，为其提供了清晰的表达工具与传播载体。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宽其知识视野与世界意义。唯有如此，方能使这一源于中华文明和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更具系统性、解释力与传播力，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的知识图谱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49.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0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
- [3] 杨光斌，周楚粤. 试论中国的团结型政治：人民政协的视角[J]. 社会科学，2025（11）：30-42.
- [4] 马雪松，冯源. 协商式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责任逻辑、制度体系与实践路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0-36.
- [5] 谈火生，侯听饶. 人民政协复合型群体代表机制探析[J]. 教学与研究，2023（6）：68-80.
- [6] 董树彬，罗原生.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的历史使命、显著优势与时代意蕴[J]. 探索，2023（1）：53-65.

- [7] 朱兆华,甘守义. 人民政协: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J]. 理论视野, 2022(5): 83-88.
- [8] 董树彬,董鹏林. 政治吸纳视阈下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优化[J]. 中州学刊, 2019(8): 1-8.
- [9] 谈火生. 制度安排、回应性与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以H省政协“微建议”为中心的探讨[J]. 治理研究, 2023(5): 35-51.
- [10] 钟德涛,孔海棠. 新时代双周协商座谈会运行机制探析——以100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为考察对象[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 73-81.
- [11] 张丽琴,李佳育. 党领导人民政协的基本形态:“请示-授权”与“嵌入-吸纳”复合[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1(3): 78-86.
- [12] 李甜甜,闫小波. “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考议[J]. 党的文献, 2021(1): 111-116.
- [13] 谈火生. “政治协商”概念的由来、内涵与定位[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6): 124-134.
- [14] 郭红军.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J]. 理论学刊, 2025(6): 78-88.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277.
- [16]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1.
-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648.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317.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345.
- [20] 林尚立. 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J].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16(1): 3-54.
- [21] 汪仕凯. 论中国现代大一统国家[J]. 社会科学, 2025(6): 89-100.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836.
- [23] 林华山. 建设力:统战工作一个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样本[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6(1): 5-12.
- [24]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发布网络视听已成推动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J]. 网络视听, 2025(6): 21-27.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72.
- [26] (现场实录)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EB/OL](2026-03-04)[2026-03-07]. <http://mp.weixin.qq.com/s/AZalwDn62irPthF3MbSJ8Q>.
- [27] 许宝君.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内在逻辑——基于“政党功能—社会参与”的分析框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60-72.
- [28] 蒋英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四重来源及其整合——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视角[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1-13.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1356.
- [30] 利普哈特. 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 陈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 [31] 曹伟,黄天柱. 团结与民主相统一——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 [J]. 政治学研究, 2025 (5): 110-122.
- [32] 林华山. 共同体视角下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与发展趋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6): 26-38.
- [33] 林尚立, 赵宇峰. 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5.
- [34] 刘少奇选集: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21.
- [35] 陈明明. 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 (5): 28-34.
-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5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288.
- [37] 万绍华, 赵诗清. 加强人民政协理论建设的任务和途径[J]. 党政干部论坛, 1994 (11): 38-40.
- [38] 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 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 范岱年, 纪树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24.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杨稀琴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维度与实践路径

黄洪凯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命题。当前,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党理论的误读与偏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应有之义; 是坚持“两个结合”, 系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经验, 提炼标识性成果的必然要求; 有助于打破文明隔阂与制度偏见, 促进不同政治文明互学互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理论、话语、学科、方法五个核心维度。其中, 体系的概念知识是基石, 原创的理论体系是内容支撑, 对话的话语体系是关键载体, 系统的学科体系是重要保障, 多元的方法体系是必要工具。未来, 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 需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原创经验, 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 提高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自主知识体系; 标识性概念; “两个结合”;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063-13

DOI: 10.13946/j.cnki.jcqs.2026.02.005

作者简介: 黄洪凯,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县乡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23&ZD139);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石榴花开映巴渝: 重庆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的实践经验与现实启示”(2025TZ07)

引用格式: 黄洪凯.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维度与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63-75.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战略意义。政治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亟需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及遇到的新课题。目前,学界更多从宏观层面探究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方式^[3],或从学科属性、方法论视角讨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内容^[4],鲜有成果探讨具体制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政党制度是政治学的经典命题,围绕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议题,既有成果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在必要性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是赓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6]。在价值性上,一些学者通过纵向与横向维度,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形成^[7]与比较优势^[8],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制度学说^[9],符合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诉求^[10],能够正确回应中国政党的具体实践^[11],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关键作用^[12]。在发展性上,学界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标识性概念之一^[13],通过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实践经验^[14],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则^[15]。同时,一些学者认为要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说的宣传工作纳入国家总体外宣大局和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为更多人所了解和认可^[16]。

既有研究关注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多数研究是从制度本身着手,未能形成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独立单元和关键概念要素的学术聚焦,缺少从宏观层面对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讨论。事实上,“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综合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而是跳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程式建构逻辑,不以预设的学科框架为起点,对“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实践形态进行的理论提炼与知识转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制度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种具有自主性认知的知识框架和解释范式,其核心使命在于突破西方政党学说的话语垄断,实现从“解释中国”到“中国解释”的范式转换。本文通过探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问题,以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通过对制度历史、制度理论和制度实践的体系化和结构化分析,系统阐释作为知识和话语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学说。构建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读与偏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政治学话语霸权的应有之义；是坚持“两个结合”，系统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经验，将制度、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话语优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打破文明隔阂与制度偏见，促进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互学互鉴，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

（一）西方政党制度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弊端

20世纪以来，西方逐步构建起一套以竞争性选举和多党轮流执政为主要形式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西方国家将其奉为现代政党学说的“普世”标准和“理想”形态，并以此作为评判其他国家政党政治演进的标准，其内核是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政党学说弱化了“民主”“政党制度”等知识内涵，狭隘地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的程序性安排。一方面，“民主”概念被窄化和工具化。西方政党学说以竞争和选举为底色，强调博弈而非团结，民主被视作少数人通过争取选票而获得做决定的权力^[17]。凭借先发优势，西方自由民主知识体系在国际话语中占据绝对强势地位，以至于出现“历史终结论”等极端认识^[18]。另一方面，西方政党制度知识体系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西方政党学说植根于多党竞争、选举中心与权力制衡的政治实践，核心预设是将政党关系视为对抗性的零和博弈，并形成以“分权制衡”“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为特征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19]。西方政党学说存在明显弊端，但西方凭借霸权手段，长期垄断政党制度学说，企图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制度话语体系，进而实施制度和文化的渗透^[20]。

西方政党制度知识体系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危机，对全球政治生态的多样性与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忽视了全球不同文明背景下政治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而简单将本国经验有意拔高为“普世真理”。西方国家依照这种范式粗暴评判和干涉全球多国政治制度，推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成为世界多地动荡的根源。西方国家以“民主-威权”二元框架划分世界，对选择符合自身国情和采用契合本土经验政党知识体系的国家，动辄贴上“威权”标签，采取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等手段，加剧地区冲突，造成大量政治悲剧，严重阻碍这些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美西方一些国家用唯一的政党学说评判其他国家，甚至用武力、胁迫等手段强行推销自身政党话语和民主模式，只会危害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西方国家恶意抨击和抹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我国台湾、香港等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将中国香港特区依法止暴制乱、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污蔑为政党“破坏民主”，却将本国发生的类似骚乱定性为必须镇压的暴力犯罪，其真实动机是借题发挥，妄图借此瓦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遏制中国发展。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坚持“两个结合”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为提炼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成果、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道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两个结合”原创性论断的理论成果。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进一步细化对“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增强其理论活力与生命力，彰显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解释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在历史实践中渐进发展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将与其他进步政党、政团组织联合的设想付诸实践，在革命时期创造性提出“三三制”原则，搭建与党外人士密切合作的桥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党派、团体等进步人士纷纷参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封建旧式制度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其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发挥治理功能。中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这意味着中国的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具备较强的战略引导、利益整合和危机应对能力。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征，能够实现广泛民主与高效集中的统一。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发挥多党合作的优势，书写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方力量，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滋养中不断完善、升华。中国的政党制度话语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功能。从外在结构上看，大一统、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组织图式，这种统一中有多元、多元中坚持统一的特征，形塑了中国关于政党制度知识体系构建的理念，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必要性。从内在价值上看，和合精神、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价值理念，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在处理政党关系时，用合作、协商代替了西方政党学说中相互拆台、互相抹黑的对抗、竞争形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以广开言路、察纳雅言为价值导向，强调听取各民主党派的声音，既尊重差异又扩大共识，妥善协调多党派并存的复杂局面，不搞一党专制和多党轮流执政，避免国家政权的碎片化与离心化，进而强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凝聚力，推动政党关系朝着团结合作方向前进^[22]。

（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国际社会准确全面理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过去，中国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长期受制于西方话语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准确、完整地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说的基本内容与核心要义，甚至在西方一些国家故意歪曲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曲解为“一党专政”“垄断性政党制度”等错误论调^[23]。一段时期，有的中国学者在解释本国政党制度学说时，也多是套用西方理论，无法针对性给予理论回应。

西方政党学说编造了一套形式和程序上的合理言论，但无法否认西方政党制度在资本操控下，代表少数精英群体私利的本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丰富世界政党学说，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积淀，是一种使命型、目标驱动型和任务型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2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价值，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背后蕴含的“合作共赢”“和合共生”等政治伦理。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排他”的协商模式论述清楚，为不同国家政党知识体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政党学说相关重大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分享治党治国经验提供可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弥补西方政党学说中人民主体虚化的缺陷，打破政治寡头醉心政党竞争、追逐权力私利的狭隘格局^[25]，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制度偏见，促进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治理的复杂挑战。

三、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维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理论、话语、学科、方法五个维度，其中概念体系是基础，理论体系是支撑，话语体系是载体，学科体系是保障，方法体系是工具。

（一）概念维度：从碎片到体系的标识术语

概念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可以理解为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通过纵向历史与横向比较的逻辑梳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关概念、理论等进行整合，形成具有本土特性的彼此关联、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概念维度指向的内容是探究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的概念“元素”，通过厘清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依据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以横向和纵向维度将其整合成系统的“概念树”，实现抽象知识体系的具象化呈现。

从横向维度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宽广的概念外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处于横向枢纽位置，起到统摄和关联其他概念的作用。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6]，并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优势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化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解释力，从价值体系层面揭示和回答了世界关于中国政党制度学说之问。从这一基础性概念的界定中，可以横向延伸出“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革命型政党”“民主党派”“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等相关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立者与引领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合法参与国家政权和政治活动的政党组织，在概念上打破了西方政党学说的类型标准，构成了新型政党类型；“一个参加，三个参与”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阐释。这些概念超越了一般性的政治表述，是具有明确主体、客体、内容、渠道、程序及效力评估机制的系统性学术表达，是准确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从纵向维度上看，政治概念源自政治实践^[27]。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充实、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工农民主政权”“三三

制”“民主联合战线”“五一口号”“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型政党制度”等概念线索，延伸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协商民主”等价值概念，不断充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从1927年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再到1940年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三三制”原则，再到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8]，又到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历史进程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三三制”“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些概念诞生于中国的政治实践，通过历时维度串联，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各阶段的关键词，为构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分析工具。其中，“三三制”“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雏形的概念要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人民政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趋于定型的核心概念，“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华民族大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发挥功能、迈向成熟的重要概念集成。

（二）理论维度：从阐释到原创的自主建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是由科学缜密、逻辑分明的理论体系构成，研究和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自觉运用理论思维，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构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围绕政党的阶级性质、指导思想、组织架构等方面，作出了系列原创性论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首次提出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任务是领导本阶级，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实现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29]，无产阶级是党的坚实支柱。这一论断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基石。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坚持以先进理论为指南，主张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严的规矩，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严密的政党。这些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科学吸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还坚持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打破西方多党竞争、一党专制弊端的基础上，创造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崭新模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中政党制度的理论谱系和知识体系。

第二，党的领导理论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要求。政党制度知识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权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塑造了执政党的领导角色，彰显出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要求，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作为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30]。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遵循“党领导一切”的根本要求，以本土性话语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中的核心地位，为巩固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本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民主集中、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内容是以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的，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31]。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

党，处于全面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通过提案建议、口头汇报等形式议政建言，积极参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因此，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系统把握党的领导这一根本要求，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确保党始终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第三，统一战线理论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从起源上看，统一战线理论源于恩格斯晚年形成的“历史合成论”，并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组织形态，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一个目标采取行动，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想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和压迫，就必须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政党、团体加强交流。只要建立了统一战线联盟，“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团结基因和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33]。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统一战线基本理论，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形成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的局面。

第四，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支撑。协商民主既是党和国家构建的秩序规范，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4]。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制度化建设逐步嵌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内核，依托政协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各类渠道，收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描边画像”。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下，协商民主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多种形式打造情感连接^[35]，将沟通贯穿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确保了各方意见和建议能被充分听取和吸纳，弥合意见与共识的张力，实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人民民主真谛。政党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36]，通过协商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拓展了民主的深度与广度，也在理论上突破了将民主窄化为竞争性选举的西式教条，使之成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撑。

（三）话语维度：从独白到对话的立体构建

话语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得以表达、传播并被接受的重要载体。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丰富的概念系统和坚实的理论根基，还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政治话语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引。政治话语的核心在于准确传达中国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关思想、政策、理论的根本属性及具体内容，目标是正确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政治话语阐明了中国的政党制度学说不仅是一种机制和平台，更体现出一种政治责任与合作精神，即强调党的领导同多党合作相统一、执政与参政相统一、民主与团结相统一、独特性与合作性相统一、多元性与一体性相统一^[37]。一是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立场。学界和实务界通过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提炼具有前沿性、学理性和现实性的新思想、新论断。二是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规范化建设。国家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强化党的领导,同时将多党合作的精神外化为具有刚性和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等规范性文件,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迈向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三是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效能。政治话语与多党合作实践相融合,通过完善知情明政、考察调研、成果转化等机制,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建言献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学术话语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支撑。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提升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问题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国内学者努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通过构建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突破西方政党制度学说,生成具有解释力、原创性、逻辑性和生命力的标识性概念,提出“团结型政党”“使命型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38]等表述,充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学术框架,实现“术语的革命”。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凝聚了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形成研究共同体。国家层面通过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中亚政党论坛”等会议强化交流,地方层面则依托高等院校、研究所等力量,设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通过组织化建构,凝聚学者智慧,助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对外话语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目标。对外话语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优势与故事及时、真实地传递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对外话语在于确立一种区别于西方政党学说、具有中国标识性的话语范式,彰显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道路与自主逻辑。一般而言,对外话语由理论与舆论宣传两大主体构成。其一,学界通过实践调研、研讨会等形式,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讨论,形成学术共识,进而发展出一套能够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具备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系统。其二,政府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宣传海报、宣讲等方式,利用社交平台、媒体、报刊等载体,对外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这一自主知识体系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与国际舞台。

(四) 学科维度:从零散到系统的制度支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科体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保障与焦点命题,具体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科建设问题;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成果问题。

国家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专门化知识领域,通过学科布局、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使相关研究从零散走向系统,实现知识的体系化。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政党学或政党制度学尚未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39],讨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科建设

相关问题^[4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某一学科为载体,破解学科属性不明、多学科交叉导致的理论话语滞后实践经验的难题。为了更好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许多科研院所汇聚资源、搭建平台、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例如,清华大学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山东大学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统一战线学”二级学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立统一战线教研部,并设立新型政党制度教研室专门从事政党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其成果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学科的归属问题,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以至于在学科建设上存在不同的一级学科统摄现象。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拓展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统一战线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空间,增强学科交叉、打破学科壁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座“学术富矿”,不同学科的专业学者依托本学科优势,形成不同视角、多元范式的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以来,中国知网上公开发表的相关成果有1500余篇,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10余项。同时,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支持。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学科体系的“灵魂”。政治学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学科,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制度运行的分析框架^[41],探究政党与政府职责、政党协商如何嵌入国家决策过程等问题^[42]。中共党史党建学通过历时性分析,回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流演变,构建“政党史学”的知识系谱。统一战线学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大团结、大合作的基本原则。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外延结构网络,通过学科交叉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推动学科范式的完善与成熟。

(五) 方法维度:从单一到多元的综合创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建构,核心在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形成一套契合中国政治实践特质、能够客观揭示制度生成逻辑与运行规律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自觉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创新上,还体现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与问题意识的革新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有赖于方法的结构支撑,不同的方法会影响知识体系的内容与阐释样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选择建立在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统一战线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论基础之上,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现了方法创新。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调守正创新、问题导向、自信自立,始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质性研究中的文本分析、扎根理论、调查研究等方法,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分析、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政治现象学的意义阐释等,逐步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维方法论整合,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工具。具体而言,一是历史政治学路径,强调将中国的政党制度知识体系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和政治力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适应性。

与西方政党学说强调普遍模式与共时分析不同,历史政治学是从政治史出发探寻中国大一统国家延绵不断的内在机理,寻找制度体系生成的历史逻辑^[43]。二是比较分析法路径,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横向对比和历史维度的纵向比较,分析不同国家政党制度学说的异同点,用比较的方式揭示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知识体系形成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社会结构,进而打破西方政党学说所谓的“普世”化原则,为理解全球政党制度知识的多样性提供新的分类框架和分析视角。

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解读中国实践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坚持党的领导,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完善传播体系,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一) 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经验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政治智慧与理论滋养,确立其价值内核、分析框架与话语根基。

首先,要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的系统阐释,提炼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概念、本土化基因和独特功能。其次,重视党的创新理论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地位。要将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论述作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命题,深入阐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发展原创性知识体系。最后,党的百余年统战实践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样本。理论界要深化对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学理化阐释,提炼“大团结大联合”“凝聚共识”“利益整合”等原创性学说,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科学系统的知识贡献^[44]。

(二) 推动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在于解释并指导实践。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问题意识,增强现实观照,用自主知识话语回应党执政兴国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首先,要聚焦制度运行中的真问题,直面具体而微的“治理之问”。学界要提升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相关问题的洞察力,不仅要通过阅读经典文献找问题,还要利用田野实践发现真问题,确保理论与实践紧密相扣。在理论层面,要不断完善“什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怎样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等关键问题。其次,要加强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提炼,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和理论成果。学者要提升对问题的分析能力,通过多学科交叉培养自身的理论思维和学理能力,在日常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总结形成自主的学术架构,不断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更新完善。最后,要推动理论研究成

果的实践转化，通过理论创新指导制度的实践发展。要通过具体的成果经验，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知识话语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确保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既能准确反映中国自身的特征和运行规律，又能获得世界的认可。

（三）提高国际话语权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围绕“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等根本问题展开，用贴近受众、易于理解的语言和形式，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

首先，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形成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合力。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官方媒体的海外分支机构负责发布权威信息，传播中国声音；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传播活动。在传播内容上，主动设置议题，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认可度与话语权。其次，传播方式要呈现差序性。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受众，重点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尤其是与西方政党学说的差异，突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打破西方的误解与偏见；针对发展中国家受众，重点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党学说提供借鉴。最后，在传播方式上，要避免“自说自话”。将这一自主知识体系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学说，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核心概念准确翻译并阐释其内涵，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以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访问、开展合作研究等方式，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政党学说的讨论，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亲和力和可信度。

五、结语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对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探索，需要深刻认识西方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和中国实践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要求，以及国家独特优势为体系建构提供的可能性，以便从理论逻辑层面解答该体系“为何建构”的问题^[45]。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性工程。其深层使命在于将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知识框架，系统总结为一套概念精准、理论创新、方法科学、话语有效、传承有序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标志着我们从长期的“实践探索者”和“理论学习者”，向“理论原创者”和“知识贡献者”身份转变。从本体论视角审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由概念、理论、话语、学科、方法五个核心维度构成，它们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塑造了一个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政党学说。“自主”是该知识体系的本质属性，其“是什么”的核心要义在于摆脱西方政党学说的话语霸权与学科框架束缚。在知识来源上，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政党实践经验，而非西方政党制度范式的演绎；在逻辑阐释上，以“和合共生”“协商民主”等中国话语为核心；在价值判断上，以“人民利益至上”“国家治理效能”为标准，而非西方的“民主形式”标准。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化解理论话语滞后政治实践的困境，提升中国在政党学说中的话语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为人

类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6.
- [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N]. 人民日报,2022-04-26(1).
- [3] 王炳权,杨睿智. 论建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J]. 新视野,2023(1):36-45.
- [4] 徐勇. 从田野政治学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J]. 开放时代,2023(1):68-72.
- [5] 梁杰皓,丁俊萍.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原则和价值[J]. 社会主义研究,2022(4):100-106,123.
- [6] 李朝录. 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346.
- [7] 钟德涛.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发展[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7-17.
- [8] 龚少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及其类型学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7):106-115,164.
- [9] 郭定平,孙青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学叙事体系新论[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9.
- [10] 董树彬. 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的生成逻辑[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57-66,86.
- [11] 周淑真,穆若曦. 从西方政党政治失能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衰退[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5):13-22.
- [12] 孙正聿. 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2024(7):38-51,204-205.
- [13] 陈明明,李松. 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路径与逻辑[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6):1-17.
- [14] 张献生. 关于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几个问题[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6):55-65.
- [15] 左鹏.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J]. 红旗文稿,2025(11):18-21.
- [16] 黄天柱. 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J]. 团结,2024(1):47-51.
- [17]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6.
- [18]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11.
- [19] 臧秀玲,贾晓强.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5-22.
- [20] 刘志刚. 从“文明冲突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方对待文明冲突的不同逻辑[J]. 学术界,2021(10):201-209.
- [2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22] 柴宝勇,黎田. 在“新型”与“传统”之间:影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因素探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9(5):82-89.

- [23] 龚志宏. 竞争性垄断性合作性——中国政党制度的百年回顾与展望[J]. 理论导刊, 2007(2): 8-10.
- [24] 许忠明. 政治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理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4): 19-29.
- [25] 陈怀平.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系统性超越[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5): 23-34, 155.
- [26] 中共中央统战部. 伟大的政治创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2: 1.
- [27] 张师伟. 中国传统政治概念体系的理论结构及其历史演进[J]. 天津社会科学, 2024(2): 57-61.
- [28] 胡锦涛.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9年9月20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 [29] 列宁全集: 第24卷[M]. 2版(增订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8.
- [30] 王炳林, 李亚伦. 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和构建进路[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5(5): 63-73.
- [31]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30.
-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84.
- [33] 林华山. 多维互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6): 32-41.
- [34] 蔡文成, 曲若仪. 意见、共识与治理: 协商民主的核心运行机理[J]. 学习与实践, 2025(10): 13-24.
- [35] 黄洪凯, 周振超. 科层叙事的实践反思: 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中数智与情感的冲突与联结[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2): 57-68.
-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1.
- [37] 林尚立, 赵宇峰. 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32.
- [38] 唐亚林. 使命型政党: 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J]. 政治学研究, 2021(4): 38-49, 155-156.
- [39] 郝铁川, 张昊楠.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的思考[J]. 学习与探索, 2024(1): 38-45, 174.
- [40] 梁晓宇, 吴有海.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学科建设的探讨[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1): 66-74.
- [41] 孙会岩. 技术革命与现代政党政治发展: 类型、议题与趋势[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5(2): 14-25.
- [42] 黄洪凯, 周振超. 差序同构: 中国政府纵向职责体系的结构形态[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4(5): 30-42.
- [43] 杨光斌. 历史政治学: 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156.
- [44] 胡雪飞. 作为统一战线标识性概念的“大团结大联合”: 源流考释与意义阐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1): 27-41.
- [45] 王丰, 何宇霞.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着力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 1-14, 325.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形塑发展、重要特征与构建指向

刘宗灵 严浩月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新时代总结党百余年历史经验、掌握历史主动、筑牢民族复兴思想根基的战略性命题。其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以中华传统史学为精神滋养,在回应“如何看待自身历史”“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等核心议题中,形成了“理论奠基—历史演进—特征凝练—构建指向”的阐释框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拓进,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系统发展,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升华,这一知识体系在萌芽、淬炼、革新与集成中完成了历史演进。作为逻辑严密的原创性思想成果,它呈现出主体性、系统性、综合性与实践性特征,既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确立了中国历史叙事的自主性,又以大历史观为引领,实现正确党史观与正确历史观的逻辑贯通。进一步构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加强理论体系化与学理化研究以萃取标识性概念;推动知识从“叙述事实”向“阐释逻辑”跨越,实现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融通;以重大议题为突破口参与全球历史话语对话;依托交叉研究平台构建跨学科协同的组织机制,进而为筑牢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自主知识体系; 大历史观; 正确历史观; 历史自信; 历史叙事权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076-15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06

作者简介: 刘宗灵,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严浩月,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新时代统一战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ZK0120250120)

引用格式: 刘宗灵,严浩月.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形塑发展、重要特征与构建指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76-90.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 这为推动中国共产党自主文明叙事体系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与强劲动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这表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紧迫性与战略深远性愈发清晰。

概念是思想的载体，贯穿理论与实践，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基石作用^[3]。“正确历史观”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认知领域提出的原创性表达，高度浓缩了党对自身历史、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立场与观点，为正确评价中共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总结历史成就、提炼历史经验、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及主流本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历史，多次提出要“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命题。正确历史观要真正实现落地生根，不能停留在原则倡导层面，而必须形成系统化、学理化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为学术研究提供稳定的概念工具，为思想教育提供系统的理论教材，为社会大众提供清晰的历史坐标。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某一学科的专属知识，而是以历史学为基础，深度融合政治学、哲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系统整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成果、制度规范、实践经验与叙事方式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理性的知识系统。作为知识体系，它不仅要标识一种历史态度，更要提供一套可传承、可展开阐释的完整知识框架。构建这一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命题，更关乎坚定历史自信、筑牢民族复兴思想根基的重要时代命题。目前，学界尚无直接以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为命题的系统性研究著述。前期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聚焦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历史观”的重要论述^[4]；二是分析“大历史观”^[5]、“正确党史观”^[6]、“中华民族历史观”^[7]的建构逻辑、内涵与实践进路；三是从微观层面切入，探讨历史观与三个历史决议的内在关联^[8]，与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逻辑互嵌^[9]；四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10]、历史学^[11]等学科或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中涉及“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论述阐释。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学术前提与重要参照，也清晰地表明当前“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正处于知识要素积累与体系构建的重要阶段。基于此，本文尝试梳理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形塑脉络，提炼其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构建的实践指向，以期在这一重要时代命题的学理回应提供知识参照。

二、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品格与深层内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之中。唯物史观为其提供了洞察历史演进逻辑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历史观契合正确历史观的内在价值。

（一）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知识体系构建的思想基石

一是坚持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来研究历史。“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唯物史观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这一基本原理落到中国语境，意味着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与改革，构成了“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最根本的社会存在。因此，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从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形成过的制度探索、积累过的实践经验出发，提炼概念与概括理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框架植根于其自身的社会存在，而抽离具体社会存在的概念移植，只会使中国历史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历史认知的客观性首先体现为对认知对象本身的忠实。坚持以中国历史事实为原点，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不可移易的哲学根基。

二是科学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唯物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阶级斗争的主导性力量。其一，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知识的源头活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历史叙事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亿万人民在具体社会条件下作出的正确选择，正确历史观的知识生产必须扎根于这些鲜活的实践现场。其二，人民利益是历史评价的价值尺度。评判一段历史好坏、一个人物是非的标准，归根结底要看其是否顺应了民心、是否维护了人民利益。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使历史认知是对历史主体真实感受的忠实记录。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论述，为构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合法性根基。

三是运用历史分析法。“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3〕}坚持历史分析法，应将问题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看到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把握其包含的历史局限性。“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所强调的历史真实不仅仅指单一的历史事件或碎片的考据，更指历史发展的全貌与本质。如若仅停留在微观的考据而忽视宏观的真实，或者用支流掩盖主流，用个别现象否定整体性质，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历史观强调要运用历史分析法，结合时代背景和阶级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既看到其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又不回避其中存在的错误与失误。这是对历史内在逻辑与整体趋势的理性把握，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四是坚持辩证思维法。这要求我们把握联系与发展，坚持具体与历史，认识必然与偶然。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坚持“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1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既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与世界历史交汇的必然，也包含了无数革命者主观努力和特定历史机缘的偶然。正确历史观反对机械决定论，也反对唯意志论。它承认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同时高度重视关键时刻的历史主动。例如，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引的必然，也与遵义会议的正确决策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对必然与偶然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使“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具备了解释历史复杂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理论张力。

（二）汲取传统史学之精神滋养：知识体系发展的文化血脉

“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其深层的文化底蕴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史学中“通古今之变”“以史为鉴”等思想，为构建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一是“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维，为塑造“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叙事风格提供了方法论启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5]，揭示了“变”是历史的内在动力与常态。这一思维强调在历史的长期连续中把握变易的脉络与趋向，为认识和改造现实提供历史依据。正确历史观吸纳“通变”思想，将之转化为独特的叙事品格。一是追求贯通，强调应自觉将重大事件与人物置于纵向的历史纵深和横向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不孤立地谈史实，不割裂地论得失，而是在连续中把握断裂、在演进中定位节点，使历史叙事呈现出古今贯通的宏阔感。二是注重经验，强调从具体历史情境中提炼可镜鉴的实践逻辑，而非停留于抽象说教或概念演绎，使历史叙事始终承载着从“已然”中洞察“未然”的方法论自觉。

二是“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为确立“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功能定位提供了逻辑支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等隽语箴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获取警示的深刻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6]，简明扼要地道出了以史为鉴的核心价值。正确历史观吸纳了这一思想，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确立为对待自身历史的基本方针，在不同时期均重视对党史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时代站位深化对党史的学习和思考。这种功能指向使历史认知始终与治国理政实践深度耦合，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开辟未来的思想资源。

此外，近年来我国史学界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课题，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构建起“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等学术话语体系。这不仅是对文明源流的科学追溯，更是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依据。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在“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知识位置，绝非简单的素材库，而是通过“两个结合”使其精髓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知框架，共同塑造了一种兼具科学真理性、实践指导性与文明主体性的历史思维范式。

三、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立足于中华文明深厚土壤，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独特实践中紧扣“如何看待自身历史”“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命题，经历了从初步奠基、系统构建、曲折反思到成熟拓展的演进历程。这一过程中，正确历史观逐步完成了历史叙事、制度文本、实践案例、学理阐释、内外宣介等知识形态的建构与积淀，最终成长为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原创性思想体系。

（一）萌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处于理论准备与模

式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知识体系的发展主线在于,开启历史认知的自主化探索,推动知识体系从零散论述走向初步系统化,进而成长为一个具有组织化、制度化特征的知识形态。

建党初期,李大钊^[17]、陈独秀^[18]、李达^[19]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将唯物史观作为解剖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用以论证封建制度的崩溃与社会主义到来的历史必然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提出应当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历史观开始由英雄史观向群众史观转变,这为“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构建确立了价值内核。此时的认识尚具有启蒙与工具性的特征,为此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做了关键铺垫。

遵义会议后,党开启了历史认知的自主化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党的历史观第一次自主构建的飞跃。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0]党自主地界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厘清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明确了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革命史观”的阐释框架。这一时期,“中共党史”作为学科概念被正式提出。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将“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列入高级党校教育课程,由此开启了党史研究的学科化进程。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强调把马恩列斯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21],这一方法论催生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理论成果,初步构建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框架与学科基础^[22]。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等文件汇集,将其用作批判主观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历史教材^[23],开创了以历史教材统一思想的知识传播路径。这些探索标志着“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开始从分散论述走向专门化的知识生产。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决议形式系统总结自身历史经验的正式文件,完成了“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首次制度化表达与系统性集成。一是以党的最高文献形式确立了历史评价的权威准则,树立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正确历史观,使正确历史观从学术探讨上升为全党遵循的规范框架;二是首次系统化地提炼出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标识性概念,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理论载体;三是开创了“以决议写史”的独特叙事范式。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未来行动的指引,使历史认知与政治实践实现了制度化的深度耦合。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完成了从思想准备到制度奠基的演进。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照搬外来理论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自主转向,确立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路径;在价值观上,将人民本位确立为历史认知的价值内核,这为知识体系注入了最基本的道义立场;在制度化上,通过延安整风和历史决议的实践,开创了以文献整理、学科建设、决议规范并行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这些探索为此后“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移易的根基,不仅提供了方法论与价值观的原点,更确立了“自主”的灵魂,即中国历史的叙事权与解释权必须归诸中国自身。

(二) 淬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曲折拓进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夕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曲折探索与经验积累期。随着中国共产党从

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面临着从指导革命转向解释建设、巩固新生政权合法性、塑造国家认同以及在全党进行思想改造的新任务，这一阶段的探索呈现出建设性成就与复杂波折相交织的特点。

其一，大规模史料整理工程的启动，为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制度化的基础支撑。国家统筹开展史籍编纂、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等工作，推动了知识生产从个人著述转向有组织、成体系、可持续的集体积累，这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了系统化、规模化的文献支撑。其二，权威党史文本的成型，发挥了认知整合与框架定型的双重功能。这一时期，胡乔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首次以简明体例系统梳理了党史脉络，并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核心观点转化为可传播的叙事体系；《毛泽东选集》（1—4卷）的出版，使毛泽东思想从分散论述整合为系统化的理论经典。这些权威文本的问世，为全党全社会提供了统一的历史认知参照，完成了党史叙事从分散论述到定型叙事的跃迁。其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通史编纂推动了历史解释体系的更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尚钺所撰的《中国历史纲要》尝试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中国历史，为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范例。它将党的历史观延伸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理解，使“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获得了超越政党研究范围的文明史视野。其四，这一阶段党史学科在高校得以开设，使正确历史观知识从文献走向课堂。研究人员、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的逐步完善，标志着“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开始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代代赓续的稳定知识内容。

“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过程充满艰辛，这凸显了确立科学稳定、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标准的重要性。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关于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丰富了“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内涵。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史料基础的系统化、权威文本的定型化、历史解释由旧学转向新诠以及学科传承由探索走向建制，共同推动“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完成了从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向新中国成立后系统构建的关键跃迁。

（三）革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观上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拨乱反正与创新发展，为其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开放、理性与辩证的新特质。

首先，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这一时期“正确历史观”知识的重要生产者和“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推动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历史观的精髓。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历史评价中引入了生产力标准，实现了历史观与发展观的有机统一。他主张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实践^[24]，既总结成功经验，也不回避失败教训。江泽民、胡锦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江泽民重视挖掘历史的现实价值，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总结党的历史，认为这是党逐步成熟的关键因素。胡锦涛强调学习历史有助于“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25]，主张将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党的建设、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在深入研究历史中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其次，“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强调历史经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并依托“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政策实践实现了多维深化。一是系列指导中国发展的自主方

方法论得以形成,形塑了“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鲜明特色。“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强调通过试点试验探索规律,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以认识指导实践的唯物史观认识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确保了大国转型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持续向前,避免了颠覆性错误^[26];中国式现代化以“五个文明”协同发展的实践丰富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知^[27]。二是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升华为系统化的治理知识与制度成果。学界立足中国实际开展学理研究,形成大量自主性知识成果。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划分社会主义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节点,确立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为党史研究的基本思路^[28],成为研究典范。

最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一时期“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文本。一是它完成了历史认知的方法论拨正。《决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唯物史观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出总结性评价,既正视探索中的曲折,又肯定“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主流,使全党在“怎么看历史”上有了统一标尺。二是确立了价值判断的权威框架,将毛泽东的一生置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体历程中审视,既科学评价其历史地位,又阐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同时,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29],这一正一反的定论,使全党在“怎么评人物”上形成共识。三是开创了辩证统一的叙事范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视为既有曲折又有成就的有机整体,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提供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阐释框架,使全党在“怎么连古今”上超越了简单肯定或否定的二元对立,为此后该知识体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叙事根基。

这一时期,“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发展叙事的平稳转型,更加契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形成了历史经验与现代化建设相互塑造的新格局。历史认知为经济建设提供经验支撑,改革开放则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一知识体系。其知识生产也从领导人论述为主,转向领导人论述、学界研究与制度化文本的协同推进,它们共同构成“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可感知形态与可传承内容。正是这一阶段确定的功能定位与知识生产机制,使该知识体系从革命年代的“思想武器”成长为和平建设时期的“治理资源”,为新时代的全面集成铺垫了道路。

(四)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全面升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迎来了守正创新与体系成熟期。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危害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求,对“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理论创新。

首先,这一时期党提炼出新的标识性概念,从多个维度拓展和深化了“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例如,“大历史观”将认知视野从具体事件延伸至长时段、宽视域的历史纵深,使知识体系获得了把握社会发展大逻辑大趋势的宏观框架,增强了体系解释复杂历史进程的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三重维度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为知识体系处理民族历史叙事提供了核心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历史叙事延伸至全球维度,使正确历史观获得了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参与全球历史对话的话语资源,从文明

论高度拓展了知识体系的世界意义。这些概念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使其在“守正”的基础上具备了“创新”开放的宏大格局，真正成为一个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张力的开放性知识系统。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正确历史观”的重要论述，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正确历史观作出了核心界定：“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见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30]这生动诠释了正确历史观所蕴含的深远历史眼光和宏大时空视野，强调了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和对未来趋势的预见。这一核心定义成为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确立了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导向。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这为正确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根本方法。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既不能隔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31]，“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32]。这些重要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划清了正确历史观与各种错误历史观的界限，为构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方向。

再次，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史料基础、建设历程和全球视野等多个维度产出了丰硕成果，推动“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从政治论述向学术理论纵深发展。例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史料学》系统阐述了党史史料的分类、整理与辨析方法，这为运用“正确历史观”进行严谨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方法论支持。《新世界史纲要》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促进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图景中更深刻地定位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八卷本）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七个专题展开横向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则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遵循纵向呈现百年党建历程^[33]。两套丛书分别从横向专题和纵向通史的角度，构建了立体的党建史研究体系，为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材料依据。《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等著作，汇集了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它们自上而下地确立核心概念、提供方法论、树立典范，并从整体上串联起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看待自身历史的一贯立场与科学方法，成为这一时期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文本载体。

最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新时代“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最权威、最系统的文本载体。一是实现了前两个历史决议的理论集成与时代升华。第三个历史决议赓续传承了它们的基本结论与核心精神，同时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使正确历史观在承续中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二是完成了“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在权威文献中的有机统一。第三个历史决议要求“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34]，这标志着两个标识性概念从各自表述走向制度化整合，为知识体系提供了兼具宏观视野与微观准则的双重方法论支撑。三是建构了百年党史的宏大叙事框架。通过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系统总结和对“十个坚持”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回答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问题。

这一叙事框架不仅提供了统一的历史认知,更以文本形式展现了“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在解释历史、建构认同、指引未来方面的强大功能。

这一时期是“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全面升华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历史观的重要论述为价值导向,确立了知识体系的政治灵魂;以“大历史观”等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为理论突破,拓展了知识体系的宏观视野与微观准则;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体系化研究为学术支撑,推动知识形态从政治论述向学理纵深发展;以第三个历史决议为制度文本,完成了对百年党史的宏大叙事建构与规律性提炼。至此,“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在价值、概念、学术、文本四个维度实现了有机统一,成为兼具政治引领力与学术解释力的更为成熟的知识形态。

四、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具有统摄性与根基性的学术命题。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高度审视,“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具有若干重要特征。

(一) 主体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历史叙事自主性的确立

在西方所制定的文明线性进化标尺之下,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的分野使其他文明被降格为西方文明的附庸^[35]。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思想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旨在建立起一套能够深刻诠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独立叙事逻辑。

一是构建植根于中国实践的自主叙事框架与话语体系。譬如,复旦大学持续实施的“两大工程”,其目标正是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彻底摆脱“学徒状态”,确立“自我主张”,最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新范式^[36];“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的话语出场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指导,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大实践成果^[37];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用“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等表述界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路径^[38]。

二是构建以本土实践为核心的学科体系。将“中共党史党建学”设立为一级学科,这标志着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不再以西方学术体系为圭臬。其围绕“中国共产党之治”与“中国之治”展开,系统整合了党的历史进程的科学评价、历史经验以及党的建设基本规律,形成了一套成体系的理论与知识。作为最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点的学科之一,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是为世界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认知图景。“文明型国家”理论的提出与阐发,构成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根本性超越,亦在俄罗斯、印度等多国获得共鸣;面对国际舆论中关于二战历史的模糊与歪曲,中国推动的“正确二战史观”国际对话,提出世界要公平看待中国对二战的贡献,必须跳出以欧洲战场为中心的传统史观^[39]。《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运用多国档案明确提出“十四年抗战”的起点,在全球史视野中确立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战略地位,有效突破了西方二战叙事的话语垄断^[40]。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正从“解释中国”走向“影响世界”,为思考人类共同未来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系统性：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与正确历史观的层级关联与逻辑嵌套

“正确历史观”作为新时代党关于历史问题的核心表述之一，与“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等共同构成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概念群。但“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并非若干历史判断与零散论断的简单拼合，它是一个包含概念、原则、规范、叙事、理论等在内的知识系统。在这一知识体系的逻辑架构中，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与正确历史观并非单纯的并列概念，三者层级嵌套、逻辑互嵌，共同构成一个从哲学视野到学科规范再到整体叙事的连贯性知识体系。

首先，大历史观作为方法论视野，为正确党史观与正确历史观提供贯通长时段、涵盖宽视域的认知框架。其核心是从宏阔历史纵深与世界视野中，把握历史事件与人物地位，认清社会发展的根本逻辑。它要求将党的百年奋斗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连续脉络中加以理解，将新中国的成立与复兴置于近代以来的艰苦探索中加以定位，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图景中加以审视。如若缺乏这种历史感，对党史的评价易陷入短期盲视或碎片化的偏执。大历史观不直接提供具体的历史判断，但为所有历史认知活动确立了基本的时空坐标与价值方位。

其次，正确党史观是大历史观与正确历史观在政党历史领域的聚焦化运用。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首次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其核心要义有三：一是以两个历史决议和党中央精神为依据，确保评价的权威性；二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保持视角的整体性；三是科学评价重大事件、会议、人物，体现功能的规范性。它将大历史观哲学原理转化为党史研究可操作、可检验的学术准则，进而为“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提供方法论支撑。可以说，正确党史观是连接大历史观哲学原则与正确历史观整体叙事的桥梁。

最后，正确历史观是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在更广阔历史叙事领域的集成与呈现。大历史观以“望远镜”的方式提供观察视野，正确党史观以“显微镜”的方式提供分析工具，正确历史观则将二者所见加以统合与融贯，最终形成涵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贯通数千年文明演进与党百余年奋斗的统一叙事框架。从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初步奠基，到新时代第三个历史决议及系列原创性概念的提出，这一体系正在实践检验与理论升华中不断走向成熟。

（三）综合性：多学科视域融合与自主知识体系整合

正确历史观知识的跨学科性，根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整体性实践。这一知识体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用，需要融合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方能形成对中国数千年文明演进与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完整解释。

在历史学领域，正确历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聚焦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五大领域。通过系统整理原始档案与口述史料，为史实考证、长时段分期与事件因果梳理提供基础方法论，揭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在政治学领域，正确历史观关注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历史角色、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逻辑。在哲学领域，正确历史观以大历史观为方法论指引，贯通五千年文明史与百余年奋斗史，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在法学领域，正确历史观涉及作为“政治—法律”复合文本的历史决议的效力依据与解释方法；介入历史评价

的边界划定,将对英烈事迹的歪曲与侮辱纳入法律追责范围;探讨国家公祭仪式、纪念日设立等制度实践如何以法治方式巩固历史共识。这些赋予了正确历史观以规范性的制度表达,将历史认知从舆论引导拓展至法治保障。

当前“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跨学科研究的协同性仍显不足。党史研究擅长考证史实,却很少借鉴政治学对国家制度的分析、社会学对组织运行的观察;新中国史研究多是政策脉络梳理,缺少经济学对发展阶段的量化分析、法学对制度规范的阐释等。破解这一困境,需从“多学科并存”走向“跨学科融合”,在方法论层面形成交叉研究模式,使其真正成为一门集历史纵深、制度分析、价值判断、国际视野于一体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四) 实践性:知识生成与治国理政实践的深度耦合

“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检验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深度交织。它并非书斋中孤立的思辨产物,而是深植于民族复兴的历史土壤,在回应时代课题中不断丰富演进,是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活的体系。

首先,正确历史观的知识源头发轫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恢宏实践。例如,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作用的历史定论,源于党率先高举抗战旗帜、倡导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全部实践总和。这一历史认知本身就是对当时中国政治逻辑与实践动态最深刻的理论提炼。这种从实践深处生长出来的历史判断,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最坚实的基石。

其次,治国理政面临的每一次挑战都为历史知识的生成与深化提供了鲜活场域,推动知识体系与时俱进。譬如,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与理论构建,就是在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应对各种错误史观挑战的实践中被显著地突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41]。每一次对重大社会事件的总结,每一项关乎国家认同与历史记忆的立法与教育实践,都是在运用正确历史观的同时,也在具体情境中对其解释力进行检验、充实和再创造。

最后,发展着的“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又反过来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方向指引。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党的百年奋斗史的纵深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就是为了在新时代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42],从而增强道路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多元一体”、“五个共同”等理论的提出,旨在为廓清历史迷雾、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知识支撑和实践指南。当正确历史观通过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而转化为社会价值共识时,它便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强大工具。

五、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进入新时代,“正确历史观”研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命题。正确历史观在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政治认同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历史观的知识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仍存在一些短板:学术界对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富实践进行概念化、学理化提炼尚不充分,高质量的理论成果

尚且不足，学科壁垒限制整体性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系统构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厘清其核心概念、历史脉络、叙事逻辑与实践发展。

一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与学理化研究，从历史经验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根基，在于形成一套植根中国实践、具有理论穿透力的概念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43]。概念范畴的提炼要以实践为基础，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获得感性认知，经由理性加工得到具有学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44]。近年来，“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耐心”等原创性概念的提出，已为“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有大量亟待开掘的理论富矿。例如“伟大复兴”已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词和关键词，但对其内涵、标准、阶段步骤等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界还未展开深入研究^[45]。应当系统梳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形成的独特历史经验，将其打磨成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自我革命”这般既有理论承载力又有国际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这种提炼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工作，而是以问题导向为牵引，从史料解读、史实建构上升到理论概括的完整理路，使“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概念宝库。

二是推动“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从“叙述事实”向“阐释逻辑”跨越，实现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效融通。自主知识体系成熟的标志，既体现在高水准学术研究的产出，更在于能否转化为全社会认识历史的思想工具。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学术语言与社会语言之间存在明显断层。一方面，大量党史、国史研究囿于术语堆砌、长句嵌套、结论先行的表述方式，使得普通读者难以进入其话语体系，研究成果转化意识弱、渠道窄、形态旧，未能有效进入国民教育与公共传播等日常场域。另一方面，面向大众的历史叙事又易陷入碎片化、浅表化，思想深度与传播效力难以兼得。这种断裂给历史虚无主义者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生活化议题设置、感性化话语表达、隐性化图像渗透等方式抢占大众舆论阵地^[46]。近年来，各类优秀的通俗理论读物和融媒体产品已探索出弥合话语断裂的有效路径。如《中国日报》围绕抗战胜利80周年推出系列报道，“思享者”栏目通过专访权威学者，以视频形式深入解读“东方主战场贡献”，将严谨的学术观点转化为具象化的叙事，单期传播量超2000万；“围炉漫话”等栏目以外籍友人的感性视角切入历史现场，通过“这是教科书里没写的历史”等视频，唤起国际社会的情感共鸣，让抽象的史观变得可感可触，兼顾学理深度与传播温度，有效推动正确二战史观面向国内公众与国际“Z世代”宣介^[47]。同时，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的修订则从源头规范了叙事体系，其严格按照党的历史决议搭建内容框架，在通史体例中完整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让正确历史观通过课程教材这一主渠道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可见，推动“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从“叙述事实”升级为“阐释逻辑”，核心在于转换叙事方式。后续应鼓励研究者与出版机构、融媒体平台、文博单位等多方展开协作，围绕重大历史节点与党史国史核心命题，打造通识读本、专题纪录片、数字展陈等多元叙事产品，让正确历史观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回应社会历史关切中完成从学术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向。

三是以重大议题为突破口，推动“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与话语权构建。当前，我国在文明起源史、边疆民族史、二战史等关键议题上仍遭受西方话语霸权。破解这一困局的当务之急是集中优势学术力量，在若干关键议题上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进而确立中

国历史叙事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学界已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桎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二十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等采用全球史视角,注重中、英、德、俄、日等多语种档案的比对与互证,纠正了西方叙事中的偏见,弘扬了正确的二战史观,这有利于中国自主的二战史叙事体系的构建。知识体系的主体性不等于封闭性,中国自主历史叙事的生命力体现在它能否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历史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下一步的构建工作应当聚焦这些重大议题,集中学术力量推出一批具有国际传播力的学术成果,以此推动“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并进一步强化国际认可。

四是以学科交叉研究平台为载体,构建跨学科协同研究的组织机制。当前“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跨学科研究的协同性仍显不足,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知识积累。可借鉴国内高校已有实践探索,如中央民族大学建设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旨在整合全国主要民族史教学科研单位力量,为教学科研一体化、融合式、数字化转型提供组织保障^[48]。从制度上打破学科壁垒,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设立常态化运行的“正确历史观知识体系交叉研究平台”,配备编制与经费并将跨学科成果纳入学科评估与人才评价体系,鼓励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者围绕同一知识体系构建开展长期协作,大力发挥知识界的学术智识,进一步实现“正确历史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多学科研究视域融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 人民日报,2021-06-02(1).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5-10-29(1).
- [3] 胡雪飞.作为统一战线标识性概念的“大团结大联合”:源流考释与意义阐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27-41.
- [4] 安丽梅.习近平关于正确历史观的重要论断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9(9):11-15.
- [5] 袁嘉雪,王明初.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演进脉络、内涵要义与价值意蕴[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27-34.
- [6] 谢园园,王刚.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历史演进[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6):25-27.
- [7] 张琳,李少鹏.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价值及路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6):39-48.
- [8] 宋月红,周进.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1):1-12.
- [9] 李洁.论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新时代意涵[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4):96-106.
- [10] 杨凤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重要论述与中共党史知识体系建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11):95-105.

- [11] 王广义. 立场、观点、思维: 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历史观建构[J]. 史学集刊, 2023(5): 18-23.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13] 列宁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75.
- [14] 李太森.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N]. 河南日报, 2019-12-02(10).
- [15] 王彦等. 周易[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1: 192.
- [16] 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N]. 人民日报, 2014-07-08(2).
- [17] 李大钊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9.
- [18] 陈独秀著作选: 第2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00.
- [19] 李达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03.
- [20]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32.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407.
- [22] 周晔. 共产党人“大历史观”的来源演进、当代意蕴与性质特征[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5): 36-43, 108.
- [23] 王立. 延安时期中央文库“千里调档”服务“党书”编辑[J]. 中国档案, 2022(9): 16-17.
- [24]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21.
-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53.
- [26] 辛向阳. 建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6): 7-9.
- [27] 王立胜.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N]. 光明日报, 2022-08-17(6).
- [28] 金冲及. 胡乔木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J]. 中共党史研究, 2012(5): 5-9.
- [29] 闫长丽. 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党自我革命的价值意蕴[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12): 1-5.
- [3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77.
- [3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33.
-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0.
- [33]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八卷本)、《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在京首发[N]. 光明日报, 2026-01-10(2).
- [3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4.
- [35] 杨增崇, 党佳美. “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蕴涵[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6): 35-42.
- [36] 查建国, 陈炼. 复旦大学“两大工程”二期丛书首发亮相上海书展[EB/OL]. (2025-09-10) [2026-02-13].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10_5914229.shtml.
- [37] 仇瑛, 陈继红. 中国共产党文明叙事体系构建的三重进路: 基于话语演进的视角[J]. 科学社会主义,

2025 (5): 14-22.

- [38]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EB/OL]. (2025-06-19)[2026-02-13]. <http://www.yatz.gov.cn/content/item/2447>.
- [39] 刘宗灵, 张博林. 正确二战史观的核心要义、理论基础与构建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4): 90-101.
- [40] 陈雅静. 回应学术使命 肩负历史担当——访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作奎[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10-10 (2).
- [41] 杜俊华, 冯政龙, 冯熙茹.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识演进和当代启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1): 222-235.
- [42] 黄一兵.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N]. 光明日报, 2025-12-03 (11).
- [4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46.
- [44] 王丰, 何宇霞.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着力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 1-14.
- [45] 谭建.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要做到“四个转变”[N]. 大众日报, 2025-03-25 (6).
- [46] 罗红杰. 历史虚无主义软性叙事: 内生机制与应对策略[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2): 85-93.
- [47] 发扬外宣特色 宣介正确史观[EB/OL]. (2025-09-29)[2026-02-13]. <https://www.xinhuanet.com/zgjx/2019v/20250929/f4cb3a64ab84472d8856f0b4409b388d/c.html>.
- [48] 陈鹏.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教育改革创新[N]. 中国教育报, 2025-09-24 (6).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杨稀琴

论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应当把握的基本关系：基于现代政治过程的分析

董亚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北京 100091）

摘 要：协商建国的历史与逻辑决定着政绩观是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的统一。统战工作政绩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具有独特作用。协商民主构成检验统战工作政绩观的本质特征与标准。统战工作在协商作风上升到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既需要遵循现代政治过程的基本规律，又要坚持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本质特征。现代政治过程体现为协商民主发展的四方面的基本要素与环节。统战工作政绩观要把握好四个方面的基本关系：正确把握统战实践中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关系，处理好党领导的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正确把握统战工作中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处理好统战工作政治性与统战工作群众性的关系；正确把握政治引领与利益照顾的关系，处理好统战工作促进政党整合与多元社会利益回应的关系；正确把握政治安排与协商制度化关系，处理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关系。

关键词：统一战线政权；商量政府；政党自主性；政党整合；协商制度化；政治过程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6）02-0091-12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2.007

作者简介：董亚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

引用格式：董亚伟. 论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应当把握的基本关系：基于现代政治过程的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91-10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多年来,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2026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1]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2]在当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领导干部必须在统一战线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中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对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坚持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的统战事业行稳致远”^[3]。统战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党的政治工作不像经济社会发展等其他工作有明显的效果;统战工作虽有看得见的“显绩”,但更多的是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既需要只争朝夕、把握当下,又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在这个大政治前提下,我们应该也能够广泛听取人民内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4]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党的本质与执政方式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这一基本逻辑贯穿于我国政绩观的基本关系之中,为政绩观在统战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提供了基本原则,成为决定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的基本方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没有能够容纳多元社会利益冲突的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只会带来持久的动荡。统战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工作,承担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为了给现代化提供有序的制度保障,统战工作要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为重要内容,紧紧围绕协商价值、协商主体、协商动力以及协商制度化等重点环节方面,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要求,把握每个方面面临的基本问题,正确处理好每个方面的基本关系。这些方面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我国政治过程的全局,也成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把握的基本课题。领导干部能否把握好这些基本关系,直接决定着新时代正确的统战工作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发挥,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

此前,相关研究涉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5]、“正确政绩观”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演进与理论建构^[6]、基层干部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7]等方面。但学界对如何深入理解和把握我国政绩观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统战工作中的应用,尤其是统战工作政绩观对我国政绩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等问题探讨较少。本文通过探讨统战工作在政绩观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关系,呈现统战工作在协商民主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不仅可以促进协商民主的

发展,而且可以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现实可行的制度化机制。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也是党的领导方式的现代化过程,因而从现代政治过程的视角分析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政绩观界定及其与统战工作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2年春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8]党性决定着政绩观,政绩观体现着党的本质。根据我国政治本质特征与政治运行过程,笔者尝试把政绩观界定为:领导干部在一定执政思维的指导下,通过特定的执政方式,把党的领导与本质转化为具体执政实践的政治过程。党的本质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从根本上决定着政绩观的基本内涵。作为构成主导政治文化重要内容的政绩观,决定着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具体利益产生重大影响。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与执政本领,直接决定着政绩观的不同以及不同的执政效果。

政绩观的基本内涵反映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涉及实现党的全面领导而采取的正确方式。政绩观体现党的领导与执政过程的统一。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9]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指出:“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0]以上论述体现了党的政绩观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的党的性质与宗旨,二是坚持“尊重群众意愿”的执政方式。

这两方面揭示了政绩观蕴含的两个基本维度。一方面,党的领导和本质决定着政绩观,政绩观受制于党性,反映着党的作风修养;另一方面,主要指领导干部通过特定的执政方式,正确执行中央精神和战略意图,从而贯彻落实党的领导,完成党的使命任务的过程。总之,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同时还要有正确的执政思维和执政本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握好这两方面的基本关系,坚持正确政绩观首要的就是把握党的性质宗旨与执政方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党的性质是前提;在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前提下,执政方式对坚持正确政绩观尤为重要。对领导干部来说,即使有良好的愿望,如果不能把握正确的执政方式,也不能实现正确政绩观。因而,坚持正确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在保持党性前提下,正确执掌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方式。

统战工作集中凸显了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统战工作主要解决的就是阶级与社会阶层的政治关系,即“人心”与“力量”问题;其次,统战工作主要通过协商与协商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党的领导。这两个方面也是各级党委、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当所有领导干部都树立起了统战意识,坚持正确的统战工作政绩观时,政绩观才能得以更好贯彻落实。从这样的基本逻辑出发,统战工作政绩观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政绩观中

的特殊意义就得到规定。

统战工作与政绩观之间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关系已为历史和逻辑所证实。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设想和步骤,再次强调和阐释了新生政权的“联合”性质^[10]¹⁰²⁹。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更是进一步地认为新中国建立在统一战线组织基础上,“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11]。从这个角度看,党领导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新中国,延续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政权”的构想,可以称作“协商建国”。

新中国既是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又是在协商的方式下确立的。协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政府的品质,也决定着政绩观的基本内容。“协商”的品质以及作为协商品质制度化的协商民主,规定着坚持正确政绩观的基本目标、内涵特征、主要方法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周恩来认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11]¹³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12]“商量政府”的本质决定了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的重要意义。

“协商”在政治实践中的贯彻落实,需要在制度层面加以保障。因而,将“协商”上升为一种民主形式,标志着党的领导具有了与其相适应的方式。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强调“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3]协商民主成为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检验着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协商民主构成了我国统战工作政绩观的价值目标、基本理论、主要任务以及制度成果等方面的基本内容,统战工作政绩观主要围绕这些基本内容特别是其中的四对基本关系展开。

三、正确把握统战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关系

建立“无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统战工作作为党实现革命战略的重要法宝,总是围绕特定战略目标而展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首要原则,也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基本政治要求。统战工作还要根据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任务,制定不同的战略策略。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党的长远战略目标与具体政策策略的关系,既使具体政策策略与长远战略目标的方向一致,又使战略目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确定任务,并具体体现为党的政策措施,从而使统

战工作具有政治属性，通过统战工作来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1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15]。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运用统一战线战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为我们正确把握这一关系提供了典范。有学者指出：“虽是敌对阶级，却又要同它联盟，虽是对抗性矛盾，却又要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决；既要在经济上管得住，又要利用同它的经济联盟为国计民生和工业化建设服务；既要在政治上加以孤立乃至消灭，又要把资产阶级的个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对其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以保持同它的政治联盟。毛泽东就是这样对民族资产阶级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政策和策略，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6]。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战工作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从属于党领导人民“消灭阶级、消除社会两极分化”的政治任务，旨在最终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战略目标。

党的百年统战工作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才有团结凝聚的核心，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才能充分彰显强大法宝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决定着统战工作的方向，检验着统战工作的政绩。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17]。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当前统战工作的战略目标。只有坚持好战略目标，同心圆才具有价值，战略目标实现才具有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多元利益表达日趋复杂，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功能和职责更加重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决定着党的统战工作必须不断做好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各类专业人才、海归人士、海外华侨等新时代特定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引领经济社会资本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如何反映汇集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诉求，找到最大公约数，考验着领导干部正确把握好统战工作战略目标与具体策略关系的能力，也检验着我国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成熟与完善程度。有效的政治制度应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这里的自主性是指政治系统保持自身性质、吸纳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的能力，实质上是政治组织实现领导职能的过程。一国政治体系是否具有稳定的领导核心，成为检验该国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首要的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领导核心和组织保障。

同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这是党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策略与方式。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表明，现代政党制度在整合吸纳多元社会力量的同时，

必须保持开放的状态,拥有适应社会多元化组织与各种新兴主体成长的能力。现代政党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成为现代化实现的政治要求,内在统一于现代政治体系中。与西方多党制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本身蕴含着开放性的政治功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便捷渠道;要不断完善政协界别设置,扩大社会团结面,不断增强人民政协的统战功能,增强政治包容性,实现制度开放性,最大限度把社会各阶层引导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战略目标上来。

四、正确把握统战工作中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做好统战工作,关键是要把握好统战工作中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关系,需要从党的阶级理论及其与统战战略的关系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决定政党性质的基本因素主要是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政治纲领及其实际活动。无产阶级只有处理好自身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政治关系,即谁来领导革命及为谁革命的问题,才能进行生产资料和财产权归属等经济社会层面的革命。党的统战理论本质上也是党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断创新的产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革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理论发展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从“一个先锋队”发展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群众的先锋队,这就赋予了阶级更加包容与革命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提出了“两个先锋队”性质的观点,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以此为基础,党确立了以“三大法宝”为基本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略,这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而且在正确的革命统一战线战略下,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两个先锋队”观点同时还成为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理论依据与合法性基础。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18]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两个先锋队”理论,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尤其是要把握好统战工作中政治性与群众性的关系。将统战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及统战对象从党的一般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中分离出来,既不能简单用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来代替统战这一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也不能将政治性很强的统战工作与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相割裂,甚至将统战对象与人民群众相对立。“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19]

对统战工作中阶级性与人民性关系的正确把握,需要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对我

国社会阶层政策进行调整完善。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1]2006年7月，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关键是要协调和处理我国重大社会政治关系，特别是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五大关系”的基本内容；并明确了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新产生的职业、身份等社会群体，为了满足和保护自身的权益，必然具有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参与的潜在需求。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构成更加复杂。原有群体和阶层自身不断发展变化，新群体不断从中分化出来。知识分子大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不断壮大，新就业群体快速增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必然会催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逐渐成为现代政治过程中的新兴主体。统战工作必须将教育科技人才等新的社会阶层作为重点，将这些事关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从业者，将更多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对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上的战略支撑。同时，要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做好劳动群众的工作。这都要求我们创新统战理论和思维，改进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坚持统战工作政治性的同时，不断扩大统战工作的覆盖面，体现出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的群众性，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在劳动群众中发现新的统战对象，将统战对象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统一起来。

五、正确把握政治引领与利益照顾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这就更需要下功夫去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很重要，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我们十三亿人，八千二百多万党员，包括海外同胞，大家能凝聚共识，本身就是力量。”^[17]⁶⁶坚持统战工作政治性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纳入有序的制度化框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统战中的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工作来完成。新的社会阶层逐渐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

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如何平衡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统战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政治如何引领多元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追求,增进一致性,同时又尊重不同的利益诉求,成为我国统战工作需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

现代政党在解决“一致”与“冲突”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整合中,现代政党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党整合即社会政治化的过程。政党整合建立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政党整合主要将政治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的渠道,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以获得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理解、信任,最后达成一致的目标。政党整合过程既是政党按照自身纲领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领社会和形塑社会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政党整合社会功能受到不同的政党制度结构的制约,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在政党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中,我国政党制度体现出超越西方多党竞争的创新性和优越性。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2]。

党对多元社会利益的整合首先建立在党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上。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政治领导的内涵,即“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政治决策的形成建立在尊重多元利益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将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供给了有序的、规范的社会利益整合渠道。这种有序的制度安排既体现了政治对多元社会利益的引领,同时又实现了政治对多元社会利益的回应。可以说,我国政党整合是政治领导与社会整合功能的统一。而西方政党只是简单地反映多元社会力量,缺乏政党自主性,政治无法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进行决策,公共政策形成只能是多元社会利益冲突的自然结果。

把握政治引领与利益照顾的关系,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下运行。1950年3月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23]。毛泽东强调,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要团结他们,尊重他们,要给他们事做,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不应分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23] 202}。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运行的关键就在党历来尊重民主党派和统战对象的民主权利。为了更好地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权利,《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

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为多党合作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照顾同盟者利益有着更加现实的针对性和重要价值。这是调动和激励统战对象积极性的重要举措。统战工作要在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进行有效政治引领的前提下，采取多种举措从政治安排和建言献策方面照顾其利益：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议政建言；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参政议政，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有益参考；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同群体特点优势，打造各类智库平台，建立知情明政、定期座谈、协商反馈等机制，开辟建言献策“绿色通道”，鼓励他们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这些举措的贯彻落实，既是对同盟者利益的照顾，同时也是新的社会群体行使政治权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照顾同盟者利益成为人民权利行使和我国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照顾”就从单方面的给予关系，变成双向的互动关系。

六、正确把握政治安排与协商制度化的关系

随着统战工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同盟者的利益需要照顾，这也意味着政治安排也必须不断适应现代多元社会的治理要求，只有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协商性的民主制度，才能不断容纳日益多元的社会利益诉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安排与照顾同盟者利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多元社会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过程，也对协商民主的发展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关系，使其在协商民主发展中得到统一，成为检验和判断统战工作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准和落脚点。

任何现代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稳定成熟的制度之上，同时成熟定型的制度本身也是现代化实现的基本标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化的目标，这要求人民群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形成过程中，进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序化、法治化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按照宪法、法律和人民意愿来行使国家权力，其中决策前实行协商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就是政策出台前要听取和吸纳群众的意见建议，广泛贴近群众切身利益，把握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诉求，坚持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政府决策和政策作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检验政府政绩的公共产品，凸显了协商在政府决策和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协商机制的建立、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

政党协商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七种协商形式中的第一种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首次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之一，并就进一步加强政党协商作出部署。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对政党协商的定义予以完整明确的界定：“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政党协商作为政治安排的重要方式，在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中具有重要价值。不少地方在政党协商方面都有很多创新探索实践。这些探索实践有力地推进了政党协商在地方党委决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治

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党协商自身也需要不断在制度化框架下运行和推进。政党协商在涉及地方政府重要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等议题时,如何更好地程序化、规范化运行,将其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尤其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好其与政协协商之间关系,日益成为统战工作需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正确分析和看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政协协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特殊作用。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谈判情况时就指出:“‘政协’被规定为政府以外的机构,实质上便是党派会议,各党派均保有否决权,一致通过的议案,政府须负责实施。这样,‘政协’本身并不能约束各党派,只有在各党派自己同意的决议上,方得约束自己。”^[24]人民政协作为“党派会议”,从源头上说体现了政党协商的属性。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25]2023年新修订的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统一战线将党的领导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尤其是建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成为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成为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26]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人民政协在发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等统战功能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

为了使两者关系得到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使统一战线从战略策略工作方法层面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关系,充分发挥统战工作尤其是政党协商的制度属性,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成熟定型的现代国家制度。

七、结语

协商建国的历史与逻辑决定了协商与协商民主成为我国统战工作政绩观的基本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政绩观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只有将与群众商量的优良作风上升为规范的制度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具有政治上的保障。从根本上说,统战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从党的“两个先锋队”理论出发进一步探讨党的统战工作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界定统战对象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协商建国的逻辑决定了统一战线理论深刻地包含在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制度设计中。进一步挖掘统一战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理

代化中的战略价值,探讨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政治整合社会的功能及其治理价值,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至关重要。以发展协商民主作为检验统战工作政绩观的基本目标与标准,不断创新统战理念、统战方法、统战载体和统战艺术,并形成协商制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可以为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最终为党的领导提供新的制度化渠道和政治形式。这些问题充分凸显了统一战线与统战工作在中国政治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N]. 人民日报,2026-1-21(1).
- [2]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N]. 人民日报,2020-01-22(1).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40-241.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5.
- [5] 赵红灿. 习近平政绩观的价值意蕴[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5(4):5-13.
- [6] 魏崇辉,李玲. “正确政绩观”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演进与理论建构[J/OL].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6-03-31]. <https://doi.org/10.16783/j.cnki.nwnus.2026.03.002>.
- [7] 齐卫平. 基层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若干思考[J/OL].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7[2026-03-31]. <https://doi.org/10.19865/j.cnki.xxdj.2026.03.001>.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28.
-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1013.
- [1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7.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8.
- [13]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13-11-16(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7.
- [16] 项启源,徐则荣. 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学习毛泽东1956年的重要述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2):61-66,90.
-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8.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49.
- [19]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15.
- [20]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1.

- [21]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39.
- [22]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29.
- [23] 刘洪森. 党计与生计: 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949—1956)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02.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22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844.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93.
- [26]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20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0.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王京菁

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场景、逻辑与路径

邓海龙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深度契合、同频共振，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是“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金钥匙”。“四个之问”系统概括了当前中国与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明确了党在新时代不能回避且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中国场域、全球视野、价值立场与时代要求，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实践场景。正确政绩观与自我革命在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实践场景中，构成以正确政绩观正方向、以自我革命弦破难题、以实干实绩验成效的闭环互动机制。从实践路径看，需要重点从制度治党、干部管理、数智赋能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即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与从严监督执纪相贯通，激励为民造福与增强党员干部党性相契合，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相协同。

关键词：正确政绩观；自我革命；“四个之问”；互动机制；“十五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2-0103-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08

作者简介：邓海龙，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大学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历程与经验研究”（TJDJ24-002）

引用格式：邓海龙. 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场景、逻辑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2): 103-115.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下简称“四个之问”)的实践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1]这一统领性命题,并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2],“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3],“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4],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5],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6],明确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工作安排,表明正确政绩观日益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健康成长和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与价值标尺。正确政绩观的内涵不断丰富、要求持续深化,并贯穿于党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

中国共产党作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7]。面对“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复杂形势,“四个之问”这一考题更趋复杂严峻,亟待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彻底自我革命精神作出科学回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7]纳入“十五五”规划顶层设计,为中国共产党破题作答“四个之问”提供了鲜明价值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深度契合、同频共振。唯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校准价值坐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进而锤炼过硬本领、强化制度保障,才能更好破解发展难题、回应时代关切,为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奋进力量,从而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学术界对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内在关联的研究较少,鲜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回答“四个之问”的研究成果。一是政绩观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从执政伦理的角度来看,“政绩观扭曲”是党的自我革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8],党“以卓越政绩推动社会革命进程”并“在自我革命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9]。二是“四个之问”与党的自我革命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回答“四个之问”的强大动力^[10],党要在回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11]。还有学者对党的自我革命与具体的某一个“之问”展开了研究。例如,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就是要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12],时代之问是党的自我革命主动性激发的社会基础^[13],自我革命是党回答时代之问的自觉选择^[14]。三是对政绩观与“四个之问”的相关研究。正确的政绩观是正确发展观和现代化观的思想前提和行动保障^[15],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回答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之问^[16]。不难看出,学术界直接探讨政绩观、党的自我革命与“四个之问”三者关联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回答“四个之问”的学理化阐释、系统化研究尚显薄弱。鉴于此,本文着力探究“十五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来作答“四个之问”这一理论命题。

二、“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的实践场景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实践的起点，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场景与实践命题。“四个之问”系统概括了当前中国与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明确了党在新时代不能回避且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中国场域、全球视野、价值立场与时代要求。

“四个之问”不是孤立存在的时代课题，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四者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实践场景。

（一）中国之问：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之问聚焦国内发展任务，核心在于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7]。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是中国之问的现实图景，也是作答中国之问的战略路径，还是检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的实践标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2]76}。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发展的方向、质量与成色。事实证明，政绩观正确，发展就会稳中有进、行稳致远；政绩观错误，发展就会脱轨失序、后患无穷。只有充分发挥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作用，才能引导党员干部摒弃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和增长率比高低、论英雄的发展思路，才能扭转只要经济增长而不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错误做法，才能及时批评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才能减少或避免盲目扩张铺摊子、贪大求洋搞开发、重复建设耗资源、华而不实造数据、劳民伤财留隐患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的出现。“十五五”时期，能否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是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尺度。具体而言，要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各项工作决策、执行和检查的全过程，切实摒弃粗放式增长、短期化政绩，坚持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系统思维推动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17]，是“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国之问的民心答案。正确政绩观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因而能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检验正确政绩观效度的试金石。政绩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群众是否能真正富起来、生活能否真正好起来。脱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谈政绩，就是虚绩、虚功、虚效；只有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出实招、做文章，才能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和实践检验的实绩、真绩、实效。换句话说，偏离共同富裕轨道的错误政绩观，势必会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放眼全球，一些在现代化进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就

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好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等突出问题，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甚至严重倒退的发展困境。坚持错误政绩观，必然会导致急功近利一味追求 GDP 增速、盲目上项目、造亮点垒数据，导致见物不见人、拉大贫富差距、损害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因此，必须真正把共同富裕摆在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兜牢民生底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做表面文章，多做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惠民生的工作，确保发展成果能精准对接人民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进而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世界之问：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之问关乎全球和平稳定与公平发展，重点在于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美国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单边霸凌愈演愈烈。个别国家接连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国际贸易规则受到严重损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日趋成为牵动各国神经且必须解决的最紧迫的时代命题。

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绩观在国际社会的实践延展与集中体现。这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就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如成功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全球妇女峰会等，支持倡导多边主义和团结合作，致力于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和国际公平正义，保障各国人民共享全球治理成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四个不同维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蕴含着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治理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引领”^[18]，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政绩观为解决人类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

坚持正确政绩观，为中国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与行动指南。这一正确政绩观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与个人政绩，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面向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天下的品格，将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相连，将一域发展与全球发展统筹考量，彰显了中国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与和平发展的大国担当。反之，个别国家和政客奉行错误的国际治理观念和狭隘政绩观，加剧地区冲突、集团对立与分裂对抗的态势。面对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 48}，“各国需要团结协作，而不是分裂对抗；人民希望开放进步，而不是封闭倒退”^[19]。“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坚持正确政绩观，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人民之问：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之问突出党的初心使命，关键在于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20〕}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7〕}，并强调必须遵循“坚持人民至上”^{〔7〕}的原则。这实际上为回答人民之间提供了根本立场、价值遵循与实践路径。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2〕⁴⁸}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不断夯实长期执政基础的奥秘所在。百余年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才能培养出人民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真挚情感，才能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供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一切疏远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脱离群众的错误政绩观，都是极其危险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不愿和群众打交道”“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绝不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21〕}。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非个人的升官发财。“十五五”时期，实现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目标，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等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努力让群众切实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幸福，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四）时代之间：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时代之间紧扣党的中心任务，旨在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把‘十五五’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规划好实施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23〕}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必然要求。

时代是出卷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和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和担当。精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是回答时代课题、解决时代问题、担负时代使命的前提和基础。谁把准了时代脉搏，谁就能赢得历史主动和战略机遇，谁就能占据发展先机和战略主动。时代发展脉搏集

中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进程中,体现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善于观察时代之变、回应群众之需、解决发展之难,把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聚焦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把精力用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上,不做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使时代进步的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受益长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决定了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确政绩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准则,二者辩证统一、双向赋能,统一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实践中。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校准方向。坚持正确政绩观,有利于杜绝违法用权、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盲目攀比、重复建设等错误行为的出现,引导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民生为大,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正确政绩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路径,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大力弘扬团结奋斗精神,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实践平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也是我们党探索和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1] 109}的历史。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是检验正确政绩观效度的重要尺度。正确政绩观树立得越牢、践行得越实,就越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其成色也会越亮。总之,唯有把准时代发展脉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更好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三、“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 “四个之问”的互动逻辑

正确政绩观与自我革命内在统一、同频共振,在中国共产党作答“四个之问”的实践场景中构成以正确政绩观正方向、以自我革命弦破难题、以实干实绩验成效的闭环互动机制,其核心逻辑可凝练为价值引领、问题导向和实践转化三个方面。

(一) 价值引领逻辑: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

政绩观是人们关于政绩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人们对什么是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以及如何树政绩等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深层次认识,是人们关于政绩的内涵、标准、态度和创造方法的观念系统。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履职尽责和施政成效方面的集中体现,是党员干部创造政绩的思想前提和内生动力。“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根本方向的作用机理。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根本性问题”主要揭示“源与流”“先与后”以及“因与果”的相互关系,即从时间维度考量哪一个更具优先性。将政绩观作为“根本性问题”,并以正确政绩观校

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基本原理。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标尺，直接决定着自我革命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还有一些党员干部抱有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自我革命“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24]等错误想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绩观出了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5]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根本性问题”主要指涉“纵向到底”“贯穿始终”的主线型关系，即事物发展从头到尾的核心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政绩观作为“根本性问题”，并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实质上就是强调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党的自我革命和长期执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破除影响事业发展的顽瘴痼疾的重要切入点就是纠治政绩观。正确政绩观能够引领党员干部主动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坚决纠治错误政绩观带来的不良作风，确保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四个自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政绩观依靠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治偏差、增强本领的良性循环。

从功能论的角度看，“根本性问题”主要阐明“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作用型关系，即对事物发展的有利作用或效能。将政绩观作为“根本性问题”，并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意味着正确政绩观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发挥着统领性、指导性的方向盘作用。正确的政绩观可以成为自我革命的“发动机”和“推进器”，错误的政绩观则会沦为自我革命的“绊脚石”和“拦路虎”，阻滞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甚至背离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进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自我革命根本方向的成效，将最终落实到党员干部为作答“四个之问”而践行初心使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绩上。

（二）问题导向逻辑：以自我革命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

作为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26]。当前，我们党肩负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必须把自我革命这根弦绷得更紧。以自我革命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也是党在“十五五”时期作答“四个之问”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深刻认识并强调党内存在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党内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个不纯”“七个有之”等突出问题，强调“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其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20] 500}。早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中，就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实质作了分析概括。他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27]反过来讲，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就必须自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以自我革命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必须严肃查处顶风违纪、改头换面、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纠治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偏差等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需要强调的是，在作答“四个之问”破解政绩观的实践偏差症结时，既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聚焦突出问题，充分认识和区分老问题与新问题、显性问题与隐性问题、表层次问题与深层次问题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摸清不同类型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要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以及已经解决的问题死灰复燃。

（三）实践转化逻辑：以实干和实绩检验双向互动的最终成效

中国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崇尚实干、埋头苦干是其鲜明品格。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狠抓落实、以实干出政绩，这是最质朴的方法论，也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28]“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归根到底要靠实干和实绩检验双向互动的最终成效。

政绩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贪大求洋、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装点门面等错误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重要会议上予以批评，明确强调：“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要把这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29]实干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政绩的根本途径。以实干出政绩，不能只喊空洞的口号，而要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能虚头巴脑地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而要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泽被后人的好事；不能只看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要多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而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的成效如何，根本标志就是看所创造的实绩能否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比如，塞罕坝林场守护和保障“绿色地图”、新疆和田为沙漠“锁边”、亮丽内蒙古建设迈出重要步伐，这些都是我们党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造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就曾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30]。再比如，党中央在新时代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一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无疑也是我们党创造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着眼人民需求、锚定长远发展，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四、“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的协同路径

“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绝非单一举措可成，也不能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而是一项需多点突破、统筹兼顾、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当前，需要重点从制度治党、干部管理、数智赋能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切实以系统思维推动正确政绩观与自我革命深度融合，确保“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项战略举措都成为书写“四个之问”满意答卷的坚实一笔，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制度治党路径：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与从严监督执纪相贯通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张力与失衡是政绩观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制度治党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的工具理性、治理活动的程序理性和效力预期的目的理性连贯有序、相互配合、有机统一”^[31]。制度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健全科学管用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以刚性约束规范权力运行、涵养务实作风，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坚实保障。“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必须强化制度治党，构建精准有效的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32]，完善政绩考核、监督问责等制度体系，让正确政绩观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以增强制度刚性规范自我革命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2]11}政绩考核体系界定了什么是好政绩的正确政绩观，而从严监督执纪则是推进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硬手段，两者贯通互促。一是将高质量发展指标作为考核与执纪的“度量衡”。彻底摒弃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唯一导向，将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潜绩指标纳入差异化考核体系，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同时，将违规举债、搞“形象工程”等行为列为执纪问责的红线，做到离任审计与终身追责，让制度的“指挥棒”与纪律的“高压线”同向发力。二是紧盯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督。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必须聚焦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极易滋生政绩观扭曲的重点事项，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的制度，通过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以刚性制度阻断利益输送与特权寻租，铲除政绩观异化的制度漏洞。三是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针对脱离实际盲目攀比、大搞劳民伤财工程背后的利益交织，既查作风问题背后的政绩观扭曲，又深挖“四风”背后的团团伙伙与贪腐行为，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确保干部将心思真正用在干事创业上。

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与从严监督执纪的深度贯通，是党作答时代课题的制度利器。其通过制度约束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以严明的纪律保障新发展理念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不可摧的制度支撑，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风险考验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干部管理路径：激励为民造福与增强党员干部党性相契合

干部队伍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其作风与状态直接关乎执政根基与事业成败。构建科学有效的干部管理体系，才能以鲜明导向激发内生动力、涵养担当作为，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主体支撑。“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要强化干部管理，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引导干部摒弃急功近利思想，在自我革命中践行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21〕}。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与锤炼坚强党性相契合，是干部管理路径的根本着力点。为民造福是正确政绩观的最终落脚点，而增强党性则是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源，两者在干部个体的思想深处和行动实践中高度契合。一是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通过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引导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引导其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破除“出头露脸才是政绩”的私心杂念，以内无妄思的坚强党性保证外无妄动的清正廉洁。二是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知事识人导向。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坚决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成事作为评判干部优劣的重要标准，多到基层和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让埋头苦干、不搞花架子的实干者得到重用，让作风漂浮、弄虚作假者失去市场，以选人用人的公道正派激励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三是构建敢于担当的容错纠错与正向激励机制。自我革命不是把人管死，而是要明方向、立规矩，实事求是、科学对待干部的缺点和不足，通过真情关爱和科学减负，破除“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的逆向淘汰心态，全面激发干部迎难而上、造福一方的精气神。

激励为民造福与增强党员干部党性相互契合，是党凝聚民心、汇聚伟力的关键所在。当广大干部摒弃急功近利，将造福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业、教育、医疗等实际问题时，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便得到了最坚实的巩固。一支具备极强党性修养、敢于直面矛盾、善于破解难题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也必当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打破发展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核心骨干。

（三）数智赋能路径：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打造精准识别需求、主动规划服务、全程智能办理的政务服务新模式。”^{〔33〕}立足数智时代新方位，顺应数智化发展趋势，广泛应用数智技术，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政绩考评精准度和治理效能，为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注入科技活力，是“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的时代要求。

破解“十五五”时期党作答“四个之问”过程中的顽瘴痼疾，需要实现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正确的政绩观能够确保数智治理创新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数智治理创新则为政绩观教育引导提供了穿透力强、精准度高的现代技术支撑。一是深化数智赋能，精准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优化政务平台与数据互通，

坚决砍掉缺乏实效的繁文缛节与重复报表，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二是构建多维度、穿透式、可视化、可监测的数据指标体系。要通过算法模型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绩进行全程留痕、实时跟踪、客观评估和动态预警，将 GDP 增速、产业结构调整、“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人民幸福指数等纳入干部政绩观考核的各环节，有效甄别并遏制“做秀不做事”“数据造假”等政绩观异化现象。三是形成数智监督闭环。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推动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贯通协调，运用数智化平台拓宽群众反映诉求与参与评价的渠道，让基层群众能够直观感受到干部的作风与业绩；以数智技术最大化发挥群众的监督“前哨”作用，倒逼基层干部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负责，确保基层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数智治理创新与政绩观教育引导相促进，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信息化、数字化浪潮汹涌的今天，通过数智赋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技之力促进根除作风顽疾，展现了党应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创新智慧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科学回答“四个之问”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四）全球治理路径：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相联动

全球治理是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舞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合作共赢的治理格局，才能以广阔视野应对外部风险、拓展发展空间，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外部场域。“十五五”时期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作答“四个之问”，要立足全球治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深化自我革命，实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协同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姿态彰显自我革命的时代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长周期、跨国界、系统性的大工程，现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18]。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将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相联动，是践行大国政绩观与深化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是践行大国正确政绩观的国际实践，而应对全球挑战则是党的自我革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具体展开，两者联动推进。一是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海外项目高质量落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涉外干部必须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和贪大求洋的心态，绝不在海外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驻在国的客观需求与发展规律，将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于国际合作的全过程。二是扎实推进“廉洁丝绸之路”建设，强化跨境腐败治理。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化，防范利益输送和隐性腐败成为自我革命的新战场，必须健全涉外重大项目审批与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对涉外领域的风腐问题同查同治，坚决斩断内外勾结的利益链条，以一严到底的法纪约束保障海外资金安全，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的决心。三是培养具备全球视野与斗争本领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国际交往与全球治理博弈中，干部不仅要具备高超的专业素养，更须具备坚定的政治定力与强烈的底线思维；要在重大国际斗争一线磨砺干部，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引导涉外干部在风口浪尖践行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共建“一带一路”与应对全球挑战的紧密联动，以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生动体现。党以自我革命的清醒确保对外合作的廉洁与高效，真心

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与发展难题,提供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这种摒弃私利、致力于全球共同繁荣的大国政绩观,不仅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更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引领人类社会朝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未来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09.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12.
- [3]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N].人民日报,2026-01-21(1).
- [4] 习近平.在二〇二六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二〇二六年二月十四日)[N].人民日报,2026-02-15(1).
-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2.
- [6] 中办印发《通知》 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N].人民日报,2026-02-24(1).
- [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5-10-29(1).
- [8] 李新廷.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系统性逻辑——一个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分析[J].党政研究,2025(4):14-26.
- [9] 赵红灿.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学理思考[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31-46.
- [10] 王春玺,夏晓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创新性贡献[J].理论探讨,2025(1):14-21.
- [11] 吴潜涛,张志恒.论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质与时代发扬[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2):31-41.
- [12] 钟贞山,周品秀.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实践遵循与现实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4-22.
- [13] 洪向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内在逻辑、动力系统与实践路向[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1-11.
- [14] 王越芬,刘艳君.自我革命是党长期执政重要保证的政治逻辑[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61-168.
- [15] 曹东勃,蔡煜.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教学与研究,2024(4):50-62.
- [16] 丁俊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4):18-23.
- [17] 曲青山.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J].求是,2023(16):18-25.
- [18] 邓海龙.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框架与协同机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217-229.
- [19]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N].人民日报,2024-08-30(1).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37.
- [21] 习近平. 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 求是，2023（13）：4-16.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17.
- [2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2025年9月30日，晚上）[N]. 人民日报，2025-10-01（2）.
- [24] 习近平.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J]. 求是，2025（23）：4-8.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4.
-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79.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189.
- [2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17-12-27（1）.
- [29] 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我常说两个必保”（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2023-03-06（1）.
- [30]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186.
- [31] 崔征. 新时代制度治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特征[J]. 社会科学战线，2018（11）：222-227.
- [32] 秦书生，梅可欣. 以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着力点与实现机制[J/OL].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2026-03-04].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8.C.20260206.1023.004>.
- [33]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5（25）：15-19.

责任编辑：林华山 校对：卢媛

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演进、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

俞佳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 要:统一战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行稳致远、凝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的关键课题。从革命时期以壮大力量、夺取政权为导向,到建设时期以确立制度、完成改造为重心的,从改革时期以服务经济、提升效率为特点,直至新时代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统领、强调整体性效能,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百余年历史演进,是一部与党的使命同频、与复兴征程共振的观念发展史和实践探索史。透过纷繁历史现象,这一演进脉络呈现出贯穿始终、相互关联的内在规律:在价值根基上,坚持巩固党的领导与赢得人民拥护的高度统一;在目标指向上,追求长远战略与实际成效的有机融合;在方法策略上,把握坚守一致性与包容多样性的有效结合;在评价标准上,做到系统性考量与过程性审视的相互贯通。在统一战线实践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绩考评体系引领方向,将统战工作深度嵌入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国家治理等核心场域创造实绩,同步建强统战干部与统战成员两支队伍提供政绩保障。理解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演进的历史、规律以及实践要求,有利于确保统一战线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持续发挥重要法宝作用。

关键词: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政绩;潜绩;显绩;重要法宝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6)02-0116-12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2.009

作者简介: 俞佳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教师。

引用格式: 俞佳奇. 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演进、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116-127.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与评判的标尺,政绩观是否正确,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党的建设,从根本上决定着建党强党、干事创业的成效乃至成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到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2],再到2026年春节团拜会^[3],习近平总书记等多个场合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评判统一战线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早在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已精准点明统战工作的独特政绩逻辑:“要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坚持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的统战事业行稳致远。”^[4]这一重要论述将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正确政绩观从一般性工作要求,提升为统战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重要命题,为理解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视角。2022年以来,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两次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5],“建好统战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锻造过硬素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6]。这些论述进一步明晰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理论自觉和主体自觉,将价值理念、实践方法与队伍建设紧密联结,构成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从思想深化到实践推进的完整体系,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向和鲜明的问题导向。

统一战线政绩观作为政绩观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具体投射,是关于统一战线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不仅在理论层面深刻回答统一战线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等问题,更在实践层面形塑大团结大联合的广度、深度与效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统一战线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系统考察、梳理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百余年演进轨迹,提炼其不断巩固深化团结的历史经验与理论逻辑,既是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持续成功整合中国社会庞杂力量的关键锁钥,也是新时代巩固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形塑牢不可破真团结的迫切实践命题。

从既有成果来看,当前学界虽未直接系统论述统一战线政绩观这一特定概念,但围绕其核心关切已形成三条重要研究脉络,为统一战线政绩观研究创造条件。第一,关于统战历史、统战政策等研究细致梳理统战史中的路线方针、人物事件及文献材料,深刻揭示统战工作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策略选择与实践形态,如抗战时期的重要统战成果在国内范围是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7],在国际范围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演变^[8]。此类研究虽未聚焦统一战线政绩观背后的价值评判标准,却为理解政绩观的生成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与政策语境。第二,聚焦统一战线制度安排的结构、运行与优势,如新型政党制度的“多维互嵌”^[9]价值功能,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构成“团结型政治”^[10],为思考政绩观所关涉的绩效评价提供制度维度的参照。第三,关于统战策略的研究敏锐回应统战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如“十五五”时期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11],持续激活与释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12]等,此类研究已隐含政绩观的现实关切,触及政绩观的操作层面。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大多将“政绩”视为不言自明的隐含前提或顺带提及的结果,缺乏将“政绩观”本身作为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独立研究对象并进行贯通百余年统战历史的整体性、连续

性、全局性考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经历怎样的演进历程,内在的发展逻辑与深层规律是什么,又为新时代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哪些重要启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质上是对统战政绩观如何伴随时代任务而调适深化、日趋成熟并最终发展为独特行动逻辑的追问。本研究尝试从政绩观演进的角度重审统一战线的历史脉络、实践效能及价值关切,系统考察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演进历程、内在规律与实践启示,以期更深刻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不断取得成功的观念密码。

二、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演进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统一战线始终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评价统一战线业绩、成效的观念体系,即统一战线政绩观,亦伴随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的深刻变化,呈现出动态演进、不断丰富的发展轨迹。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壮大力量、夺取政权为核心导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宏大叙事中,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由于革命形势严峻,敌我力量悬殊,“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13],统一战线必须联合其他阶级、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与此相适应,统战工作的核心价值被赋予鲜明的斗争属性,统一战线政绩观紧紧围绕着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服务于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最高政治目标展开。

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首要政绩,直观地体现为最大限度地“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14]。衡量统战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等一切可能争取的中间力量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是否有效动员和组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构筑起革命最深厚的阶级基础。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构建,其伟大政绩不仅在于汇聚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更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5]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敌后抗战,在统一战线中巩固领导权,实现力量对比的历史性逆转。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成效直接关联革命的生存与发展,其绩效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任何削弱革命力量、扩大敌人阵营的做法都被视作工作的失败。党内一度出现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16]的政策,其根源就在于偏离以壮大自身力量为依归的政绩导向,使革命事业在孤立中遭受重大挫折。因此,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绩观可以概括为:团结的人越多,政绩越大;孤立的敌人越多,成效越显。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确立新型制度、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重点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转向“建设一个新世界”^[17]。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困境,评价统战工作的政绩标准随之发生转变——从革命时期侧重分化敌人、联合朋友的力量博弈,转向“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8],即通过统一战线教育和改造旧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这一阶段统战工作的核心政绩主要看是否有效推动制度确立与实现政治整合。第一，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例如，“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19]，通过定息、高薪等“五不变”政策完成渐进改造，发挥其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积极作用。这一政策既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在经济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避免社会剧烈震荡，在政治上创造将资产阶级改造为劳动者的奇迹。第二，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协商建国的历史经验提升固化为国家制度。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8]³⁴方针，指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20]。由此，“各民主党派开始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转化，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一致性加强”^[21]，推动多党合作从革命时期的力量联盟上升为制度安排。第三，推动知识界和宗教界的自我改造。1956年，周恩来作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¹⁶²的科学论断，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宗教领域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严重干扰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时期的统战政绩观经历曲折起伏，曾将统战工作片面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一度导致政治关系紧张，统战工作收缩。这说明，如果统战政绩观偏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实际要求，统一战线的生机与活力就会受损。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服务经济建设、提升发展效能 为鲜明主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统一战线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转变，衡量统战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与“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强音紧密结合，显现出服务经济建设的发展导向、效率导向。

一方面，统战工作的政绩前所未有地与经济社会发展实效直接挂钩。其显性成效突出体现为经济指标，例如，是否为现代化建设引进亟需的资金、技术、人才；党外知识分子在推动科技进步、文化繁荣中发挥何等实际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活跃市场方面作出多大贡献等。其经典案例是1979年邓小平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举行的火锅宴。席间，邓小平明确表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22]，主张“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22]¹⁵⁷。这一历史性会面传递的核心信息说明，统战工作的政绩聚焦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妥善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成为评价统战工作隐性效能的重要维度。从更加丰富的团结对象看，统一战线将改革开放中涌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3]并纳入工作范围。这是统战工作成效紧密围绕发展需求的生动体现，其政绩转化为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社会活力源。从更加广阔的团结空间看，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两个范围”的联盟，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对台工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是此阶段统一战线在实现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重大基础性政绩，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汇聚广泛力量。

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绩观将服务经济建设、提升发展效能作为主要评判标准。伴随统一战线的转型发展，其政绩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效能评价的边界亦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更广范围拓展，为向更高形态的政绩观演进奠定基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统领，强调系统性、整体性、战略性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社会利益更加多元、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复杂。面对新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呈现“整体性统战”^[24]的工作状态。统战政绩观从侧重经济效能的资源思维，转向复兴征程中涵盖全域、贯穿全程、统揽全局的系统思维。

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政绩具有整体性，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和更全面的系统思维审视工作成效。第一，对象的整体性。新时代统一战线扩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25]，民族复兴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第二，目标的整体性。统战工作已经全面嵌入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通过协商民主等形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文化领域，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渠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社会领域，通过协调利益关系等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在生态领域，引导党外人士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海外领域，通过争取人心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战工作的政绩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第三，成效的整体性。强调“潜绩”和“显绩”的辩证统一，追求的是党执政基础的整体巩固和人心力量的整合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26]。统战工作的政绩既要有“显”的一面，即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更要有“潜”的一面，即深耕人心、厚植认同、涵养团结，为党长期执政夯实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三、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规律

从前述历史考察中不难发现，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百余年演进历程深植于党的使命追求、统战工作的本质属性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是确保统一战线强大法宝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发挥作用的导航。从具体问题看，这一历程事实上是围绕统一战线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如何衡量所树政绩的优劣等问题进行的理性探索与规律总结。

（一）价值维度：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正确政绩观的首要前提是解决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原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7]百余年统一战线史昭示，统一战线政绩观的首要规律是政绩的价值评判既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又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将党

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融为一体。

从坚持党性的角度而言，统战工作的政绩必须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政治纲领。统一战线因党而生、为党而兴，统战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服务于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5] 94}任何脱离或弱化党的领导“政绩”，在统一战线的逻辑下不仅是无效的，更是危险的。历史经验表明，当统战工作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时，其法宝作用就发挥得最充分；反之，任何试图弱化或脱离党的领导倾向，都会使统战工作迷失方向、丧失根本，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党性原则要求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统一战线的广泛共识和行动合力。

从坚持人民性的角度而言，统战工作的政绩必须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为最终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6] 34}历史上，党先后将统一战线视为“法宝”“重要法宝”，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28]，其精神内核都是最大化地争取人心。党的百余年统战史，就是一部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从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土地诉求，到改革开放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激发新社会阶层活力，再到新时代致力于脱贫攻坚、推动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创造真正解决包括统战成员在内的全体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业绩，才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真政绩、实政绩。

这一规律的内在统一性体现为党的统战工作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模范的行动，创造服务人民、赢得人心的政绩；人心向党、力量汇聚，又反过来创造将党的领导锻炼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新政绩。在统战工作中，割裂二者，或将统战工作简单化为行政命令，或迎合少数人利益而丧失政治原则，都会导致政绩观的扭曲。新时代统一战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深刻把握这一价值铁律，自觉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二）目标维度：促进战略性与实效性的有机融合

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正确政绩观必须回答的目标指向问题。统战政绩在时间维度上具有长短交织的特征，这决定其政绩追求必须准确处理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在目标设定上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辩证法智慧，既要放眼长远，致力于战略布局和基础建设，又要立足当下，在服务大局中创造可见可感的现实成果。

从战略性的长远视野来看，统一战线需要树立宽广的政绩胸怀，注重基础性、潜绩性工作。一方面，统一战线在争取人心、转变思想、形成共识、塑造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立竿见影。例如，统一战线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神仙会”实行“三自”和“三不”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29]。“神仙会”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帮助党外代表人士在宽松氛围中敞开思想、实现自我教育，正是谋求春风化雨、浸润人心的潜绩。另一方面，统战工作的潜绩显现具有相当程度的累积性和滞后性，

应当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以谷文昌建成防护林为例，强调“潜绩”是最大的“显绩”^{[26] 108}。没有深厚的“潜绩”，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显绩”。重视战略性目标，就是要求统战工作具备战略耐心和历史远见，摆脱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为未来赢得优势、赢得主动打下坚实基础。

从实效性的现实要求来看，统一战线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解决具体问题，展现法宝作用。强调战略性，绝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实际、空谈长远，注重“潜绩”绝不意味着忽视“显绩”。统一战线政绩必须能够为每一个历史时期解决最紧迫的难题、完成最关键的任務提供直接有力的支持。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创造直接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政绩，追求统一战线在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维护安全、参与治理等方面的综合效能与整体贡献，更好地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就个体来说，强调实效性是激励统战工作队伍和团结广大统战成员持续奋进的直接动力，有利于统战工作通过办实事、求实效的形式，将统一战线的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现实生产力、维护稳定的有效凝聚力、应对挑战的强大向心力。

这一规律的辩证性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创造潜绩主导、显绩辅助的统一战线政绩。例如，持之以恒地推进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联谊等潜绩工作，才能在关键时刻形成反“独”促统强大声势的显绩成效；做好日常耐心细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潜绩工作，才能在社会面临考验时展现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显绩成效。把握这一规律，要求统战工作者既要做着眼未来的战略家，也要做善作善成的实干家，在“潜”与“显”的辩证统一中推动统一战线政绩实现持续增长。

（三）方法维度：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效结合

正确政绩观还必须回答靠什么树政绩的方法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正所谓‘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28] 357-358} 创造真正的团结政绩，必须遵循坚守政治圆心与拉长包容半径相统一的规律，在固守根本中扩大团结，在包容差异中增进共识。

巩固一致性要求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坚守政治圆心，筑牢共同基础。一致性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前提。没有一致性，统一战线就会丧失共同的政治基础和价值追求，就谈不上团结。一致性作为统一战线“同心圆”的圆心，是统一战线政绩的“底线”和“红线”，巩固一致性是创造统一战线政绩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要求。固守圆心，就是必须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确保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方向。因此，统战工作的政绩深刻体现在能否巩固“同心圆”的圆心，“圆心”是否守得牢、扎得稳。

包容多样性要求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拉长团结半径，尊重合理差异。统一战线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包容，没有多样性，统一战线就成了“清一色”，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高明之处表现为，在坚守一致性圆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尊重、包容、照顾、协调多样性。但必须指出，包容多样性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承认差异的客观存在，尊重不同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并通过民主协商、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等方式，寻求最大公约

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尊重差异性中增进一致性。据此而言，能否有效团结具有不同特点的对象，能否在复杂局面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是检验统一战线政绩含金量的重要标尺。历史证明，对多样性包容得越好，统一战线的团结面就越广，社会基础就越牢。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到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30]，都是包容多样性方法论的生动实践。

这一规律说明，一致性与多样性作为衡量统一战线政绩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二者之间“度”的把握。例如，在面临外部严峻挑战或内部重大转折时，更强调一致性以凝聚力量、共克时艰；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内部活力迸发的时期，更多地包容和鼓励多样性以促进创新、增进和谐。创造新时代的统一战线政绩，必须深刻掌握这一规律，既要有坚守圆心的政治定力，也要有拉长半径的包容胸襟，在“一”与“多”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

（四）评价维度：注重系统性与过程性的相互贯通

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实到如何评价政绩的衡量标准上。统战工作的成效具有渗透性、关系性和过程性特征，其政绩评价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工作的指标，必须超越单一、静态的量化指标，建立符合统战工作特点的立体化、动态化评价尺度。

所谓系统性，就是指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不仅要看经济贡献，更要看政治凝聚、社会整合、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综合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最后看综合指标，看总体要求的实现程度”^{[27]122}。统战工作的业绩广泛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必须具备系统思维，建立多维评价框架。第一，政治维度是最核心的维度，主要评价党的领导是否加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否巩固，人心是否更加凝聚，政治共识是否扩大等。第二，经济与社会贡献是重要尺度，主要评价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是否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是否化解矛盾、协调利益，是否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等。第三，文化认同效能是关键指标，主要评价是否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否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第四，安全保障效能是底线要求，主要评价是否有效防范化解民族、宗教、涉疆涉藏、涉港涉台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风险，是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历史上曾出现的片面强调经济指标或单纯追求“不出事”的倾向，都是评价系统性不足的表现。例如，评价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政绩，就不能只看工业产值和税收贡献，还要看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情况、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思想引领情况等。

所谓过程性，就是指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将关系的和谐度、机制的畅通度作为重要评价指标。统战工作不仅是追求结果的工作，更是注重过程的工作，统一战线的许多业绩体现在健康、稳定、富有活力的和谐关系与互动机制上。一方面，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程度，是衡量统战工作绩效质量的直观尺度。另一方面，必须将协商民主、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机制是否健全、运行是否有效作为评价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性政绩。例如，广泛稳固的联系网络是统战工作的基础设施，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宝贵资源。倘若平时疏于联系、关键时刻才寻求配合，即便偶有“显绩”，也难以转化为持久的制度效能。相较而言，深耕日常、润物无声的经常性工作，虽未必在短期内显现成效，却构成统战工作最为根本的“潜绩”。

这一规律说明，系统性的结果是过程性建设水到渠成的产物，高质量的过程是产生可持续、

综合性结果的根本保证。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在评价维度上必须遵循系统性结果评估与过程性质量审视相统一的标准。

四、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

统一战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将大团结大联合主题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实践，从判断标尺、发力场域、工作骨干、代表力量四个维度协同推进，探索可操作、可持续的落实路径，确保正确政绩观成为引领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一）校准判断标尺：构建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政绩考核还是必需的有效的，关键是考核内容要科学。”^{[27] 123} 评价体系是政绩观的具象化、制度化，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全面、导向清晰、符合统战规律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第一，设计多维度考核指标，建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复合型政绩考评体系。例如，政治维度重点考核思想引领与共识凝聚效果，需要设置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在统战成员中的共识凝聚度与行动转化率、党的创新理论在统战各领域的传播覆盖面和认同度等指标；经济维度侧重评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绩，量化统计通过统战渠道引入的资源与项目、党外知识分子在科技创新中的贡献值等。第二，实施多元化评估方式，建立内部考核、对象评价、部门征询、社会观测相结合的立体评价网络。提升统战对象评价权重，通过恳谈会、满意度测评、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听取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对统战工作的真实感受和具体意见。建立与组织、宣传、政法、科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会商评价机制，从服务全局的角度评估统战工作在其他领域产生的协同效应和综合贡献。利用大数据技术探索社会舆情的间接评价，监测分析涉及统战领域相关群体、议题的网络舆情，从社会心态、舆论氛围的积极变化或风险苗头中，间接检验评估统战工作的社会影响与实际效果。第三，推行动态化考核管理，建立常态化监测、阶段性评估与长远性考察相结合的动态评价流程。加强日常统战工作的过程纪实与质量评估，对重要会议活动、联系走访、谈心谈话、建言献策、问题处理等工作进行全流程记录和可回溯管理。建立统战干部政绩的长周期追踪评价机制，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进行跨任期效果追踪，抑制急功近利行为。

（二）聚焦发力场域：服务中心大局的真抓实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27] 93} 正确的政绩观，最终要落脚到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上。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在服务时代最紧迫、最重大的任务中得到确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必须将统一战线的智力优势、资源优势、组织优势汇聚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议程上，在关键领域创造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团结效能。第一，聚焦国之大者，在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中彰显统战作为。例如，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统联系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党外人才，特别是加强对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团结引领，

勇闯创新“无人区”；聚力推动共同富裕，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理念，发挥其促进就业、依法纳税等作用。第二，聚焦安全之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筑牢防线。统一战线处于防范化解风险的前沿阵地，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大统战与大安全的关联逻辑，必须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统一战线的硬任务、硬政绩。密切关注统战各领域的思想动态，及时有效批驳错误思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提升网络统战能力，善于在互联网上发现人、团结人、引导人，对冲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煽动，培育清朗空间建设力量。第三，聚焦治理之效，在嵌入国家治理大格局中发挥统战功能。“统一战线具有多中心治理功能、协商式治理功能和网络化治理功能”^[31]，将统一战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统一战线政绩观在治理现代化场景中的具体体现。必须发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支持民主党派开展穿透式调研并强化成果的采纳反馈，将统一战线的制度设计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成效。丰富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在乡镇街道、城乡社区探索运用数字技术开展远程协商、网络议政，扩大协商的参与面和便捷度。激发社会组织协同活力，加强对重点行业协会、商会的政治引领和示范培育，使其成为团结特定群体、化解行业矛盾的有效载体。

（三）锻造工作骨干：提升统战干部的能力作风

统战干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直接主体。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铁军”，确保正确理念凭借过硬的执行力落到实处。第一，强化政治能力与战略思维。统战干部必须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强化战略思维养成，着力提升统战干部从巩固执政根基的高度谋划统战工作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将把握政治方向、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等方面的表现作为考核政绩的核心标准，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第二，提升专业素养与实战本领。帮助统战干部克服“本领恐慌”，积极开展现代社会治理、协商民主实务、危机沟通、网络群众工作等专业培训，在一线提升调查研究、联谊交友、思想引导、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例如，联谊交友重在培养同党外人士打交道、交朋友的能力，“通过情理逻辑、人际关系以及情感能量等情感因素为统一战线赋能”^[32]，广交深交一批挚友诤友。同时，建立激励与容错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27] 126-127}要求，对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中出现的无心之失或探索性失误，予以宽容，保护统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第三，锤炼务实作风与清廉操守。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练就扎实过硬的基本功，提升解决问题能力。面对统战领域的复杂矛盾和敏感问题，必须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既要坚持原则，守住政治底线，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政策，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此外，统战干部是党的形象在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其作风形象直接影响统战工作的感召力。统战干部必须恪守廉洁从政底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矩，在与党外人士交往中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力，构建健康纯洁的政商关系、政社关系。

（四）培育代表力量：加强统战成员的队伍建设

党外代表人士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和影响其他统战成员的效能放大器。建设一支数量充

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统战领域代表人士队伍是重要的“潜绩”，更是检验统战工作成效的关键指标。第一，完善选、育、管、用的全链条机制。积极拓宽视野，在各领域、各层级及早发现优秀党外人才。制定系统性培养规划，通过理论培训、实践锻炼、岗位交流，全面提升党外代表人士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以及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认可的代表人士，敢于在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平台进行实质性安排，并加强履职管理。第二，深化思想政治引领与价值观塑造。持续开展共识教育，不断增进党外代表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在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并将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利用专业优势服务社会，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第三，搭建作用发挥与成长支持平台。为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对外交往创造更多条件、搭建更广舞台。健全情况通报、对口联系、考察调研等制度，保障党外代表人士知情明政、建言献策的权利。关心党外代表人士成长发展，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增强其组织归属感和价值实现感，推动广大统战成员成为巩固团结、服务发展的中坚力量。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百余年演进史，是一部价值追求不断澄明、实践智慧持续积累、战略定力始终如一的壮阔史诗。从革命年代以壮大力量、夺取政权为核心导向，到建设时期着力于制度建构与政治整合，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赋能，直至新时代强调整体性、战略性的系统效能，其评价标尺虽随时代任务动态调适，但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致力于实现最广泛团结的核心内核一以贯之、历久弥坚。在理论上，将政绩观从一般性的工作观念提升为理解统战工作内在驱动与效能产出的重要分析概念，将为评判统战工作的成效提供一个富有解释力的新视角。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绩观是跨周期、代际传递的，统战工作的任何实践创新与制度完善，都必须把“人心政治”作为政绩评价的根本标尺，服务于团结目标。在实践上，置身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愈发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愈发紧迫。必须从统一战线史中深刻领悟正确政绩观的精髓，善于将统一战线正确政绩观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富有感召力、实效性的工作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不断夯实团结根基。面向未来，必须始终坚持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为根本政绩，以最大范围、最深程度的大团结大联合为永恒追求，持续焕发统一战线不可替代的法宝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画出最大最美的同心圆。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5-12-12 (1).
- [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6-01-21 (1).
- [3] 习近平. 在二〇二六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四日) [N]. 人民日报, 2026-02-15 (1).
- [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09.

- [5]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汪洋出席并讲话[N]. 人民日报, 2022-01-18(1).
- [6]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N]. 人民日报, 2026-01-29(1).
- [7] 邓前程, 徐学初.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的——以四川为例的统战史考察[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100-106.
- [8] 侯中军.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与两个统一战线的建立[J]. 史学集刊, 2025(4): 31-42.
- [9] 林华山. 多维互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6): 32-41.
- [10] 杨光斌, 周楚粤. 试论中国的团结型政治: 人民政协的视角[J]. 社会科学, 2025(11): 30-42, 61.
- [11] 龚维斌.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J]. 新视野, 2025(6): 5-12.
- [12] 叶子鹏, 杜晓童. 建设力: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识性概念的逻辑生成与框架建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1): 58-72.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G].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312.
- [14]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7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90.
- [16]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92.
- [17]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39.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7卷(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3.
- [19] 周恩来选集: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03.
- [20]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G].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6.
- [21] 张启华, 张树军.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史: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1078.
- [2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56.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917.
- [24] 林华山. 整体性统战: 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战略研究[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2): 39-46.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39.
- [26]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08.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6: 12.
-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2.
- [29]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 274-275.
- [30]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 求是, 2024(2): 4-7.
- [31]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68-76.
- [32] 侯恩宾. 新时代统一战线中情感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优化路径[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5(4): 151-161, 166.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卢媛

“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机遇、困境和着力点

徐 政^{1, 2} 占智勇²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9;

2.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格局深度重塑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已成为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 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从战略逻辑看, 未来产业发展正迎来科技创新与技术范式变革加速突破、产业体系与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制度环境与要素配置不断优化、国际环境变化与战略竞争加剧等多重机遇, 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重要窗口。从问题视角看, 当前未来产业发展仍面临技术路径不确定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融合不畅与成果转化效率偏低、投融资结构失衡与耐心资本供给不足、区域布局分散与政策协同度不高等结构性约束。从实践路径看, 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必须以战略引导与市场主体结合, 系统构建未来产业总体布局路径; 以要素配置与风险控制协同, 系统夯实未来产业培育支撑路径; 以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系统畅通前沿技术产业转化路径; 以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耦合, 系统优化未来产业创新生态路径。

关键词: 未来产业; 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 新质生产力; 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128-12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2.010

作者简介: 徐政,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 占智勇, 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质生产力对江苏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25EYC012)

引用格式: 徐政, 占智勇. “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机遇、困境和着力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128-139.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1]超前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发展未来产业是扩大国内需求、协调供需矛盾的重要抓手^[2]。

“十五五”规划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这一战略要求出发，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应该清晰认识到当前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发挥我国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的市场纵深、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雄厚的人才储备等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突破性创新作用，积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境，但也为培育未来产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培育未来产业是整体性工程，需要具备宏观视野和系统观念。系统谋划不是对单一技术、单一产业或单一政策的线性安排，而是围绕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对技术革新、产业变革、要素配置、制度创新和外部环境进行一体化、系统化的前瞻布局^[3-4]。系统谋划是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以整体性、协同性和前瞻性为基本原则，将多元目标、多重主体、多类要素和多阶段过程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之中，通过统筹设计、动态协调和持续优化，推动复杂系统有序演进的战略规划方式^[5]。因此，亟需从学术视角分析系统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和实践导向，为“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培育提供新的思考与有益探索。

当前，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目的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优势，把握发展主动权，前瞻布局发展机遇。不同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发展形态、市场规模和发展导向上尚未成熟，是依托比较优势形成、由前沿技术驱动、处于概念验证或产业化初期的产业形态^[6]，因此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颠覆性三大特征。第一，前瞻性体现在立足尚未完全显性的技术趋势与市场需求，源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技术成熟度较低、短期回报不稳定，需要基于技术创新路径和产业变革趋势进行长期规划与系统布局。第二，战略性体现在对国家经济安全、发展安全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支撑作用，是重塑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依托，是为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依赖政府前瞻引导与系统支持。第三，颠覆性体现在依托原创性技术突破既有技术路径与产业结构，推动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根本变革，随着技术创新、产业重构与价值重新分配的系统性变革，应统筹风险防范与创新突破^[7-8]。培育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发展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体现^[9]，因此应准确把握未来产业的内涵与特征，超越短期市场发展逻辑，通过系统协同机制统筹推进未来产业发展。

二、“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孕育的战略机遇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系统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随着全球创新格局深度调整，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为未来产业孕育提供了重要外部机遇。在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自立自强

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持续释放，也为未来产业成长创造了坚实基础。系统谋划未来产业不仅有助于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对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快前沿技术突破：科技创新与技术范式变革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呈现出加速突破与交叉融合并进的发展态势，新兴领域不断取得关键性进展。未来产业发展必将加快前沿技术突破，技术创新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路线演进，而是依托多学科、多技术协同突破，推动技术体系重构。这一技术发展范式为未来产业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技术支撑，也有效拓展未来产业的发展边界。

首先，从创新范式看，科技创新正由渐进式创新向颠覆性创新转变。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特征明显增强，技术路径尚未完全收敛，产业化模式和市场形态仍处于探索阶段^[10]。技术范式的变革，使未来产业在发展初期即具备突破既有产业格局和重塑竞争优势的潜力^[11]，同时也对技术选择、资源配置和风险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次，从产业生成机制看，前沿技术突破正在重塑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一方面，通用性、平台型技术通过标准化、模块化和平台化应用，加速向产业体系扩散，推动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技术突破不断催生跨界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模糊了产业边界，促使未来产业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特征^[12]。这种由技术范式变革所引发的产业生成机制重塑，是未来产业区别于传统新兴产业的重要标志。最后，从战略价值看，前沿技术逐渐成为战略发展核心驱动力。前沿技术突破不仅为未来产业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也为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博弈中塑造长期优势创造了战略窗口。系统谋划前沿技术布局，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协同发力，有助于在关键领域实现先发优势或并行突破。因此，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技术范式变革，构成“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核心战略机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二）发挥产业场景优势：产业体系与应用场景支撑

面向“十五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的综合优势持续显现，为未来产业从科技创新走向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相较于单纯依赖技术突破的路径，未来产业的发展更加依赖消费场景中的试验和应用，而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多层次应用场景，正是推动前沿技术快速成熟的重要条件^[13]。

首先，从产业体系层面看，产业体系完备提供基础支撑。我国已经形成涵盖研发设计、装备制造、系统集成与规模化应用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结构，为未来产业实现技术、产品与产业协同演进奠定了现实基础。传统产业与新技术之间的深度融合，使前沿技术在现有产业体系中实现嵌入式发展，通过与传统产业的协同推进，加快技术革新与产业发展进程。以既有产业体系为依托的演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释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其次，从应用场景层面看，超大规模市场提供发展支撑。应用场景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试验空间和应用载

体，随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不断深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绿色化转型以及社会治理等领域持续释放新的需求，为前沿技术的迭代优化和规模化推广创造了现实条件。在新场景和内需的共同牵引下，未来产业能够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创新技术路径、完善商业模式，并逐步实现由探索向规模化发展的转变。最后，从系统谋划的角度看，两者协同发展共同构成战略支撑。统筹产业基础、场景构建与政策引导，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在真实场景中形成良性互动。由此来看，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的综合优势，既是“十五五”时期系统培育未来产业的重要战略机遇，也是提升未来产业发展效率和质量的现实依托。

（三）完善制度要素保障：制度环境与要素配置保障

“十五五”时期，我国围绕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建设持续完善，为未来产业培育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要素保障。未来产业发展不仅依赖技术和市场需求，更需要制度供给与要素配置的系统支撑，制度环境和要素保障成为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重要战略机遇^[14]。

首先，优化制度环境，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制度环境上，国家层面不断强化对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顶层设计，通过规划引导、政策协同和制度创新，逐步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培育的政策体系。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任务组织中的作用持续增强，为未来产业在培育的早期阶段克服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提供了制度性支撑。同时，制度型开放和营商环境优化不断推进，有助于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其次，完善要素配置机制，促进关键要素集聚。要素配置上，新型生产要素加快向未来产业集聚，数据、算力、资本和人才等关键要素的配置机制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耐心资本培育持续推进，为未来产业所需的长期资金投入提供了重要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化、智能化的未来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不断优化，为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最后，强化系统协同，提升制度与要素联动效能。从系统谋划的视角看，制度环境与要素配置并非仅仅依靠单一的政策或单一要素的支持，而是通过政策协同、要素联动和风险共担，充分发挥联动效应，形成了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整体统筹制度供给与要素投入，能够有效降低在发展未来产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制度摩擦和资源错配风险，为创新活动提供更为稳定和高效的制度保障。这种协同作用不仅提升了创新效率，还极大提高了产业培育的整体效能，确保了资源配置的高效性与公平性。尤其是在未来产业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制度和要素的优化配置能显著增强政策实施的适应性和执行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顺利衔接。

（四）创新国际格局重塑：国际环境变化与战略竞争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科技竞争态势加速演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和形势复杂性显著上升。在这一背景下，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大国战略博弈深度交织，未来产业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领域和战略博弈点。这种国际格局的重塑，既带来外部压力和挑战，也为系统谋划未来产业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15]。

首先，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全球创新与产业体系加速重构。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

新链正经历系统性重构。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地缘政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既有产业分工体系和技术扩散路径出现变化,部分传统技术路线和主导性产业格局的稳定性明显下降。在此过程中,新技术、新标准和新规则尚未完全定型,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并行,全球创新体系正由相对稳定走向动态调整。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趋于激烈,技术壁垒和规则博弈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跨国创新网络并未消除,而是在更高层次和更复杂结构中持续重构。科技合作、技术互补和产业协同仍是全球科技进步的重要方式,这为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科技创新、嵌入国际产业体系并提升未来产业发展能级,创造了新的空间。其次,战略竞争加剧,未来产业成为塑造长期优势的关键抓手。未来产业已成为大国提升综合实力和塑造长期优势的重要抓手。各国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产业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发展格局倒逼我国必须以系统思维统筹国内科技创新、产业布局和安全保障,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寻求动态平衡。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有助于增强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战略主动权和风险应对能力。最后,强化全球视野下的系统谋划,提升国家战略主动性。从系统谋划角度看,国际格局的重塑要求将未来产业发展置于全球视野和国家战略全局之中,统筹开放合作与安全可控、国内培育与国际竞争的关系。把握国际环境变化中的结构性机遇,主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和产业规则塑造,有助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从国家战略视角看,国际环境变化与战略竞争是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是提升国家长期竞争力和发展韧性的关键外部条件。

三、“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现实困境

未来产业发展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过程,虽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从创新体系看,关键核心技术供给能力仍有待提升,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之间衔接不畅。从产业基础看,部分领域产业生态尚不完善,产业链协同与要素配置效率仍需优化。从制度环境看,政策协同机制与风险管控体系仍滞后于发展需求,影响资源配置与市场预期稳定。同时,系统谋划未来产业过程中在统筹创新资源、优化发展路径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仍面临现实挑战。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的现实困境,对于提升产业培育的系统性、前瞻性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 技术路径不确定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面向“十五五”时期,发展未来产业在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产业化链条衔接不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的现实困境。由于未来产业多处于孕育期或产业化初期,技术成熟度、商业模式和市场需求尚未稳定,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路径仍不清晰,制约了未来产业的形成速度和发展质量^[16]。

一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科研体系与产业体系之间仍存在结构性断层。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在组织方式和评价导向上更侧重学术产出和技术突破,科研活动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耦合度相对不足,导致部分前沿技术成果主要停留在实验室研究或中试验证阶段,尚未与企业的真实需求和具体应用场景形成深度对接,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错位。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 2024 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为 2.68%, 在中国企业 500 强中, 制造业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 2.39%。2024 年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约为 3.8%, 企业专利转化率约为 50%, 科研院所专利转化率约为 11.8%, 这与发达国家研发强度仍然存在差距^[17]。在此背景下, 科技成果难以及时嵌入产业链关键环节, 影响了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效率。与此同时, 成果转化体系中系统集成等关键环节相对薄弱, 缺乏稳定、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专业化支撑体系, 使得技术从原理可行向商业可行转化过程中面临较高成本和较大不确定性。一方面, 企业单独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 制约了其参与前沿技术转化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 科研机构在工程转化能力、市场化经验和产业组织方面存在短板, 进一步加剧了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断裂。这种结构性问题在未来产业培育早期尤为突出, 已成为制约前沿技术规模化应用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的重要现实瓶颈。

二是从转化机制角度看, 现有成果转化制度和激励机制尚难完全适应未来产业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征。一些科研成果在知识产权处置、收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制度约束, 影响科研人员和企业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加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产业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成果转化效率整体偏低。

三是从系统谋划角度看, 产业化链条不畅不仅是单一环节的问题, 而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协同不足的集中体现。若不能在研发、试验和规模化推广等关键节点形成系统支撑, 未来产业将难以实现由技术突破向产业竞争力的有效转化。打通产业化链条、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是“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亟需破解的现实难题之一。

(二) 产业链融合不畅与成果转化效率偏低

产业发展规律表明未来产业在由技术孕育走向产业形成和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 普遍面临产业化链条衔接不畅、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效率偏低的问题。由于未来产业多处于技术成熟度和市场验证尚未完成的阶段, 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衔接环节较多, 任何关键节点的缺失或弱化, 都会显著抬高产业化成本^[18]。

一是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不足。当前, 科研体系与产业体系之间仍存在结构性脱节, 一些前沿技术成果在研发阶段对产业应用需求关注不足, 导致技术方案与企业生产条件、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匹配度不高, 难以顺利进入产业化阶段。依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5》数据, 2024 年,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在 35% 左右。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研究显示, 我国前沿科技成果只有 10% ~ 30% 应用于实际生产中, 而真正形成产业的仅为其中的 20%, 远低于发达国家 60% 的指标^[19]。成果转化和系统集成等关键环节支撑能力不足, 使得技术从实验可行向产业可用转化面临较大障碍。

二是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欠缺。现有制度安排在知识产权处置、收益分配、风险分担等方面, 对高风险、长周期的未来产业成果转化支持力度仍显不足。科研人员和企业成果转化中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完善, 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和产业孵化生态尚未健全, 进一步制约了成果转化效率的整体提升。

三是产业链融合不畅。产业链并非单一环节失效, 而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协同不足的集中体现。若不能通过系统性布局打通研发、中试、示范和规模化推广等关键节点, 未

来产业将难以实现由技术突破向产业竞争力的有效转化。因此，产业化链条不畅与成果转化效率偏低，构成“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亟需破解的重要现实困境。

（三）投融资结构失衡与耐心资本供给不足

当前，未来产业在培育和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投融资结构与产业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问题，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供给不足，成为制约未来产业持续投入和稳定发展的重要现实困境。由于未来产业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特征，其资金需求与传统以短期回报为导向的投融资模式存在明显张力^[20-21]。

一是投融资结构偏向成熟领域。投融资结构上，当前金融资源配置更倾向于成熟产业和短期回报项目，对处于早期阶段、技术路径尚未明晰的未来产业支持力度有限。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在部分领域存在前端与后端协同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中后期扩展阶段的资金接续不足，导致部分潜力技术和项目难以顺利跨越鸿沟。

二是耐心资本供给不足。长期资本、战略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未来产业培育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受考核机制、风险偏好和退出渠道等因素影响，部分资本难以承受未来产业研发周期长、回报不确定性高的现实要求，投资行为更偏向短期化和保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开展原始创新的积极性。

三是投资结构整体规划方面仍显不足。投融资结构失衡已成为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22]。资金供给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创新环节之间分布不均，往往偏向于短期回报明确、商业模式相对成熟的项目，而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以及产业化初期的高风险环节支持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影响单个项目或企业的持续发展，也在更大范围内削弱了未来产业整体创新生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运行机制看，资金供给与技术研发进程、成果转化效率和产业培育周期之间匹配度不高，容易导致创新活动在关键阶段出现资金断档，使部分技术路线和产业探索被迫中止或放缓，进而增加未来产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企业在高投入、长周期阶段面临融资约束，创新意愿和投入能力受到抑制；另一方面，资本配置缺乏长期视角和风险分担机制，不利于形成支持未来产业持续演进的耐心资本体系。这种投融资结构与未来产业发展特征之间的错位，已成为系统谋划未来产业过程中亟需破解的关键约束之一。

（四）区域布局分散与政策协同度不足

在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区域竞相布局与统筹协同不足并存，区域布局分散和政策协同度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系统谋划未来产业面临的重要现实困境之一^[23]。由于未来产业方向前沿、边界模糊，各地在抢占新赛道和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同质化布局和重复建设，削弱了整体发展效能^[24]。

一是区域布局不均衡。我国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and 创新能力方面差异显著。在实际推进中，部分地区对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研判不足，倾向于全面铺开或盲目跟进热点领域，导致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清晰、协同机制薄弱。这种分散式布局不仅抬高了未来产业培育成本，也不利于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

二是政策协同不足。未来产业发展涉及科技、产业、财政、金融、人才等多领域政策，跨部

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政策协同难度较大。政策目标不一致、实施节奏不同以及政策工具碎片化等问题，容易造成政策叠加效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制度成本，影响创新主体的预期稳定性。

三是整体统筹能力有待提升。当前，各地在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积极性较高，但在国家层面的前瞻性引导和系统统筹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重复布局、同质化竞争和资源分散配置等问题。近年来，从“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到“人工智能”，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往往引起一些地方产业园区蜂拥而上。例如，达闼机器人曾是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明星企业，累计融资超 54 亿元，估值一度达 223 亿元，位居国内机器人独角兽榜首。然而 2025 年初，这家企业陷入严重危机，广州分公司大门紧闭，水电停缴，大楼被回收拍卖，上海闵行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人去楼空。这些案例表明，一些地区在尚未具备技术基础、产业配套和应用场景条件的情况下盲目跟进，削弱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潜在风险。从区域协同角度看，跨区域产业分工和创新协作机制尚不健全，区域间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流动和产业配套等方面的协同程度不足，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在政策层面，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政策目标、支持力度缺乏有效衔接，政策工具分散发力、叠加效应不足，制约了政策效应释放。

四、“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的着力点

“十五五”时期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关键在于找准战略重点、强化系统布局与提升政策协同效能。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生态培育、应用场景拓展以及制度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有助于构建以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要素协同为支撑的未来产业发展体系。要通过强化前瞻性布局与系统性推进，不断完善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有效提升未来产业培育效率，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一）以战略引导与市场主体结合，系统构建未来产业总体布局路径

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产业空间布局和发展方向一旦形成，往往具有较强路径依赖。仅依靠有效市场自发调节，容易导致资源分散、重复布局和低效竞争。单纯依赖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又可能抑制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十五五”时期，应以系统思维统筹战略引导与市场主体协同发力，通过政府前瞻引导与市场选择机制相结合，系统构建未来产业科学有序的整体布局路径^[25]。

首先，从国家战略和发展全局出发，强化对未来产业布局的前瞻引导。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优先领域，通过中长期规划、战略纲要和重大专项，向市场释放清晰、稳定的政策信号。通过战略引导降低市场主体探索不确定领域的制度性成本，引导资源向具有战略意义和发展潜力的未来产业集聚。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在产业布局中的主导作用，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活力。强化企业在未来产业培育和空间布局中的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业、创新型企业 and 研发机构基于自身技术积累和市场判断进行差异化布局。通过竞争性机制和市场化选择，推动未来产业在不同区域和细分领域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

其次，推动战略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耦合，优化未来产业布局的系统效率。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反馈的双向互动，动态调整产业布局方向和重点领域，避免同质化竞争。引导地方政府在

国家总体战略框架下，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探索具有比较优势的未来产业发展路径，提升整体布局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26]。

最后，以系统布局为导向，促进未来产业在空间结构和产业体系中的协同演进。通过加强区域协同和跨区域合作，推动创新资源、产业要素和应用场景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构建层次清晰、分工合理、联动发展的未来产业布局体系。以整体性、系统性的空间布局支撑未来产业规模化发展和长期竞争力培育，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以要素配置与风险控制协同，系统夯实未来产业培育支撑路径

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伴随显著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制度风险。单一主体难以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单一要素投入也难以形成持续支撑效应。“十五五”时期，需以系统思维统筹各类要素配置与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多主体协同分担不确定性，系统夯实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基础支撑。

首先，系统优化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要素供给结构。围绕未来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特征，统筹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关键要素配置方式，推动要素供给由分散投入向协同配置转变。通过提升要素配置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增强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的资源保障能力。

其次，积极构建多主体参与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协同安排，引导不同主体按照比较优势分担未来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挥政府在风险缓释和制度保障方面的引导作用，运用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工具和担保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和长期资本更加积极参与未来产业培育。

最后，推动要素配置与风险共担机制协同运行，提升培育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通过将要素投入与风险分担相结合，避免高风险、低保障的投入失衡问题，增强创新主体的预期稳定性。引导资本配置更加注重长期价值和战略回报，培育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耐心资本体系，支撑未来产业跨越技术不确定与市场不确定的关键阶段。以系统支撑为导向，构建可持续的未来产业培育保障体系。通过动态调整要素配置结构和风险共担方式，持续优化制度供给和政策工具组合，推动未来产业在可控风险条件下稳步发展。以长期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支撑机制，为“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保障。

（三）以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系统畅通前沿技术产业化路径

“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正处于由技术孕育向产业成形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前沿技术能否实现产业化，已成为决定未来产业培育成效的重要变量。从现实看，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错位、成果转化效率偏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应以系统思维统筹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运行，通过整体谋划、机制贯通和路径优化，系统打通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关键通道^[27]。

首先，从创新源头入手，系统强化创新链的整体布局与协同推进。围绕未来产业重点方向，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衔接关系，引导科研活动由单点突破向面向产业需求的体系化创新转变。通过重大科技任务组织和跨学科协同攻关，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在形成阶段即嵌入产业化导向，提升前沿技术供给的前瞻性和适配性。

其次，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推动产业链深度参与创新链运行。强化企业在技术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促进龙头企业、科研机构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协同联动，形成稳定的产学研用协作机制。依托平台、技术转化基地和应用示范场景，系统降低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快科技成果向产业产品和产业能力转化^[28]。

最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的关键节点。围绕成果转化中的制度性障碍，完善科技成果产权界定、收益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增强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参与产业化的内生动力。同时，推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形成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扩散全过程的政策支持体系。协同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良性互动与动态演进。通过整体设计、分阶段推进和动态调整，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协同发展，加快将前沿技术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产业竞争力，为未来产业持续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路径支撑。

（四）以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耦合，系统优化未来产业创新生态路径

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不仅依赖单项政策支持或市场自发调节，更有赖于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的系统协同。当前，政策工具碎片化、政策目标与市场信号衔接不足、创新生态系统整体效能有待提升等问题依然存在。“十五五”时期，要以系统思维统筹各类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系统优化有利于未来产业孕育、生长和扩散的创新生态。

首先，构建政策工具体系，系统提升政策供给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围绕未来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关键环节，统筹科技、产业、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避免政策叠加失效和目标错配。通过明确政策功能边界和实施重点，推动政策工具由单点发力向系统集成转变，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其次，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技术路线选择和产业演化规律，强化市场需求、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对创新活动的引导功能，引导数据等资源向具备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的未来产业领域集聚^[29]。通过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升技术、资本、数据和人才等关键要素在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中的流动效率。推动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的协同耦合，提升创新生态运行效能。通过政策引导撬动市场力量参与未来产业培育，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创新生态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风险缓释功能，引导社会资本、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增强创新生态的韧性与活力^[30]。

最后，以系统优化为导向，推动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的动态演进与持续完善。通过持续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和市场反馈，及时调整政策组合与运行机制，促进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以生态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式，推动未来产业在开放竞争中实现可持续成长，为“十五五”时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发挥比较优势 坚持稳中求进 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N]. 人民日报, 2026-02-01(1).
- [2] 徐政, 程梦瑶, 郑霖豪. “十五五”时期场景培育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1): 135-146.

- [3] 郭晗,侯雪花.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范式、逻辑与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5(5): 12-20.
- [4] 李平,陈劲,盛朝迅,等.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机制——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J]. 技术经济, 2025(12): 1-10.
- [5] 任令涛. 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4): 159-168.
- [6] 曾宪奎. 必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6): 1-16.
- [7] 陈一君,张玉林,余元春. 创新优势: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策略研究[J].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1-10.
- [8] 赵家未,李文启. 破局要素桎梏: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如何激活新质生产力[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6): 95-104, 172.
- [9] 孙绍勇,李诗.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新质生产力逻辑分析与路径探要[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24-131.
- [10] 潘光曦,郭冰. 新质生产力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机制探索——基于创新保护与资源适配的二元激励视角[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1): 79-92.
- [11] 秦宇. 智能引领: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经济革新与社会变迁[J]. 湖湘论坛, 2025(3): 97-108.
- [12] 徐君,朱微笑,刘征宇. 创新韧性赋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1): 75-92.
- [13] 孔智键,狄书宇.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J]. 阅江学刊, 2025(5): 5-15, 170.
- [14] 李辽宁. “十五五”规划建议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四维向度[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6): 22-32, 277-278.
- [15] 高海龙,李从玉. 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新趋势及其应对[J]. 人民论坛, 2023(18): 91-93.
- [16] 冯夏楠. 数字消费、技术突破式创新与新质生产力[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6(1): 128-135.
- [17] 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R/OL]. (2025-09-29)[2026-01-21].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9/t20250929_1961429.html.
- [18] 李金叶,李任茜. 数智化转型如何提升制造业企业竞争力?——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赋能机制[J]. 西部论坛, 2025(4): 68-82.
- [19]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R/OL]. (2025-09-23)[2026-01-21]. https://www.ncsti.gov.cn/kjdt/kjrd/qtrd_kjrd/202509/t20250923_219919.html.
- [20] 陈绍辉,孙熙国. 习近平经济思想视域下的耐心资本:理论阐释、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5(1): 63-71.
- [21] 王鹏,靳开颜.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未来产业发展:内涵特征与发展思路[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3): 1-6.
- [22] 贺京同,汪震,魏哲. 资本产出率扭曲、投资结构优化与经济稳定增长[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

- (12): 3-18.
- [23] 吴传清, 吴政希, 池明锟. 长三角地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55-65, 159.
- [24] 王娟娟. 新质生产力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与区域锁定[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32-44.
- [25] 方莹莹, 阳镇. 面向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 模式选择与政策体系[J]. 甘肃社会科学, 2025(4): 184-196.
- [26] 潘雅茹, 单芸菲. 新型基础设施助力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 109-121.
- [27] 刘建徽, 何丹. 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新质生产力: 理论逻辑、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31-41.
- [28] 费艳颖, 张栩凡.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践进路[J]. 理论探索, 2024(5): 108-114.
- [29] 陈星星, 田贻萱. 中国未来产业新动能培育: 发展潜能与政策取向[J]. 区域经济评论, 2025(3): 66-84.
- [30] 黄滢. 数据要素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J]. 学术交流, 2025(12): 116-126.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林华山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进程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潘智璇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策源地,也是当前抢占科技制高点和领跑全球经济赛道的关键领域。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在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物人协同投资的发展逻辑契合未来产业的内在规定性。从性质维度看,未来产业颠覆性创新驱动的特质,内在要求对物与人两种生产力要素进行对称投资,以知识溢出效应推动生产力的质态跃迁。从结构维度看,以“投资于人”提升主体的确定性,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化解未来产业客体不确定性的关键。从制度视角看,物人协同投资是大国博弈背景下打破“依附性发展”陷阱,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选择。从形态层面看,这种协同投资是对人与自然互动范式的重塑,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景观。当前未来产业发展存在要素配置失衡、价值实现受阻和政策供给偏差的结构性矛盾,制约着物人协同投资的效能转化。要强化产业出题机制,驱动两类资源高效配置;健全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物人结合的能级跃升;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优化未来产业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物人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未来产业中的纵深推进,不仅是一场社会生产力的深层革命,更是以物与人的同频共振,在产业变革的潮头交织出中国式现代化通往更高文明形态的实践图景。

关键词: 未来产业;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140-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11

作者简介: 潘智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25LLLJC083)

引用格式: 潘智璇.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进程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140-15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1]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未来产业对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重大价值，蕴含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于未来产业的战略意图。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及“未来产业”概念，指出“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浙江、黑龙江、江苏等地考察期间，多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20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要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3]。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把握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基础上，再次强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4]。未来产业的物人协同战略旨在以科技创新赋能要素结构优化，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劳动者，形成普惠性生产力。通过锚定科技变革前沿赛道，激活两类资源的生产潜能，实现我国在全球高端产业链的位势重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实践底蕴。

当前学界虽未直接就该主题进行专门研究，但已从生产力质态演进、物人结合的转换机制、制度治理路径与国际战略博弈四个维度展开讨论。具体说来，一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未来产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认为未来产业发展依赖各方持续提供优质创新要素^[5]，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6]，进而推动劳动三要素的质态跃升与优化组合^[7]，表现为智人协同发展模式^[8]与产业边界模糊化趋势^[9]。二是基于社会总生产过程视角，分析物人结合方式从传统产业“线性叠加”向未来产业“非线性耦合”转变的动力机制。未来产业发展以新型劳动者为支撑^[10]，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显著特征^[11]。投入和积累人力资本，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机制^[12]，既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保障^[13]，也是由颠覆性产品重塑消费习惯的要求。三是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探讨未来产业进程中国家如何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未来产业的长研发周期和高风险特征要求国家力量支持^[14]，以构建政府主导的新型资源配置机制为基础^[15]，通过制度治理压缩市场失灵边界^[16]，建立起贯通产业发展全过程的政策优化动态机制^[17]。四是以“脱钩断链”技术主权风险为背景，强调科技和智力协同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意义。未来产业成为大国博弈关键领域^[18]，是关乎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高地^[19]，通过物与人的对称性投资，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20]，是提升产业链韧性^[21]和科技自主权的重要举措。

综观现有研究，尽管学界对未来产业物人协同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多维分析，但偏重于投资回报率、产业规模等量化指标，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作为辩证统一体在未来产业形态下的系统性考察尚显不足，对生产关系变革如何作用于物人协同的微观机理有待深化。对此，本文基于投资

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整体性研究视角，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深入剖析未来产业本质规定性的基础上，阐明未来产业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同频共振“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为推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治理提供学理支撑。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逻辑机理

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在制造、信息、材料、能源、空间和健康六大方向的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未来产业“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型产业”^[22]，其性质、结构与形态的底层逻辑要求物人协同发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于未来产业发展进程，不仅是对未来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社会再生产过程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对人与技术、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一）产业性质视角：生产力要素质态跃迁的内在必然

颠覆性创新驱动作为未来产业的显著特质，是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力质变的性质表征。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包含“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3]三要素，其本质由劳动者主体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客体的结合方式所决定。科学技术是生产过程的“创新性破坏力量”，能够引发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的变革。以科技为中介，对物与人两种要素进行对称性投资是顺应未来产业性质的应有之义。

首先，未来产业的劳动资料突破了传统的刚性机械形态，演进为集数字化、智能化和原子化于一体的新型基础设施。其一，极强的资产专用性催生了“高门槛”。例如大科学装置、算力集群、量子实验室，其投入使用的沉没成本极高。其二，极速的技术更迭引发了“高损耗”。未来产业的劳动资料作为科技创新的载体，面临着科技迅猛变革条件下的技术折旧与“无形磨损”。其三，对系统性生态的依附强化了“高集成”。这类要素突破了单向封闭运转模式，对周边配套设施和策源性平台具有极高要求。“投资于物”是对未来产业劳动资料“三高”特征的战略回应，是稳固产业底座的物质前提。

其次，人是生产力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未来产业是高密度知识生产领域，其价值创造有赖于智力输出。马克思认为科学越来越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在未来产业中，智力因素既是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也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枢纽。一方面，智力因素是未来产业中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处理器”。未来产业包含高度复杂的知识，人的智力通过逻辑、判断和推演等方式能够对已有知识进行重组，在把握自然规律中建构新知识体系，将知识存量转化为生产力变量。另一方面，智力因素是化解未来产业不确定性的“压舱石”。智力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定义科技变革范式、预见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以人的力量化解探索未来产业过程中的风险。

最后，物与人两类要素的质态变革必然引发结合范式的重构。区别于传统产业中物与人“线性叠加”模式，未来产业表现出人机协同、数实结合和场景驱动等生产方式特征，本质是由知识溢出效应主导的生产力跃升。智力资本能够超越实物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流动和协作中激活并转化实体要素。由此观之，实物载体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物质底座，而新质劳动者则赋予未来产业灵魂。物与人紧密结合的投资逻辑是顺应未来产业生产力演进规律的必然选择。

（二）产业结构视角：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人协同的发展效应

未来产业“存在高度的技术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性”^[24]。其经济效益转化往往呈现出时滞性与长链条特征，内在要求实现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畅通，进而提升未来产业结构的灵活性与协调性。优化未来产业结构并非单纯调整产值比例，其本质在于通过对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对称性投入，驱动物的供给结构与人的能力需求结构的深度匹配，以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统一带动社会生产力整体跃迁。

其一，社会再生产的持续首要取决于流通环节的资本周转效率。首先，未来产业表现出极高的技术密度，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如若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必须依托新质劳动者驾驭新型基础设施，化解阻碍要素流通的卡点和堵点。其次，支撑未来产业的物质要素具有瞬时性和场景驱动的特质。以6G基站、智能物流系统和量子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流通载体，其高速运行要求劳动者具备即时响应的决策能力。未来产业必须既加强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又提升人的认知结构和能力水平，减少社会再生产循环的摩擦。

其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实现取决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统一，即生产资料部类的物质投资与消费资料部类的人力投资之间的结构性均衡。分配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未来产业对生产力范式的重塑必然倒逼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变革。其颠覆性技术和高密度知识形态内在要求构建分配关系的人本导向，通过加大对知识与技术产权的制度性投资，提高相应劳动者的收入比重。这是以“投资于人”激发未来产业创新动力源，在分配环节实现价值补偿的客观要求。

其三，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终点和逻辑起点，承载着化解未来产业不确定性的功能。未来产业产出的不仅是新型产品，更是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一社会化过程的不可预测性源于技术迭代速度与社会承载能力的差异。“未来产业的成长需要市场需求的支撑”^[25]，以高质量就业、改善民生和观念引导等方式“投资于人”，培育新的消费习惯，不仅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更是破解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错位的关键。其核心要义在于：在未来产业引发的社会变革领域，通过提升人的主体确定性，有效对冲物的客体不确定性。

（三）产业制度视角：大国博弈背景下物人资源的战略整合

国家是具备独立意志和自主性的行为主体，确保长远安全与战略主权是其核心诉求。当前未来产业发展已超越纯粹的经济领域竞争，上升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战场。未来产业的资源整合绝不能完全诉诸市场自发调节，必须依靠国家组织力量的制度安排，构建起面对外部竞争的有效壁垒。

其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未来产业的物人协同投资是打破“依附性发展”陷阱、确立技术主权的必然选择。“技术控制的表现是，优先发展必须在国际上具有竞争性的部门（不论是出口部门或奢侈品部门）。 ”^[26] 外围地区积累形式的依附性，根源在于被动接纳中心国家转嫁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标准。在这一逻辑下，即使外围国家不断加大实物投资，也无法有效转化为自主积累的内生动力。坚持实物投资与人力投资的辩证统一，是摆脱“外向性历史根源”的根本路径。在“技术武器化”背景下，国家自主空间的构筑必须依托于大规模投资公共物品与保护战略科学家的双向结合，形成自主的中心式积累底座，进而打破全球资本霸权，形成不可替代的国家竞争优势。

其二,从全球产业治理格局来看,坚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物人协同投资是重塑国际产业规则体系,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举措。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焦点已由物质产量和市场份额转向对技术标准、伦理规范等定义权的争夺。未来产业既要以“投资于物”构建产业发展和治理的硬实力,更要通过“投资于人”培育一批能够主导国际产业话语体系,制定科技发展标准和伦理规范的领军人才。物人协同投资战略旨在形成智力与制度的“引力场”,打破西方国家对产业规则体系的话语垄断,实现我国从规则的追随者、参与者向引领者、定义者转变,进而从根本上重塑全球产业治理格局。

其三,从国内经济制度逻辑来看,如若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资本逐利性极易导致未来产业投资出现“重物轻人”或“科研孤岛”现象。国家职能的本质在于调节社会经济生产。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指出,产生变革作用的公共投资通常是“使命导向型”政策的成果。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通过对未来产业的战略性干预,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未来产业的物质平台与高端人才的精准配置。这种制度调节不仅确保了大国博弈中的智力主权,更从根本上提升了产业链的安全韧性与竞争优势。

(四) 产业形态视角: 人类文明进程中物人共生的价值愿景

生产“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3]。作为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载体,未来产业兴起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交互边界的前瞻性拓展,是人类认识与把握自然规律能力纵深跃进的必然结果,擘画出人、自然与技术高度统一的文明新图景。

其一,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底层逻辑来看,未来产业的物人协同投资是对西方现代化“掠夺自然”模式的重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底色。“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资本为中心’”^[27],表现为资本对自然的统治形态。在这一框架下,未来产业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高阶工具,掩盖了资本对自然的隐蔽掠夺。与之相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未来产业发展的物人协同战略,不仅将实物资本转化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绿色载体,还通过“投资于人”强化主体的环保意识,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从而实现自然价值的保护和自然资本的增殖,开辟出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协同共生的文明新路。

其二,从人与自然交互的社会形式来看,未来产业的物人协同投资是对传统工业文明“重物轻人”模式的超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民生本色。无论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工业文明,还是过度强调重工业积累的传统苏联模式,往往侧重于实物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导致生产成果未能充分转化为满足人民需求和发展的现实前提。未来产业的物人协同投资旨在以物质手段的充裕赋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技术红利辐射至教育、医疗和就业等关键领域,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为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其三,从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旨归来看,未来产业的物人协同投资以劳动解放为路径,推动人类文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未来产业通过“投资于物”,将具身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生产工具嵌入劳动过程,在消解重复、机械和异化的劳动形式中,创造出巨大的普惠性生产力。同时,通过“投资于人”的智力潜能及其身心健康,提升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促使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化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关系才能够达成真正的和解,从而开启人类文明向“自由王国”

飞跃的历史新篇。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于未来产业的现实挑战

在未来产业实践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深度融合并非自发的均衡过程，其发展存在由产业形态深刻变革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挑战：微观层面表现为生产要素构成的配置失衡；中观层面体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价值实现的约束；宏观层面则存在政策制度供给的偏差。以上三重矛盾阻碍了当前未来产业物人协同投资战略的纵深推进。

（一）要素配置失衡：硬件设施超前投入与人才效能释放滞后

当前我国未来产业物质要素的积累已实现跨越式发展，规模效应显著。2025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研发经费投入达7668.9亿元，同比增长10.2%，投入强度提升至3.35%^[28]。这种大规模的实物资本投入，催生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标志着我国未来产业的硬件布局已跻身全球领先地位，构筑起未来产业发展的雄厚物质基础。

然而就要素整体配置而言，物与人两种维度的要素投入呈现出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巨额投入资金多倾斜于采购昂贵的实验设备和原材料，直接作用于科研人才的资金增量相对有限。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6326.8亿元，虽然较之于上年实现了8.9%的稳健增长，但其中涉及硬件购置、基建投入的“试验发展经费”占比高达81.2%，而用于激发原始创新活力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仅为6.88%^[28]。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当前我国智算基础设施已跨入“吉瓦级（GW）”竞争新阶段，意味着头部科技企业和国家算力枢纽的极大规模服务器集群投资已初具规模，实物资本的堆叠达到空前高度。但通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依赖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技术“奇点”的突破^[29]，这一目标的实现唯有依靠战略科学家等顶尖人才的智力攻关。现实中底层算法人才、跨学科复合型领军人才的供给速度未能与硬件设施投入的步调一致，导致大量昂贵的智算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陷入“有物无人”的困境，强大的算力和模型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与经济效益。

上述要素配置失衡现象的根源，首先在于未来产业生产力函数演进中的深层矛盾。未来产业的发展以高资本有机构成为前提，客观上要求物质资源的投入先行。然而在未来产业生产体系中，活劳动是激活物化劳动的唯一变量。当物与人两种要素的配置形成“剪刀差”，作为短板的人的要素无法同物的要素有效耦合，生产体系便会触发“木桶效应”，导致整体产出效能受制于人才效能释放的上限。其次，这一现象与要素更新节奏的非同一性紧密相关。实物资本的投入往往是跳跃式的，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支持与社会融资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积累，并且直接嵌入生产过程发挥作用；而人力资本的更新具有显著的渐进性，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创新认知的成型以及科研团队协作默契的形成，都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积淀，其投入到生产过程需要经历不断调整和磨合。例如在量子信息实验室建设中，相关设备的投资在2年左右即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战略科学家的培养通常受制于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的建设情况，其培养周期往往长达20年。这种时空维度的错位，导致智力供给无法满足硬件平台的技术需求，形成物在未来、人在当下的发展断层。

（二）价值实现受阻：再生产循环长效周期与评价尺度错位

未来产业视角下，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在于通过创造未来式需求提振消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2024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突破18%^[30]，展现出远超传统业态的增长韧性。在成果转化维度，2024年第一季度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发明专利达134.9万件，企业专利产业化率稳步升至51.3%^[31]，表明智力资本已开始依托实物载体释放价值。以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产业为例，该领域已由初生期（1.0）、试错期（2.0）迈入发展“快车道”（3.0），特别是2024年以来，在“AI+XR”双引擎的驱动下，终端形态和融合应用开始落地^[32]，这是未来产业由知识态转向产品态，开启市场空间的典型案例。

与传统产业遵循“投入—产出—获利”的线性循环不同，未来产业再生产过程的特殊性表现为长效性的周期规律，其高工程化难度、长研发周期与慢市场培育的特征，决定了物人协同投资的化学反应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孕育期。为增强未来产业再生产循环的韧性，客观上要求外部环境提供双重支撑：一是从“投资于人”入手扩大内需，以产品消费反哺再生产循环；二是突破传统的市场短期评价导向，建立能够识别潜在价值而非即时利润的评价体系，给予未来产业成长时间和容错空间。

然而在未来产业实践中，由于消费市场转型通常滞后于生产技术变革，加之当前针对未来产业产品的消费刺激不足，未来产业技术成果转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因缺少精准应用场景的定位，大量成果难以进入市场循环，消费潜能释放受阻；另一方面，这反向制约了投资者的信心，由于资本天然追求流动性与确定性，投资机构往往受困于现有的“价值网”，倾向于向具备短期量化回报的领域倾斜投资。上述现象导致未来产业价值实现的内生动力不足，未能形成生产、消费与再生产的高效闭环。例如，当前扩展现实产业致力于打造标志性的产品体系，通过优化头显、轻量化眼镜等设备，增强续航、交互等各项指标，提升用户使用体验，激发大众消费兴趣，修复价值链条的断点。

此外，未来产业的价值实现还受制于评价尺度的错位。现行的评价机制多以财务报表、即时产值等传统成熟产业指标作为参照。这种评价方式用于评估和衡量未来产业，一方面可能因忽视未来产业的长效价值，导致项目在尚未盈利前便面临融资断裂风险，企业也愈发不愿意承担“投资于人”的不确定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测试评价和公共服务体系，未来产业评价标准沿用了传统产业的评价尺度，习惯于将物与人割裂考核：关注前者的资产价值，强调后者的学术产出。这种评价方式消解了物人协同发展的整体性效益，忽略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可能产生的实际价值增量。

（三）政策供给偏差：资源配置规模优势与制度治理衔接不畅

与传统产业生产力范式相适应，生产关系调整的核心在于对土地、设备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未来产业以其战略前瞻性与高度不确定性，对政府治理效能与政策有效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政策赋能未来产业已取得显著进展，“通过制度互补构建起‘国家战略引导—市场动态选择’的双重适配机制”^[33]。例如，工信部通过推行“揭榜挂帅”机制，发掘并培育了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推动了实物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深度融合。此外，

地方政府亦通过立法与条例强化制度支撑。如 2024 年 2 月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航线补贴及发放低空飞行券等手段，构建了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及行政动员，为未来产业注入了强大物质和资金流。但在现实中，受制度更新时滞、认知偏差与预判失准等因素影响，与宏观规模优势相配套的微观治理体系仍不健全，二者的衔接不畅问题制约着未来产业物人协同投资的有效治理。

一是跨界融合属性与条块分割治理模式的冲突。未来产业的跨学科性与跨领域性要求高度系统化的政策协同，然而当前未来产业治理框架仍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由于跨部门的协同审批机制、“监管沙盒”的创新管理机制尚未成熟，多头管理导致的制度摩擦现象频发，致使未来产业的新物品难以转化为新产品，科研人员的创造力被损耗。以算力互联网体系为例，尽管我国目前已有超 7 000 家的算力供给主体，但受限于统一架构体系和治理标准的缺失，算力区域呈现出块状网络形态^[34]，难以释放资源集群的规模效应。

二是行政科层制管理与高度灵活的人才需求矛盾。制度治理往往遵循科层制的运行逻辑，而未来产业作为人力资本密集型领域，对管理制度的灵活性、激励性和保障性要求极高。一方面，当前在人才跨领域流动、薪酬激励以及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方面，缺少匹配未来产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殊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培育人”和“保护人”方面的政策供给相对滞后，评价体系仍存在“唯论文”“唯帽子”的传统惯性，尚未完全建立有效的风险容错机制和权益保障体系。

三是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企业主体活力激发不足。企业是未来产业创新的主阵地，但部分政策供给偏重于对大型国有平台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中小企业的支撑体系相对薄弱。在实践中，针对性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平的准入标准的缺失，制约了企业主体的创新活动；同时针对部分领域出现的“内卷式”竞争，仍缺乏完善的引导和治理机制，导致资源投入在低水平重复中被稀释。

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于未来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回应未来产业发展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失衡的现实问题，需要立足于动力牵引、主体支撑、空间治理与环境保障的四维框架，实现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深度融合。首先，强化产业出题机制，以场景需求驱动物人资源的精准对接；其次，健全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智力资本对实物资本的驾驭能力；再次，发挥比较优势，优化未来产业的区域治理格局；最后，统筹发展和安全，在高水平开放中构建物人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

（一）强化产业出题：驱动实物要素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

针对未来产业发展中实物投资与人才流向相脱节的矛盾，“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1]。强化“产业出题”的本质在于打破传统产业“项目导向”的投资模式，转向构建以场景需求为牵引的资源精准配置体系。

第一，在创新环节，以场景应用锚定科研设备与岗位对标，建立“以题定物，以物聚人”的协同创新体系。针对重大科研装置与顶尖人才时空分布不均的现状，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

性与体系化布局。在精准把握未来产业“出题”逻辑及其动态指标的基础上，将国家级实验室、大型算力集群等实物载体转化为战略阵地，吸引跨学科、复合型的战略科学家团队入驻“答题”，同时“完善资助体系、提升资助效能，推动营造良好科研生态”^[35]。要确保昂贵的科研设施成为激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物质基底，提升智力资本对实物资本的渗透率，推动两种资源在原始创新环节同频共振。

第二，在生产环节，推行以规模场景需求为中心的要素动态配置体系。以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为前提，“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36]。利用具身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复合场景，推动中试基地、通用智能工具等新型物质要素与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直接对接，降低技术由实验室向生产线转化过程中的效能损耗。此外，针对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的前沿领域，引入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建立场景实验的动态筛选机制，倒逼“投资于物”由盲目扩产转向场景导向型投入，促使“投资于人”的智力效能在特定生产环境下实现最大化释放。

第三，在消费环节，以多元化消费场景创造推动未来产业的价值实现。针对市场上产品供给与需求偏好错位的情况，一方面，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振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35]，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夯实消费根基。另一方面，依托数字生活、银发经济等终端场景捕捉潜在产业命题，引导社会投资向具备现实经济效益的领域集聚，在消费末端完成物人协同投资战略闭环的同时，吸引创新型人才针对民生需求进行再研发，实现两类资源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良性互动与价值反哺。

（二）健全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物人结合的能级跃升

“‘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投入到‘人力资本’上的货币属于投资而非消费。”^[37]当实物投资呈现边际收益递减时，转向教育和人力投资就成为必然。在未来产业布局初期，“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38]，核心要义在于以智力资本重塑实物资本的价值定义权，提升人对物的驾驭能力。

第一，构建分层次的战略人才力量体系，完善教育科研人才“三位一体”育人机制。未来产业的高集成性决定了其对人才需求具有多元化、高复合的特征，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特质，应构建差异化功能的培养机制。在顶层设计层面，依托大科学装置与国家实验室，赋予战略科学家以项目定义权与资源调度权。在技术转化层面，“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39]，将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序列直接嵌入中试基地与应用场景。在生产运维层面，加强对高技能人才的实操培训，为未来产业打造一支既懂科技逻辑，又能驱动复杂设备的系统化人才供应链。

第二，强化教育的思想引领功能，以精神投资化解未来产业发展风险。“人才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创新文化土壤的滋养。”^[38]“投资于人”不仅在于技能提升，更是思想意志的塑造。要通过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导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和矢志创新，形成深厚的职业认同和战略定力，激发面对未来产业高风险、长周期技术攻关时的能动性，提升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效能。

第三，重构开放创新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实现人才与平台的利益捆绑。改变以短期产出论英雄的评价倾向，“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

体系和考核机制”^[38]。一是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给予智力资本预留时间窗口；二是建立容错机制，营造宽容失败、鼓励跨界的创新氛围；三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行技术入股、科技奖励与分红激励等制度，让智力贡献获得合理的实物回报。这些举措旨在构建人才与平台捆绑的利益共同体，全面释放创新创造的潜能。

（三）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优化未来产业治理体系

优化未来产业治理体系，关键在于推动政府角色从单纯的“资源配置者”向“风险共担者”与“生态建构者”转型。这要求各级政府“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1]；各级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40]，建立适配未来产业属性的制度框架。

第一，强化未来产业的方向判断与战略引导，构建支撑物人协同投资的耐心资本治理体系。针对未来产业实物投资的沉淀成本高、人力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征，政府治理重心应“将符合发展规划或战略的使用价值目标引入市场，与企业追求的微观价值目标相结合，并使前一目标居于相对主导地位”^[41]。一方面，发挥政府引导投资基金的撬动作用，加强财政与金融的政策协同，“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35]，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长效现金流。另一方面，实施与推进投资导向的清单化管理，明确未来产业投资的战略导向与负面清单，遏制地方政府在物的扩张上盲目跟风与低水平重复建设，确保资本在物与人的协同配置上精准发力。

第二，发挥区位优势，健全未来产业的协同治理体系，打破阻碍要素流转的体制机制障碍。针对东部科研高地和中西部资源腹地的差异定位，未来产业治理体系应从块状分割转向网络协同演进。在智力资源集聚区，重点优化人才激励政策，通过智力溢出带动硬件迭代；在能源及实物要素丰富区域，利用基础优势承接大规模应用场景建设，吸引人才回流。核心在于推动区域间政策标准互通与人才自由流动，通过“算力券”“模型券”“人才互认”等方式实现资源跨省互换机制，优化未来产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格局。

第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激发企业主体活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一是完善“政企风险共担”机制，对企业在未来产业领域的重资产投入与高层次人才引育给予结构性补偿，“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养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1]。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实施清单式推进和一站式服务，减少对企业研发经营的行政干预。三是提升未来产业的竞争层次，建立以技术能级和价值创造为标准的差异化准入机制，约束“蹭热点”“抢补贴”的盲目投物行为，引导企业从低水平价格对垒转向物人协同的生产效能竞争。

（四）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物人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

未来产业发展面涉及广、培育周期长且市场风险大，决定了其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3]。通过重塑公共权力与产业生态的联结纽带，未来产业治理重心转向物人协同的安全体系，构建两类资源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

第一，聚焦内生安全，化解技术“卡脖子”和人才流失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建立以自主可控

与预期稳定为核心的产业安全体系。一方面,针对未来产业发展可能出现的供应链中断风险,深化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的“揭榜挂帅”和国产替代专项行动,建立实物要素的供应链弹性清单,完善风险预警机制,确保核心部件的自主供应能力。另一方面,针对未来产业可能导致的技术异化挑战,应完善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前沿领域的伦理审查和法律保障,严格保护数字化场景中人的合法权益和数据隐私。同时,应强化对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人才政策连续性和法制稳定性增强人力资本安全预期,防止政策环境波动引发的人才流失风险。

第二,强化外部安全,通过全球要素高效配置增强产业话语权,参与国际未来产业标准治理,以高水平开放化解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是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力,吸引全球高端实物要素与战略人才向国内汇聚,形成利益深度捆绑。同时,支持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全球智力攻克关键技术瓶颈,再将成果回流至国内生产线。二是积极参与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与多边治理,“深化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1]。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赋能,将科技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确保科研人才在全球价值链占据高位优势,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未来产业生态中的核心竞争力。

五、结语

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并非实物要素的简单堆砌,亦非智力资源的孤立生成,其本质在于二者在更高能级上的紧密结合与协同演化,形成生产力质态跃迁的内生函数。在“十五五”时期的关键窗口,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于未来产业发展进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传统单纯依赖物质资本积累的粗放增长模式已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需求,如何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而激发新质生产力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亟须破解的核心命题^[42]。其一,这是生产力要素质态演进的必然要求,唯有弥合硬件设施投入与人才效能释放的时空错位,才能激活未来产业的策源动力。其二,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必由之路,通过物人协同发展的价值闭环,将技术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驱动力量。其三,这是大国博弈背景下构筑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通过对物与人两种资源的有机整合,支撑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民族脊梁。展望未来产业发展,以“投资于物”固其本,以“投资于人”铸其魂,这一逻辑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进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对工业文明时代“重物轻人”技术发展模式的深刻重塑。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未来产业发展,以物人协同共生的内在逻辑超越了单一的物质积累模式,转向物与人同步跃升的发展新范式,不仅为全球未来产业治理贡献了引领性的中国智慧,更展现出开启人类文明新篇章的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发挥比较优势 坚持稳中求进 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N]. 人民日报, 2026-02-01(1).
-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N]. 人民日报, 2014-12-12(1).
-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N]. 人民日报,

- 2026-01-01 (2) .
- [4]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J]. 求是, 2025 (21): 4-10.
- [5] 刘华军, 史浩琰.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人文杂志, 2025 (3): 24-34.
- [6] 刘伟. 新质生产力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探讨[J]. 经济研究, 2025 (4): 5-17.
- [7] 洪银兴, 刘松涛.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机制研究[J/OL]. 求是学刊, 1-10 [2026-02-18].
<https://link.cnki.net/urlid/23.1070.C.20260119.1519.002>.
- [8] 余东华, 姜伟. 未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特点、难点与进路[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2): 113-124, 2.
- [9] 周文, 白佶. 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机理、重点方向与战略路径研究[J]. 齐鲁学刊, 2025 (6): 101-114.
- [10] 胡拥军, 关乐宁, 宋心荣. 未来产业“四链”融合: 理论阐释、创新机理与实践方略[J]. 改革, 2025 (9): 16-25.
- [11] 方莹莹, 阳镇. 面向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 模式选择与政策体系[J]. 甘肃社会科学, 2025 (4): 184-196.
- [12] 宋宪萍, 杨丽乐. “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创新生态构建[J]. 学习与实践, 2025 (12): 25-36.
- [13] 黄群慧, 王岭. 以“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基础理论与根本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 2025 (9): 69-81, 206, 2.
- [14] 刘志彪, 孙瑞东. “十五五”期间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问题、挑战及对策建议[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6): 17-30.
- [15] 林毅夫.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 2025 (2): 32-40.
- [16] 邵传林, 刘登晖.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政策创新与调整[J]. 产业经济评论, 2026 (1): 5-25.
- [17]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视阈下发展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 内涵、功能与创新[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4 (4): 27-38.
- [18] 李晓华. 未来产业的内涵、特征、难点及进路[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 71-80, 2.
- [19] 芮明杰. 未来产业成长路径与范式探讨[J]. 经济纵横, 2025 (1): 1-8, 136.
- [20] 徐建伟, 李子文. 加快未来产业布局建设: 发展规律、现实制约和生态构建[J]. 经济纵横, 2024 (10): 102-109.
- [21] 贾超然, 曹洪滔. 中国未来产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驱动逻辑、路径选择与优化对策[J]. 科学管理研究, 2025 (6): 63-73.
- [2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科〔2024〕12号)[EB/OL]. (2024-01-18)[2026-02-1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9021.htm.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8.
- [24] 朱香敏.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超前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政策选择和实施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 (11): 50-56.

- [25] 胡苗, 吴旭辉, 鲁雪峰.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水平测度、动态演进及障碍因子识别[J]. 统计与决策, 2025(16): 84-89.
- [26]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 高钰,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59.
- [27] 毕照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逻辑指向[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5): 97-106.
- [28] 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R/OL]. (2025-09-29) [2026-02-13].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9/t20250929_1961429.html.
- [2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R/OL]. (2025-12-17) [2026-02-13].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512/t20251217_707076.htm.
- [30] 国家统计局. 2024年“三新”经济增加值超24万亿元 占GDP比重为18.01%[EB/OL]. (2025-07-31) [2026-02-13].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7/t20250731_1960553.html.
- [31] 国新办举行2024年一季度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EB/OL]. (2024-04-16) [2026-02-13].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4/content_6943585.htm.
- [3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虚拟(增强)现实研究报告(2025年)[R/OL]. (2026-01) [2026-02-13].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601/t20260121_711183.htm.
- [33] 黄群慧, 李芳芳. “十五五”时期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主要思路与政策建议[J]. 广东社会科学, 2026(1): 29-40.
- [3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算力互联网体系架构研究报告(2025年)[R/OL]. (2026-01) [2026-02-13].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601/t20260127_711862.htm.
- [35] 习近平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N]. 人民日报, 2026-02-13(1).
- [3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N]. 人民日报, 2024-12-13(1).
- [37] 黄玮杰. 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及其效应——基于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2): 17-24.
- [38] 习近平.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 求是, 2025(22): 4-10.
- [39] 习近平. 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J]. 求是, 2025(7): 4-10.
- [4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N]. 人民日报, 2026-01-21(1).
- [41] 孟捷. 依托建构性市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个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出发点的演化—制度分析框架[J]. 学术月刊, 2025(4): 32-43.
- [42] 徐政, 施雄天.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21 [2026-03-17].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212.1553.004>.

责任编辑: 杨稀琴 校对: 林华山

“十五五”时期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牟春伟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张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发展未来产业是“十五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场景创新作为连接技术与产业、打通研发与市场的关键桥梁,已成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路径。其内在机理主要体现为:需求牵引机制驱动技术革命性突破,技术验证机制实现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成熟度的双向校验,要素重组机制促进传统与新型要素公平高效配置,制度试验机制推动政策治理体系适应性演化。“十五五”时期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面临场景供给分散、要素配置失衡、市场化规模不足、制度供给滞后等现实困境。要以场景创新为抓手,通过主动构建战略性场景体系为前沿技术应用转化提供方向引领,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保障场景驱动创新的优质供给,培育生态协同网络打造多主体与链群互动的开放创新空间,深化制度与治理创新为场景驱动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保障。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场景创新;产业创新;科技突破;“十五五”规划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6)02-0153-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12

作者简介: 牟春伟,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烟台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数字山东研究专项(25CSDJ22)

引用格式: 牟春伟,张翔.“十五五”时期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153-165.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1]以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为先导,构建以新支柱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期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浪潮下,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一批颠覆性创新大量涌现,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并加速向大规模产业化应用转化,日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从全球视野看,未来产业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在2019年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报告,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制造业等列为未来产业重点,并相继出台了《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无尽前沿法案》《未来产业法案》等一系列文件。欧盟通过《促进繁荣的未来技术》和《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等文件,强调提升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智能健康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未来产业作为颠覆性科技创新的载体,已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战略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突破和颠覆性创新驱动的新兴产业,相较于现有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其目前虽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但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领域进行了系统性布局,明确到2027年要成为世界未来产业重要策源地,实现未来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部分领域实现全球引领的目标。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专节部署“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提出“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3],这标志着我国未来产业顶层设计进入系统化、机制化新阶段。

场景创新作为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日益成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和关键路径。我国在政策层面已将场景创新提升至战略高度。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把“场景”提升为国家战略层级的政策工具,标志着我国在未来产业布局上已经迈向“场景驱动逻辑”。场景不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场”,更是要素集聚和创新生态构建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全球科技竞争趋于白热化,发达国家也着眼于通过场景创新加速未来产业落地,如欧盟氢能应用场景、日本“社会5.0”战略中的“超智能社会”场景。我国需抓住未来产业发展机遇期,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以场景创新为着力点,推动未来产业从孕育期向规模化转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未来产业与场景创新的内涵阐释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是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关键路径。系统阐明未来产业与场景创新的理论内涵及核心特征，是揭示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内在机理、构建未来产业竞争新优势的理论前提。

（一）未来产业的理论界定及核心特征

未来产业是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十五五”期间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既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产业演进视角来看，未来产业形成于具体实践^[4]。相对于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强调原创性、系统性和跨界融合性^[5]，能够彻底重构生产范式、生产关系和产业生态^[6]。从表现形态上看，未来产业源于前沿技术或通用目的技术集群，如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技术创新是产业变革的基础^[7]，该类技术突破形成的“破坏性创造”将引发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系统性重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这一内涵不仅反映了未来产业的动态新兴本质，还突出了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战略定位。从驱动要素来看，未来产业发展过程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过程。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8]。未来产业高度依赖数据，如在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方向中，数据要素贯穿研发、生产、流通、分配全链条，是“技术—产品—市场”动态匹配的纽带。

从核心特征来看，未来产业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9]。其中，战略性是未来产业最突出的价值特性，体现为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格局的全局性影响。这一战略性源于其前瞻布局以及对科技制高点的抢占。作为战略必争领域，未来产业不仅能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通过赋能传统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产业的引领性源自前沿科技突破以及技术同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这种引领性使未来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产业载体。未来产业本质上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综合体现。颠覆性创新驱动是未来产业最根本的特征。从技术经济范式层面来看，未来产业不是现有产业的线性延伸，而是由颠覆性技术或通用目的技术集群引发。这一特征决定了未来产业发展需依赖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实现“换道超车”，避免路径依赖。高度不确定性是未来产业具有的风险特征。技术路线、市场需求、商业模式、政策环境均难以准确预判，使其可能面临基础研究到技术原理验证的“魔鬼之河”、技术到产品转化的“死亡之谷”、产品到市场规模化的“达尔文之海”三重困境^[10]。同时，未来产业处于非线性、系统性的动态演进过程中，投资周期长、沉没成本高，需要依赖政府战略性投入以降低系统性风险。

（二）场景创新的理论意涵与类型体系

“十五五”规划建议聚焦高质量发展，明确提出了“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的任务要求。《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对“场景”作出这样界定：“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

政策的具体情境，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具有重要牵引作用”。这一界定源于对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的深刻认识，旨在通过场景培育和开放，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发展路径。场景创新不仅是技术落地的具象化载体，更是激发产业生态活力的动态机制。具体而言，场景创新通过需求导向的具象化表达，将分散的市场需求整合为可操作的应用框架，从而牵引技术供给侧的响应与优化，这体现了场景在破解创新脱节问题中的桥梁功能。一方面，场景创新将抽象的技术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情境验证，避免研发脱离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它通过规模化应用放大技术价值，推动从实验室原型向市场产品的转化。场景创新有助于一体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改革，强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供给，这意味着场景不仅是应用工具，更是驱动制度变迁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引擎。

场景创新的理论意涵可从需求牵引、创新生态构建和复杂系统演化等角度理解。从需求牵引理论来看，场景创新本质上是需求侧对技术供给的倒逼机制。市场需求是创新的原动力，而场景作为需求的具象化形式，可提供现实、复杂的验证环境，揭示技术在成本、可靠性、安全等多维约束下的适用性，从而引导技术迭代升级。这一意涵在未来产业语境中尤为显著，未来产业的高不确定性要求从需求端出发，通过场景模拟真实应用，避免“技术孤岛”。从创新生态理论来看，场景创新是生态系统的构建枢纽。创新有赖于多主体协同，而场景可提供聚合平台将政产学研金服用等要素整合为动态网络。通过场景，技术提供者、需求使用者、资本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形成闭环互动，实现要素从分散到协同的转变。这一意涵扩展了场景的边界：场景不仅是验证工具，更是价值共创的空间。从复杂系统理论来看，场景创新体现了非线性演进的特征。系统演化依赖反馈循环和自组织，而场景通过快速试错机制，可形成“需求反馈—技术调整—应用优化”的正反馈循环。

场景应用的类型体系可分为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和高价值小切口场景，这一体系反映了场景从宏观统筹到微观突破的层次设计。综合性重大场景强调跨领域、跨区域协作，聚焦大规模系统性应用，如依托载人航天、深海深地等重大工程，加速未来空间方向的成果转化。该类型场景的特征在于全链条贯通，旨在推动重点产业体系升级，实现要素互通与生态联动。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针对特定行业进行技术集成，如制造业领域的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场景，支持工业领域垂直大模型应用，注重行业深度融合。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则聚焦高潜力、精细化切入点，如应急管理领域的智能感知、无人救援场景，提升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发挥低风险试错与智能处置优势。多样化场景创新类型体系相互补充，提供了从综合到精细的发展路径，综合性场景提供宏观框架，集成式场景深化行业应用，小切口场景驱动微观突破，构成全方位梯度培育格局。“十五五”时期，分批次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清单，组织实施若干重大项目，实现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三、“十五五”时期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场景创新并非外在于产业演进的辅助性工具，而是深度内嵌于未来产业“技术—市场—要素—制度”协同演化全过程的核心驱动力量。深入剖析其内在机理，可发现需求牵引机制、技术验

证机制、要素重组机制及制度试验机制之间相互耦合、层层递进。四大机制分别从方向导引、价值校验、资源聚合与环境适配维度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以场景创新驱动未来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坚实动力系统。

（一）需求牵引机制：场景需求和市场需求牵引技术突破

未来产业的培育依赖于关键前沿技术的突破，而“技术创新从起始阶段就无法脱离于场景的内容与结构”^[11]。需求牵引机制作为核心导向，通过场景创新将抽象的市场潜能转化为具象化的技术应用情境，从而推动技术迭代、产业生态构建与规模化落地。需求机制的本质是拉动技术创新与产业持续迭代的过程，旨在满足日益多样化且不断升级的有效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场景创新构成了技术验证的关键“选择环境”，其核心逻辑在于将模糊的“潜在市场需求”转化为清晰的“有效市场需求”，进而倒逼技术创新形成正反馈循环。这种机制蕴含了“感知催化—反馈迭代—规模放大—生态协同”的多重路径。场景作为技术试错的载体，能够显著降低前沿技术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战略性领先市场发挥着方向锁定作用^[12]，激活着技术集成与外溢，牵引着技术路线从连续性改进向非连续性跃迁转变，进而实现技术能力与安全需求的极致优化与动态平衡。

“未来产业的成长需要形成产业需求规模和应用场景优势。”^[13]我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与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在关键前沿技术赶超中体现为需求牵引与创新生态构建的辩证统一，标志着从“市场换技术”向“市场育技术”的范式转型。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体量优势，更是一种能够实现要素重组与风险分摊的经济机制。其一，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聚合效应形成强大的内需引擎，将潜在需求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稳定预期，从而激励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专用性投资。其二，市场规模优势通过网络效应与成本分摊机制，为前沿技术提供了多元化的验证场景，有效摊薄了高昂的研发成本并降低了试错风险。同时，丰富的应用场景作为连接技术供给与市场痛点的枢纽，遵循“整合资源—拓展场景链—构建场景生态”的演进规律，推动资源向核心能力快速转化。更为关键的是，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同时容纳多样化的技术路线竞争，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自主技术融合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种“需求牵引—要素聚合—创新迭代—生态成型”的闭环机制，不仅确立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市场基础，更为未来产业从“跟跑”向“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创新活力。

（二）技术验证机制：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成熟度的双向校验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需统筹好技术可能性与市场可能性^[14]。场景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情景验证机制”，充当了技术演化与市场选择之间的关键适配器。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在动态环境中实现“场景定义—机会识别—意义建构”的循环迭代。场景通过设定特定的应用逻辑、边界条件与交互规则，为未来产业的技术应用进行现实模拟或虚拟建构，使处于萌芽期的前沿技术脱离理想化的实验环境，直面现实世界的复杂约束。这一机制的核心功能在于实现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成熟度的双向验证。一方面，通过早期验证场景的建设，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可以快速暴露技术在稳定性、兼容性及安全性上的短板，从而触发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收敛，将高度不确定的技术演进路径收敛为具有产业化潜力的具体方向。另一方面，场景能够对技术的实用性进行市场

化检验，特别是在我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条件下，可将潜在的大规模需求转化为具体的“战略性领先市场”，为我国前沿技术提供宝贵的试错空间和早期市场反馈，从而在技术追赶和超越中发挥关键的“筛选”作用。

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强化场景驱动是“十五五”期间加速新技术市场化进程、形成产业良性循环的战略抓手。传统的产业发展往往依赖于供给侧的技术推动，但在未来产业领域，由于缺乏成熟的历史数据和参照系，必须转向以场景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要求通过实施未来科技应用场景创新工程，构建“场景衍生需求—需求定义创新—创新赋能场景”的闭环生态。场景作为连接技术供给与潜在市场的桥梁，具有显著的“催化”与“放大”效应。当新技术在工业制造或家庭服务等特定场景中得到有效验证后，场景便从“试验田”转化为“示范田”，通过示范效应降低市场主体对新技术的认知门槛与采纳风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实现市场规模的指数级增长。场景创新还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通过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将科技领军企业的前瞻布局与专精特新企业的敏捷创新紧密结合，形成分布式但高度协同的创新网络。这种由场景驱动验证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产业的演进路径，使其从偶然的“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性的“集群涌现”。

（三）要素重组机制：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的公平高效配置

场景创新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和创新抓手，其基础性功能便是通过要素重组机制，实现创新要素的协同集聚与高效配置。这一机制的理论逻辑基于要素协同集聚理论，即未来产业的集约化发展要求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的跨界流动与高效配置，实现从要素叠加向价值倍增的跃升，场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要素引力场”角色。场景通过将抽象的战略性需求具象化为特定的应用情境、性能指标和商业逻辑，为原本分散的创新要素提供了明确的目标。这种目标牵引打破了要素在各自领域中的孤岛状态，促使其向场景价值的实现路径集聚。同时，场景作为情景验证平台，提供了真实、复杂的约束条件，使得要素的重组和配置必须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实现了要素在实践中的高效适配和动态优化，保证了要素的配置效率。

场景驱动下的要素重组机制在实践中体现为三个关键维度，共同支撑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的构建。首先是数据要素的枢纽式重组。在未来产业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成为多要素互动中的关键纽带^[15]。场景创新通过实施“数据场景化”策略，使得高质量、专用性的验证和训练数据成为要素重组的中枢。场景定义了所需数据的类型和规模，而数据需求作为内生驱动力，倒逼了算力、算法以及人才等关键要素向该场景重组配置。这种以数据为中心的重组，是未来产业实现“智能—物理”系统协同的基础。其次是资本要素的适配性重组。未来产业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是阻碍资本要素流入的瓶颈。场景创新机制通过提供可观察、可评估的商业化验证结果，有效降低了资本方与技术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吸引耐心资本的长期投入。基于场景验证的风险重估，金融机构能够创新金融产品，如研发选择权贷款，实现资本从传统的资产抵押型向创新价值型的重组配置，显著提升金融资源与未来产业风险特征的适配性。最后是创新主体的跨界网络化重组。未来产业要求跨学科、跨行业的知识和技术进行系统集成。颠覆性技术的涌现需要宏观结构、中观连接、微观嵌入的协同。场景创新正是通过提供中观层面的应用连接，促进高校、科研院所、链主企业等异构创新主体在同一目标下进行知识共享、技术嫁接和功能重组。这种网络化

重组不仅打破了组织间的壁垒，还加速了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未来产业生态中的高效流动和集成，是实现未来产业集群涌现的关键机制。

（四）制度试验机制：制度政策与治理体系的适应演化

场景对制度政策、管理规则、监管体系制度建设有试验作用，能够通过“场景试错”倒逼制度供给从刚性管制向敏捷适应演化。未来产业蕴含的颠覆性与不确定性特征，使得基于传统工业时代确立的法律法规、监管范式普遍面临滞后甚至失效。场景创新通过构建“监管沙盒”或“试验特区”，为前沿技术提供一个可控的风险释放与规则探索空间。在这一机制中，场景运行产生的实证数据能清晰暴露现有制度在伦理边界、数据安全、准入标准等方面的空白或冲突，形成制度压力测试效应。基于这种压力反馈，政府治理体系从“事前审批”为主的静态监管向“全过程动态治理”转型。一方面，这推动了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即根据场景中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成熟度的演进，动态修订监管规则，例如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和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为颠覆性创新提供“试错容错”的制度空间，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与创新风险。另一方面，场景创新加速了科技伦理与风险防控体系的重塑。针对未来产业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如算法歧视、生物安全等，场景提供了伦理规范落地的具体情境，促使政策制定者在“红线”与“底线”之上构建敏捷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向前瞻治理的跨越，确保技术创新在制度的轨道上安全有序发展。

场景创新深刻重塑了产业政策的作用逻辑，推动“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政策体系从传统的“选择性、供给侧”模式向“功能性、需求侧、生态化”模式转型。在传统模式下，产业政策多依赖资金补贴等直接干预手段，容易引致资源错配或“内卷式”竞争。而场景创新机制确立了以“应用需求”为导向的政策新范式，政府角色从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转变为场景的“架构师”与生态的“维护者”。这种转型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制度演化。首先是标准化体系的“领航”演化。场景应用作为“事实标准”形成的关键环节，通过在综合性重大场景中的技术验证，政策体系加速推动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以标准链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抢占全球技术治理话语权。其次是要素配置政策的“协同”演化。围绕场景落地需求，政策重点转向打破部门壁垒与行业界限，建立涵盖财税支持、数据要素流通、知识产权保护、人才评价等多维度的协同政策框架。例如，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创新政策，以适应未来产业“轻资产、高风险”特征，引导“耐心资本”通过场景识别价值并进行长期投入。最后是创新组织政策的“联合”演化。政策体系鼓励依托场景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制度设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在制度层面保障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在场景中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提供系统性的制度土壤。

四、“十五五”时期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现实约束

场景创新作为驱动未来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关键引擎，旨在通过技术需求的具象牵引、关键要素的系统重组及产业生态的动态演进，重塑产业发展动能。然而，这一机制在落地过程中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现实约束，具体表现在场景供给、要素配置、市场规模以及制度供给四个层面。

（一）场景供给分散化及应用缺乏协同联动

当前我国场景创新的推进模式呈现显著的分散化与碎片化特征，这成为“十五五”时期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首要结构性瓶颈。尽管各地积极布局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未来健康等前沿领域，但总体仍存在各自为战、单点试验、缺乏联动的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场景建设权力主要分散在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缺乏统一规划与顶层牵引，导致资源配置重复、示范场景同质化，难以形成跨区域场景链或全国性系统性场景群。场景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依旧存在，部分场景建设偏向“技术展示”或“示范工程”，缺乏面向真实痛点的系统性设计，难以对技术路线形成有效验证压力。跨行业、跨领域协同推进机制薄弱，使得诸如城市交通、智能物流、低空飞行等典型综合性场景无法一体化推进，从而降低了场景复用能力和外部性溢出效应。

场景供给分散化直接削弱了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散能力。一方面，分散化场景无法形成“试验田—示范田—应用田”的连续梯级，导致验证路径中断，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成熟度难以同步提升。另一方面，缺乏系统性场景意味着上下游企业的参与意愿不足，难以形成集群式创新网络，影响未来产业的集群涌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压力使得同质化建设可能加剧，如超过 80% 的地区在产业政策规划中将量子信息或量子科技视为优先培育领域^[16]，忽略了对本地产业基础及资源禀赋的全面考量，导致资源浪费与碎片化试验重复开展，弱化了国家层面场景战略的整体效能。此外，场景分散化容易放大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东部发达地区场景资源丰富，而中西部地区供给不足，影响全国未来产业布局的均衡性。这一瓶颈的深层影响体现在未来产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上。场景作为连接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的桥梁，本应通过分布式验证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向产业的转化，但分散化导致场景经济外部性无法充分释放。这种碎片化不仅增加了企业进入门槛，还抑制了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的机会，导致产业生态趋于垄断化。总体来看，场景供给侧的结构性分散已成为未来产业发展亟待突破的第一瓶颈，需通过一体化设计、场景链构建和跨区域协同进行系统性重塑，切实增强场景对技术突破的牵引力和生态构建的支撑力。

（二）要素配置不均衡与新要素供给不足

场景创新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其要素重组功能旨在通过构建要素资源“引力场”，实现数据、技术、资本、人才等关键要素的协同集聚与高效配置。然而，从要素投入到要素组合创新的跃升并非自然发生，其作用机制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受到多重结构性约束。相关约束主要源自未来产业的高不确定性与跨界融合特性，致使场景难以成为突破要素孤岛的有效锚点，影响价值倍增效应的充分显现。

数据要素的重组壁垒构成最突出制约。当前要素市场流动障碍显著，数据隐私规则与开放共享之间的张力，使跨行业、跨区域的数据标准缺失；“孤岛效应”的普遍存在制约了数据要素在不同场景中的互操作性，使其无法有效牵引算力、算法等关联要素的集聚。对高度依赖数据密度的前沿领域而言，这种壁垒不仅抑制场景迭代速度，还放大不确定性风险，削弱了技术从验证到规模化的跃迁动力。同时，资本要素的结构性错配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制约了未来技术创新的扩展和未来产业发展^[17]。未来产业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特征，部分领域尚处于基础研究和原

始创新阶段，需要依赖耐心资本支撑。但从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来看，2024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 2 497 亿元，占 R&D 经费支出比重为 6.91%，与同期发达国家 15% 的平均水平尚有差距^[18]。而且受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风险偏好较低等结构影响，社会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成熟期项目，造成“长周期技术—短周期资本”的期限错配。尽管部分地区探索了“研发选择权贷款”等创新金融工具，但覆盖范围相对有限，难以形成对早期场景创新的持续支撑。耐心资本供给不足导致要素重组难以从“叠加逻辑”迈向“倍增逻辑”，阻碍了技术能力向场景需求的快速适配，影响产业从实验室向市场的跃迁。此外，创新主体网络化重组不均衡，跨界融合能力不足，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整体偏低。区域创新能力差异明显，资源禀赋不均导致产学研用体系未能有效贯通。产学研分割的结构性壁垒，造成跨主体知识流动难度较高，无法在场景牵引下形成分布式创新网络。高校、科研院所、链主企业等异构主体虽有协同创新需求，却因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难以在场景创新中实现高效合作。要素重组如缺乏有效的组织者与系统集成者，人才供给滞后于技术迭代，将导致场景构建与运营能力不足。这种多维度短缺强化了创新主体的路径依赖，增加了重复建设和内卷化竞争风险，抑制了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涌现”的生态化演进。

（三）商品消费化与规模化市场形成受阻

商品消费化路径尚未真正贯通，规模市场的网络效应尚未充分形成，是“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突出障碍之一。未来产业在早期普遍呈现“技术领先—市场滞后”的结构性特征。该特征源于前沿技术的快速突破与市场需求培育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错位，使得产品从实验室到消费市场的转化链条受阻。这种错位不仅源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受制于市场培育的缓慢进程，导致未来产业难以实现从技术示范向大规模消费应用的跃迁。

一方面，未来产业的产品多处于中试或试点阶段，技术性能与用户需求之间匹配度不足。例如，人工智能大模型、脑机接口设备等技术虽具前沿性，但其稳定性、安全性不足，市场接受度有限，用户难以承担高试用成本。这种匹配不足不仅体现在技术参数上，还涉及整体用户体验与可靠性。例如人工智能在医疗场景中的可能误诊问题，将使患者和机构难以形成稳定信赖，从而降低采纳意愿。另一方面，未来产业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许多场景创新仍停留在“政府主导试点—技术展示—有限扩散”的模式，难以形成可自我循环的商业闭环。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最终要受到市场的约束^[19]，许多场景的创新应用通常依赖财政补贴或示范工程推进，部分企业难以通过市场化收入覆盖研发和运营成本。高强度刺激政策致使市场被提前催熟^[20]，难以有效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导致产业从示范验证向消费级产品跃迁缓慢，从而进一步压制市场规模扩大。此外，需求端分散削弱了市场集聚效应，导致“规模不经济”长期存在。缺乏规模市场意味着单位试验成本居高不下，从而抬高了技术成熟度提升的边际成本，形成“高成本—低需求—低迭代”的恶性循环。此外，消费端的认知门槛高、采纳风险大，特别是在具有伦理、安全外部性的产业领域，用户采纳更加谨慎。需求端动力不足使得场景创新难以进入规模化扩散阶段，未来产业面临增长瓶颈。总体来看，商品消费化受阻与规模市场难以形成是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典型结构性瓶颈，是技术不确定性、需求滞后与政策错配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抑制了场景驱动下的需求牵引，还制约了要素重组与生态构建。

（四）制度供给滞后与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未来产业发展速度快、跨界性强、风险高度不确定，这对制度供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相较于未来产业的快速演化，我国现有制度体系在规则制定、治理方式和政策协同方面仍有滞后情形。

一方面，监管体系总体以“事前审批—静态执法”为特征，难以适应脑机接口、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的迭代速度，应用场景中的灰色地带较多，企业合规成本高、制度不确定性大。这种滞后不仅体现在规则制定上，还放大了技术安全与伦理风险。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安全外部性突出，如自动驾驶系统存在的算法失效风险给社会带来不可预期影响。同时，隐私与数据伦理问题成为场景扩散的重要障碍。具身智能等产业大量依赖数据采集，但现行数据治理体系仍不完善，数据采集边界、算法透明度、模型可解释性等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框架，造成公众信任成本上升，市场采纳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制度供给碎片化严重，部门间缺乏统一的协同机制，数据流通、标准体系、知识产权运营、数据确权等关键制度未形成系统性支持，导致场景创新缺少制度层面的统一底座。在产业政策方面，仍存在条块分割、地方竞争性重复建设等现象，不利于形成协同的未来产业布局。此外，制度创新工具匮乏，监管创新能力不足。针对新技术的包容审慎监管、沙盒试验区、动态调整机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伦理审查能力不足，未来产业涉及的伦理问题呈现跨学科、跨行业特点，而现有审查体系仍以传统行业监管逻辑为主，难以覆盖人工智能自治性、生物伦理前沿问题等新型伦理风险。技术治理能力的滞后进进一步放大安全隐患，使场景创新不得不在更谨慎的前提下推进。总之，制度供给相对滞后已成为阻碍场景创新扩散的关键影响因素，技术安全与伦理风险不仅提高了产业落地成本，也影响规模化扩散速度。

五、“十五五”时期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十五五”时期构建以场景创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需统筹推进前沿技术验证、优质要素集聚、生态网络协同及高效制度供给，深度激发场景创新的牵引效能，打通从“概念验证”向“规模应用”跃迁的内生发展路径。

（一）构建未来产业战略性场景体系，为前沿技术的应用转化提供方向性引领

构建战略性场景体系是破解场景供给分散与应用协同不足这一结构性障碍的关键之举。该体系通过提前描绘智能制造、医学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系统等未来产业的关键场景，将原本抽象的潜在需求转化为可测试、可迭代、可规模化的具体情境，为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向应用的转化提供清晰、可验证的方向性牵引。与传统“技术先行—应用匹配”模式下创新活动易陷入“无场景可依、转化无抓手”的困境不同，这种需求导向的场景先行路径确保技术研发从起点即对标真实市场路径。

面向现实需求研究制定未来产业战略性场景体系发展规划。在顶层设计统筹下进行场景整合，将碎片化的局部场景重构为相互衔接的梯级链条，形成“试验田—示范田—应用田”的连续

谱系。以链条式重构为契机，强化跨领域、跨主体的知识流动，为区域均衡发展提供协同框架。同时，建立国家级场景机会清单平台，将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与企业置于同一套需求语言与验证逻辑之下，避免资源重复配置与同质化竞争。将需求在这一统一平台上的聚合迅速转化为企业的稳定预期，增加专用性投资，实现技术创新从渐进式改进跃迁至非连续突破。此外，通过持续优化场景链条，内生出“感知催化—反馈迭代—规模放大”的动态循环，使场景真正成为连接技术供给与市场痛点的桥梁，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充分释放网络化创新效应。这种桥梁作用的持续强化，可通过全过程创新保护机制杜绝技术验证中的权益灰色地带，最终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双向互促。综合而言，战略性场景体系可使原本分离的需求导向与技术转化深度耦合，通过示范效应降低市场认知门槛，持续激发潜在需求，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轨迹从高度不确定转向可规划、可预期、可持续路径。

（二）优化未来产业要素配置结构，为场景牵引的创新活动提供优质要素供给

优化未来产业的要素配置结构是强化场景牵引创新活动的基础性工程。要素结构的重组不仅要求数量意义上的供给扩张，更要求在结构意义上形成高效的协同机制。需要以应用场景为导向实现数据、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关键要素的精准匹配与高效流动，从而驱动产业从孕育期向规模化阶段加速转型。

一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是释放其价值的核心路径，其配置优化需要依赖数字化平台建设和数据共享机制来实现。因而，要不断完善国家级数据交易平台与试验区、优化分级授权制度并明确流通和隐私规则，促进信息流动和知识共享，促使算法与算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与集聚，避免数据孤岛现象的发生，为场景提供可验证的数据供给。二是优化资本要素供给结构。资本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培育未来产业要有长期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需要引导资金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带动优势资源向战略性技术领域集聚，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项目，弥补市场机制在早期产业化阶段的不足。扩展长期资本供给、构建研发选择权工具、强化中试金融支持等方式，能够有效弥补期限错配，使耐心资本成为场景验证的重要支撑。三是提升技术要素配置效率。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和前沿技术驱动来实现高效配置，确保技术突破与产业应用的紧密衔接，避免资源浪费和低效重复。四是重视人才要素配置在场景重构中的基础性意义。通过构建多层次协同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培养适应未来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确保人力资源与技术需求、场景需求的高度匹配。总之，要素的协同集聚不仅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还能通过创新驱动和市场反馈机制，形成自我强化、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实现要素配置从碎片化向系统化的转变，为未来产业的规模化与集约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培育未来产业生态协同网络，为多主体互动与链群互动构建开放创新空间

培育未来产业生态协同网络是“十五五”时期破解生态碎片化与不平衡约束的核心路径。这一网络通过整合多主体资源，促进链群互动与开放空间构建，形成从碎片化向集群涌现的生态演进。具体而言，建立多主体协作机制、强化链群联动路径以及构建开放创新平台，是提升生态协同性和互动性的重点方向。

一是建立多主体协作机制。多主体协作机制是生态网络的基础,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政产学研金”各方形成紧密联盟,有效吸引国内外的创新团队和资金,为场景驱动的生态注入活力。以场景创新为锚点,促进异构主体协同,避免区域失衡。构建“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的协作模式,促进知识共享与资源流动,确保多主体在场景验证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些举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放大外部性溢出,为场景牵引提供稳定支撑,推动未来产业从碎片化向生态化的转型。二是强化链群联动路径。强化链群联动路径是建构生态网络的核心,要通过深化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增强多主体互动与全球网络的连接,塑造实现国内国际循环畅通的现代化协同创新价值链。要鼓励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促进链群内技术资源和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领域,应通过营造开放的创新环境,支持链主企业主导的生态构建,形成“技术—样品—产品—产业”的孵化链条。这一联动能通过场景开放吸引上下游企业参与,实现从单点验证向规模扩散的跃迁。发挥示范效应,降低准入门槛,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完善动态评估机制、优化链群配置,确保产业生态从不确定向可持续转型,推动未来产业集群涌现。三是构建开放创新平台。随着未来产业生态的不断融合,协同平台的统一成为推动多主体互动协调发展的关键。应积极推动并主导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推动设立国家级平台,牵头建立“开放场景实验室”,允许多主体接入验证环境。融入监测体系,实现动态优化互动,确保开放空间可持续。

(四) 推进制度和治理体系创新,为场景驱动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制度保障

制度和治理体系创新在场景驱动未来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保障作用。要建立起有利于颠覆式创新发生的体制机制,为颠覆式创新提供更多场景需求^[21]。未来产业的高不确定性与跨界融合特性,要求治理从传统刚性管制向动态适应转型。要通过完善监管机制、强化政策协同以及构建伦理风险框架,为场景驱动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制度保障。

建立动态调整监管体系是制度创新的基础。一是利用“监管沙盒”模式,实现对前沿技术的包容审慎管理。如在脑机接口领域,可以设立专项沙盒,允许企业在可控环境中测试新技术,同时动态监控风险,避免灰色地带扩大。这一体系需要融入全过程保护,确保场景验证中的权益保障,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二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根据技术成熟度调整规则,促进政府部门从事前审批向全过程治理的转变。建立动态评估体系。通过市场反馈和技术进展及时优化监管重点,确保制度与场景演进相匹配,进而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未来产业从不确定向有序发展。三是促进跨部门政策协同。这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强调打破各部门间壁垒实现一体化布局。要“构建目标取向一致性的政策协调机制”^[22],通过协调平台,整合数据流通、标准体系与知识产权运营,确保政策统一性和连贯性。针对区域失衡提供包容机制,确保中西部地区平等参与。政策引导资源向场景集聚,避免地方重复建设,有效整合资源,推动场景从碎片化向生态化的转型。四是完善伦理风险治理体系。要构建前瞻预警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向前瞻治理的跨越。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伦理风险敏捷治理机制,科学划定“红线”与“底线”,强化伦理风险研判和防范,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符合伦理规范。治理还需融入国际规则,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外部封锁影响。通过标准领航,确保要素在治理框架中的高效集成,降低公众信任成本,破解伦理风险瓶颈,为场景驱动提供可持续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发挥比较优势 坚持稳中求进 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N]. 人民日报, 2026-02-01 (1).
- [2] 习近平经济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557.
-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5-10-29 (1).
- [4] 王珏. 未来产业: 指标体系与生态架构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 81-92.
- [5] 冯晓青. 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培育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探究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 130-140.
- [6] 李晓华. 未来产业的内涵、特征、难点及进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 71-80, 2.
- [7] BOGLIACINO F, LUCCHESI M, PIANZA M. Job creation in business services: innovation, demand, and polarisation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3 (25): 95-109.
- [8] 余东华, 陈海谦. “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与未来产业互动发展路径探析 [J]. 改革, 2025 (9): 36-46.
-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EB/OL] (2024-01-29) [2025-12-07].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yj/art/2024/art_ad15b0f08a714fd8888c0e31468b8c54.html.
- [10] 胡拥军, 关乐宁, 宋心荣. 未来产业“四链”融合: 理论阐释、创新机理与实践方略 [J]. 改革, 2025 (9): 16-25.
- [11] 尹西明, 陈锋, 吴善超. 技术—组织—场景 (TOC): 培育未来产业的新理论 [J]. 中国软科学, 2025 (9): 42-54.
- [12] 罗路红, 吴海军, 李旭宁. 市场需求如何牵引技术赶超? ——基于中国核电产业的案例研究 [J]. 学习与探索, 2025 (9): 103-111.
- [13] 陈凯华. 以需求和情景为牵引培育未来产业创新生态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 (12): 22-28.
- [14]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视阈下发展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 内涵、功能与创新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4 (4): 27-38.
- [15] 潘为华, 刘亚威, 潘红玉. 要素协同集聚赋能未来产业发展: 理论框架、内在机理与现实进路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 (4): 62-71.
- [16] 闫俊周, 郭婧羽, 杨祎. 我国未来产业培育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 [J]. 科学管理研究, 2025 (4): 70-79.
- [17] 孟祺, 杨永新. 未来科技如何驱动未来产业发展——基于“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制度环境”的视角 [J]. 经济学家, 2025 (3): 46-55.
- [18]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N]. 光明日报, 2025-03-01 (4).
- [19] 徐康宁. 未来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市场逻辑的分析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6): 5-16, 205.
- [20] 曾宪奎. 探索推动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模式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5 (7): 47-55.
- [21] 张晨, 卢江. 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内在逻辑与关键举措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 64-74.
- [22] 盛方富, 朱顺东. 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 功能、扩散与创新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5 (8): 55-64.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杨稀琴

算法社会的数字统战：范式转型、运作机制与伦理规范

高 进 黄种兴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摘 要: 算法社会重塑了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动员结构,使得依托实体场域与科层体系的传统统战范式面临去组织化与流动性的适应性挑战,催生了数字统战。数字统战并非仅是传统统战的线上延伸,而是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的治理变革,本质上属于单向度政策宣导向交互式情感治理的范式转型。数字统战不仅是工具性的算法赋能,更是制度性的算法治理,在无序流量中构建起政治秩序。这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身份确认局限,通过算法算力重构了政治识别与动员路径,精准吸纳了网络游离群体。从运作机制看,数字统战塑造了涵盖政治识别、话语转换、网络构建与叙事生产的复合治理系统。其利用多源异构数据清洗生成统战对象精准画像,将严肃政治话语转译为契合亚文化语境的生活化表达,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虚实嵌合平台体系,并确立用户共创的主体地位以打造沉浸式政治叙事体验。但算法技术可能引致数字统战的伦理风险,亟须构建集隐私边界确立、算法偏误矫正与实质认同深化于一体的伦理规范体系,确保技术理性服务于政治整合的价值目标。数字统战主动驾驭算法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为全球数字时代的政治整合与社会团结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 算法社会; 数字统战; 数智化; 统战宣传; 政治整合; 范式转型; 伦理规范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166-13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2.013

作者简介: 高进,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黄种兴,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仪式与共同体认同研究”(22BZZ02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N25BSS061)

引用格式: 高进, 黄种兴. 算法社会的数字统战: 范式转型、运作机制与伦理规范[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166-178.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这凸显出新时代推进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党对统战工作的持续关注。从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社会发展现实看，传统统战依托的物理空间和人际关系渐趋被数据流与算法运行所重塑，统战工作的形式从面对面的具身互动转向屏对屏的数字互联。算法推荐、数据画像与流量分发提升了统战对象识别精度，但也改变了情感连接的萌生路径，引致算法社会的统战实践呈现出过度技术理性。

学界对于这一现象持迥异态度。技术乐观主义者从赋能视角出发^[3]，认为技术能增强情感沉浸^[4]，拓展统战工作的覆盖面^[5]，触达不同社会阶层人士^[6]，并降低参政议政的效能损耗^[7]。也有学者担忧数字技术的社会再造功能会消解统一战线的组织力^[8]，且算法权力的无序扩张可能减损公共性^[9]，算法治理的黑箱属性则造成数据偏见而触发社会排斥^[10]，使意在促成团结的政治实践遭遇技术异化风险。此外，当前关于数字统战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传统统战工作的网络舆情关注^[11]和线上网络延伸^[12]，但缺乏对算法社会情境下统战范式转型的学理审视。亦有研究阐明团结“亲密公众”的算法作用发挥^[13]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与算法技术的嵌融^[14]，却缺乏算法本身作为非人行动者所具有的权力属性与架构能力探索。

鉴于此，本文尝试剖析算法社会情境下数字统战的变革逻辑，首先探析统战工作嵌入算法主导的数字生态，其运作范式发生了何种转向。这涉及从单向度政策宣导向交互式情感治理转型的过程，更关乎如何在算法社会中融入统战思维，实现技术理性与政治价值的统合。其后剖析数字统战的运作机制，探究算法如何重构统战对象的连接方式与行动逻辑，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伦理规范来化解技术带来的统战领域风险。这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时代内涵，揭示算法权力与政治整合的互动规律，推动统战工作由被动适应技术向主动驾驭算法演变，进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算法社会中数字统战的范式转型

算法社会的发展重塑了社会连接形态，依托实体场域与科层体系的传统统战范式受到挑战，其基于地缘与业缘的静态吸纳机制已难以触达去组织化的网络游离群体，而数字统战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数字统战并非传统统战的简单线上延伸，而是治理逻辑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变革。它通过算法算力重构了政治识别与动员路径，以精准画像打破时空阻隔，实现了从指令传导向情感治理的跨越。这一统战范式转型不仅是对技术理性的适应，更是对传统统战在组织形态、动员方式与话语体系上的全方位超越，从而构建适应流动性社会的精准化及开放式大统战新格局。

（一）传统统战的本质与时代局限

传统统战本质上是结构嵌入与实体在场相结合的治理范式，凭借行政科层实现了统战吸纳，

却难以聚合算法社会的游离个体。统战部门惯于将治理对象置于组织格位,通过单位归属来确定个体的社会身份与政治属性。这种制度吸纳强调了组织的在场性,个体依附于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或企事业单位而被纳入统战工作范畴。行政力量依靠文件传达、政策宣讲以及组织生活,将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融进社会。各级统战部门、民主党派组织及工商联等人民团体构成了组织网络,承担了上传下达的政治功能,发挥着社会整合的稳定作用。此模式通过制度化途径实现了政治吸纳^[15],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与人口流动性较低的历史时期展现出动员及整合效能。但随着流动化的算法社会来临,过度依赖组织架构可能使统战工作对体制外游离个体的事务处理存有盲区,大量自由职业者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脱离了单位体制,行政与社团网络便面临影响力减弱的困境。

对于这些分散性个体与弱关系网络,传统统战存在着线下动员精英的路径依赖,忽视线上活跃群体的影响,仍侧重通过长周期的线下互动与强关系建构将关键少数转化为政治盟友。这是建立在物理接近与人际信任基础上的情感治理,面对面的在场互动成为政治吸纳的必要条件。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党外代表人士工作^[16],因而统战干部采用联谊交友、谈心谈话与走访慰问等方式,在非正式或公开的实体场域内与党外代表人士建立起个人友谊与政治互信。人格化治理考虑到了统战对象的声望积累,主要关注具备较高的行业威望、学术造诣及经济实力的传统精英。这种以实体声望为准的评价体系,在流量支配的算法社会中显现出滞后性,难以有效触及在数字空间占据话语高地且能影响舆论的新型意见领袖。可见,依靠线下漫长考察来培养精英的传统统战工作方式,尚不能充分适应数字时代即时性与爆发性的线上动员需求,这迫切要求统战工作从现实精英吸纳向虚拟与现实并重转型。

为了凝聚多元主体,传统统战以特定的时空规制及场景安排完成了异质性诉求的整合。会议与活动对在场交流而言不仅是工作载体,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仪式。通过座谈会、通报会及各类联谊活动,统战对象置身于专定的物理空间,这些形式多样的政治协商活动^[17]与在场的仪式感强化了其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仪式凝聚彰显了集体行动的统一性与政治表达的规范性,要求参与者遵循既定的行为及话语规则。但仪式化的场景自带威严感与距离感,可能难以触达统战对象的真实想法。统战工作的范式亟须从依靠仪式感的在场规训转型为适应算法推荐的非在场引导,于开放及流动的数字舆论场内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与引领力。

(二) 数字统战的萌发与效能彰显

数字统战是指统战部门运用海量数据及新兴技术,对算法社会中隐蔽化统战对象展开统战工作的治理范式,其从依靠行政经验的模糊感知转向了凭借算法算力的全面评判。个体在虚拟空间中摆脱了现实社会的身份束缚,以匿名或化的方式于网络平台进行交互与表达。去实体化引致归属于单位、行业或地域的身份标签失效,统战部门难以通过既有的组织名册与行政渠道来精准辨识目标群体。而数字统战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个体在网络空间留下的社交痕迹、消费记录与言论倾向等数字足迹进行清洗与结构化处理,窥见统战对象的政治面貌与思想轨迹,透过虚拟身份还原真实的统战对象以及提供分众化的网络统战内容^[18],将统战工作的决策基础由主观经验直觉迁移至客观实证数据。这种统战范式转型的优势在于治理方式从粗放趋向精微,其不止步于物理空间的身份确认,而是致力于在虚拟流动的网络空间中凭借数据分析与算法技术来精确识

别统战对象。

从治理逻辑看，数字统战实现了主流价值与个性化需求的精准供给。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改造了信息传播的生态结构，对统战工作的主流话语传播构成了过滤挑战。在流量与用户偏好主导的算法机制下，信息分发不再遵循政治重要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内容的点击率、完读率与互动性。这易引起同质化信息的过度推送，将用户包裹在与其既有观点相符的信息茧房中，受众认知受到算法操纵^[19]。对此，数字统战引入了计算治理的思维，将统战工作视为政治产品的供需匹配过程，依据用户画像进行统战对象的精细划分，针对知识分子、网络原住民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多元群体的心理特征及话语偏好来推出差异化的内容产品与沟通策略。这种分众化的精准施策发挥出算法推荐的正向作用，将严肃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契合亚文化语境的柔性表达，精确嵌入目标受众的信息流，在技术构筑的信息茧房内部打通政治传播链路，达成从单向度说教向交互式共鸣的跨越。

就组织形态而言，数字统战呈现出行政架构向平台生态的延展，以嵌入式治理促成了网络社会的政治连接。面对数智时代社会连接方式泛在化，传统依附于科层体制的封闭运作已无法适应延伸的统战边界，而网络空间精神交往也存在价值的共识削弱、理性消解及认同弱化等困境^[20]，其虚拟性也令信任建立变得困难。数字统战则确立了平台化的生态思维，统战部门从行政管理者转型为生态营造者与规则制定者。这一统战范式通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及网络意见领袖等各方资源，构建线上线下协同与体制内外联动的大统战数字生态。统战工作以服务与赋能为切入口，将政治引导功能嵌入数字平台与网络社群的运行之中，利用关键个体的辐射效应来吸附松散流量与强化社会信任。这种去中心化的连接方式，将网络个体编织进具有弹性的数字组织网络，实现了从刚性组织吸纳到柔性生态凝聚的形态迭新。

（三）数字统战对传统统战的超越

由遵从组织权威的经验化驱动转向凭靠算法体系的数据化凝聚，凸显了传统统战与数字统战的根本殊异。传统统战将个体纳入体制可控的组织格位来实现政治整合，依赖于干部的个人阅历、政治直觉与调研分析，这种模糊感知的决策模式用于处理小规模与静态性的社会问题尚且有效，但面向海量、动态且复杂的网络民意则可能效能低下。统战宣传需要由线下拓展至线上^[21]，因而数字统战承认了算法社会中个体的去组织化状态，并不强求其物理空间在场，而是以虚拟空间的数据痕迹考察来建立政治连接。这意味着统战工作不再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与文件传达来维系共识，而是适应算法推荐的底层规则，在无序的流量中通过掌握数据权与算法解释权构建起隐性政治秩序。归根结底，统战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依托组织科层体系的管住人演进为依靠数据与算法体系的读懂人与聚拢人，将分散在数字空间的社会情绪、意见倾向与群体行为转化为可量化及可视化的数据指标。

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功能各有侧重^[22]，现今统战工作受算法技术赋能影响经历了从传统统战广泛动员到数字统战精准动员的演化。传统统战方式试图以一套话语和一种模式兼顾所有统战对象，这在高流动性的数字社会难以为继。数字统战则把握统战对象的精细画像，将庞大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不同的圈层及亚群体，分析其行为习惯、兴趣偏好与价值取向，实施契合性强的统战工作策略。这种精准动员注重的是供需匹配与效果导向，要求统战工作拓展至线

上场景，向多元群体施加恰当影响力。对留学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不同群体，数字统战分别设计不同的在线沟通话语体系。这不仅能提高统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能强化统战工作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让统战对象在虚拟空间感受到关怀和尊重，由此在心理上产生共鸣与认同。

为满足算法社会的治理需求，统战工作从传统统战的封闭机构建制迈向了数字统战的开放生态运营。传统统战工作局限于职能部门运作，主要依靠行政指令推动工作落实。而在数字统战的推进下，大量掌握流量与数据的平台都可能成为统战工作新阵地。这表明数字统战善于借力，打造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相融合的统战生态系统。在此系统内，算法行政的应用表现出嵌套式结构^[23]，统战部门不再是唯一的行动主体，而是通过规则制定、议程设置与资源导入来引导网络平台、社会组织以及网络意见领袖共同参与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这种生态运营倡导的是连接而非控制，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附性。质言之，传统统战注重对特定物理空间的占有与管理，数字统战注重对无限网络空间的融入及引导，进而重塑统一战线的生态格局。

三、算法社会中数字统战的运作机制

算法社会的数字统战运作并非纯粹技术应用，而是涵盖主体识别、话语修辞、组织形态与意义生产的复合治理系统。其运作机制始于数据算力对统战对象的精准画像与隐私保护的平衡，延展至政治话语向生活化及分众化表达的情感转译，进而在跨层级与跨部门的平台网络构建中实现虚实协同，最终通过沉浸式叙事与主体共创完成主流价值的嵌融。

（一）政治识别机制：精准统战与隐私保护

政治识别机制的运作效能提升，首要在于突破科层制的数据条块分割藩篱，通过多源异构数据的清洗与融合构建出统战对象的数字画像。其对散落在工商、税务及互联网平台等系统中的数据进行采集，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打通数据孤岛，并依据政治社会学属性展开标签化处理，进而生成数字档案。这种从平面登记到立体画像的转变，增强了统战部门发现问题与精准施策的能力。以河北数字工商联平台为例，其整合了税务与市场监管等 20 多个部门的 30 多项数据资源，通过算法模型为民营企业生成包含经营情况、信用信息及工商联合作情况等方面的多维雷达图。立足于这一精准画像，平台自动测算企业的融资需求与信用额度，实现了从企业跑腿申请到线上直接审批的流程再造，不仅帮助 5.8 万户企业获得了 766.8 亿元的贷款投放，更使统战部门得以透过数据表象，准确把握民营经济人士的发展痛点。这表明随着多模态全息知识画像架构的发展^[24]，政治识别机制通过数据融合计算将统战对象具体化，奠定了从被动“找人”到主动“算人”的精准治理基础。

在精准统战的基础上，社会网络的权力分布不再完全依循科层传递，处于关键节点的行动者促进了政治识别机制的运作。网络意见领袖影响了舆论演化^[25]，掌控着圈层的话语分发权与议程设置权。政治识别机制分析个体在网络空间的内容生产力、粉丝连接度与情感号召力，挖掘出具有实质影响但尚未引起统战部门高度重视的精英。这种运作方式通过算法筛选将流量节点变成统战支点，扩展了统一战线的涵盖范围。比如，湖南省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施了

“一村一品一主播”工程，并未局限于传统的新阶层代表，而是利用政治识别机制精准培育了 5 万余名乡村带货达人。这些分散在乡间的网络主播通过直播带货助农销售突破 22 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政治识别机制通过分析行为数据，辨识并吸纳自由职业者及网络意见领袖等新兴群体，将非集中的网络流量转化为有组织的统战增量。

政治识别机制寻求高效能，同时内置了风险规避程序，以技术与制度的叠合来防范数据滥用引发隐私伦理破坏。数字社群是个体与社会相连接的新型共同体^[26]，其权力结构、互动模式和情绪渲染处于变动之中。政治识别机制为控制此类信任变化风险，确立知情同意与数据最小化的原则，在算法介入政治识别的过程中向统战对象赋予数据主权，要求在涉及敏感数据调取时进行身份验证及授权许可，确保数据利用的合法性与透明度。河北数字工商联平台要求，企业法人登录平台认证授权后，方可借助平台调用企业数据以及实现一键测额，这种授权与响应消解了统战对象对于隐私泄露的防御心理。另外，政治识别机制具备宏观风险监测功能。四川省首创民营经济税电指数，通过对涉税市场主体与用电数据的分析监测了经济运行态势，既避免了对企业的过度窥探，又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精准的风险预警。这确保了政治识别的合法性，弥合了技术理性与政治伦理的张力。

（二）话语转换机制：情感激发与官方引导

话语权反映现实利益格局^[27]，话语转换机制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表达的转换来分配受众注意力，消解其对政治宣传的刻板印象，强化政治话语的亲切感与解释力。在算法主导的信息流中，枯燥生硬的政治说教容易被受众忽视，经过转换的话语才能融入受众心智。话语转换意味着将政治概念与方针政策转换成具体化、生活化的日常表达，这并非对政治原则的悖弃，而是探寻政治与生活的契合点，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国家政治建设 with 统战对象发展相关联，透过个人叙事得以洞见制度优势。天津市创设“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知行分享汇系列活动，划分出“代表人士谈”与“党派青年说”等板块，其中“代表人士谈”活动由 7 位代表人士分享“从奋楫者到同行者”的蜕变故事，以此将政党制度完善具象化为个体可感的成长历程。通过这种转换，统战话语消除了认知壁垒并增强了其在数字空间的可传播性，于受众心理层面激起了情感认同，提升了主流价值在不同代际与群体中的穿透力。

不同社会群体在数字空间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圈层，拥有独特的语言符号、价值取向与情感倾向，话语转换正是针对特定群体进行的情感共鸣设计。统一战线的情感工作可分成情感的唤起与动员、浸润与维系、建设与发展三个阶段^[28]，统战对象在话语转换中窥得自身，感受到被理解与被尊重。算法社会的话语转换要求统战工作摒弃千人一面的通稿模式，转向精准的话语传播策略。例如，对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侧重于理性思辨凸显与家国情怀激发；对新一代互联网网民，则运用青年亚文化符号在轻松幽默的话语互动中传递正向价值；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则聚焦于政策解读、营商环境优化与社会责任担当等经济议题话语。浙江省余杭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从辖区内大量电商从业者与互联网创业者的思考角度出发，提炼出“互联网碰上创业”的话语主题，邀请专业人士分享“从线上买家到淘宝卖家，从电商创业者到资源链接者”的实践历程。这种话语转换及体验分享策略将统战工作嵌入到行业发展，政治引导与职业成长藉此实现融合。

话语转换机制扩大了传播广度,采用官方议程设定与多元助力共创的协同模式,以防话语转换在去中心化传播中出现舆论偏误及失控的风险。话语引导功能由立场表达功能衍生而来^[29],统战部门掌握议程设置及立场呈现的主动权,搭建权威平台与拟定核心议题,引导网络意见领袖在既定政治话语体系内进行个性化表达,从而实现话语传播的热点爆发与安全稳定相统一。北京市开展“同心之旅·复兴有我”主题活动,通过线下走访与线上发声的双重形式,融合了网络平台、信息化技术与代表人士队伍,即带领党外人士、网络大V和媒体记者走进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场景,并在官方设定的“复兴有我”议程框架下引导网络大V们利用其网络语言风格及影响力进行内容生产。这种运作方式借助网络流量优势创造了2.4亿次的话题阅读量,并以实地走访的物理在场与主流媒体的协同背书确保了话语产出的政治方向不发生偏离,规避了网络舆论的随机性风险,保障了统一战线声音在舆论场中的定力与主导权。

(三) 网络构建机制:协同联动与虚实嵌合

网络构建机制突破了分散治理的局限,建立集约化的数字统战平台体系,实现对统战资源的高效整合及调度。该机制的运行由点状分布向云端集成演进,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整合了民宗、侨务及工商联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构造全天候的数字统战服务综合体。网络空间是准公共领域^[30],数字统战在网络空间建立属于自身的阵地,形成综合性统战平台。江苏省实施数字统战建设发展规划,以江苏统一战线大数据云平台为牵引,并未重复建设孤立系统,而是统筹集成了“侨e家”“苏商e家”“智慧社院”等网络服务平台。这种机制运作以数据的互联互通打破了传统统战工作的条块分割阻碍,使统战部门在聚合性终端上协同指挥多领域工作,造就了纵横贯通的统战数字化管理体系,化解了数字化转型常见的信息孤岛风险,数字统战网络得以在扩展过程中保持安全。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生态中,网络构建机制通过联盟策略将统战工作拓宽至市场与社会。其通过跨界协同与功能嵌入,在虚拟及现实的社会网络中注入统战元素,构建开放的统战生态。统战对象并不局限于体制内,而是转移到更多体制外领域^[31]。上海市成立企业海外合作联盟,形塑了侨办、侨联与工商联的横向协作机制,发布联盟伙伴名单及涵盖首站咨询、资源对接与项目落地等六类13项公益服务清单。依靠这种实体与非实体融合的网络构建,统战部门将政治宣导融入“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赋能链条,促成了海外华商通过投资科创基金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网络构建机制以利益契合点的嵌入,化解了统战工作被边缘化以及受限于国内场域的风险,实现了政治与社会、市场的联动。

网络构建机制实现了线上线下事务办理的虚实嵌合,通过服务交付来规避数字形式主义风险,确保技术运用转化成稳固的政治信任。这一机制的运转逻辑在于建立全流程的管理系统,防止统战工作止步于线上浅层互动。人在网络中拥有特别的行为画像^[32],统战部门结合数字统战平台的诉求办理来推动统战工作实现整体智治。重庆市打造“巴渝同心”数字统战综合服务体,设置了议政建言、民企直通、学习知政与参学服务等模块,其中在线收集民营企业诉求达16445件,成功办结15933件,办结率极高。这将数字平台的便捷性与线下服务的实效性紧密结合,满足了合理诉求,强化了各方主体的政治认同,防止数字统战沦为“面子工程”,保证了网络构建机制的运行服务于实际问题解决,从而在虚拟与现实的需求衔接中筑牢了统一战线。

（四）叙事生产机制：沉浸体验与共创参与

叙事生产机制的运作超越了传统文本逻辑支撑的单向宣教，转向多媒介融合的沉浸式传播。数字化情境催生了数智叙事的新场景^[33]，其叙事生产机制凭借新型媒介技术将统战理念附着于可视、可听及可感的文化产品，打造具有沉浸感的叙事体验。湖北省搭建统战文化博览汇平台，设计实施了5个系列与10个主体项目，举办统战故事视听荟，创作展演百余个节目，实现了统战工作的可视可听；创办统战文化创意作品展，让传统非遗与现代科技交融。这筛选出了具有历史底蕴与文化意蕴的叙事素材，以数字技术手段助益政治内容阐释，并兼备视觉冲击追求与政治严肃性呈现，在算法推荐的娱乐化趋势下构筑起政治价值防线。政治叙事由此蕴含于文化体验，受众在身临其境的数字化审美体验中接受主流政治价值熏陶。

政治价值共识不能仅靠单向灌输，而应激发统战对象的主体性。叙事生产机制确立了用户共创的主体地位，将统战对象从被动受众转变为叙事生产者。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更是内容生产的参与主体^[34]。叙事生产机制通过设置开放性议题，激发统战对象的参与热情，利用算法的分发机制放大优质内容，形成官方引导和民间参与的舆论声场。江苏省“新善中国，共建美好生活”主题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200多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及40个公益品牌项目主动参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具身化的视角和语言讲述公益故事，相关话题在百余家媒体的报道下产生了超12.4亿次的总影响力。这种公益与统战的共创模式，让统战对象在行动中自我教育及自我表达，增强了叙事的说服力。统战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以议程设置引领共创方向。

政治共识的持续性凝聚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叙事生产机制的运作坚守了长周期叙事。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统战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坚持统一战线^[35]，旨在构建价值坐标系与唤醒历史记忆，防止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叙事生产机制通过实施系统性的筑基工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价值内化为青少年的精神基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在信仰上实现兵团学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课程全覆盖，在情感上通过“兵地融情”与“祖国情、中华行”等活动组织近3000名学生赴疆外研学，在语言上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在文化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多维立体化的叙事生产运作，在物理空间方面促进了交流，更在精神空间层面通过文化浸润与情感培养夯实了不可动摇的认同基础，确保在算法构建的瞬时性信息流中依然积淀下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根本共识。

四、算法社会中数字统战的伦理规范

算法技术为统战工作提供了精准化与智能化的治理工具，但其工具理性若缺乏价值规制，则可能引发技术异化乃至消解政治整合的合法性根基。数字统战的建构，不仅关涉技术效能发挥，更在于坚守以人为本的伦理立场。这要求统战主体审视算法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张力，在数据利用中划定隐私保护红线，并通过人为干预与纠偏机制确保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公正性不被技术使用所遮蔽。与此同时，要推动技术联接从形式上的在线互动向实质性的政治认同深化，构建集隐私保护、偏误矫正与实质认同于一体的伦理规范体系，实现技术与政治伦理的嵌合，维系数字统战

的生命力。

（一）确立数据利用的隐私边界

数字统战工作的要义是争取人心，而信任是建立政治联盟的前提，这要求确立知情同意的数据使用原则。在算法介入统战工作的过程中，海量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提升了识别与动员的精准度，但若缺乏清晰的权利边界，则易触碰个人隐私红线而诱发信任危机。信息获取在传统统战工作中一般是经由当面的信任交付或组织间的档案调取，具有明确的场景与边界。而在数字生态下，算法记录了个人行为痕迹，不对称的信息统计易让统战对象产生被凝视的不适感。对此，数字统战应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通过构建数据采集的授权机制将数据主权赋予统战对象，明确向其告知数据使用的目的、范围与方式。通过保障统战对象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促进其主体性和参与意愿的释放，使其感受到在数字空间中被尊重与被信任，从而主动配合政治识别与互动；通过确立平等的数字契约关系，避免因技术理性僭越而引起逆反情绪与政治疏离，防止为了追求数据全面性而牺牲人的尊严感。只有统战对象感受到隐私边界受到严密保护，政治识别机制才能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输入，从而保障数字统战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

依靠道德约束或事后追责已不足以应对数据安全挑战，应将隐私保护理念嵌入数字统战的技术架构设置。隐私增强技术不只是信息安全的加密工具，更是规范政治实践的基本要素。在统战大数据的处理流程上，应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仅采集实现统战工作目标所必需的最少数据量，不可过度挖掘及使用无关信息。引入差分隐私、同态加密与多方安全计算等前沿技术，实现群体特征分析、趋势研判与精准画像，同时免于直接暴露个体身份，达成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效果。对于涉及党外代表人士的重要数据，实施物理隔离与分级授权管理。通过这种技术规制，促进数据要素在数字统战系统内安全流动，确保统战部门把握社会结构与群体心态；通过在算法模型训练阶段剔除敏感特征值，避免对个体微观隐私的过度收集，降低数据泄露风险。对人的尊重被转化为技术默认设置，向社会传递出统战部门严守法治与尊重人权的积极形象。数字统战平台非但是数据处理中心，更应成为建立政治信任的枢纽，进而确保数字统战的运行机制根植于政治安全环境。

算法权力的隐蔽性和黑箱特征易引起公众疑虑，削弱数字统战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公开透明与规范可信的数据治理，成为增强数字统战公信力及号召力的必要条件。为了消解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应清晰界定统战部门、统战对象与技术服务商在数据生态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透明度建设要求统战部门对算法推荐机制、画像标签体系以及数据流转路径进行必要的解释与披露，强调逻辑可解释性与流程可见性。通过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与监督体系，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数字统战项目进行常态化监测，促进技术应用符合法治与伦理规范，强化统战对象的数字统战参与信心；通过畅通申诉与救济渠道，确保统战对象在认为算法出现偏差时能寻得反馈途径，避免因算法黑箱引致其误解与猜疑，防止技术隔阂异化为政治背离。这种制度化安排旨在将技术信任变成政治信任，使数字时代的统战感召力建立在规则公平与程序正义的基础之上。

（二）矫正算法决策的社会偏误

统战工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而算法模型的训练数据可能潜藏社会既有偏见，因而实施算法

公平性审计不仅是技术纠错手段，更是维护统一战线广泛性与包容性的政治举措。历史数据往往反映了主流群体的特征，算法模型在处理边缘群体与非主流意见时易产生歧视性输出，这种技术偏失若不加以政治干预，则可能引致数字统战在追求高效能的过程中忽略部分群体。统战部门应建立符合统一战线价值导向的公平性指标体系，评估算法决策是否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算法输入、处理与输出环节的全方位伦理检验，及时发现并矫正技术排斥现象。通过主动的算法纠偏机制构建，促进统一战线资源在不同阶层及群体间合理配置，确保在数据表现上处于劣势但具有统战价值的群体能够被算法系统辨识与吸纳；通过人为赋予少数群体及冷门领域代表人士以合理的算法权重，避免技术理性触发的马太效应与圈层固化，防止数字鸿沟演变为难以消解的政治矛盾。

数据的代表性直接影响了算法决策的公正性与政治吸纳的有效性，践行纳入多元视角的数据实践旨在跳出数据盲区，确保数字统战的决策如实反映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在当前的流量生态中，不同群体的发声能力与活跃度存在差异，沉默的大多数容易被算法所遗忘，而极端声音与高流量群体则享有数据优势，若统战工作仅依据这些数据进行决策，易导致对社会真实生态的误判以及遗漏部分统战对象。数字统战的数据实践不能停滞于被动数据抓取，而应主动将视野投向数字弱势群体，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研方式填补数据盲点，确保偏远地区群众与传统行业从业者等群体的生存现状及利益诉求得到关注。要通过奠定强包容性的数据基础，促进社会各界人士的理念与诉求在数字空间中平等呈现，使算法更为全面地理解社会的多样性；通过在算法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引入专家学者、人民团体与各民主党派等不同群体的具体意见，避免因样本偏差造成“政治失语”。

在追求智能化治理的进程中保留人机协同的决策空间，须警惕算法万能论的倾向，确保人的政治判断力对技术计算力的统摄。统战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关乎情感交流与价值权衡，这种充满柔性 with 艺术性的领域实践是算法难以完全量化与替代的。纵使算法提供数据参考、趋势预测与方案初筛，但最终的政治决断、人事安排以及沟通互动必须由具备政治智慧的统战干部来完成。数字统战应建立人机协同的作业模式，在算法输出结果后引入人工复核与干预机制。通过确立人在算法治理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促进统战干部保持主体性与敏锐性，运用自身的经验和直觉对算法结论进行审视与修正；通过灵活应对算法无法处理的例外情况，规避因程序僵化引起的治理失灵，谨防算法依赖症造成统战工作能力退化，保持干部队伍直接联系群众与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确保数字统战技术服务于巩固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

（三）深化技术联接的实质认同

数字统战的目标并非实现流量数据的良好反映，而是技术联接下的政治认同，这就需要建立价值评估体系以防止统战工作陷入数字形式主义困境。当前的算法评价多考量点击量、转发率与停留时长等行为指标，这些指标反映用户的注意力分配，却难以衡量其内心深处的信仰与立场。个体可能频繁浏览统战资讯，但这并不等同于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真正接纳。若依赖此类流量指标，易引致统战工作目标置换，即为了迎合算法推荐而舍弃政治内容的导向性。数字统战应构建政治认同指数体系，引入情感分析、语义理解与长周期行为追踪等方法，从海量互动数据中提炼出反映统战对象真实态度倾向的指标。通过区分浅表的围观凑热闹与深刻的价值共识，促进统战

部门精准把握社会共识，据此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通过将线上言论到线下行动的转化率纳入评估范畴，避免陷入唯流量论的治理陷阱，确保数字统战的资源投入转化为实际的人心凝聚效能。

算法推荐提升了信息分发效率，但带来信息茧房与回音壁效应，须构建促进跨圈层理解的对话场景以实现求同存异。在同质化算法的助推下，不同社会群体处于符合其既有认知的封闭信息环境中，这不仅加剧了群体之间的认知隔阂与情感极化，更使得统一战线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努力受阻。为化解这一效能困境，数字统战不能被动顺从算法的隔绝式控制逻辑，而应主动设计具有公共协商功能的数字平台与规则。统战工作者应借助算法匹配机制的反向应用，向特定群体适度推送具有异质性且富有建设性的观点，激发其认知反思与视野拓展。通过精心设计的对话仪式与议程设置，促进不同阶层及界别的代表人士在理性的交锋与碰撞中寻求利益交集点，培育和而不同的网络政治文化；通过技术联接手段过滤极端情绪化的宣泄并放大理性包容的声音，避免社会矛盾在封闭圈层内发酵与激化，防范技术联接异化为政治冲突，确保数字统战发挥化解矛盾与凝聚共识的社会治理效能。

纵然技术联接助益高频次互动，但虚拟交往缺乏真实体验，须以线上线下融合的社群生态培育深化实质认同。数字统战若只局限于虚拟空间的键对键交流，其形成的连接关系则脆弱且易逝，难以承载统一战线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所需的动员韧性。深化实质认同应致力于将线上的流量优势转化为线下的组织优势，构建虚实互补的统战共同体。社群生态的培育注重以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兴趣旨趣为核心，通过线上的内容运营与话题讨论维持社群的粘性与活跃度，并定期组织线下的考察调研、联谊座谈与社会服务活动，让统战成员在真实的在场交往中增进了解及建立深厚友谊。这种融合生态的形塑，能够促进情感与价值在虚实两个空间内协同发挥作用，使线上的便捷交流为线下的聚合提供广泛的动员基础，而线下的深度体验又反过来强化线上的认同归属；也有利于打造兼具数字灵动性与现实稳定性的组织形态，避免数字统战沦为空泛工作。

五、结语

社会连接方式由地缘业缘的实体聚集向数据算法的虚拟链接演变，导致以组织吸纳和物理在场为核心的统战范式遭遇了适应性挑战，迫切需要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化治理范式跨越。这并非浮于技术应用，而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本文剖析了数字统战从政策宣导向情感治理的范式转型，揭示了其在政治识别、话语转换、网络构建与叙事生产四重维度的运作机制，并确立了隐私保护、偏误矫正与认同深化的伦理坐标。数字统战通过算法算力重塑了政治识别与动员路径，实现了从指令传导向情感治理的跨越，破解了传统统战在去组织化网络游离群体触达上的困境。在此过程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统战工作，必须立足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整体智治，将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与算法治理的技术优势深度融合。这意味着数字统战不仅是工具性的算法赋能，更是制度性的算法治理，在无序流量中构建起政治秩序。这种立足于本土实践的数字统战，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全球数字时代的政治整合与社会团结贡献了中国方案。

尽管本文对算法社会数字统战的转型逻辑、运行机制与伦理规范进行了理论勾勒与实证探究，但尚存局限性。一方面，算法技术迅速迭代，诸如本文还未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对统战工作主体性、交互性及意义生产的冲击等进行着重探讨。另一方面，实证案例涵盖了京、渝、

浙等多地典型实践,但受限于数据获取的私密性与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数字统战在其他地区及特定亚文化圈层的微观运作效能仍待深入检验。展望未来,数字统战的研究可关注以下方向:一是探索算法问责与算法透明在统战领域的本土化落地,通过制度化安排将技术信任转化为政治信任;二是进一步研究虚实嵌合的社区生态,探索如何将线上流量优势转化为线下组织韧性;三是强化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引入计算社会学与精神政治学等学科,对统战对象的政治认同进行监测与量化评估。总之,数字统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在主动驾驭算法与坚守政治伦理的平衡中持续探索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43.
- [3] 张学见,郭振宽,李俊. 新质生产力赋能统一战线整合社会空间的逻辑探析[J]. 学习与探索,2025(10):107-113.
- [4] 侯恩宾. 新时代统一战线中情感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优化路径[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5(4):151-161,166.
- [5] 郭振雪. 新时代中国网络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和构建机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190-194.
- [6] 张卫,后梦婷,张春龙.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行为特征及统战工作方式研究[J]. 江海学刊,2019(2):125-131.
- [7] 徐旂瑶,朱仁显. 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机制研究——以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为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25-29.
- [8] 孙冲亚,何祥林.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统一战线:功能、挑战及其进路[J]. 理论月刊,2021(7):51-58.
- [9] 韩万渠,韩一,柴琳琳. 算法权力及其适应性协同规制:基于信息支配权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22(1):33-39.
- [10] 刘建,吴理财. 算法治理的黑箱及规制:基于治理界面的视角[J]. 学习与实践,2025(11):34-45.
- [11] 钱英伟,石新宇. 网络舆情视域下的高校统战工作探赜[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7):82-85.
- [12] 王建国,李济时. 新时代的网络统战:挑战、策略和方法[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5):68-73.
- [13] 田浩. 团结“亲密公众”:智能算法与数字生活秩序重建[J]. 新闻界,2025(5):25-34.
- [14] 朱萌,张权,赵璐.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主流意识形态嵌入算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2025(5):40-46.
- [15] 曹伟,黄天柱. 团结与民主相统一——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政治学研究,2025(5):110-122,220.
- [16] 束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大团结与大联合:大统战格局的目标指向与实现机制[J]. 南京社会科学,2024(11):1-11.
- [17] 陈晓莉. 统一战线何以服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实践的观察与思考[J]. 理论学刊,2022

- (2): 112-119.
- [18] 林毅, 郑宜帆.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实践探索[J]. 理论视野, 2025(10): 83-89.
- [19] 陶冶, 唐超. 算法操纵下的认知对立: 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J]. 情报杂志, 2025(8): 94-100.
- [20] 蒋婷婷. 论网络空间精神交往的实践样态、价值困境与有效引导[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5): 78-87.
- [21]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68-76.
- [22] 唐磊, 刘莉丹, 张彰. 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述评[J]. 国外理论动态, 2025(4): 14-23.
- [23] 王意, 曹诗权. 算法行政的应用场景、层次嵌套与规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5(6): 120-128.
- [24] 周鹏, 张佶, 刘奔跃. 人智交互视角下多模态全息知识画像架构模型研究[J/OL]. 情报资料工作, 1-17 [2026-02-13]. <https://link.cnki.net/urlid/11.1448.G3.20251217.1210.002>.
- [25] 刘鸣箐, 张菀芮, 王佳欣. 网络意见领袖在公共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探析[J]. 传媒, 2025(21): 20-23.
- [26] 王卓, 刘小莞. 数字社群: 信息社会新型群己关系与演化逻辑[J]. 社会科学研究, 2025(5): 128-138.
- [27] 丁俊萍, 颜苗苗.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3): 1-14, 181.
- [28] 刘静, 刘嘉祺. 统一战线发挥情感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J]. 新视野, 2021(6): 55-61.
- [29] 刘承峰, 王越. 从立场表达到话语引导: 反馈形式的互动功能[J]. 当代修辞学, 2025(4): 13-24.
- [30] 张改凤, 林伯海. 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空间的整合功能及路径探微[J]. 广西社会科学, 2015(10): 142-146.
- [31] 艾明江. 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和完善[J]. 理论视野, 2025(1): 40-46.
- [32] 郝雨, 盖嘉慧. “新质网络社群”: 网络空间通往现实共同体的媒介机制[J]. 传媒观察, 2025(7): 88-97.
- [33] 张云中, 冯晓. 数字叙事与数据叙事: 缘起、差异与交融[J/OL]. 图书情报工作, 1-16 [2026-02-13]. <https://link.cnki.net/urlid/11.1541.G2.20251230.1801.002>.
- [34] 解学芳, 贾东窃. AIGC时代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演进逻辑和跃迁路径[J]. 东南学术, 2025(6): 74-87.
- [35] 孙信. 统一战线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J]. 东岳论丛, 2023(2): 145-151.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杨稀琴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创新与实践启示——基于《太平年》热播的分析

胡莞齐 冯熙茹 杜俊华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受意识形态激烈斗争、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受众群体代际更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吸收传统的历史观教育叙事经验,在叙事目标、内容、方式和媒介上进行了多维转向。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太平年》通过“双线互文+虚实结合”的内容呈现、“去脸谱化+群像赋能”的人物塑造、“以小见大+古今共振”的主题表达以及“新媒体赋能+双向互动”的叙事传播,创新了历史叙事的理念与模式,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太平年》的成功实践表明,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聚焦价值引领的核心使命、深化大众传播的实践路径、构建多元协同的教育生态,以持续增强教育叙事的感染力、传播力和实效性,引导广大受众自觉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 中华民族历史观; 历史观教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太平年》; 大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179-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14

作者简介: 胡莞齐,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冯熙茹,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杜俊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

基金项目: 重庆市英才·名师名家项目“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及新时代弘扬研究”(2022YC027)

引用格式: 胡莞齐,冯熙茹,杜俊华.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创新与实践启示——基于《太平年》热播的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179-191.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1]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形成脉络、发展历程与演进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核心旨向在于科学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之举,也是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必由之路。然而,随着多元文化思潮的交织激荡和信息传播业态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叙事范式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1644史观”“新清史”“内亚史观”等错误史观时常沉渣泛起,割裂因果、以偏概全的碎片化解读消解历史事实的整体性,单向度灌输的叙事方式引发受众的情感隔阂,传统信息传播媒介与当代青年群体轻量化接收、个性化体验、情感化共鸣的认知特点存在明显错位。在此背景下,探索更加契合时代发展潮流、贴合受众接受习惯的叙事新范式,推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更加吸引人、打动人、说服人的方式触达社会大众,已然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亟待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

当前,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在理论建构上,学界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应以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2]为根本遵循,通过深度阐释“五个共同”“五个认同”“四个与共”的内涵要义,系统推进历史认知教育、历史情感教育和历史自信教育^[3],建构起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效度的教育理论框架。在价值指向上,相关研究重点分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时代价值,明确了其在抵御各种错误史观^[4]、厚植历史文化自信^[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在实践路径上,学者们结合时代发展特征,提出了丰富历史呈现的载体形式^[7]、推动教育内容融入课程体系建设^[8]、构建主体的情感联结机制^[9]以及强化人工智能在教育过程中的融合运用^[10]等众多创新见解。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为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奠定了重要学理基础,但现有成果多偏重于宏观阐释与整体论述,缺乏对支撑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具体载体形式的深层次学理解析,未能充分阐述具体载体赋能教育实践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从理论探讨向实践落地的有效转化。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载体类型丰富多样,其中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深远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文化载体,是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大众化、具象化的重要形式。“影视文化作为人类所有文化样式中传播力最广泛、最丰富、最有效的形式之一”^[11],凭借生动的视听语言、具象的历史场景以及富有共情力的情感诉说,能够将抽象化的历史概念、宏大化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阅读的影像文本,引导观众在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中感知历史温度、触摸文明脉络。近期,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太平年》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掀起现象级播放热潮,成为一个超级影视IP。该剧以大历史观重构影视剧作中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它不局限于某一朝代、某一地域的局部叙事,而是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紧扣天下太平、民心为上的主题,突出表现了统一是大势所趋、太平是人心所向这一主基调,展现出深厚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12]。基于此,本文以《太平年》为研究切入点,探析其如何通过视角突破、人物刻画、价

值联结,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变得可感可触,进而提炼其在内容创作、主题表达、传播模式、育人生态等方面的实践启示,以期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二、范式嬗变：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转向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始终将其置于事关党和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受众群体的代际更迭,传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叙事范式已难以完全适应时代变化的需求,亟须实现叙事范式的转向。这种转向并非对传统范式的割裂与否定,而是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对叙事目标、内容、方式和媒介进行调整与优化,进一步增强历史观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

（一）目标转向：从“知识传播”到“价值认同”

传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强调历史知识的传播,侧重向受众讲述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关键节点,主要引导受众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是什么”,而对历史知识背后的价值内涵挖掘和民族认同培育有所忽视,导致教育陷入“重知识、轻价值”“重传播、轻认同”的困境。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目标,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实现了从“知识传递”向“价值认同”的升华,核心是引导受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形成”“中华民族未来走向何处”,着重培育受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1] 256}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目标转向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不能简单拘泥于历史知识的普及,而要聚焦“五个共同”的核心内涵,通过叙事传递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逻辑、团结奋进的精神基因以及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促使受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培根铸魂,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3],自觉践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价值认同”的叙事目标,凸显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价值属性,实现了“知、情、意、行”^[14]的有机统一,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真正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

（二）内容转向：从“宏大叙事”到“宏微融合”

传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在叙事内容上多关注宏大叙事,对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的历史图景等微观视角重视不足。这种叙事偏向导致受众难以找到历史共情点,无法与教育内容形成深度的情感联结,甚至出现“历史疏离感”。新时代以来,受众的认知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不再满足于概括性的历史结论与宏大化的叙事视野,更着眼于对历史发展大势下的个体命运、市井百态、人情冷暖的解读,以真切感知历史的温度与厚度。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在叙事内容上逐步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向“宏微融合”的拓展,既坚守宏大叙事的核心地位,又注重微观视角的丰富与补充,使宏大历史与微观细节相互映衬。

宏大叙事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核心骨架，发挥着传递历史规律、彰显民族精神、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坚持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宏大叙事主线，深入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国家统一的历史、抵御外侮的历史，彰显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15]。同时，融入更多微观元素，聚焦百姓民众在历史洪流中的生存状态、价值追求和行为选择，通过个体的命运变迁折射宏大历史的发展脉络，让疏远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烟火”。“宏微融合”的叙事内容，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化、抽象化，又弥补了微观视角的碎片化、片面化，“散发出微观史与大历史结合的迷人魅力”^[16]，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更具亲和力，有效纾解了传统历史观教育“曲高和寡”的困境。

（三）方式转向：从“单向输入”到“双向互动”

传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倾向单向度的知识输入，采用“我说你听”“我讲你记”的方式，叙事主体处于相对主导地位，受众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疏于情感交流与双向互动，致使教育内容难以实现认知层面的深度内化和情感层面的真实认同。但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和受众主体意识的强化，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历史知识的旁观者，而是主动建构历史认知、涵养历史情感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基于这一条件的变化，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方式需要实现从“单向输入”向“双向互动”的转变，更加重视叙事的情感性和互动性。

一方面，加强情感共鸣的培育，深入挖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蕴含的情感内涵，填补传统叙事“重理性、轻情感”的不足，通过情感叙事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让受众在情感体验中理解历史、认同历史。“情感、认知和行为是人类在形成共情过程中经历的三个层系”^[17]，只有让受众在情感上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才能在思想上树立、行动上践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另一方面，畅通双向互动的渠道，借助媒介技术搭建多元化互动场域，引导受众置身历史议题的讨论、历史文本的解读、历史价值的传播，让受众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例如，媒体平台通过发布历史话题、历史问答等内容，鼓励受众参与讨论、分享观点，形成“人人都是历史参与者”“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18]的良好氛围；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让受众身临其境式地体验历史。“双向互动”的叙事方式，不仅显著激发了受众的参与意愿，更让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互动与对话中得到深化传播，织就了“传播—接受—认同—传播”的循环网络。

（四）媒介转向：从“单一媒介”到“多媒融合”

传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主要依托书籍、报刊、课堂教学、博物馆展览等传统媒介。这些媒介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特点，但存在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有限、表现形式单一等局限，难以完全适配新时代信息的传播规律和受众的认知需求。伴随多元媒介形态的迭代升级与深度融合，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在叙事媒介上实现了从“单一媒介”向“多媒融合”的转向，依托媒介互补优势，搭建起“传统媒介+新媒体”的传播体系。

新媒体已跃升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叙事的重点传播载体，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

广、交互性强、表现形式多样，为推动历史观教育创新性发展注入了强劲势能。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视频平台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短视频、纪录片、历史剧、直播、图文推送等多种形式，传播中华民族历史知识、弘扬民族精神，促进了历史叙事的大众化传播和时代化表达。同时，传统媒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叙事样态不断创新，与新媒体相互补充、相互赋能^[19]。例如，博物馆通过引入VR、A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展览，让历史文物“活”起来，打破展览的时空限制；书籍、报刊等传统出版物通过图文结合、短视频配套等形式，丰富内容叙事的呈现形态，提升内容的可读性；课堂讲授通过引入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方式，结合新媒体资源，克服传统课堂的枯燥性。“多媒融合”的叙事媒介，打造了“线上+线下”“传统+现代”的立体化传播格局，既兼顾了权威性与严肃性，又增添了趣味性与互动性，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受众，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时代性和传播力。

三、《太平年》的叙事创新： 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生动范本

作为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典范，《太平年》在大历史观视域下，聚焦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这一段“冷门历史”，以“纳土归宋”为核心线索，跳出传统历史剧的权谋战争套路，凭借扎实的考据和价值表达，深度展现了这段政权更迭频繁却蕴含文明韧性的时期^[20]。《太平年》立足中华民族对“天下太平”“中华一统”矢志不渝的守望，在内容呈现、人物塑造、主题表达以及叙事传播等多维度实现了叙事创新，将历史教育与历史叙事有机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生动范本，展现了当代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思想高度与艺术担当。

（一）内容呈现：双线互文+虚实结合，构建历史观教育的叙事图景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清晰、全面地呈现历史语境，避免历史叙事的碎片化和片面化。五代十国素有“散装的历史”之称，数十年间政权更迭此起彼伏，人物关系盘根错节，因叙事难度大、大众认知基础薄弱而长期游离于影视创作的主流视野之外。《太平年》恰将创作背景置于这一时期的风云变幻之中，以“双线互文”的叙事结构和“虚实结合”创作原则，构筑起兼具历史厚度和艺术美感的内容体系，为历史观教育提供了全景式的叙事图景。

一是“双线互文”的叙事结构，完整勾勒乱世景象与民族走向。《太平年》采用南北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规避了单一叙事挂一漏万的不足，成功构建起“乱”与“治”这样一个互为镜像、对立共生的二元叙事场景。北方线聚焦于中原政权的更迭乱象，从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起笔，历经契丹入寇、后晋覆灭、后汉短祚、后周中兴，直至赵匡胤建宋。在这期间，中原大地陷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权力怪圈，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短暂和虚幻，民生凋敝、饿殍遍野，令无数网友不禁感叹“太窒息了”。南方线则着眼于吴越国的治国实践，描绘了吴越国历代君王在皇权崩解、天下纷争的乱世中，坚守“保境安民、善事中原”的治国理念，兴水利、促海运、整吏治，使百姓安居乐业、商业繁荣发达，同时不回避其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博弈，避免将吴越国简单塑造成乱世“净土”。这两条线索的推进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以钱弘俶的汴梁之行为纽带连通两个叙事空间。“北方的惨状映照出吴越承平的意义，吴越的秩序又反衬出北方失序的代价”^[21]，使观众在强烈的时空对照中深刻理解战争与分裂的苦难、和平与统一的可贵，以及这一历史时期虽处乱世，但其内在的文明整合力量和秩序重建逻辑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

二是“虚实结合”的创作原则，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要寻找“史学的求真意志”与“艺术的审美自由”之间的最大公约数^[22]。《太平年》坚持以“史实为骨、艺术为肉、价值为魂”^[23]的创作理念，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既不刻意简化历史，也不低估观众审美，在严格遵循历史大框架的基础上，对史书中的“留白”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完成了对历史剧叙事美学的革新。在历史真实性上，剧作对“割让幽云十六州”“陈桥兵变”“纳土归宋”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基本历史脉络，都审慎依据《吴越备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典籍，甚至对越窑青瓷碗上的“钱氏”款识、“叉手礼”的标准姿势等细微之处都进行了考据式还原，让网友们惊叹“服化道走心了，跟古画里一模一样”“就这诏书，编剧不简单”。在艺术表达性上，剧作以艺术想象力和建构力，合理虚构史书记载有限的人物经历、生活场景等，如钱弘俶早年“擅做鱼脍的潇洒王孙”形象、孙太真的民间出身重塑，以及钱弘俶、赵匡胤、郭荣、孙太真四人许下“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的誓言。这些剧情虽无直接的史料来源，但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逻辑，既丰富了叙事内容，又让历史人物更加鲜活。这种“实”为主、“虚”为辅的创作原则，在避免“戏说历史”误导历史观教育的同时，也规避了“史料堆砌”的枯燥感，让观众在沉浸式的叙事体验中，深刻认识到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夹缝”的文明价值，明晰每一段历史都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重要印记，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中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

（二）人物塑造：去脸谱化+群像赋能，强化历史观教育的情感共鸣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离不开情感层面的认同与共情，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情感的最好表达路径。传统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人物塑造往往趋于脸谱化，陷入“忠奸二元对立”的叙事窠臼，既难以引发观众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也不利于传递全面客观的历史面貌。《太平年》坚持“去脸谱化+群像赋能”的人物塑造策略，洞察人性幽微，既刻画核心人物的成长弧光，又塑造丰满的群像格局，以有血有肉的形象传递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注入情感力量。

一是核心人物的去脸谱化，还原历史人物复杂立体的性格。《太平年》对核心人物的塑造，摒弃了“刻板化”“标签化”印象，着力呈现出历史人物在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内心世界与价值抉择。钱弘俶并非天生的“圣贤君主”，而是从擅做鱼脍的闲散王孙，历经汴梁之行的震撼、宫廷内斗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以苍生为念的统治者。他“舍一家一姓之荣，保千万生灵之安”，既内含着对祖宗基业的愧疚，更承载着对万民福祉的坚守，展现了大义与担当。《太平年》对赵匡胤形象的塑造也摆脱“权谋赢家”的惯性认知，刻画了他在乱世中目睹种种不公后形成的济世抱负，突出了他发动兵变、建立北宋以“成卫霍之功”的雄才大略，以及“杯酒释兵权”背后兼顾皇权巩固与百姓安宁的考量。郭荣则被塑造为锐意进取、壮志未酬的英雄豪杰，其整饬吏治、南征北战的努力，为开创太平之世奠定了根基，其遗憾既是个人悲剧，也是乱世中仁人志士的共同无奈。即便是胡进思、冯道等传统认知中的“负面人物”，《太平年》也未将其简单贴上“奸佞”“贰

臣”的标签，而是重点凸显他们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困境与利益权衡。“去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使角色呈现出“反定型化”特征，为观众提供了“替代性镜像”^[24]，有效引导观众消解片面化、绝对化的历史认知偏差，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历史人物，解读其行为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与个人动机，进而树立历史本身具有复杂性、多元性、辩证性的科学认知。

二是群像格局的丰满塑造，彰显历史主体的多元价值。《太平年》在精心雕刻核心人物的同时，还塑造了涵盖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市井百姓在内的多元群像。剧中23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使命任务，每个人物都有自洽的行为逻辑，既不刻意美化，也不简单丑化，让观众看到离乱中不同个体的生存抉择与价值追求。吴越国的文臣武将，坚守“保境安民”的理念，为万民安乐殚精竭虑；中原的仁人志士，在乱世中保守初心，试图重建社会秩序；民间的普通百姓，用坚韧的生命力抵御战乱苦难，向往和平安稳的生活。《太平年》所塑造的每个人物形象都不是孤立的、分散的，他们虽然身份各异、立场不同，但都在乱世中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其命运轨迹与时代变迁深度绑定，共同构成了对太平渴望的众生相^[25]。群像塑造凭借演员演技与气质的统一，借助精准的镜头语言，赋予了每个人物鲜明的身份标识和独特的性格特质，使得观众能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感知历史的多元样貌，并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明演进与历史发展是全民族交融共生、共同奋斗的结果，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在人物、演员与观众三者情感的统一中落地生根。

（三）主题表达：以小见大+古今共振，传递历史观教育的价值理念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旨在引导受众从历史中寻找根脉、凝聚共识，将历史智慧转化为新时代的价值认同与实践追求。《太平年》本质上“是一种‘引导型’创作，目标是激发共同的历史关切”^[26]，其在主题表达上没有空洞论述、强势灌输，转而采用“以小见大”的表达手法和“古今共振”的价值联结，实现“道”的输出，达成了历史观教育思想力与感染力、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有机统一。

一是以小见大，将宏大价值理念落地于微观叙事。《太平年》并未局限于宏大历史事件的表层叙述，而是将叙事重心下沉，聚焦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抉择和情感表达，通过微观的人物、故事和细节，折射出宏大的历史主题与价值理念。剧中以钱弘俶的个人成长轨迹为叙述主线，通过其从“潇洒王孙”到“太平守护者”的蜕变，展现了“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价值追求。“他治下的吴越政权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并非简单地迫于武力威胁，而是基于对统一大势的清醒认知与对百姓安危的深切考量”^[27]，跳出了传统“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叙事，清晰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中“和而不同、顺势而为”的历史逻辑，深刻诠释了桑维翰所说的“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易”的箴言。同时，剧作通过诸多细节传递主题观念。例如，吴越国街市的繁华景象、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理念；钱氏家族的家训传承、大臣的赤诚风骨、百姓的太平祈愿，彰显了中华民族仁爱、勇毅、和平的精神基因。“以小见大”的表达手法，将“和平”“统一”“家国情怀”等具有宏大叙事特质的历史观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人物行动和生活细节，避免了主题表达的空泛化。观众在体悟微观叙事的情感温度基础上，深刻领会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要义，达到“以小

见大、见微知著”的教育效果。

二是古今共振，衔接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太平年》立足当代视角，挖掘历史叙事中的现实关照，引发了观众对历史的深邃思索，让历史观教育更具现实针对性。剧中所传递的“大一统”理念，与当代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共同愿景高度契合。“纳土归宋”的历史壮举，为国家统一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吴越国“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与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异曲同工，钱弘俶“以民为先”的精神底色映射出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人民立场，跨越千年依然具有强烈的时代共鸣。剧中人物于乱世浮沉中渴望太平的价值取向，与当代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反对战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关怀内在契合。此外，剧作通过对地域历史的挖掘，展现了浙江地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使观众在了解地域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古今共振”的价值联结，“实现了‘讲述的历史时代’与‘讲述历史的时代’的双向观照、互为镜鉴”^[28]，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往，而是与当代社会相承接、相适应，促进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跨时空对话中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四）叙事传播：新媒体赋能+双向互动，拓展历史观教育的传播边界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际成效，不仅取决于内容的质量和表达的方式，还依赖于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在新媒体时代，《太平年》精准把握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演进规律，采用“新媒体赋能+双向互动”的叙事传播方式，突破传统历史剧在观众群体上的固有壁垒，拓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传播边界，实现了历史观教育的“破圈”传播。

一是适配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打破时空限制与观众壁垒。《太平年》依托腾讯视频、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新媒体平台，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矩阵，让观众能够随时看、随地学。在腾讯视频，平台设置“太平年·百科”板块，集成人物介绍、剧情解读和历史知识，并支持一键跳转至相关剧集片段，实现了观剧体验与知识学习的无缝衔接。在微博，制片方成立“历史追剧团”，邀请历史类大V带领观众“边看剧、边学史”，发起相关话题讨论，推动剧集剧情和历史知识的传播。在播出首周，《太平年》就已“揽获微博热搜648条、微博剧集热度指数榜TOP1、微指数9000万+”^[29]。在B站、小红书，UP主与博主自发制作五代十国政权更迭时间轴、剧中人物与史实对照表、服饰妆容解析等内容，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解读历史，吸引青年观众参与。在抖音，平台推送剧情片段、主创访谈等短视频内容，以碎片化传播的方式扩大历史观教育的覆盖范围。目前，抖音平台主话题#太平年#的播放总量已突破49.3亿次，并且围绕剧集衍生出大量高互动性话题。新媒体平台的赋能，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摆脱了传统“课堂式”“书本式”的局限，实现了“观剧即学史”的传播效果，吸引了不同年龄层、不同知识背景的观众参与到历史学习中来。正如有网友表示：“感觉在上历史速成班”“看剧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二是构建双向互动的传播格局，深化历史观教育的传播深度。《太平年》的传播不再采用“单向输出”的叙事模式，而是通过多种方式搭建互动桥梁，引导观众主动参与历史探究与讨论，形成“观剧—考据—讨论—分享”的良性循环。《太平年》凭借严谨的史料考据，被观众被誉为“难得一见的历史剧细糠”，充分激发了观众的“解密欲”。不少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主动利用AI工

具查阅相关历史问题，如“张彦泽食人案”“冯道为何历仕多朝”“‘纳土归宋’的政治博弈”“‘留后’是什么官职”等，将观剧行为转化为历史研学行为。弹幕里“暂停查史料去了”的调侃，就是《太平年》所独有的风景线。在社交平台上，观众自发分享历史考据成果、讨论历史人物评价、交流对“太平”“统一”等主题的理解，形成了集体性的历史学习热潮。“《太平年》的‘正确打开方式’，本质上是技术赋能下观众与剧集的新型互动——剧集提供‘可考据的历史肌理’，观众以智能检索为工具完成‘深度解码’，在这种双向奔赴中，历史剧真正实现了从‘娱乐消费品’到‘文化对话载体’的升级。”^[30]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让观众不再是历史观教育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传播者”。这既强化了观众对历史知识的记忆与理解，更深化了其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同与坚守。

四、《太平年》的实践启示： 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发展路向

《太平年》的热播不仅证明了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历史观教育中的重要价值，更以其成功的叙事实践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启示。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民族工作主线，合理借鉴《太平年》的叙事经验，坚持守正创新、聚焦价值引领、深化大众传播、构建多元生态，搭建起一个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叙事体系，切实推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坚持守正创新：筑牢历史史实根基，实现艺术表达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83}“守正”是根基，坚守历史真实就是坚守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唯有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才能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拥有坚实的史实基础。“创新”是关键，打破传统叙事的局限，实现艺术表达的升级，才能让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是要坚守历史真实的根本底线。传递正确的历史认知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而正确历史认知的前提就是历史真实。“历史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静态文本，而是在持续解读与对话中，动态生成集体认同的意义场域。”^[31]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必须以正史史料为依据，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精准呈现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核心特质和精神内涵，不取流量捷径、不减历史厚度，反对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虚无历史的错误行径，警惕“戏说历史”“消费历史”“娱乐化历史”的创作倾向，尤其要注意当下“AI魔改”可能造成的历史认知扭曲，引导受众在真实的历史叙事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的全过程，树立“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32]的基本理念。

二是要推动艺术表达的创新升级。坚守历史史实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叙事表达的刻板化，抽象的历史知识、宏大的历史理念，需要通过生动的艺术表达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的具象化内容。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在核心历史事件和关键历史人物的叙事框架之外，可针对史实缝隙中的细节性内容进行系统性的艺术提炼与加工，包括历史人物性格特质的多维解构、次要人物的功能性设置以及具体对话内容基于历史语境的合理推演等，将教育实践充分转化为可视化的场景呈现、沉

沉浸式的情感体验与深层次的认知互动。通过这些举措,受众不仅能够准确把握既定的历史事实,更能深度体悟历史的感性和历史的个性,强化历史观教育的思想引领力与艺术感染力。

(二) 聚焦价值引领: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抵制西方伪史观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引领行为,其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坚决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伪史观,自觉认同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价值追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坚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必然,即使在政权分裂、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亦未曾中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33]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锚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点挖掘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事实,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1644史观”、“台独”史观等错误思潮,坚定不移筑牢“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二是坚决抵制西方伪史观。“新清史”“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等西方伪史观打着所谓“学术研究”的幌子甚嚣尘上,“无一例外试图将中国说‘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说‘短’,……解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观”^[34]。对此,要坚决抵制西方伪史观的侵袭。一方面,加强对西方伪史观的辨析和批驳,精准揭露其逻辑谬误与思想本质,引导全体中华儿女认清它们对民族历史认同、国家文化根基、社会价值共识所产生的严重危害,自觉抵制“欧风美雨”的渗透蔓延。另一方面,强化正面宣传引导,牢牢掌握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主导权,着力推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内化为受众的行动自觉,同时积极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提升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

(三) 深化大众传播:促进多元媒介融合,打造双向互动模式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太平年》的火热出圈表明,只有深化大众传播创新,促进多元媒介融合,打造双向互动模式,才能“推动主流价值实现由单向灌输到多维互动的范式转变”^[35],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传播影响力。

一是促进多元媒介融合。整合传播资源,深化多元媒介一体化发展,构建立体化的传播矩阵,形成强大的传播合力,是实现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全方位传播、全范围覆盖的必然选择。要高效发挥电视、广播、书籍等传统媒介的权威性优势,推出系列高质量的历史节目、纪实作品、学术读物等优质内容载体。要广泛运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各类新媒体媒介,规模化产出碎片化、可视化、互动化的历史观传播内容产品。要构建线上与线下相联动的传播体系,助推线上传播与线下教育有机结合,常态化开展主题展览、座谈会、宣讲会等实践活动,让历史观教育走出屏幕、走进生活。要健全官方与民间相协同的传播机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传播,打造民间历史科普品牌,促使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全社会广泛传播。

二是打造双向互动模式。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积极调动并充分尊重受众的主体参与意识,

突破单向输出式传播的局限，打造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要利用新媒体搭建互动交流平台，通过话题研讨、知识问答等形式拓展受众参与渠道，号召社会大众发表历史感悟、提出现实关切。要邀请历史学者、文艺工作者等专业人士与受众开展面对面的深度对话和学术交流，精准回应受众困惑，深化受众对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认知、理解与认同。要关注受众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满足受众的教育需求。此外，要特别注重对受众自创内容的引导，鼓励受众创作、分享与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相关的图文视频、话题内容，并做好“二次创作”和“二次传播”。

（四）构建多元生态：凝聚协同育人合力，推动教育常态化开展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单一主体、单一渠道能够完成，需要凝聚政府、媒体、学校、社会等多方力量，构建多元协同的育人生态，推动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开展。

一是明确协同育人的主体职责。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和实施细则，引导各类主体主动参与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践活动。媒体要坚守正确的历史站位和价值导向，打造更多如《太平年》《大秦帝国之崛起》《天下长河》这类兼具思想深度、艺术水准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通过多元化传播路径，传递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学校要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将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式，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的历史认知水平和历史思辨能力。社会各界要主动担当、积极参与，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受众的历史观教育活动，让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浸润于社区治理、企业文化、日常生活，最终形成“政府引导、媒体推动、学校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育人局面。

二是完善教育常态化开展的保障机制。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是长期性的育人工程，绝非短期可竟之功，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保障体系，确保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要强化人才支撑，聚焦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全链条需求，大力培养包括科研人员、文艺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教师队伍在内的具有深厚历史素养、艺术素养与传播素养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推进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提供主体动力。要加强资源保障，通过整合历史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等，建立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资源库，实现各类优质资源高效共享。要深化理论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36]，深入阐释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及旨归，为历史观教育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解读。要健全监督评价机制，构建涵盖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内容、方式、成效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教育工作开展全面评估，精准发现问题、及时优化完善，持续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33]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根本性议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对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守护、共同文化

基因的传承、共同价值追求的凝聚。《太平年》的高热度“破圈”，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叙事创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现实范例，是历史观教育具象化、通俗化探索的成功实践。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不能囿于刻板化的概念阐释、碎片化的事件讲解和单一化的结论输出，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广泛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传播载体与呈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从“理论灌输”向“情感共鸣”转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关键所在^[37]。根本而言，就是要让中华民族历史“活”起来，让历史叙事更具温度、更具感染力、更具传播力，引导全体中华儿女在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刻认知和情感认同中，坚定历史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共同迈向属于中华民族的“太平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58-259.
- [2] 张琳，李少鹏.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价值及路径[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6）：39-48.
- [3] 海路，杨柄.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内涵、价值与实践路径[J]. 民族研究，2022（4）：13-24，139.
- [4] 李林.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价值意蕴[J]. 理论观察，2025（9）：95-100.
- [5] 余文兵，吴连才. 新时代大学生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价值审视与纾困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7-53.
- [6] 马惠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历史观导向及其着力点[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3）：23-27.
- [7] 青觉.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J]. 前线，2022（8）：47-51.
- [8] 朱亚峰.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观教育进路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3）：149-154.
- [9] 张利国，韩祎诺. 青少年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情感逻辑与实践进路[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9.
- [10] 张琳，李会敏.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主要依据、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1）：169-176.
- [11] 王馨莹，黄望莉. 新时代中国影视文化的使命担当[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1）：111-118，201.
-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电视剧《太平年》创作座谈会[EB/OL]. （2026-03-04）[2026-03-06]. https://www.nrta.gov.cn/art/2026/3/4/art_3901_72537.html.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44.
- [14] 管健，杭宁. 知情意行：四维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53-67.
- [15]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J]. 求是，2023（17）：4-11.
- [16] 于帆. 《长安的荔枝》：微观视野与宏大叙事的张力与危机[J]. 电影艺术，2025（5）：96-100.
- [17] 朱鸿军，汪文. 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应用探析[J]. 对外传播，2023（6）：4-7.
- [18] 户华为. 人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关于中国公众史学的对话[N]. 光明日报，2016-04-20（14）.
- [19] 李春丽.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优势互补[J]. 人民论坛，2017（5）：138-139.

- [20] 《太平年》热播：以“纳土归宋”为脉，照见“天下太平”之愿 [EB/OL]. (2026-02-08)
[2026-02-22].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6/02-08/10568248.shtml>.
- [21] 丁莉丽, 崇雪利. 《太平年》：于五代烽烟中谱写和平史诗 [N]. 杭州日报, 2026-02-08 (4).
- [22] 马晓光. 历史真实的边界：影视叙事中史实与艺术的博弈 [EB/OL]. (2025-07-30)
[2026-02-22]. https://wenyi.gmw.cn/2025-07/30/content_38183260.htm.
- [23] 刘淑欣. 三重创新维度下看历史题材剧《太平年》的“破圈”路径 [N]. 中国艺术报, 2026-02-02 (4).
- [24] 许迪. 符号叙事与审美共振：当代影视与文化认同的互动机制 [J]. 文艺评论, 2025 (5): 102-109.
- [25] 《太平年》编剧董哲：每个人物共同构成了对太平渴望的众生相 [EB/OL]. (2026-02-03)
[2026-02-22].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770113132168265.html>.
- [26] 专家谈《太平年》：历史剧的价值在于当代回响 [EB/OL]. (2026-02-05) [2026-02-22].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6/02-05/10566456.shtml>.
- [27] 王钟的. 看过《太平年》，再去读读真实的历史 [N]. 中国青年报, 2026-02-15 (3).
- [28] 尹鸿. 历史情境中的想象与对话——评历史剧《太平年》 [N]. 光明日报, 2026-01-28 (15).
- [29] 《太平年》首周战报！多维数据全面领跑，国内国际热度齐飞 [EB/OL]. (2026-02-01)
[2026-02-22]. https://www.huacemedia.com/about/news_detail/1274.html.
- [30] 高长力. AI时代的剧情考据与互动性观剧新探 [N]. 文艺报, 2026-02-06 (3).
- [31] 董涛. 从《太平年》看历史剧创作生产 [J]. 求是, 2026 (4): 67-69.
-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522.
- [3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7.
- [34] 强世功.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J]. 求是, 2025 (19): 22-26.
- [35] 刘慧. 影视作品对史料素材的时代化转译 [J]. 传媒, 2025 (23): 29-31.
- [36]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3): 4-8.
- [37] 蒲清平, 王嘉欣. 数智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的逻辑理路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1): 12-22.

责任编辑：杨稀琴 校对：王京菁

从断裂叙事到共同体认知：“1644 史观”的话语逻辑、现实风险及学理应对

梁 山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中华文明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突出特性, 这一文明结构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凝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构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生成与巩固的历史基础。然而, 以“1644 史观”为代表的断裂化历史叙事在网络与公共知识场域扩散, 将明清易代简化为文明中断与族群对立, 削弱了对中华文明整体结构的历史认知, 背离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类叙事以碎片化史实选取、族群本质化解释和情绪化表达为主要策略, 将复杂历史压缩为身份政治下的对抗性叙事, 并以历史解释为外壳, 将特定价值立场固化为理解中国历史的认知框架。在学理层面, “1644 史观”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连续性与历史整体性的基本原则, 否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客观事实; 在现实层面, 这种断裂叙事容易诱发族群对立想象, 并可能被情绪政治与外部叙事力量利用, 从而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结构性风险。要从历史叙事机制、民族认知逻辑、知识解释权与公共话语权等层次构建系统性的学理应对路径,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稳固的历史认知基础。

关键词: 中华民族历史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 “1644 史观”; 断裂叙事; 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192-14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2.015

作者简介: 梁山,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

引用格式: 梁山. 从断裂叙事到共同体认知: “1644 史观”的话语逻辑、现实风险及学理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2): 192-205.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塑造中华民族整体格局，并合力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1]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总开关，也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更是我们揭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规律，增强历史主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2]。然而，近期在网络空间与部分公共话语场域中，围绕明清易代的历史解释出现了一类以断裂为逻辑特征的历史叙事。此类断裂叙事倾向于将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压缩为若干具有强烈价值指向的时间断点，并通过文明中断、正统失落等表述重构中国历史的整体图景。“1644史观”正是在这一断裂叙事框架中形成并扩散的典型样态，其以明清易代为中心，将1644年设定为中国历史的“文明断点”，将原本建立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压缩改写为一种排他性的文明兴衰叙事，从而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演进与国家形成逻辑造成根本性遮蔽。从更宏观的文明结构看，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根本在于其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这些特性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具体体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与巩固。任何以断裂方式理解中国历史的叙事模式，本质上都在动摇这一文明结构与民族结构的认知基础。

表面上，“1644史观”似乎只是关于明清史乃至清朝性质的学术分歧，但在更深层意义上，它触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根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3]，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历史是在多民族共同参与、长期互动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整体过程，构成判断各类历史叙事是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根本标准。任何将中国历史理解为文明断裂或将王朝更替等同于民族更替的叙事方式，都在根本立场上背离了以多民族交融汇聚为基本事实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在认知层面冲击了对中华文明连续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认知。

学术界与公共讨论针对“1644史观”中的若干具体观点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驳。一方面，历史学界与相关研究从史实与历史认识的层面进行了批评与澄清，指出将清朝界定为“外来殖民政权”、将明清易代理解为“文明中断”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也违背中国历史多元一体发展的基本事实^[4]。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从情绪政治、身份认同或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对“1644史观”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机制与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分析，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群体焦虑与认同投射^[5]。这些论述从不同层面对“1644史观”进行了分析，为公共认知纠偏提供了必要支撑。

从总体上看，这些回应主要集中于公共讨论与评论性写作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学术研究。现有讨论虽已涉及情绪心理机制分析、现实社会影响、历史认知框架重建等多个方面^[6]，但限于公共讨论的篇幅，尚没有触及对“1644史观”作为一种断裂化的历史叙事形态如何被建构、如何获得解释力的底层机制的系统解析。事实上，“1644史观”绝非若干错误判断的简单拼接，而是通过将一个王朝更替节点叙事化为“文明断裂”“民族被殖民”的内涵结构，完成了从历史解释到价值裁判的转化，并在此过程中塑造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认知框架。如果仅从史实纠偏或情绪

动因入手,不触及断裂叙事的构造方式及在固化公共认知中的运作机制,相关批驳便难以从根本上削弱其话语效力。因此,本文以断裂化的历史叙事机制为切入点,对“1644 史观”的话语逻辑展开分析,进一步揭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所造成的深层风险和应对举措。

二、“1644 史观”的叙事特征及话语逻辑

“1644 史观”是一套在网络空间逐渐成型的叙事框架。它围绕明清易代这一历史节点,持续制造一种高度情绪化的历史断裂感,并借助碎片化传播将这种断裂叙事固化为常识。理解这一史观的关键,在于揭示其如何通过话语结构与叙事机制,将复杂历史转化为可被情绪动员的政治想象。

(一) 断裂化的时间:以“1644”为断裂点的历史时间重构

“1644 史观”的核心叙事操作,是把一个朝代更替的历史事件转化为文明意义上的时间断裂。明清鼎革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始终被理解为王朝循环中的一次改朝换代,其历史意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结构的重组与制度运行方式的调整。然而在“1644 史观”的叙事中,这一节点被人为地渲染成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被强行涂抹上“文明断裂”“国家失序”“族群替换”等多重危言耸听的含义。通过不断重复和强化这一年份的特殊性,叙事者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压缩为一个可以被情绪和身份投射的时间符号,从而使 1644 成为整个历史想象的组织中心。

这一时间建构方式重点在于对转折的极端放大,在网络传播与部分非主流论述里,1644 年被塑造成一个历史归零点,仿佛在此前后存在着本质上无法连续的两个世界。1644 年之前的历史被不断描绘为完整、自足且具有高度正当性的文明阶段,它承载着正统中国、真实中华的象征意义;1644 年之后的历史则被放置在一个持续下坠的轨道上,成为“中华耻辱”的代名词。这与鼓吹“明亡之后无华夏、崖山之后无中华”的文化断裂论是一类论调^[7]。它们并不分析明清制度之间如何衔接,也不关心政权更替中所包含的继承与调整,因为这些都会削弱断裂叙事的效果。清朝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前代制度的吸纳与重构,也因无法被放置进“前—后”这种简化框架,而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叙事之外。历史演进中原本存在的层累与调整,被压缩为一个被设定好的断裂前后图景。

“1644 史观”用一个被高度符号化的年份取代了历史进程本身,使中国历史在认知上围绕这一“断点”展开,它把“变”本身当作价值判断的依据,使王朝更替在话语中自然滑向了文明的失落。历史的连续演进被压缩为之前的辉煌与之后的衰落两个对立区块,复杂的社会变迁被一个不可逆转的坠落轨迹所遮蔽。

(二) 单因果式归责:复杂历史进程的叙事简化

“1644 史观”通过单因果化的解释方式,将近代中国的结构性困境与历史转折集中归结为清朝统治这一单一变量。在公共平台上,常出现“若非清朝入主,近代屈辱本可避免”之类的反事实句式,将清朝整体定性为“异族殖民统治”,并进一步把近代中国在对外冲突中的失利与落后集中归因于清朝政权的统治性质。这种解释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将原本涉及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工业文明冲击、制度转型困境、内部社会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历史进程,简化为一个错误政权

导致文明倒退的因果链条。

当解释框架被这样收缩之后，历史问题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本需要通过中国史、世界史、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来理解的近代转型过程，被转化为一个简单的责任叙事：只要锁定清朝这一政治主体，复杂的历史困境就获得了一个看似清晰的来源。这种处理方式使因果分析从多变量的历史研究滑向一种高度简化的故事结构，其中“谁导致了衰落”比“衰落为何发生”更为重要。在这一逻辑中，问题分析逐渐向道德判断靠拢，当清朝被持续放置在“近代落后的起点”这一位置上时，它在叙事中被赋予了承载负面历史意义的象征角色。近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被动处境，由此可被归因为“外族的入侵”，而真正复杂的结构性压力则退居幕后。所以，“1644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问题解释模型的高度简化，单因果解释完全是出于叙事需要的主动压缩，因为只有将历史原因高度简化，才能为道德化、情绪化和身份化的表达提供清晰的指向。

（三）价值裁决型叙事：道德与情绪嵌入下的历史评价

“1644史观”之所以能够在公共空间中产生较强的煽动力，与其叙事结构中深度嵌入的道德与情绪要素密切相关。时间断裂使得明清易代被理解为某种无法挽回的文明流失，而单因果化的解释方式则为这种流失提供了明确的归因方向。当这些叙事要素被反复组合和传播时，借助历史书写固化为一种文化记忆，为社会成员提供知识，这时，“文化记忆在历史书写中完成意识形态生产”^[8]。这种历史的价值化运作，构成“1644史观”断裂叙事的生成机制。

第一，文明正统论的价值对立机制。相关叙事借助长期积累的文化联想，将文明等级与正统性进行绑定，使某些历史主体自然获得正面或负面的道德标记。比如将“明”与“中华文明”“正统秩序”等符号关联在一起，同时把“清”与“异族统治”“文明变形”等意涵捆绑。“就话语内容而言，用以标注身份的二元话语通常并非价值中性，而是有抑有扬、有褒有贬。”^[9]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中一度流传所谓“‘满汉全席’本是满人吃汉人”的说法，将原本作为清朝宫廷宴饮制度与多民族饮食融合象征的历史概念，恶意重构为征服与吞噬的二元隐喻结构。这类言说完全缺乏历史依据，却通过猎奇化、阴谋论式的叙述方式被不断重复和放大，当这些未经证实却高度情绪化的说法在公共话语中被反复调用时，便逐渐构成了一套无需再加论证的价值前提，历史判断也因此被置入一种预设好的二元化评价框架。

第二，情绪动员型的价值嵌入机制。通过持续唤起屈辱、失落、被剥夺感等情绪体验，历史被呈现为一段需要被追究与清算的过程，其中更承载对现实不满与身份焦虑的情绪投射。这种策略往往“将历史事件简化为‘个人悲剧’或‘人性困境’，同时以生动的场景元素和浓厚的场景氛围调动人们的情感，使人们沉浸在对场景化叙事的感性回应中，失去对背后原因的理性分析”^[10]。比如大量短视频中，崇祯帝常被塑造成一位孤绝而无力的悲情君主，画面上反复出现倾颓的垣墙、枯绝的老树等场景，配以苍茫悲壮的音乐，激发观众的悲悯共情，借助情绪机制，观众被带入由叙事者预先设定的悲剧场景之中，使这一人物形象成为承载秩序失落、文明终结等价值判断的象征载体。这种历史叙事实际上为自身搭建了一套稳定的叙事舞台，历史的真实演进逻辑被有意悬置，一套设定好的激发原始精神创伤的修辞戏码不断上演。

第三，经典政治化的价值裁决机制。在“1644史观”的相关叙事中，价值裁决往往借助对文化经典的政治化解读，在情感层面为既定立场提供证据。其中，围绕《红楼梦》进行的一系列流

行解读,构成了这一机制的典型表现。抖音历史博主“吃瓜蒙主”的红楼系列解读掀起了一股“红楼梦悼明”说的风潮,小说中的人物、意象与叙事线索被强行纳入明清易代的道德框架之中。例如,将“绛珠”牵引为“朱明”之象征,把宝玉的“通灵宝玉”解释为“传国玉玺”的隐喻,进而将整部作品附会为“反清悼明”的政治寓言。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索隐派原本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学派,其以文本整体为对象,试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作品。而网络语境中流行的相关解读,基于简单的符号拼接,辅之二元道德框架,与网络传播逻辑高度契合,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此类阐释以预设立场为前提,对文学符号进行选择性地重组,通过刻意挑战人们对既定事物的固有认知和常识,制造认知反差,在“所见非所得、所得非所愿”的心理落差中借助暗示性的意会机制完成意义传递^[11]。通过对经典的政治化占用,“1644史观”得以在不直接展开历史论证的情况下,将价值判断自然化、正当化,并嵌入公众的情感认同结构之中。

通过以上三种机制,“1644史观”将历史研究中本应保持开放性的问题解析,转化为一种具有封闭性的价值裁断。原本可以通过多维度分析加以理解的历史转折,被纳入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导向的公共叙事之中。更具风险性的是,这种价值叙事不仅停留在王朝评价层面,还通过“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叙事框架,将满、蒙等少数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结构对立起来,进而把历史更替转化为族群对抗。相关言说在网络空间中往往伴随明显的情绪动员色彩,甚至被用来煽动针对特定族群的历史怨恨情绪,进而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现代国家认同结构。

三、“1644史观”的学理批判：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构

恩格斯指出,“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12]。对“1644史观”的学理批判亦是如此。“1644史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认知与国家文化安全所造成的冲击,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在历史叙事层面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错误史观进行彻底批判的理论武器^[13]。只有借助这一武器,才能从理论层面揭示“1644史观”的错误本质。

(一) 历史发展观的偏误：断裂叙事对唯物史观整体性原则的背离

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是由社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与文化结构等多重因素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连续演进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14]朝代更替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动,固然会带来制度与政策层面的调整,但并不等同于文明形态、社会结构与历史主体的整体断裂。因此,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应被置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脉络之中加以理解。而“1644史观”的根本问题,正在于其所采用的断裂式历史理解方式。它以明清鼎革为绝对分界点,将中国历史切割为“文明”与“非文明”、“正统”与“异族”两个彼此对立的阶段,由此构造出一种高度道德化、二元化的历史图景。这种叙事方式表面上似乎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判断,实则方法论层面背离了唯物史观,“就是不懂历史辩证法,不了解主客观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不能辩证地看待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因而无法认清社会历史的真相”^[15]。

这种叙事方式的偏误,首先体现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处理上。唯物史观要求从多重结构因素

出发解释历史变迁，而“1644 史观”则倾向于将近代中国遭遇的制度危机、外部冲击与现代化困境，单一化地归因于清朝的建立本身。这种“单因果断裂模型”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也在事实上遮蔽了清朝前中期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无论是农业生产的恢复与扩展、统一市场的形成，还是疆域整合与行政体系的完善，都表明清朝并非一个停滞乃至倒退的“文明断层”，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重组。将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简单回溯到 1644 年这一政治事件，无异于以象征化节点替代结构性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1644 史观”以断裂叙事替代历史过程，本质上是用一种瞬间道德裁断取代了历史发展过程。在唯物史观中，任何重大历史转变都源于既有结构内部矛盾的积累与重组，而不是突然缘于单一事件。明清鼎革固然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它并非凭空出现的文明断裂，而是长期社会矛盾、财政危机、军事压力与权力结构重组的综合结果。将这一复杂历史过程抽象为“外来统治”取代华夏文明，实际上是把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替换为外部冲击叙事，从而将本应通过结构分析解释的问题转化为道德化的文明裁决。

这种对历史过程的简化还导致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整体遮蔽。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历史转折点的存在，但它强调转折点需要在整体结构中被理解。明清之际，尽管统治集团与族群构成发生变化，但土地制度、科举体系、地方治理结构、士绅社会乃至儒家意识形态框架并未被根本性打断，反而在新的权力结构下继续运作并发生调适。所以，“1644 史观”的断裂叙事全然在方法论层面背离唯物史观整体性原则，无法形成对历史的正确解释。

（二）民族认知框架的错置：族群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消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将“中华民族”理解为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由多民族互动、融合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历史共同体，“中国”从来不是由单一族群独占的文明实体，而是在不断的迁徙、征服、融合与制度整合中逐步生成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从孤立的“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人类历史发展轨迹^[16]。《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系统概括：“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17]无论是秦汉时期对多族群区域的整合，还是隋唐以后对草原与中原关系的制度化安排，乃至元明清时期对广阔边疆的持续纳入，中国历史的主线始终是共同体的扩展与重组。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提出，“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18]。然而，“1644 史观”以族群化叙事方式，在理论上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文明边界，它预设“华夏”与“夷狄”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并据此将清朝政权天然排除在“中国”之外，这完全是对民族与文明关系的根本性误读。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在制度层面继承和完善历代王朝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与法律结构，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正统，清朝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度承袭。清朝统治集团在民族观念上逐步形成并推动“满汉一体”的政治理念，“具有‘华夷一家’的含义，与‘华夷共祖’民族思想有诸多契合”^[19]，这种制度性与文化性的内在接续，使清朝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1644 史观”以族群标签来界定文明归属，本质上是将“民族”理解为静态、排他的文化实体。这种认知框架直接否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性特征。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叙事一旦进入公共空间便会把现实社会中的民族多样性重新诠释为潜在的文明断裂，从而在观念上瓦解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连续性。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角度看，“1644史观”实际上是以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倒置性地重写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它将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的“族群—主权—文化”同构关系，强行投射到传统王朝时代，从而误把王朝更替理解为民族更替。这种时代错位的解释方式，遮蔽了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的跨族群治理与制度整合传统，是“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苟合，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和少数民族情感的关照，背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意”^[20]。“1644史观”对民族认知框架的扭曲，在更深层次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逻辑的认知错置。

（三）学术解释向断裂叙事的滑移：历史研究工具的误用

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方式，“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4] 172}。在叙事上，“1644史观”最具迷惑性的是对学术工具的挪用。在正常的学术研究中，“殖民”“帝国”或“现代性”等概念具有明确的历史语境与分析边界，它们被用于解释特定权力结构、经济关系或文化互动的具体形态。然而，在“1644史观”的话语实践中，它通过将历史事件、人物、结论从本源性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进行解构与颠覆，进而肆意改写历史以制造思想混乱。

具体的挪用做法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学术概念标签化。它把学术概念从分析工具转化为价值标签，比如在使用“殖民”“异族”“他者”等词汇时，往往脱离其原有语境，直接套用于清朝的政治统治，从而将原本需要通过制度、经济与社会关系加以分析的问题，简化为外来统治压迫本土文明的道德图景。一旦学术概念不再指向具体的历史关系，而被用来直接界定谁是中国、谁不是中国，历史的讨论便脱离了事实，开始陷入身份与立场之争中。在许多具体表述中，这种用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应用，而成为一种象征化挪用，其本质是通过学术词汇的表层合法性，为高度简化的历史想象提供权威背书。

其二是学术标准不一致。在处理明朝历史时，“1644史观”往往强调制度连续性、文化积累与文明发展，而在处理清朝历史时，转而采用高度抽象的文明对立框架，将具体制度实践、社会运行与文化互动全部置于外来统治的总标签之下。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解释方式，只为服务于预设的价值判断。学术方法不过是被用来为既定结论提供修辞支撑，历史研究中的概念与框架在此被当成身份政治的象征，使原本应当通过学理讨论解决的问题，转化为难以妥协的立场对立。

从学理上看，真正的历史研究应当在不断检验、修正与扩展中逼近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一旦历史解释工具被用来固化断裂、强化对立并裁决文明归属时，它们就已经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本意，学术语言反而成为制造二元对立的修辞资源，成为断裂叙事的直接助推器。这种滑移正是“1644史观”在学理层面最深层的问题。

四、“1644史观”的现实风险：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

的人。”^{[12] 253} 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历史观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历史叙事一旦进入公共认知结构，便可能通过塑造理解方式、激活情绪取向和引导身份认同，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1644 史观”的现实危害集中体现在断裂叙事进入公共传播后，会由内到外重塑社会的历史理解与身份认同。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所产生的连锁冲击，首先体现在侵蚀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继而放大族群对立叙事，再导致公共历史讨论极端化，最终在国际叙事竞争中被外部力量利用并削弱中国的话语主动权。

（一）历史连续性认知的弱化

“1644 史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基础、也最隐蔽的冲击，首先发生在历史认知结构内部。通过将明清鼎革塑造为“文明中断”的分水岭，它改变的并不仅是某一历史事件的解释方式，而是对整个中国历史连续性的理解框架。当 1644 从一个王朝更替的节点，被转换为中华文明合法性断裂的标志性时刻，公众对“中国”本身的时间想象也会被潜在重塑。清朝不再被理解为中国历史链条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被外化为“非中国”的统治时期。这种处理方式的实质，是将历史连续体切割为正统中国与异族统治两段，并通过这种断裂来重新界定何谓“真正的中国”。一旦这种时间断裂成为主导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成立的历史整体性便遭到削弱。

更进一步看，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弱化，会在共同体形成史的理解上制造系统性遮蔽：清朝在疆域整合、制度统合与多民族互动格局定型中的历史环节，被叙事性“摘除”或“污名化”，从而使现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来源被人为割裂。一旦共同体的基础被压缩为以单一王朝或单一文化形态为核心的排他性想象，公众很容易滑入一种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理解为某种偏离的错位之中。历史整体性一旦被这种叙事结构拆解，共同体认同就失去稳定的时间锚点，后续更激烈的对立化解释便获得了进入空间。

（二）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撕裂风险

“1644 史观”以文明断裂的方式重构中国历史，这种影响会进一步转化为对现实民族关系的隐性重塑。历史叙事一旦被切割为“正统文明”与“异族统治”两段，相关的族群与历史主体也随之被重新编码为对立阵营，从而在话语层面制造出“内外之别”“本他之分”的认知结构。在“1644 史观”的叙述中，清朝往往被整体性地贴上“外来统治”“异族政权”的标签，这种标签化处理将历史上的清朝政治集团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中剥离出来，转而置于一种“非我族类”的象征位置。尽管这一叙事并不直接针对当代民族关系，但它在符号层面构建了一种“谁是文明继承者、谁是文明破坏者”的二元对立模式，并通过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外衣，将这种对立自然化、正当化。由此，原本应当在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理解的历史过程，被转化为族群间的对抗性图景。

这种叙事模式的现实风险，在于它为身份政治的扩散提供了可嫁接的认知模板。一旦历史被讲述为族群对文明的背叛或篡夺，当代社会中的族群差异便容易被重新投射到这种历史想象之中，使现实的多民族关系被误读为潜在的文明对立，更严重者，就会落入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的极端民族主义深渊中^[21]。事实上，这种将清朝与“中国”割裂的叙事逻辑并非孤立出现。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曾以“满蒙非中国论”为理论工具，为分裂中国、肢解疆域提供历史合法性论证，而这一理论工具的前提正是将清朝排除在中国历史主体之外。当前舆论场中重新激活

类似逻辑, 尽管语境不同, 但在结构上已具备被外部势力嫁接和利用的潜在风险, 可能动摇现代中国疆域与国家认同的历史法理基础。它们并不需要明确提出分裂主张, 就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使不同族群更容易被放置到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加以理解, “其本质是要通过去历史化、去民族化, 达到使中华民族丧失民族独立性、文化独立性的目的”^[22]。叙事逻辑上对族群边界的强化, 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面临被撕裂的风险。这种对立化倾向一旦与现实社会中的情绪、利益或外部干预相结合, 便可能演化为更具破坏性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三) 公共历史理解的极端化风险

在历史连续性被切断、族群关系被撕裂之后, “1644 史观”的影响进一步外溢到公共舆论空间, 表现为对历史认知方式本身的重塑。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本应通过史料、方法与学术讨论加以澄清的复杂历史问题, 转化为以情绪立场为主导的价值对立, 从而推动公共历史理解走向极端化。“1644 史观”在网络传播中的典型表现, 往往围绕“文明被篡夺”“民族被背叛”“正统被颠覆”等高度情绪化的表达展开。这类表达并不依赖系统的历史论证, 而是通过不断唤起失落感与受害感来构建共鸣结构, 使历史讨论从理解过去转向立场争论。在这一过程中, 史实的复杂性、历史的多重因果关系以及学术研究的细致区分, 都会被视为妨碍情绪表达的“技术性干扰”, 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讨论之外。这种传播逻辑对公共历史认知的冲击是结构性的, 它使得历史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证据与逻辑来讨论, 公众言论更容易被纳入“站队”与“对抗”的话语框架之中。对“1644 史观”的认同或反对, 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身份标识而非学术判断, 由此导致公共空间中理性史观的边缘化。

更为隐蔽的风险在于, 这种极端化过程会削弱社会对学术权威与专业知识的信任基础。当情绪化叙事通过算法推荐和平台放大获得传播优势时, 基于长期研究积累形成的历史共识往往被描绘为“官方叙事”或既得利益群体的刻意遮蔽, 从而失去应有的公共说服力。而社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理解也会渐趋远离理性的轨道, 转而容易滑入碎片化与对抗化的认知状态中。这种公共认知环境的变化将可能为更外层的政治与国际话语风险创造条件。

(四) 国际叙事竞争中的被动风险

在全球知识生产与话语竞争的格局下, 中国历史的解释权本身就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际叙事环境中, “1644 史观”在国内公共空间中所造成的各种风险在进入国际叙事环境之后会被进一步放大和利用。

从国际学术与舆论场的现实情况看, 关于中国历史的诸多争议性解释, 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知识生产体系的持续影响。以“内亚史观”“新清史”“征服王朝论”“赞米亚学说”等为代表的研究取向, 在部分西方学术与公共话语中被不断放大^[23]。这些框架往往以族群、帝国或边疆视角重构中国历史, 强调区域化的二元对立, 弱化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24]。“1644 史观”在国内舆论场的流行行为这种外部叙事提供了呼应。虽然这些理论在学术内部具有复杂的研究背景, 但当它们被简化为“清朝非中国”“中国历史本质上是被外来力量统治”的通俗化叙事时, 便容易与“1644 史观”形成叠加效应, 使中国历史被置于一种持续需要被重新界定的话语处

境之中。如部分中国公众开始接受“文明中断”“外来殖民”等解释模式时，国际舆论便更容易将这些观点包装为中国内部的“反思”，从而赋予其更大的欺骗性。由此，中国对自身历史的整体性解释能力在国际场域中被削弱，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正当性也更容易被置于质疑和再解释之下。

这种被动局面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与国际认知结构，历史叙事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规范性意义，它影响外部世界如何理解中国的疆域形成、民族结构与国家合法性。一旦中国历史被描述为一系列被外来力量支配的断裂阶段，中国在边疆问题、民族问题乃至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国际话语基础都会受到侵蚀。从更宏观的视角看，“1644 史观”的风险并不局限于国内认知误导，而是与国际叙事竞争高度关联。它可能削弱中国以自身历史经验解释自身发展的能力，使中国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话语位置更加被动。这种对历史解释权的侵蚀，最终会反映到国家认同、民族团结与国际政治空间的多个层面，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必须正视的外部挑战。

五、“1644 史观”的风险应对： 坚持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学理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25]“五个共同”高度凝练地揭示出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科学内涵，“为准确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底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家史提供了明确的立场和路径，构成了当代中国从历史之维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根本指针”^[26]。应对“1644 史观”所带来的现实风险，必须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坐标，以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根本遵循，将历史认知安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之中，重建对中国历史整体性、民族生成逻辑、学术规范边界的系统理解，以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学理路径为统一战线领域开展历史认知引导和意识形态斗争提供稳固支撑。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视角重构历史叙事

在应对“1644 史观”的意识形态风险时，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具有基础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27]。这一重要论断从方法论层面强调了以整体结构和长期过程理解历史的必要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历史进程是由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制度形态的长期演化所推动的，王朝更替与政治权力转移属于这一总体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唯有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社会历史结构和长期演进逻辑之中加以考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内在变迁逻辑。只有“从生活现象出发，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具体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28]。

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9]。1644 年的明清易代是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集中显现，财政体系的失衡、土地关系的紧张、军政体系的失序以及基层社会的动荡，共同构成了旧有政治秩

序难以维系的结构性条件。清朝政权的建立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权力重组与秩序重建过程，其政治整合功能、制度安排与社会基础均延续了传统中国的基本结构。因此，在学理层面，应当围绕明清易代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结构开展实证性重建工作。一方面，可系统整理明末财政危机、军饷体系崩溃、土地关系紧张与农民战争等材料，通过对《明实录》《明史》等史料的综合分析，揭示政权更替背后的结构性压力，从而将 1644 年还原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集中爆发的历史节点。另一方面，可通过对清初赋役制度、官僚体系与基层治理的连续性研究，依托《清会典》《清实录》等文献，说明清朝国家在制度层面延续并重构了传统中国的基本治理形态，使“异族统治”的断裂叙事失去学理支撑，使明清易代重新回归到中国历史长期演化的整体轨道之中。

（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塑历史认知逻辑

“1644 史观”通过将清朝统治简化为异族政权，在历史叙事中持续放大族群边界，使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被重新解释为族群对立的历史。这种将政治权力更替转译为族群对抗的叙事方式，实质上否定了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历史中的生成逻辑。对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所提供的“多元一体”框架，是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历史认知方式的关键理论资源。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体，单位是多元，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30]。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清朝国家形态应被理解为多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构的重要历史阶段，边疆治理制度、差异化治理体系、适应性宗教政策，以及多民族共享的政治与文化实践，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明清之际进一步定型的历史基础。通过共同开拓疆域的制度实践，共同缔造国家的权力整合机制，以及共同书写历史所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明清之际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结得到进一步稳固和拓展。相关的具体研究可以就此展开：一方面，可通过对清朝边疆治理制度的再研究，依托《理藩院则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回疆则例》等档案文献，揭示清朝在西藏、蒙古等地区分别实施的噶厦制度、八旗制度的差异化地方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可通过对清朝宗教政策的梳理，揭示在多民族、多宗教格局下，清朝的中央政权通过度牒等制度，将宗教权威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内。尤其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创设，“将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的转世认定权收归中央，这一制度创新不仅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更体现了清朝高超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治理多民族国家的典范之作”^[31]。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塑历史认知逻辑，使中国历史从“谁战胜了谁”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共同体形成史的视域下，这一认知转换是消解“1644 史观”族群对立想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学理路径。

（三）以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确立历史知识解释权

针对历史研究的断裂叙事，有效的风险应对须从学术规范与话语边界入手，重建历史研究与价值叙事之间的区分机制。在学术生产层面，“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以及主体对历史事实的掌握程度和判断能力，直接决定着主体能否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32]，有必要通过方法与概念规范，对断裂化解释的“入口”加以制度性限制。可以在明清史、边疆史与民族史研究中，系统引入概念使用审查与范式来源标注机制，对“殖民”“帝国”“族群统治”等外来理论概念的适用条件与语境边界作出明确界定。通过在源头环节确保概念阐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注重话语运用的严谨性与可检验性，能够防止概念在脱离历史语境的情况下被泛化使用甚至价值化滥用。

在学术评价层面，有必要建立针对历史断裂叙事的同行评议与快速回应机制。围绕“明清鼎革”“清朝国家性质”等高度敏感议题，可组织历史学、民族学与宗教学学者形成问题清单，“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33]。对公共传播中频繁出现的断裂化解释进行集中评议，并以学术说明书形式发布权威回应，使学术界能够对断裂叙事形成及时的专业纠偏能力，而不是在情绪化舆论形成之后才被动介入。

在知识传播层面，应当将学术边界意识嵌入历史普及与新媒体表达之中，通过分层分类的认知引导回应不同类型的历史误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34]。这一要求从传播策略上揭示了历史认知引导必须坚持精准施策、因类施治的基本原则。可以通过编制“明清史常见概念误用手册”“族群与文明的通识读本”等面向公众的权威文本，将学术解释为何不同于价值裁断的方法论常识纳入公共史教育，降低断裂叙事对普通受众的吸引力。当公众能够识别理论概念被歪曲的常见手法时，断裂叙事的传播空间将被显著压缩。

通过在学术生产、学术评价与公共传播三个层面建立稳定的话语规范，可以有效阻断“1644史观”借助学术形式获取知识合法性的路径，使关于明清易代与中华民族形成的讨论重新回到证据、方法与结构分析的轨道之中。

（四）以学理体系支撑中国历史的公共话语权

在国际学术与舆论场中，围绕清朝国家性质、中华文明连续性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争议，往往被嵌入西方既有的殖民叙事与族群政治框架之中。中国的学术阐释必须超越内部教育与共识生产功能，承担起中国历史对外解释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35]只有将以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学术成果，转化为可被国际学术界与舆论场理解和使用的解释框架，才能有效对冲以“殖民”“帝国”“族群压迫”为中心的西方叙事范式。具体而言，应系统梳理中国关于明清易代、清朝国家形态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将“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等核心概念加以提炼与转化，形成具有国际可读性的理论表达体系。这样可以推动中国历史摆脱对既有外来概念框架的依赖，进而通过自主话语的建构，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与理性对话。

在话语转化机制上，有必要构建以学术为源头的对外叙事供给体系。可依托重点高校与国家级智库，建立“中国历史关键议题国际阐释平台”，围绕明清鼎革、边疆整合、民族互动与国家形成等议题，形成权威英文报告、学术综述与政策解读文本，并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海外媒体、智库交流等渠道持续投放。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使中国学术界在国内场域回应“1644史观”的基础上，主动进入国际叙事竞争，对“清朝殖民论”“文明断裂论”等错误框架进行前置性消解。在公共舆论层面，同样需要将这一学术阐释体系转化为稳定、可传播的公共历史叙事，可通过纪录片、图书、短视频与国际传播产品等多种形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逻辑转化为跨文化可理解的叙事表达，使国际社会能够在不依赖西方殖民话语的前提下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当中国历史拥有自身稳定的公共叙事，“1644史观”及其变体将难以在国际舆论空间中获得主导性解释地位。

六、结语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中,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整体性与差异性相互嵌合,构成了中国历史得以延续不断的基本形态。“1644 史观”以断裂叙事对中国历史认知框架进行重构,折射出当代公共历史认知中整体性视角与断裂化想象之间的深层张力。本文通过对它的叙事机制、学理根源与现实风险的分析,意在说明,历史问题一旦被简化为价值对立的裁决工具,便可能脱离学术讨论的轨道,转而对社会认知结构产生持续影响。在这一意义上,对“1644 史观”造成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风险,需要进行历史叙事机制、民族认知逻辑、知识解释权与公共话语权的系统性重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讲述方式,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重塑中国历史的主体逻辑,通过学术规范与解释权体系确立中国历史的学术话语权,并以学术阐释支撑中国历史在国内公共空间与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表达,才能从根本上瓦解断裂叙事的生成条件,使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在社会层面获得稳定而持久的认知基础。

要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保持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必然要求、战略基础、核心优势^[36]。在当今国际舆论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历史解释权已成为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中国历史自身的结构逻辑与文明连续性来理解中国道路,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问题。只要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错误的断裂叙事终将失去其认知土壤,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必将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展、不断巩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精神与思想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 [2] 杨共乐.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J]. 史学史研究, 2025(4): 10-16.
- [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J]. 求是, 2023(17): 4-11.
- [4] 班晓悦. 戳破历史虚像 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专家学者批驳“1644史观”[EB/OL]. (2025-12-26) [2026-02-01].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12/t20251226_5963306.shtml.
- [5] 吴启訥. 情绪、身份政治、大汉族主义,“1644史观”背后的三重隐喻[EB/OL]. (2026-01-03) [2026-02-01]. https://m.guancha.cn/wuqina/2026_01_03_802573.shtml.
- [6] 浙江宣传:警惕“1644史观”带乱了节奏[EB/OL]. (2025-12-17) [2026-02-01]. <https://news.qq.com/rain/a/20251217A032F500>.
- [7] 张瑜.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文化逻辑、理路遵循、践行方式[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7-34.
- [8] 赵爱霞, 左路平. 论文化记忆及其意识形态功能[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2): 80-86.
- [9] 林川. 理解“他者化”:研究图景、内涵拓展与关键环节[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6(1): 117-128.
- [10] 黄冬霞. 历史虚无主义的场景化叙事转向及其应对[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8): 116-129.
- [11] 何文校.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新样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3): 128-137.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29.

- [13] 徐家林.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批判[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2): 138-147, 164.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7.
- [15] 侯衍社. 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方法论思想研究[J]. 哲学研究, 2020(10): 23-31, 128-129.
- [16] 李包庚. 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4): 4-26, 204.
- [17] 本书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3: 2.
- [18] 费孝通文集: 第8卷[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317.
- [19] 王文光, 胡明, 马宜果. 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17-23.
- [20] 邓观鹏, 顾友仁.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样态、危害与治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149-164.
- [21] 严庆, 平维彬. 超越极端民族主义[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22-30.
- [22] 于安龙.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J]. 学术界, 2024(3): 13-20.
- [23] 李俊清, 付秋梅. 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论边疆安全的风险及其治理[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 23-29.
- [24] 罗群, 李淑敏. 警惕“去中国化”陷阱——评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J]. 历史评论, 2022(2): 81-84.
- [25]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7日)[N]. 人民日报, 2024-09-28(2).
- [26] 朱碧波.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与知识生产[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2): 28-38, 182.
- [27]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 求是, 2023(20): 4-9.
- [28] 高炳亮. 大历史观视阈中历史虚无主义批判[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6): 111-121, 124.
-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54-655.
- [30]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3.
- [31] 孔新峰, 孔玺铭. 论中华民族学学科构建的根本途径及方法论立场[J]. 山东社会科学, 2025(10): 5-14.
- [32] 竞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的五重论域[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2): 75-81.
- [33]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14-815.
- [34]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N]. 人民日报, 2016-04-26(1).
- [35]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36] 林华山.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5): 106-116.

责任编辑: 杨稀琴 校对: 王京菁

“台独”史观的系统性解构与批驳

钟厚涛

(国际关系学院 国家安全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台独”史观是由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政治权力主导、少数知识精英配合、教育系统推行、外部势力干预的系统性意识形态工程,通过割裂历史事实、美化殖民统治、妖魔化祖国大陆、强化受害者悲情叙事等方式推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话术,炮制出“同心圆史观”“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民族论”等多种虚假论述,图谋“脱中立台”,重构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和家国认同。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图谋驱动、学术中立伪装、社会弥漫扩散、服务“台独”分裂目的,必将蒙蔽台湾民众认知、扩大台湾社会裂痕、加剧两岸对立对抗,也将为两岸统一进程埋下隐患。应对“台独”史观,是一场关乎民族记忆、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持久战。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未来应加强国家统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中华民族大一统史观消解“台独”史观谬论,利用法律、教育等手段加强战略塑造和民意引导,不断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与祖国完全统一进程。

关键词: “台独”史观; “脱中立台”; 国家统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历史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206-17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16

作者简介: 钟厚涛,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对台战略预置和重大问题研究”(3262024T03)

引用格式: 钟厚涛. “台独”史观的系统性解构与批驳[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2): 206-22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1]“台独”史观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深远，需要高度警惕。所谓“台独”史观是指扭曲历史事实、为“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谬论制造正当性和合法性支撑，进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虚假历史叙事体系。“台独”史观并非单纯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经过精心包装、隐藏着深层政治图谋的骗术谬论，是“历史搭台、政治唱戏”的产物，也是权力掌控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塑造。目前学术界对“台独”史观有了一定的研究。陈孔立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建构，‘台独’史观已经基本上建成，并且已经在台湾历史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2]李细珠指出，“台独”史观“通过教改与历史教育向台湾社会渗透，严重毒害了台湾青少年”^[3]。程朝云则驳斥了“殖民统治有益论”，认为“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4]。伍俐斌和林卓立重点分析了赖清德当局推行“台独”史观的做法与危害^[5]。已有研究对“台独”史观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剖析，但部分难题仍亟待探讨：一是“台独”史观的演进历程；二是对“台独”史观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谬论的系统性批判；三是对“台独”史观对岛内民意和两岸关系深层影响的全面剖析。本文立足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尝试对“台独”史观进行战略审视和战术透视，提出“学术反击、法律惩戒、教育纠偏、舆论塑造”的反制建议。

二、“台独”史观演进的历史脉络

“台独”史观的产生，既与台湾岛内政局演变息息相关，也与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以1987年台湾当局“解严”为分水岭，“台独”史观前期主要在海外扩散，后期则在岛内公然传播。

（一）萌发时期（1945—1987年）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执政时期，中国史观在台湾地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台独”史观只是未成气候的暗流和支流。

一是肇始于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为推行“皇民化”教育，极力向台湾民众灌输分离意识，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的血缘和文化纽带。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遗留的分离意识并未根除，部分驻台日军与台湾的亲日媚日分子甚至策动了“台湾独立自主运动”^[6]。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岛内部分别有用心之人歪曲煽动，将片面的信息或局部的信息夸大为整体的信息，“台独”谬论借机死灰复燃。1948年“台独”史观始作俑者廖文毅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鼓吹“台湾独立”。1949年，廖文毅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递交英文小册子《台湾的声音》，凭空捏造出“台湾民族”的说辞，这也成为“台独”史观的早期萌芽。

二是以日本为“基地”。早期“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无法立足，只能逃窜至日本等地。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右翼势力扶持下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声称“台湾民族”要“脱离异民族”。1962年，史明（本名施朝晖）在日本出版《台湾人四百年史》，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分离并对立起来，鼓吹建立“台湾国”。1964年，王育德在日本出版《台

湾：苦闷的历史》，虚构了所谓的台湾“独立演化路径”。这一时期的“台独”史观炮制者主要出生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多用日语写作。

三是以美国为“大本营”。冷战时期，美国为遏制中国，公开支持“台独”势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台独”运动重心从日本转移到美国。史明等人也从日本流窜至美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外“台独”活动的抬头。1982年在美国的“台独”分裂势力如蔡同荣、彭明敏等人在洛杉矶成立“台独”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该组织至今依然活跃，在全美各地共有44个分会，会员约2000人。

（二）由暗转明时期（1988—2008年）

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背离蒋经国的政治路线，为“台独”大开方便之门，推动“台独”史观从边缘走向中心，逐渐公开化和合法化。到1992年，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秀政声称，台湾史研究已成为台湾史学界的“显学”^[7]。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继承李登辉“衣钵”，将中国史形塑为“外国史”。

一是以行政权的掌控来抢夺历史的解释权。随着岛内政治权力转移，海外“台独”分子也陆续返台，与岛内蛰伏的“独派”人士沆瀣一气。“台独”分子辜宽敏在蒋经国时期从日本回台，一度沉寂，在李登辉当政后转趋活跃，此后又出任陈水扁、蔡英文当局的“资政”。身在北美地区的“台独”头目彭明敏受李登辉之邀于1992年回台，1995年加入民进党，2000年出任陈水扁当局“资政”。在此过程中，台湾历史“本土论”“台湾民族论”“去中国”“脱中国”等谬论纷纷登场，并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争夺中抢占了优势地位。

二是将台湾历史上升到所谓“国史”高度。“台独”史观把台湾乡土意识提升到“国族意识”，具有鲜明的历史建构倾向性和叙事割裂的政治操纵性。1994年台湾当局修订历史课纲，以“台湾”而非“中国”作为“国家主体性”叙事。1997年台湾编译馆编订《认识台湾》教科书，所谓“认识台湾”其实是灌输“台独”意识和皇民史观^[8]。自此，在“台独”史观中，“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叙事脉络开始平行化，不再把台湾当成整个中国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以台湾为核心”的“台湾史”被提升至所谓“国史”的至高地位，让台湾青年误认为“台湾史才是国史”。

三是民进党将“台独”纳入“党纲”。1979年台湾出现的“美丽岛事件”，为民进党的成立进行了人才、组织及理论上的储备，为“台独”史观走向政党政治铺平了道路。1986年民进党成立，岛内外“台独”势力公开合流。1991年民进党把“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塞入党纲。自此，“台独”史观与民进党的“台独”行径正式合流。随着民进党的多轮执政，“台独”史观逐渐成为在全台湾广泛弥漫的政治主张。

（三）拨乱反正时期（2008—2016年）

2008年国民党籍马英九执政，对“台独”史观进行了有限的拨乱反正，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制定课纲。2008年5月马英九就职后，冻结陈水扁时期制定的、具有明显“台独”色彩的历史与语文课程大纲（以下简称课纲）。2009年马英九责成台湾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重新拟订高中课纲，2012年8月实施，也被称为“101课纲”。该课纲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叙事框架，加入三国时期以来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脉络，增加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同胞参与大陆抗日的

光荣事迹，删除“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歪理邪说。在地理层面回归“一中地理观”，将最高山峰标注为珠穆朗玛峰而非“台独”史观主张的台湾玉山。在语文方面，增加文言文比重，重塑台湾同胞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是调整课纲。“101课纲”为抵制“台独”史观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并未根本性颠覆陈水扁时期“98课纲”的整体结构，仍维持“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同心圆史观”模式，而且部分修订因“独派”学者渗透审查环节，未能完全落实。2012年马英九成立“课纲微调小组”，由统派学者王晓波担任召集人，对课纲进行全面修订。例如强调钓鱼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把“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时期”，把“接收台湾”改为“光复台湾”，把“郑成功统治时期”改为“明代郑成功统治时期”，强化中国历史的叙事脉络。

三是妥协退让。由于各种原因，马英九在其第一任期未能大刀阔斧地根本性改革课纲，错失最佳时机。2015年7月，在民进党的鼓动下，台湾出现“反课纲微调事件”，马英九当局被迫妥协，宣布新旧课纲并行。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职演讲中就明确表示要废止马英九时期制定的历史课纲，并于同年5月31日宣布废除。这意味着马英九时期扭转岛内历史教学“去中国化”的尝试最终无功而返。

（四）加速推进时期（2016年至今）

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后，全面落实“政治反中、法理拆中、文化去中、历史脱中、经济离中、战略制中”路线，在岛内全方位散播“台独”史观谬论。

一是将中国史并入东亚史。“台独”史观声称，此前对于台湾历史的描述在中国史体系中仅仅处于边缘或附属地位。杜正胜叫嚣：“过去五十年台湾的历史教育充斥着大中国主义，甚至狭窄化成大国沙文主义。从小学到大学，台湾史没有自己的地位，只附属于中国史系统中。”^[9]

“台独”史观极力摆脱中国史的论述框架。2018年8月，台湾“课审会”审定“12年公共教育社会领域课程纲要”，鼓吹用“台湾岛”作为台湾历史叙事的主体，将台湾的历史课程分为：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把中国历史归入东亚史。如此一来，中国历史就成为与日本等东亚国家同样的“外国历史”。

二是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台独”史观声称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而中国史是“他们中国人”的历史。在文化层面，把闽南语、客家话改名为“台湾语言”。在宗教层面，声称台湾妈祖与大陆妈祖“虽是同一神圣，却属不同‘分会’”。此外，还抛出“孔子是鲁国人不是中国人”等奇谈怪论。台湾文化作为下位概念，本是作为上位概念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独”史观却打着“本土化”“多元化”的幌子，将海洋因素、日本殖民因素等拼凑为台湾文化，中华文化反而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三是以“转型正义”的名义推动“去蒋化”。民进党当局成立“转型正义委员会”，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对国民党进行污名化和政治清算，刻意渲染“二二八事件”，给外界制造的印象是国民党“坏事做绝”，而民进党则“好事做尽”。民进党此举成为其解构和重构台湾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源，因为“集体受难经验常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10]。这种“仪式化的定期纪念”强化了“外省人”的“原罪”，而以“受害者”形象出现的“本省人”则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心理上的“优越感”。民进党当局把蒋介石视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重要连接点，歇

斯底里地对其抹黑诋毁，销毁蒋介石的塑像，把对蒋介石的纪念场所改为“自由广场”。此后“台独”势力又集中力量推进“去孙中山化”，不再承认孙中山是“国父”，撤除孙中山遗像，取消“遥祭国父陵寝”仪式。

三、“台独”史观的主要特征

“台独”分裂势力声称以中国为主体的统一论是“台独”史观的“紧箍咒”，非打破不足以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因而全方位消解中国史观，培育并强化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台湾主体意识”甚至是“台湾主权意识”，凯望最终达成“台独建国”的政治图谋。

（一）以“学术中立”为掩护构造“台独”伪史观

“台独”史观是建构而非“天然”的产物，披着“学术自由”的外衣行分裂之实，但其篡改历史并非随机妄为，而是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模式套路。

一是学术嫁接夹带分裂私货，制造台湾社会的结构性误导。“台独”势力借引入西方学术理论之机将分裂主张伪装成学术观点以增强迷惑性。比如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叡人在翻译美国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时，就通过译序和注释恶意篡改，把原著中的反殖民思想扭曲为两岸对立的叙事。另外，有“台独”学者以学术名义把郑成功收复台湾污蔑为“汉人殖民开端”，将台湾光复歪曲成“新殖民统治开端”。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张胜彦甚至妄称，台湾是“汉人到海外殖民唯一成功的地方”^{〔11〕}。

二是依托史实建构的虚假性与片面性，制造台湾社会的谱系性失忆。例如，《认识台湾》的“历史篇”把郑成功治理台湾说成是“台湾首度出现汉人政权”^{〔12〕}。显然，在这套话语论述中，三国时代吴国军队到达“夷洲”（台湾），隋朝在“流求”（台湾）的活动，宋朝在澎湖驻军，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等，都被刻意抹去了。“台独”学者林明德还妄言，“在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中国政府从未有效地统治过台湾”^{〔13〕}。

三是以导向性措辞和系统性扭曲，制造台湾社会的选择性遮蔽。台湾曾经遭受过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国的殖民侵略，但“台独”史观论者却把这些殖民侵略与明郑、清朝和蒋介石政权混为一谈，将其都看成“外来殖民者”，认为“台湾一贯是外来统治者的殖民地”。在此悲情叙事下，他们进而声称“台独”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台湾的自立、自主、自决”，就是要“建设台湾人自己的国家”。

（二）以政治图谋为底色落实“台独”分裂谬论

“台独”史观在台湾社会的渗透与“台独”活动沆瀣一气。“台独”史观为“台独”活动提供理论支撑，而“台独”活动尤其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上台又为“台独”史观提供了合法性庇护。

一是“台独”史观为“台独”政治服务。“台独”史观坚持意识形态挂帅，认为历史书写必然会受到政治情境的左右。在“过去事实”的客观存在和“价值判断”的主观认定之间，“台独”史观更相信后者。在目标设置上具有高度的功利性，把历史书写看作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具，主

要目的是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二是“台独”史观借“台独”活动加速扩散。“台独”史观偷梁换柱，肆意裁剪扭曲历史真相，同时借助社会运动传播分裂理念。例如，1990年3月，台湾发生“野百合”事件，民进党立即组织支持者到场声援，借机兜售所谓“台湾独立”“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论”，增加台湾民众对台湾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4]。此后，民进党又吸收了“野百合”的主要骨干，为陈水扁1994年参选台北市市长进而在2000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造势。

三是“台独”势力上台全面布局“台独”史观。1996年台湾首次举行地区领导人的全民“直选”。“台独”史观支持者声称，“台湾人选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是台湾“主权独立”的重要象征，台湾人的每一次投票，就是作为台湾人的权力行使，就是一次“台独”史观的生动实践^[15]。2026年3月，赖清德在参加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与民主韧性研讨会”时，再次以所谓“直选民主”为台湾“国家地位”编造依据。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到陈水扁推动“公投制宪”，从蔡英文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到赖清德的“新两国论”，“台独”分裂势力的布局图谋绕开“正名”或“制宪”，从“基于‘民族自决权’的‘公投分离’”转向“事实分离”，制造没有宣布“台湾独立”的“台湾事实独立”。

（三）以“政治正确”面目构建“台独”史观传播矩阵

“台独”史观的传播并非零散无序，而是“台独”势力利用行政力量生产规范性知识的系统性行为，对台湾民众尤其是鉴别意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进行“去中国化”的“洗脑”教育。

一是利用教育主导权加速“台独”史观的代际传承。岛内“台独”势力把教育话语权的争夺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不遗余力地操纵“台独教育”，让历史课堂成为“台独”思想渗透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2024年12月，赖清德当局删除了军校通识教育中的“中国现代史”课程。2025年5月，赖清德当局修改台湾户籍人口表述，把原表述“以汉人为最大族群，占总人口96.4%”，改为“2.6%为‘原住民族群’，另外来人口占1.2%，‘其余人口’占96.2%”。“汉人”二字完全消失，被“其余人口”取代，这种操作让外界瞠目结舌^[16]。2025年9月，赖清德当局启用“识读中国威胁”教材，煽动“抗中保台”叙事，让台湾青少年形成“两岸对垒”的敌我思维，误导其戴着仇恨和偏见的“有色眼镜”来敌视大陆。2026年1月赖清德当局成立台湾首家“台语实验小学”北岭小学，让学生接受所谓“以台语为主”的教育。由于教育的导向性、教材的“权威性”以及考试答案的唯一性，台湾民众只能被迫成为“台独”史观的接收者和传播者。

二是再造“本土历史文化现场”。2025年11月赖清德当局抛出“再造历史现场项目计划2.0”版，以所谓“重现历史现场”为手段，利用资源配置权力潜移默化地将“台独”史观植入公共话语体系。在历史遗迹方面，“台独”分裂势力在台南孔庙这类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场所叫嚣“用‘台独’包围中国”。民进党当局还将郑成功进驻的安平古堡改名为殖民色彩浓厚的“热兰遮堡遗构”。对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民进党当局要求将其往“本土化”和“世界化”方向发展，即重点收藏台湾本土及其他国家的文物，防止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台湾民族主义想象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赖清德当局还推动台湾歌曲、台湾歌仔戏以及台湾文学、台湾信仰等方面的搜集，图谋以台湾的独特性和在地化的情感共鸣来传递“台独”谬论，例如鼓吹“所谓台湾文学，就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写台湾经验的文学”^[17]。

三是利用媒体网军等在台湾社会编织信息茧房。“台独”史观支持者通过政策宣传、公开演讲等活动散播兜售“台独”谬论。如赖清德 2025 年 6 月的所谓“团结十讲”，就用碎片化的历史论述混淆视听，试图在社会上营造“反中抗中”的舆论氛围。在现代网络社会，民进党当局通过强硬手段干预传统广电体系，例如取消中天新闻台电视牌照、强行干预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等，让支持“台独”的言论在传统媒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民进党当局还利用媒体与社交平台的放大效应进行舆论操控，以“揭秘”“科普”“还原真相”等名义在脸书、推特等平台传播“台独”史观，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网军操控和虚假信息扩散“台独”史观。同时，民进党当局还通过补助媒体、文化机构等方式，推动利于“台独”叙事的内容产出。例如，以“中国攻台”为预设场景的“洗脑”电视剧《零日攻击》就获得了民进党当局 1.13 亿新台币补助^[18]。这种数字化和娱乐化的传播进一步加速了“台独”史观的病毒式扩散。

四、“台独”史观的主要话术及其谬误

为构建脱离中国的“台湾主体性”，“台独”史观支持者妄图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和法理连接，炮制多种谬论。

一是“同心圆史观”。所谓“同心圆史观”是指以台湾为中心重构时空序列的历史叙事，以台湾为圆心向外扩散。“同心圆史观”在空间轴上由近及远，在时间轴上略古详今，在叙事模式上由传统的“从中国看台湾”和“以中国为中心”逐步转向“从台湾看台湾”和“以台湾为中心”，声称若继续坚持“中原中心史观”，必然会把台湾“自我边缘化”^[19]。“同心圆史观”的第一圈层是台湾各个地方的乡土历史（台湾的 22 个县市或台湾北、中、西、南、东地区），第二圈层是台湾史，第三圈层是中国史，第四圈层是亚洲史，第五圈层是世界史^[20]。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杜正胜提出“同心圆史观”^[21]，此后利用 2004 至 2008 年担任台湾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之便，用“同心圆史观”主导历史课纲制定与教材编写。“同心圆史观”刻意凸显“台湾史”是“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试图让台湾青少年“只知有台湾不知有中国”。

二是“台湾地位未定论”。1951 年 9 月美国主导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22]，但并未明确规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由此产生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此后，“台独”分裂势力利用“旧金山和约”大做文章，宣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只是同盟国战时的声明，不具法律约束力，而“旧金山和约”则是由 48 个国家联合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其位阶要高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借此渲染“旧金山和约”所衍生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外部势力对此也积极附和，2025 年 11 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辩论中避而不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双边文件中明确强调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却唯一突出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声称“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全部权利，并无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23]。2026 年是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签署 75 周年，美国、日本和台湾当局正在图谋以此为幌子，大肆炒作“台湾地位未定论”。

三是“原住民史观”。为推销“台独”史观，“台独”势力极力虚构台湾“独立性”的史前

叙事，赖清德就搬出“长毛象化石”来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生态系”。但众所周知，台湾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寒带动物长毛象能够在台湾出现，这反而证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上古冰河时期就是一体的^[24]。史前叙事破产后，“台独”势力又围绕台湾少数民族议题做文章，把台湾少数民族说成“原住民”，目的是要凸显台湾是自成体系、不同于中华民族的“独特民族”。2016年5月蔡英文就职演说时，声称要“重建原住民史观”，表示“不敢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25]。所谓“原住民史观”，鼓吹“先来后到”，打着“先来”的“原住民”旗号，排斥“后到”的国民党，就是要把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排在序列最后，意图否定国民党在台的“合法性”，从而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四是“南岛语族论”与“海洋国家论”。“台独”史观支持者声称“台湾先民是南岛语族”，渲染台湾是“南岛语族”的核心区域，误导台湾民众形成台湾人的“自豪感”。赖清德还利用南岛语族搞“南向认亲”，妄图证明台湾“自古独立”。但是，对台湾古人类DNA测序的结果证明，台湾少数民族所属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26]。“南岛语族论”不攻自破后，“台独”势力又开始构建所谓“海洋国家论”。台湾静宜大学陈芳明等主张台湾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海岛国家”，声称台湾史研究应凸显台湾的海岛特性^[27]。台湾大学曹永和也提出“台湾岛史”的概念，突出台湾历史的“海洋性格”^[28]。这也被称为“台岛史观”，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独”史观的重要组成^[29]。民进党也接续了这种说法，在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籍候选人彭明敏声称“台湾不是大陆的边防，而是海洋国家”。这显然是“沙滩筑塔”的无稽之谈，所谓台湾的“海洋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地域化呈现而已。

五是“台湾民族论”。民族认同理论包括“基因原生论”和“政治建构论”。“基因原生论”认为血缘是民族的情感纽带，这种“原生性”在时间上是第一位的。廖文毅就捏造“台湾民族论”，谎称“台湾人”是融合“原住民”、葡萄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等“混血”而成的“独立种族”。“政治建构论”又称“场景论”，认为民族认同是后天建构的，与当事人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台独”史观支持者也据此提出“台湾性”“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命运共同体”等“脱中国化意识”^[30]。例如，1997年台湾作家叶石涛就声称，“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国家”^[31]。“台湾民族”论是“原住民史观”借尸还魂式的翻版，也是“南岛语族论”的升级版，把本来应该属于垂直关系的上下位概念拉到平行关系的二元对立。“中国人”作为国家认同是上位概念，“台湾人”作为与“江苏人”“浙江人”等类似的乡土认同应该是下位概念，但“台独”史观却把“台湾人”与“中国人”置放到同一个平面对立起来。

六是“台湾住民自决论”。这种谬论鼓吹台湾的前途应与其居民通过公投等民主程序自行决定。2025年12月，赖清德就宣称“台湾的前途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2300万人共同决定”^[32]。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民族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台湾本土运动也借“住民自决”概念声称“台湾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1986年11月，民进党成立时就宣称：“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33]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推动“住民自决”进入实操层面，2003年制定所谓“公民投票法”，企图“正名制宪”进而“台独建国”提前创造条件。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不是一个民族，更没有“住民自决权”。“台独”分裂势力在岛内宣扬“住民自决权”，只是在盗用住民自决论来分裂

国家。

七是“外来政权统治论”。“台独”史观支持者打破以中国历史为统筹的叙事框架，转而把台湾视为“国际竞争的场所”。《认识台湾》的“社会篇”从16世纪葡萄牙人“发现台湾”开始谈台湾历史，让外界误认为16世纪以前的台湾是“无主之岛”。“外来政权统治论”甚至炮制了“台湾在历史上是中国殖民地”的虚假叙事，例如将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理歪曲为继日本殖民之后的“再殖民时期”，声称台湾一直“被外来势力轮番压迫”，“台湾的历史是一部被殖民史”^[34]。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此种“历史的难民”和“受害者叙事”，炒作“生为台湾人的悲哀”^[35]来制造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和“亚细亚孤儿意识”，再通过反向策略，即以“台湾第一”“台湾优先”的论述来迎合台湾民众“骄傲的台湾人”意识，把民进党当政塑造为台湾“本土人出头天”，把打压国民党解读为“脱离外来政权统制”。

八是“殖民有益论”。日本殖民台湾期间犯下滔天罪行，杀害台湾同胞60余万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但“台独”史观支持者却炮制出“殖民进步论”“殖民有功论”，将日本殖民美化为台湾的“现代化起点”，鼓吹日本殖民者“致力于从事台湾基础建设并发展台湾经济”，“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地区”，“日本在台湾实行地方选举，让台湾人初尝自治之味”等^[36]。例如，赖清德就宣称“台湾现代化由日本人开始”，为日本殖民统治歌功颂德^[37]。2026年3月，赖清德竟然宣称“日本殖民台湾是为了推动‘东亚共荣圈’”，此番“恋殖”谬论引发岛内公愤。2024年9月，赖清德当局拆除全台湾最后一个“慰安妇”纪念铜像。这种历史的扭曲势必会产生严重后果，导致部分台湾青少年误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2016年12月台湾新竹光复中学学生在历史老师带领下，身穿“纳粹”服装，高举“纳粹卐字旗”参加校庆活动，并把照片在社交媒体上高调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该事件暴露出部分台湾青年对于历史常识的无知，也证明了“台独”史观教育的危害以及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危机^[38]。

九是“台湾光复与中国共产党无关”。2025年8月，赖清德发表所谓纪念文章，仅以“终战”代替抗战胜利。“终战”一词源于日本右翼势力对二战的歪曲表述，赖清德用“终战”代替“日本战败投降”，是在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隔空附和。台湾“陆委会”还妄称“台湾光复节”是为纪念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投降的纪念日，“和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众所周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导帮助台湾同胞组建台湾义勇队等抗日武装力量，支持和推动了台湾光复运动。赖清德当局避谈抗战胜利，试图制造“台湾与中国共产党无关”的虚假认知，本质是为“台独”分裂图谋构建历史谎言。

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治理过台湾”。2025年7月，赖清德在“团结十讲”中宣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赖清德此番谬论试图割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政府继承与主权延续性，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与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台湾拥有无可辩驳的管治权。在对内方面，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实施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在对外方面，台湾地区能否参与以及以何种名义、何种方式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组织，都需要事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凡此种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和行使管治权的生动体现。这也彻底瓦解了赖清德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歪理邪说。

五、“台独”史观的主要危害及其衍生风险

“台独”史观具有广泛的弥漫性和持久的渗透性。30多年来，受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及赖清德当政影响，“台独”史观已经侵蚀至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混淆、国家认同扭曲与统一意愿弱化，更进一步冲击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一）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对台湾民众的误导

价值和观念的变迁往往需要通过代际之间漫长的变化才能自然形成。“台独”史观作为台湾社会的“毒瘤”，既误导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认知，还会损害台湾的长远发展，甚至有可能把台湾推向“无底深渊”。

一是扭曲历史认知，误导青年一代。“台独”势力深谙教育是“台独”史观传播的核心阵地，将政治黑手伸进校园，通过修改课纲、调整教学内容等方式，从根源上扭曲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认知。青年群体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成形，容易陷入历史虚无的迷茫和文化“浩劫”中难以自拔。今天，一些台湾年轻人“岳飞张飞不分”，搞不清历史年代顺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张自忠将军等英雄，盲从“拒统倾独”。在2014年“太阳花”事件中，蔡英文炮制出“天然独”的概念，其实是“台独”史观教育出来的“人造独”，目的是让台湾青年成为“台独接班人”和“台独牺牲品”。这势必会毁掉台湾青年的竞争力，最终造成台湾人才的断层。

二是激化社会对立，制造内部撕裂。“台独”分裂势力长期诉诸“本土”“本省”等话语，区分“我族”和“他族”，散布“台独”观念，将“支持台独=爱台湾”“认同中国=卖台”简单捆绑，制造“非黑即白”的政治正确，利用身份焦虑制造对立，由此带来台湾的“族群问题”“省籍矛盾”^[39]。在台湾地区每次选举过程中，民进党都会猛打“台独”神主牌，将选举议题转化为身份认同问题，制造蓝营与绿营的对立，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民进党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营造“反中仇中”的舆论氛围，升级“绿色恐怖”，以“反渗透”为幌子，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对岛内反“独”促统人士进行政治清洗和系统性迫害。赖清德上台后，“反渗透法”案件激增，2025年已达287例，其中90%以上针对统派人士。这种氛围势必会让台湾社会统“独”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撕裂态势不断加剧，台湾社会戾气横行。

三是弱化文化根基，阻碍长远发展。“台独”史观推动的“去中国化”和“去中华化”，让台湾文化失去中华文化这一核心根基，导致歌仔戏、布袋戏等与中华文化紧密相关的艺术形式发展受限，台湾地区的文化逐渐丧失独特性与创造力，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发展困境。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审查“侨委会”预算时，妄称扯铃（抖空竹）是中国文化且涉及“统战”，要求删除相关预算。该言论引发两岸舆论哗然，被嘲讽为“世芳扯铃”。2026年3月，赖清德当局将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的英文名称改为“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妄图制造“台湾文化独立于中华文化”的虚假认知。大陆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市场，2025年两岸贸易总额达3143.3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增长11.2%，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增长6.0%。民进党当局系列操弄，会破坏两岸经济合作的良好环境，也会影响台湾的经济稳定与民生改善。

（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埋下深层隐忧

两岸统一的难点并不完全在于何时统一或者以何种方式统一，更在于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社会治理。“台独”史观凭借其鲜明的政治建构性和叙事指向性，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服务分离议程，这不仅会制造敌意，加剧两岸对立，更会为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社会治理埋下隐患。

一是去中国化，将“台独”史观融入对大陆的认知战。“台独”史观不是在书写历史，而是在拆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竭力把“中国”塑造为“台湾”的敌人。相对于李登辉的“权谋型台独”、陈水扁的“投机型台独”、蔡英文的“渐进型台独”，“赖式台独”是一种“对抗性的死硬台独”，危害性更大。赖清德作为“台独金孙”，宣称要“让世界迎接新台湾”。这背后的逻辑为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而非“中国的台湾”。赖清德当局不仅从历史上“去中国化”，还在文化、社会、法律层面把中国“敌对化”。2025年3月，赖清德公开把中国大陆称为“境外敌对势力”^[40]，这标志着赖清德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已经由“两国论”走向“敌国论”。

二是“洗涤人心”，扭曲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台湾同胞有着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即使在日本对台湾高压殖民时期，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依然十分强烈。1920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到台湾考察，发现“日清战争以来……台人丝毫未被同化于日本”^[41]。1939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总督府内部参考资料的《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的总序中表示：“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42]台湾学者尹章义认为，当时台湾人普遍具有“汉民族意识”，“视中国为祖国”^[43]。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出版后，就受到了台湾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批判^[44]。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和赖清德当政时期，将“台独”史观逐渐从“政治诉求”转型为“文化认同工程”，导致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出现异化。2024年4月，赖清德声称，自己上台后将推动三大议程：“社会改造”“台湾重建”以及“洗涤每个人的心”^[45]。三件事情的核心就是通过叙事逻辑上的割裂性与对立性，逐渐消解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三是以“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为由制造两岸对立。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对抗来消解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例如，以“民主”名义包装“台独”，制造“台湾民主对抗大陆威权”的虚假叙事，将统“独”之争和“民主与威权”话术强行关联，将大陆的反“独”促统举措歪曲为“威权对民主的打压”，把两岸统一说成是“大陆威权吃掉台湾民主”，将“台独”包装为“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生活方式”，将两岸关系的性质从中国内政问题扭曲为“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民进党当局还图谋以价值观叙事博取西方同情与支持，将“台独”分裂话语“合法化”和“道义化”。2024年5月，赖清德在就职讲话中，自吹自擂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企图融入美西方的所谓“民主阵营”，并将台湾描绘为“民主世界对抗威权扩张的第一道防线”。但事实上，最没有资格谈论民主的就是赖清德。他在担任台南市长期间，曾连续234天拒不接受台南市议会质询。2026年1月，台立法机构审查赖清德弹劾案，但赖清德同样拒绝接受质询，被外界批评为“当代的袁世凯”和“台湾民主的反面教材”^[46]。

（三）为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提供重要借口

一是“台独”史观对外部的依附性。“台独”分裂势力早期在日、美等地构建“台独”史观、鼓噪“联合国托管”“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时，就得到了日、美相关势力的庇护。如今，“台独”分裂势力仍对美日摇尾乞怜，借助外部势力的平台发声造势，在国际媒体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将“台独”化的台湾历史叙事推向国际，在全球范围内虚构台湾作为“独立国家”和“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的假象，为“台独”史观争取所谓的国际舆论空间，进而诱导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

二是外部势力对“台独”史观的利用。为落实“以台制华”，美日等外部势力对于“台独”史观也推波助澜，与岛内的“台独”势力谬论相互唱和。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日军原参谋少佐中宫悟郎与牧泽义夫就串联少数台湾人士，策动“台湾独立”。二战后美国曾炒作“台湾托管”，扶持“台独”势力，近年来又持续炒作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企图为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摇旗呐喊。

三是冲击台湾自主性与安全。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相互勾结，会让台湾逐渐沦为外部势力的棋子，最终损害的是台湾自身的核心利益与民众的福祉。例如，2026 年 1 月赖清德当局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对美承诺台湾的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对美新增至少 2 500 亿美元直接投资，并提供同等规模的信用担保，合计涉及 5 000 亿美元资本投入，相当于台湾 GDP 的 50%以上，也相当于每一位台湾民众要为此支付 68 万元新台币。这份被赖清德当局粉饰为“重大突破”的协议，本质上是其“倚外谋独”“跪美卖台”的产物，只会“掏空台湾”，把“护岛神山”的“台积电”变为“美积电”，把台湾从“科技岛”变为“空心岛”。

六、遏制“台独”史观的主要策略

“台独”史观作为政治建构的叙事框架，强化台湾独立于大陆的“主体性”，借“终战”史观谄媚日本军国主义，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论”迎合美国。这些谬论给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埋下严重隐患。遏制“台独”史观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艰巨任务，未来应立足长远，全面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从史料夯实、教育纠偏、法治惩戒以及国际塑造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既戳穿“台独”史观的历史谎言，又凝聚两岸统一共识。

（一）正本清源，以大一统史观遏制“台独”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47]应对“台独”史观，也是一场守护历史真相、捍卫民族认同的斗争。两岸各界应秉持民族大义，坚持破立并举，标本兼治、破其谬误，立正统叙事，以史实为武器，以交流为纽带，用真相对抗谎言、用联结对抗割裂、用共识对抗分裂，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历史与人心的根基。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两岸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未来负责。

一是固本培元，推进国家统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现代社会中，叙事权攸关阐释方向，若不主动争取，只能被他人定义，最终丧失对于事实的话语权。所以要关口前移，彻底打破

此前的冲击回应模式，也即“台独”分裂势力炮制“台独”谬论之后中国大陆只能被迫批判反击的模式，转而强化主动意识，从源头上遏制“台独”史观，加强学术反击，强化以大一统理念为代表的正统史观，打造具有普遍解释力和鲜明标识的概念与范式，全面掌控历史话语权，强化对事实的定义权。可通过发布历史档案、上线台湾光复档案数据库、公开台胞渴望回归祖国的陈情信等方式夯实法理依据，以扎实的史料来构建完整的历史链条，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戳穿“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谎言，打碎“台独”的历史图腾，引导两岸民众铭记共同历史、坚守民族大义，在维护国家统一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二是还原真相，揭露“台独”史观的谬误。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先生在撰写《台湾通史》时指出，“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未来两岸学者应共同加强台湾史研究，通过深入的学术剖析与系统性研究，批驳“台独”史观的学理谬误，揭露“台独”史观的社会政治危害。例如编纂《两岸抗战史料汇编》《台湾光复历史文献集》等权威资料，明确抗日战争胜利与台湾光复的因果关联。通过 AI 复原等手段将历史真相以可视化和通俗化的方式呈现给两岸民众，用台湾同胞在淞沪会战中浴血奋战等具体人物故事将抽象的历史变成可感知的记忆，让“台独”史观在铁证面前不攻自破，让数典忘祖的“台独”分子自惭形秽，以此破解民进党当局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

三是占据制高点，对“台独”史观展开正义的审判。中国历来就有“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传统，应借鉴历史智慧，以唯物史观对数典忘祖的“台独”史观进行正义的审判，让其无所遁形。彻底批判所谓“台湾民族”论、“台湾人意识”论、“台湾独立建国”论、“荷据以来台湾和中国大陆属于不同的经济圈”论、明郑与清及民国时期台湾是中国的“殖民地”论、日据时期“台湾近代化”论等诸多谬论，揭露其谋“独”拒统的险恶用心。

（二）以法遏“独”，以法律手段坚决挫败“台独”史观

2026年3月，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贯彻反分裂国家法，严惩‘台独’顽固分子。对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李延贺依法定罪判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将“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依法遏“独”的最强音。未来应该继续坚持利剑高悬，惩防并举，完善法律体系、织密遏“独”法律网，以法律形式锚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记忆与法理认同，加大惩“独”力度，对“台独”史观形成强大震慑。

一是以法治手段打击宣扬“台独”史观的顽固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最高可判处死刑。这为打击“台独”史观炮制者和传播者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武器。如对沈伯洋等“台独”顽固分子，找准其软肋痛点和犯罪事实，依法对其立案侦查进行精准打击。构建“清单管理+精准惩戒”的闭环，形成“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强力震慑，从源头上铲除“台独”史观的土壤，以硬核实力斩断“台独”史观传播的链条。

二是追究借文化、教育等方式传播“台独”史观的行为责任。2024年6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职权在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等领域大肆歪曲、篡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宣扬“台独”分裂思想的，属于犯罪行为，应受到法律

惩处。未来对宣扬“台独”史观倾向内容的影视作品或文化活动，应果断亮剑，可通过限制传播、惩治投资方和参与人员等方式追责，切断其传播的资金来源与渠道平台。

三是强化国际法运用，在法理层面固化历史根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条款》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法理链条，明确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必须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国家地位，联合国秘书处法律意见书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未来应继续强化台湾属于中国的主权认知，在国际社会打赢涉台法律战、舆论战和认知战，严防台湾问题国际化特别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等“台独”史观在国际社会外溢。

（三）精准打击，斩断“台独”史观传播的链条

2026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相较于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坚决反对‘台独’”，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由“反对”到“打击”，两字之差绝非单纯的文字调整，而是对当前台海局势的精准判断和精准回应，体现了底线思维与斗争意志，标志着对“台独”的遏制已经从道义谴责转向多维度主动惩治，从“被动风险应对、遏制分裂势头”转向“主动清除隐患、实施精准惩戒”。未来应制定专门遏制“台独”知识生产和输送的具体措施，不仅要加强对学术理论的研究以驳斥“台独”知识的荒谬，也要对“台独”知识的输送渠道加以精准拆解和打击。

一是以中华文化涵养台湾同胞。梁启超曾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48]两岸应讲好中华民族大义，牢牢掌握话语权，下好先手棋，占据道德制高点，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让“台独”史观无处容身。可邀请台湾各界来大陆参访，通过实地参观长城、故宫等文化地标，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通过文化自信筑牢民族认同根基。除历史主题的活动外，还可拓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让台湾同胞切身感受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客观事实，在实践中打破“台独”史观制造的隔阂与偏见，从内心深处提升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二是在教育层面拨乱反正。针对“台独”史观已深度嵌入台湾教育体系的事实，两岸可深化教育与文化交流。如推动“寻根工程”，吸引台湾同胞来大陆祭祖、修谱、认亲，重建两岸之间的血缘纽带。恢复或扩大历史教材合作，还原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真实历史。扩大宣传抗日英雄事迹，鼓励两岸高校共同开发历史研学项目，组织台湾青年重走抗战遗址，引导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势力美化日本殖民的险恶用心。

三是在社会舆论层面全方位抵制。两岸有识之士应共同发声，提升控局塑势能力，挤压“台独”史观的生存空间，在舆论上形成“历史不容篡改”的强大声势。两岸媒体可加强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开设专栏、专题节目，揭露“台独”史观的荒谬之处，引导两岸民众守护历史真相。文艺工作者可以亲情、乡愁、抗战、光复为主题，创作反映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的作品，用艺术的力量提质增效，唤醒台湾同胞沉睡的民族情感。针对民进党将“白色恐怖”中牺牲的红色烈士包装成“台独斗士”的行为，可通过如拍摄纪实影视作品《沉默的荣耀》等，还原爱国志士的真实

事迹,用“我们共同的历史”来消解“台独”史观“他们VS我们”的对立叙事。

四是在国际社会夯实一中原则。加强议程设置,在国际舆论场主动发声,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两岸历史真相,驳斥“台独”歪理邪说,打破“台独”势力的虚假叙事和恶意叙事。在国际会议和多边场合,以多语种阐述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借助海外社交平台和国际媒体,以数据化、卡通化、小视频化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台具象传播,发布两岸历史文化关联的权威内容,反驳“台独”势力炮制的“台湾独立种族”等谎言,争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广泛认同。

七、结语

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9]“台独”史观本质上是“台独”分裂势力数典忘祖的政治工具。但所谓的“台湾独立”以及背后的“去中国化”,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注定是一场闹剧。历史的铁律早已昭示,任何分裂国家的图谋、任何对历史的篡改,都无法撼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1965年5月,“台独”史观始作俑者廖文毅自我批判其台湾人是“混血民族”的错误理论,明确表态“台人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同属炎黄后裔,台省同胞都自中原而来,有千百年血统可考”“去搞什么台湾独立,毫无前途可言”。连陈水扁也坦承,“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50]。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无论台湾当局怎样篡改历史,都无法割裂两岸的历史和文化连结。两岸同胞都应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彻底铲除“台独”史观的生存土壤和传播链条。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J]. 党建, 2021(4): 4-11.
- [2] 陈孔立. “台独史观”的建构与严重影响[J]. 台湾研究, 2018(5): 1-6.
- [3] 李细珠. “台独”史观平议[J]. 台湾历史研究, 2023(1): 1-23.
- [4] 程朝云.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J]. 近代史研究, 2018(4): 147-153.
- [5] 伍俐斌, 林卓立. 赖清德当局推行“台独”史观的做法、危害与反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6): 142-155.
- [6] 王振锁, 乔林生, 乌兰图雅.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5卷(1945—1972)[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182.
- [7] 黄秀政. 台湾史研究[M]. 台北: 学生书局, 1992: 1.
- [8] 王仲孚. 为历史留下见证: 《<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件新编》[M]. 台北: 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1: 373.
- [9] 杜正胜. 认识台湾真的这么为难吗?[N]. (台湾)自由时报, 1997-06-02(4).
- [10]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2.
- [11] 张胜彦. 台湾史研究[M]. 台北: 华世出版社, 1981: 1.

- [12] 王英. 两岸政治认同形成机制研究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 178.
- [13] 林明德. 马关条约的历史教训 [N]. (台湾) 台湾时报, 1995-04-17 (3).
- [14] 蔡英文. 认同与政治: 一种理论性之反省 [J]. (台湾) 政治科学论丛, 1997 (6): 62-78.
- [15] 王甫昌. 族群意识, 民族主义与政党支持: 一九九〇年代台湾的族群政治 [J]. (台湾) 台湾社会学研究, 1998 (2): 1-45.
- [16] 台行政机构将“汉人”变“其余人口”各界痛批荒谬可笑 [EB/OL]. (2025-05-13) [2026-01-25].
<https://www.xinhuanet.com/20250513/c12ca9ff20a44b50a5b80b059b4bed30/c.html>.
- [17] 李乔. 台湾文学正解 [J]. 台湾文艺, 1983 (8): 7-11.
- [18] 补助引争议! 85万资本额小公司获1.1亿拍《零日攻击》 [EB/OL]. (2024-12-16)
[2025-12-18].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41216701439-431401>.
- [19] 王晴佳. 台湾史学史: 从战后到当代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260.
- [20] 杜正胜. 历史教育的改造 [N]. (台湾) 联合报, 1995-01-23 (4).
- [21] 杜正胜. 乡土文化与乡土历史: 兼谈乡土博物馆之设立 [J]. (台湾)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季刊, 1993 (3): 3-8.
- [22] 王春良. 世界现代史文献与要论选编 (1900—1988)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0: 492.
- [23] 2025年12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 [EB/OL]. (2025-12-01) [2025-12-19].
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202512/t20251201_11764036.shtml.
- [24] 赖谈“独立”扯“长毛象”, 媒体人打脸: 唐山过台湾的先驱 [EB/OL]. (2025-06-23)
[2026-01-1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50623003679-260407?chdtv>.
- [25] 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 宣示“改革”决心 [EB/OL]. (2016-05-20) [2025-11-17].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444>.
- [26] 陈支平, 刘慧钦. 本末倒置的台湾“南岛语族”问题研究——驳“台湾南岛语族原乡论” [J]. 台湾历史研究, 2021 (1): 16-27.
- [27] 陈芳明. 探索台湾史观 [M]. 台北: 自立晚报出版社, 1992: 3-62.
- [28] 曹永和. 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6: 449.
- [29] 张隆志. 当代台湾史学史论纲 [J]. (台湾) 台湾史研究, 2009 (4): 163-175.
- [30] 萧阿勤. 重构台湾: 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3: 1.
- [31] 叶石涛. 台湾文学入门 [M]. 高雄: 春晖出版社, 1997: 146.
- [32] 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辑录 (2025-12-03) [EB/OL]. (2025-12-03) [2025-12-19]. https://www.gwytb.gov.cn/xwdt/xwfb/xwfbh/202512/t20251203_12738377.htm.
- [33] 孙亚夫, 李鹏. 两岸关系40年历程 (1979—2019)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 51.
- [34] 邱贵芬. “发现台湾”: 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 [J]. (台湾) 中外文学, 1997 (7): 156.
- [35] 施正锋. 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 现况, 以及挑战 [C] // 施正锋. 思考台湾外交大战略. 台北: 翰芦出版社, 2015: 169-206.
- [36] 陈孔立. 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136.
- [37] 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辑录 (2025-05-14) [EB/OL]. (2025-05-14) [2026-01-21]. https://www.gwytb.gov.cn/xwdt/xwfb/xwfbh/202505/t20250514_12738377.htm.

- gwytb.gov.cn/xwdt/xwfb/xwfbh/202505/t20250514_12700620.htm.
- [38] 台湾光复中学学生扮纳粹引风波 校长或将引咎辞职 [EB/OL]. (2016-12-25) [2025-11-24].
<https://www.rmzxw.com.cn/c/2016-12-25/1240133.shtml>.
- [39] 张茂桂. 省籍问题与民族主义 [C] // 氏编. 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 台办: 业强出版社, 1993: 233-278.
- [40] 国台办发言人就赖清德“台独”分裂言行发表谈话 [EB/OL]. (2025-03-13) [2025-12-09].
https://www.gwytb.gov.cn/xwdt/xwfb/wyly/202503/t20250313_12689915.htm.
- [41] 安部矶雄. 台湾的教育问题 [J]. 台湾青年, 1920 (4): 27-32.
- [42] 林书扬.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 第2编 [M]. 1939: 1-2.
- [43] 尹章义. “台湾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观点 [J]. 台湾研究, 1994 (2): 4-16.
- [44] 许南村. 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 [M]. 台北: 人间出版社, 1994.
- [45] 赖清德喊上任后要洗涤人心 历史哥惊吓 [EB/OL]. (2024-04-08) [2025-11-27]. <https://hk.crntt.com/doc/1069/1/7/8/106917861.html?coluid=253&kindid=14678&docid=106917861&mdate=0408101424>.
- [46] 台蓝白阵营宣布弹劾赖清德 将他比作袁世凯 [EB/OL]. (2025-12-19) [2025-12-27].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51219-7988016>.
- [4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44.
- [48] 梁启超全集: 第2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497.
- [49] 龚自珍全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22.
- [50] “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两岸未来如何前行? [EB/OL]. (2025-10-16) [2025-12-09]. <https://www.gvm.com.tw/article/125090>.

责任编辑: 杨稀琴 校对: 刘泃菡

从“嵌入式”走向“体系化”：国家法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的优化进路

——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基干

杨继文^{1, 2} 张若曦¹

(1. 中央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北京 100081;

2.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从法律层面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国家法律的一项具体规定。基于对我国现行 308 部国家法律的统计分析，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体现为“以点带面”的结构特征，存在重复性明显、嵌入不深入、体系性不足和实操性较弱等问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出台是一个重大契机，推进了国家法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的体系化建设。基于领域型规定和综合型规定的双重适用原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的体系化进路，应当通过贯彻良好衔接原则，构建立改废释工作机制，完善法律间的统筹协调与联动配合制度，明确权力责任主体和完善权利义务的制度性保障等进行优化，最终以《促进法》为基干、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支联动和系统集成，推进“点面结合”的体系化实现，在法治轨道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法律；嵌入式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6) 02-0223-12

DOI: 10.13946/j.cnki.jcqi.2026.02.017

作者简介：杨继文，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张若曦，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制保障研究”（24ZDA066）

引用格式：杨继文，张若曦. 从“嵌入式”走向“体系化”：国家法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的优化进路——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基干[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223-234.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从 2018 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入宪，到 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一项立法原则，再到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我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法律规定正在从“嵌入式立法”逐步推进至“体系化建设”。部分法律明确规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和相关制度机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法理基础与实践推进的二元发展格局。在法理基础层面，宪法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条款以及“维护民族团结”义务规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体系提供宪法根基。在立法实践层面，相关规定多散见于各类法律规范中，呈现嵌入式立法、以总则中的目的原则性条款为主的特征；随着立法实践的推进，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定逐步向具体权利、义务等精细化方向延伸。

此前，学界多从宪法层面的奠基作用^[1]、价值贡献^[2]、法律解释^[3]和地方立法的立法路径^[4]、实践探索^[5]等角度切入，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内涵^[6]、法理^[7]、立法研究^[8]、制度机制^[9]、内在机理^[10]和内在逻辑^[11]、保障机制^[12]、立法体系^[13]等层面，试图将理论视角从过去侧重于保障各族群众的特定权利，转向更侧重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认同和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然而，现有研究多以政策话语为主，学科视角集中于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层面，仍存在规范分析不足的问题，缺乏从法律解释学视角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法律规定，尚未具体论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之间如何实现良性衔接的问题。鉴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制定出台的背景下，本文以当前现行国家法律规定为样本，采取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剖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法律规定的现状与不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化发展提供学理参考和优化路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的结构分析

国家通过法律体系的整体合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宏观理念具象化为各类主体的法律行动指南，为理解其法律实现的体系优化路径提供全过程指引。本文对现行国家法律进行量化分析，系统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相应法律中的分布规律与呈现形式，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在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以点带面”特征，即以总则中的原则性条款为主，逐步向具体的职责与义务性规范延伸。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法律规定及条款情况，系统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法律中规定分布、表述方式、规范类型及功能定位。本文的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主要分两类：一是法律规范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人大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官网，确保了法律文本的权威性与时效性；二是学术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为立法实践分析提

供理论参照与实证支撑。具体来看，在数据收集阶段，采用“定向检索+系统筛选”方法。针对法律规范，按“效力位阶”分类检索，主要提取宪法及国家立法，辅之以地方层面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自治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形成较为完整的法律规范数据库，共涉及现行有效 308 部法律、611 部行政法规。同时，在中国知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法律”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筛选出符合主题的 CSCI 来源期刊文章共计 47 篇。通过条款编码梳理不同阶段入法特征，统计目的性条款、原则性条款、义务性条款等的具体占比及变化趋势。该过程注重提炼核心观点并与立法实践对照，验证立法演进规律的合理性，识别现有立法与理论预期的差距，为后续分析提供依据。

（二）主要内容与结构特征

截至 2026 年 3 月 3 日，我国现行有效法律中明确规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则条款的有 13 部，还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等 2 部行政法规，共计 15 部国家法律法规。这 15 部法律法规共计 963 个法条，其中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的条款共计 17 条，仅占 1.77%，呈现嵌入式立法的“以点带面”特征，覆盖范围有限、条款密度偏低（见图 1）。



图 1 明确规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法规

以上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的条款中，从内容属性看，立法目的类条款占 29.41%，职责义务类条款占 23.53%，总则章节条款占 70.59%。核心规范集中于目的宣示与责任界定，细则性条款不足。从时间维度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体系逐步从“个别探索”到“深化实践”。相关法律规定多为倡导性、鼓励性的“软法”，如《文物保护法》《陆地国界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遗产、国家认同宣传、未成年人教育相结合。有些法律中的条款具备更强的实操性，如《立法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确立为立法基本原则；《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要求；《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基层治理相链接。《促进法》颁布实施后，将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统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体系。

1. 具体法律规则的类型结构

一般认为，法律规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各类主体的行为指引。“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结构揭示了具体法律规则是通过“在特定条件下对特定主体的行为设定标准，并辅以相应的后果保障”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根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前述相关法律中的具体表述，本文将有关规定划分为四大类：一是原则类；二是目的类；三是职责类；四是义务（责任）类，具体请参见表1。

表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的章节位置与主要类型

类型	名称	章节位置
立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第一章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章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第一章总则
立法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	第一章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第一章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一章总则 第四章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通用文字法	第一章总则
法律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	第一章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一章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一章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二章家庭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一章总则
法律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第一章总则
法律职责 (行政法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第三章网络信息内容规范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第四章全民阅读保障

具体来看，在原则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在总则章节中有所规定，例如《国防教育法》第三条规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全体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在目的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为具体法律规则要实现的目标价值。例如《黄河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阐发黄河文化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职责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多作为国家、民族事务部门、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呈现。例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十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在义务类中，家长、人大代表等是履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义务的主要主体。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八条规定：“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2. 主要结构性特征

本文进一步对上述规定的章节位置、法律表述、主体范围和具体内容等进行结构性分析，提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和主要规律。

第一，从章节位置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规定大部分在总则章节中体现。总则章节通常规定本法的目的、框架、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等，并对后续章节的法律规定有统率作用，具有确立法律价值导向、指导法律适用、协调规范体系的功能。诸多法律法规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置于第一章总则部分，强调其作为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指引作用。具体来看，2023年《立法法》修正时新增的第八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立法原则，旨在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定的价值目标和意义；《黄河保护法》第十七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保护结合，与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历史脉络纵深相呼应。

第二，从法律表述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定嵌入各领域的不同法律规范中，体现出嵌入式立法特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条款类型多样，包括《国防教育法》第三条规定的立法原则、《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七条体现的立法目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要求的职责、《代表法》第八条明确的义务，等等。这种嵌入式条款便于根据社会需求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对法律进行局部修改和完善，可及时将新的制度需求纳入法律体系，而无需对整个法律体系进行大规模重构。这种渐进的嵌入式立法方式能够使法律更好地适应时代变化，保持法律的时效性和适应性。

第三，从主体范围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法律要求呈现扩大趋势。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立法法》《黄河保护法》的规定中可见，较早时期的法律要求多针对国家、相关政府部门等，具体体现为倡导性要求。例如《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和规范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促进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民族工作政策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向基层延伸，相关法条内容规定越来越具体。例如，2025年修正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新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旨在通过基层组织促进民族团结；2021年制定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家庭教育，响应“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国家号召，这种演变反映政策从国家主导转向社会共治，强化家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意义。

第四，从具体内容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规定逐步由原则性倡导发展为具体职责和义务，与相应主体的主责主业结合更为紧密。较早，如《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要求“支持和规范文物价值挖掘阐释”。而《促进法》细化了教材使用（第十六条）、教育体系（第十八

条)、城市规划(第二十三条)等具体措施。这种精细化趋势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越来越可量化、可考核,如体现为要求媒体“制作、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纳入规划及年度计划”(第五十条)等。

(三)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上述主要内容和结构特征的分析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涉及的领域和数量在逐步增多,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化制度化的迫切要求。然而,在具体法律条款的规定和法律表达方面,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存在重复规定。现行国家法律规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多流于形式上的简单罗列^[14]。由于未结合不同法律位阶的功能定位与不同领域的治理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不同法律文本中的相关表述缺乏实质性区分和功能互补。这种重复未充分考虑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不同效力层级规范的适配性,也未针对文化遗产、政治治理、社会民生等不同领域的特点形成差异化规范表达,造成规范资源未能精准配置,削弱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法治场景中的引领力与规范力。

第二,嵌入不深入。“当前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有些条文内容已滞后于时代发展需要,有的内容在实践中执行效果不好,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需要。”^[15]我国现行法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定呈现嵌入式的点式分布状态,使得法律原则的确定、规则的设计以及制度框架的构建未能深度融合,难以完全契合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的全局性、整体性要求。具体来看,现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大多只是在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等宏观层面,未能深度融入具体法律体系、权利义务分配以及实施程序等核心环节,导致该理念难以转化为贯穿法律实施全程的行为准则和评价依据。这种碎片化的嵌入方式,使规范适用范围存在缺失,难以满足构建各领域各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迫切需求,并可能阻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法律实践中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南。

第三,体系性不足。不同效力层级及各领域间的法律规范间缺少清晰的协调机制,这不利于构建逻辑连贯、全面关联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实施体系。从纵向角度看,上位法的普遍性原则在下位法的具体制度构建中未能充分落实,造成下位法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范间缺乏有机规划分布。从横向角度分析,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及基层治理等领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范彼此关联性较弱,缺乏基于综合治理目标的协同规划,未能形成横跨多领域、贯穿各层级的统筹合力。体系性不足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规范难以发挥整体作用。

第四,实操性较弱。这具体体现为权责配置、权利保障、义务设定以及问责机制之间存在不匹配情况,相关法律条文缺乏明确保障权利的条款,表述较为模糊。在权责划分上,国家机关、基层自治组织和家庭单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中没有明确界定具体管辖范围和协调机制,导致责任划分不清晰,职能履行缺乏明确依据。在权利保障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合未能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有效结合,纠正侵权行为的机制也明显不足,表现为有关法律规定中没有详细列出各族群众在参与社区建设、获取公共服务、维

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权利及配套的权益保障制度^[16]。在义务设定上,相关法律规范多为原则性倡导,缺乏具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为标准、实施程序和机制,难以引导相关主体形成明确的行为预期。在问责机制方面,缺乏配套的问责框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未明确责任形式和执行机制,导致监管要求可能流于形式成为“软约束”。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的体系化原理

针对“嵌入式立法”存在的碎片化困境,需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宏观理念转化为法治层面的制度供给,通过结构协调与功能互补的制度安排,确保相关法律规范从“纸面”走向“行动”,推进法治效能的集成优化,实现制度合力的最大化。

(一) 领域型规定与综合型规定的双重适用原理

在法学理论界,领域法学以问题导向为理论之基、以社会领域为规范基础、以领域规律为社会基础^[17]。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开放性、应用性和整合性的新型法学^[18]。例如,《民法典》的成功编纂,带动了多个领域制定“基本法”的立法实践。领域“基本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领域内政府机构和职能、管理制度和机制、治理资源竞争能力的整合,进而提升治理效能^[19]。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已非单一部门法所能涵盖,而是广泛融入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理、生态保护乃至国防外交等各领域,呈现出极强的领域型规定现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作为“领域法”来考量,是部门法范式基础上的“跨界资源整合”^[20]。这就要求法学研究与实践必须超越传统部门法的边界划分,转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整体性、融合性思维,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领域型”规定,推进在问题导向思路中实现规范系统的功能优化。

在交叉学科视野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是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交叉议题的现实需求^[21]。根据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要充分利用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出一个立体的、系统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论证其综合法概念性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提供学理上的有力支撑。“作为新的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动力、机制、规律等。”^[22]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艰辛探索的百余年历程,是新形势下民族学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23]。这就要求国家立法必须具备“学科融合”的体系化系统思维,能识别并整合不同规范背后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机制,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成为综合型规定,进一步要求相关法律及其具体规定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制度供给和保障力量。

领域法的任务导向和问题意识决定了其无法采用传统教义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自身的体系化

工具。而指向个人利益的权利概念难以契合领域法的公共利益本位,应当主要在客观价值秩序的意义上使用^[24]。由此,需要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是领域型和综合型双重适用规定,具有跨法际关系的整合价值和统筹协调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体系是我国新时代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中的关键核心,是以《促进法》为基本法律,进而统筹各部门、各地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嵌入式条款。这种体系化方案从领域型法律规定角度切入,从综合型法律规定贯穿考量,旨在通过法治的强制力、引领力和保障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公民的法治信仰和行为习惯,确保其从“纸面上的法”有效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实现建构以相关学科体系为根本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主知识体系^[25],以指导覆盖广泛、层次丰富、结构协调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法治中国。

(二) 健全法律制度机制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这要求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屋建瓴的视野谋划发展,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法治根基;以统筹兼顾的方法破解难题,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贯彻良好衔接原则。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需要构建一套全面的跨学科融合审查与指导体系,推进法律之间的美好衔接。构建立法前的评估与立法后的审查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作为评估相关领域法规质量的重要标准。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治理、生态保护以及教育科学人才培养等领域中,需系统评估其可能产生的对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的影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例如,从基层治理角度来看,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结合自己的主责主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建立“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工作机制,通过设立法律顾问、开展法治讲座、建立法治文化阵地等方式提升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法治意识;在基层自治单位推行“法律规范+村规民约”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优势和专业司法保障机制,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26]。同时,应积极引导将这一标准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立法中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最终实现从个别条款的“点状嵌入”到整体制度框架的“全面融入”。

第二,构建立改废释工作机制。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全面审查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述的法律规范,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进行梳理,明确各规范的制定主体、效力等级、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通过比对分析,识别不同法律规范的重复规定,以及相互冲突、不一致的内容。以修改、合并等方式对存在重复、冲突或者不协调的法律规范进行整合,形成统一、协调的法律规范体系。例如,可以进一步强化涉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并做好法律法规的调整和清理等工作^[27]。另一方面,注重完善立法技术并实施分层设计方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要求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优先推进不同法律规范类型化、分层化,将一般性原则转化为具体情境化条款。通过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备案审查机制,明确各级立法机关的职权范围与工作重点,坚持上位法建立总体框架,下位法根据地方实际提供细化的行为指引,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中具体规定的精准度与可执行性。具体来讲,国家立法应侧重于结构性与原则性条款,而部

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需根据行业特性与区域实际进行精细化调整与创新。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地方条款对上位法内容的简单重复，确保各层级立法都能提供精准可行的行为指引。

第三，完善统筹协调与联动配套制度。可专门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立法协调机制，积极开展立法评估，对拟制定的法律规范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协调性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重复、冲突问题。在协同发力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需在立法初期发挥统筹领导作用，对涉及民族工作的立法项目进行统一规划，明确各层级立法的权限边界和重点领域；在既有实践基础上完善民族团结工作联席会议机制^[28]，促进部门协同、提升工作效率，使得不同法律部门在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关键制度上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层层递进的法律体系规范合力，进而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一体化。例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式地方立法中尚存在立法主题不突出、文本表达不规范、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通过加强中央立法指导和统筹协调，明确立法主要内容、健全联动配套保障机制、增强立法特色要素^[29]。

第四，推进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制度性保障。法律整合关键是在法律规范中清晰界定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具体权力（权利）、义务与责任，特别是要细化各级政府的主导责任和各部门的权力职责，将倡导性要求转化为可考核、可追责的具体指标。明确国家、地方、基层三级责任主体：国家层面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统筹协调；地方层面由省级党委政府负总责，建立民族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基层层面由乡镇（街道）党（工）委具体落实，村（社区）党组织要主动作为，建立起“谁主管、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将民族工作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同时，要为权力（权利）义务的实现提供清晰的路径指引和有力的制度保障，配套设计必要的激励措施、程序规定和法律责任条款，确保良法能够转化为切实的善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方面，建立民族工作专家库，提供专业法律指导，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和发挥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作用，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工作的监督合力。

四、以《促进法》为基干的体系化实现

以《促进法》的制定实施为重大契机，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层级分明且功能互补的法律规范集群，厘清基本法与专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与功能定位，有助于将“嵌入式立法”转向“体系化立法”，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奠定制度根基。

（一）确立《促进法》的基干核心地位

在法治体系的宏观架构中，法律的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位阶定位与统摄能力。“经过 70 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30]《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实践层面，过往的民族工作主要依托《民族区域自治法》，其侧重点在于调整各个自治地方的法律关系。《促进法》则聚焦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调整的是全国范围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涉及的法律关系。《促进法》成为继“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后，以法律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的

又一里程碑^[31]。这意味着,《促进法》必定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为各级各类法律规范提供价值底色与行动基准。例如,在处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与利益补偿的关系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行政命令,而是要在《促进法》重点突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原则下,重新审视权利义务的分配逻辑。

《促进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根基的重要法律,在2026年3月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标志着《促进法》成为民族工作领域的又一部基本法律。一方面,《促进法》的这种基本法律性质,不仅是以“新法优于旧法”原则解决法律适用的冲突,更是为了在法治层面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性,形成法律要求与制度建设的合力。另一方面,《促进法》的制定出台,确立了该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中的“定海神针”作用及其基干地位。由此,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正迎来从“嵌入式”向“体系化”转型的历史性契机,真正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法治轨道上的常态化、体系化和长效化。《促进法》的基干引领、其他法律分支支撑与立体优化的协同路径,能够有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法治护航。例如,在《促进法》中,20处使用“依法”,4处使用“依照”,尤其是在序言最后一段的“都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注重与其他相关法律进行良好衔接,目的在于进一步实现《促进法》的基干核心引领作用,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的体系合力。

(二) 体系化实现的分支联动与系统集成

如前所述,《立法法》《教育法》《黄河保护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13部重要法律,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在具体行业、具体地域落地的分支。这些分支意义上的嵌入式规定往往存在“点状分布、各自表达”的问题,亟待推进以《促进法》为基干、相关法律协同联动的立体机制构建。例如,在促进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方面,2021年修订的《教育法》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教育方针。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中起到扩展作用的分支,需将其与《促进法》对接,在课程标准设计、教材编纂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面推广中,建立起可考量的制度指标。再如,在实现生态与文化的交互链接方面,《黄河保护法》虽为生态立法,但其中关于“黄河文化”的保护规定,实质上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法治化。通过与《促进法》的协同,可以将黄河流域开展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与生态补偿机制、文化遗产溯源工程有机结合,使生态保护的过程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的过程。还如,在完善社会治理的规范接口方面,2023年出台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与《促进法》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在分支联动中,需明确两法在“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上的职责边界,避免制度重复建设,确保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民族工作能够精准嵌入公共服务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之中。

法律之间的体系化并非规范的简单堆砌,而是一种基于系统集成思维的立体化重构,具体体现在纵向的位阶衔接与横向的功能互补之上,通过“点面结合”的系统立体机制,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平面化的条款嵌入演变为立体化的制度结构。一方面,在“点”的突破上,应依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机制,对现行法律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相适应、甚至存在逻辑冲突的条款进行“立改废释”。针对某些地方性法规中过分强调差异性而忽视共同性的规定,应及时予以修正,确保微观之点不偏离宏观之主线。另一方面,在“面”的构成上,需

建立立体化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其中,要坚持《促进法》基于提供的总领框架,推进现有以及未来国家法律的良好衔接和面上支撑,推进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等适时制定或者修改完善。在实践样本中,如近年相继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等,就是这种立体化思维的体现。它们将上位法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本地化、场景化的行政职责与权利保障,形成了一套“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规范集群。这种法律体系之间的系统集成,不仅强化了法律的强制性与约束力,更通过建立民族团结进步评价指标体系等程序化的具体制度设计,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法治轨道上实现了从“软引导”向“硬约束”的跨越。

五、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定,从“嵌入式”立法走向“体系化”建设,既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在法治领域的必然延伸,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促进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宪法性法律,也是民族工作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同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法律。以《促进法》为基干,构建层级分明、逻辑严密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范集群,能够从根本上破解规范重合与实操性不足等问题,实现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的理论供给与治理需求的深度融合。展望未来,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优化与制度闭环的有效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法治轨道上形成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制度合力,不仅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坚实保障,更将在凝心聚力中进化为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基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贡献持久而深沉的法治力量。

参考文献:

- [1] 熊文钊,王楚克.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3):10-19.
- [2] 宋才发.宪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论析[J].青海民族研究,2025(1):54-63.
- [3] 邵六益.宪法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行宪法民族团结条款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88-95.
- [4] 郑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立法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2024(5):92-101.
- [5] 叶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立法路径及完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22-27.
- [6] 宋才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内涵及路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1(4):28-35.
- [7] 田钊平.民法典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理探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9.
- [8] 沈寿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5(2):125-135.
- [9] 汪习根,方路锦.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制度机制塑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5):31-43.

- [10] 张志华,文晓静.民族教育法治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以教育法典典化为背景[J].民族学刊,2023(12):128-138.
- [11] 江国华,赛依旦·阿合买提.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内在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25(1):12-22.
- [12] 宋婧,张立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0(8):17-23.
- [13] 虎有泽,程荣.构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体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140-149.
- [14] 蒋慧,孙有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理论阐释、规范考察与制度完善[J].广西民族研究,2021(3):36-44.
- [15]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158.
- [16] 杨继文,虞子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探索、模式归纳与法治进路[J].民族学刊,2025(10):91-103.
- [17] 何松威.领域法学的理论反思与证成[J].学术月刊,2025(5):100-112.
- [18] 刘剑文.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领域法学的功能担当[J].广东社会科学,2024(5):237-253.
- [19] 林鸿潮.领域“基本法”的功能承载与发展空间[J].现代法学,2025(5):148-161.
- [20] 李大庆.法学范式竞争与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J].江汉论坛,2019(4):116-122.
- [21] 田钊平,张耀.论交叉学科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J].民族学刊,2025(7):37-47.
- [22] 严庆.交叉与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刍议[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5-10.
- [23] 王延中.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J].青海社会科学,2024(4):5-9.
- [24] 仇晋阳.领域法典化的教义学反思:以体系化为中心[J].行政法学研究,2025(2):167-177.
- [25] 李维军,范金金.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主知识体系:学科、学术与话语[J].广西民族研究,2023(6):52-59.
- [26] 杨继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司法保障的基本原理与制度机制[J].贵州民族研究,2025(4):22-27.
- [27] 李俊良.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体系之发展和完善——以宪法为视角的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24(5):102-112.
- [28] 刘培功.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意义与建构[J].河南社会科学,2020(9):17-24.
- [29] 孟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式地方立法的文本考察——以430部地方立法文本为分析对象[J].民族大家庭,2025(1):109-118.
- [30]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81.
- [31] 刘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促进型”立法属性与制度实现[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196-208.

责任编辑:龚静阳 校对:卢媛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内在张力与实践路径

——基于 2026 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分析

戴维来

(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2026 年 1 月, 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掳走该国总统马杜罗, 表明其对外政策已由所谓“规则维护”滑向以武力夺取政治成果的霸权霸凌模式, 直接冲击《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原则。在债务高企、技术优势动摇、资源争夺等结构性危机驱动下, 美国大肆破坏国际规则, 直接挑战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 导致全球秩序陷入失序困境。美国强行掳走马杜罗事件引发全球强烈反弹, 加速形成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强权政治为核心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其生成逻辑是区域安全风险溢出促使各国联合自保, 权力转移背景下霸权冒险主义加剧, 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多边合作重构, 国际社会对正义与秩序的道义共识凝聚。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呈现防御性联合、议题导向、开放性网络与建设性力量特征, 但可持续发展面临内在张力。为实现从同声谴责走向同行共建,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应以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 构建从共识到制度的完整体系, 包括坚定多边主义、重塑国际话语体系、深化发展安全合作、坚持结伴不结盟, 避免阵营对抗。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全球秩序的深层变革与结构优化,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 特朗普政府; 委内瑞拉危机; 门罗主义; 唐罗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235-17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6.02.018

作者简介: 戴维来,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两大工程”三期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安全格局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025FDLDGC03)

引用格式: 戴维来.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内在张力与实践路径——基于 2026 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2): 235-251.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再调整。一方面，全球性风险与跨国议题客观上要求更加紧密的多边协作；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回潮，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治与多边机制受到持续挤压。在此背景下，强权政治回归和个别国家公然蔑视国际规则，对全球治理有效性与国际体系稳定性构成了系统性冲击。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掳走民选总统马杜罗，凸显霸权对地区秩序占有式想象。委内瑞拉危机放大了各国对安全、尊严与发展权的结构性焦虑，推动反对强权、维护《联合国宪章》的道义诉求与防止风险外溢的安全关切在更大范围内汇合。

围绕上述变化，既有研究主要形成四条学术线索。第一类研究涉及霸权及其行为逻辑的再审视与强制工具的复合化运用。相关研究认为，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其行为模式正从规则的“塑造者”转变为规则的破坏者^[1]；霸权强制工具箱呈现军事威慑、经济制裁、金融封锁、科技管制与法律战相互嵌套的特征^[2]。此类工具已从单纯提升对手成本延伸为系统性秩序塑造，并产生显著外溢效应。第二类研究聚焦议题联盟、软平衡、安全治理的操作逻辑。“软制衡”理论认为，当硬对抗代价过高、联盟承诺难以兑现时，多数国家更可能借助国际制度、外交安排与经济工具来迟滞、消解或抵消强权行动，小多边机制与议题性合作更为活跃^[3]。有研究从国际法与争端解决机制切入，集中讨论单边制裁与金融制裁对国际经贸秩序、合同履行与仲裁程序的冲击，并探索反制裁法律体系、阻断机制与私人救济路径^[4]。第三类研究聚焦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相关文献认为，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其群体性崛起标志着国际体系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共治的深刻转型；全球南方已从规则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秩序积极塑造者，其规范诉求集中于反对单边主义、维护主权平等与发展权利，并通过金砖、G20、“77国集团+中国”等平台提升议程设置能力^[5]。第四类研究涉及国际统一战线议题的理论化与议程化。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开始将统战的组织逻辑、动员逻辑与制度逻辑向国际层面延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讨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结构与实现机制，如强调要依托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进程创造良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6]。

既有研究揭示了当前国际秩序危机的深层根源，即霸权国家行为模式转变与现有制衡机制失灵。既有研究指出通过“软制衡”的广泛实践和全球南方集体觉醒，为重塑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动力。不过，对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影响因素、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仍需专门深入讨论。从历史谱系看，反对强权政治、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长期构成亚非拉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规范资源。历史上的不结盟运动和亚非拉国家在万隆会议等场合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制强权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这些运动的核心精神主要是维护主权平等、反对外部干涉，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当今时代，霸权国家对多边机制的轻视甚至绕行，不断削弱现行制度的制衡功能，促使各国开始思考如何汇聚多数国家共识与力量，形成可持续的反霸凌协同行动，探索更公正、更稳定世界秩序重构路径。这正是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和现实需求。近年来，全球南方作为政治动员词汇与研究范畴并存，内部差异与共同关切并行，意味着统一战线既可能以道义共识为黏合剂，也必须以机制设计来克服分散化困境。本文将回答

在霸权强制工具多样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掣肘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如何形成和巩固反霸凌共识，并将其制度化为可持续的协同行动能力。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形成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推动全球秩序的深层变革提供系统性思想框架和实践路径。

二、美国霸权的蜕变逻辑与国际秩序危机

委内瑞拉危机以极端方式表露出美国霸权心态与行为的蜕变：从“以规则塑造秩序”转向“以武力撕裂规则”，从“地区稳定叙事”滑向“势力范围公开宣示”。该事件根源于美国拉美政策长期演进的思想基因，与冷战后战略焦虑的现实诱因叠加。特朗普政府鼓吹的新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在此处汇总爆发，表述更直白、手段更粗暴、目标更激进、影响更恶劣。

（一）美国霸权霸凌理念的三阶段演变

回溯美国对拉美的政策谱系，可以看到一种从宣示到干预再到占有的递进逻辑，观念与工具不断升级，“合法性”话语逐步空洞化，直至趋近于赤裸的强力政治。

第一阶段是门罗主义拒止逻辑的势力范围圈定。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宣示欧洲不得在西半球扩张。就初始话语而言，它带有明显防御性与排他性，强调外部力量不得进入，同时为美国在西半球确立优先权与特殊地位奠定基础。但此后门罗主义逐渐从拒绝外来殖民演化为排除竞争者进入后院的“正当化”工具，为美国在拉美频繁干预提供观念支点。据统计，1776—2019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总量已接近400次，其中34%发生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7]。推翻或改变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拉美国家政府成为常见手段。

第二阶段是罗斯福推论监管逻辑的干预制度化。进入20世纪，美国国力迅猛上升、海外利益急剧膨胀，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出所谓“推论”，赋予美国“国际警察”角色：凡拉美国家出现所谓财政失序、治理失灵或政治不稳，美国即有权单方面介入监管、纠正乃至取代其政府职能。这一推论将门罗主义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干预权，为美国深度控制拉美提供了“合法”依据。罗斯福推论标志着美国霸权从防御性排他转向主动干预，将势力范围制度化、常态化。但此阶段仍保留较强的道义包装，干预被包装为所谓“文明责任”“地区稳定义务”，强权逻辑隐藏在“秩序”与“进步”的修辞之下。

第三阶段是特朗普版唐罗主义占有逻辑的强盗化宣言。特朗普时期，新门罗主义在语义与实践上发生质变，道义辞藻大幅退场，强权逻辑赤裸登台。特朗普宣称可动用胁迫、经济制裁、军事力量等一切手段维护美国利益，并在为委内瑞拉行动辩护时高调自诩奉行门罗主义，甚至炫耀式提及“有人称我的做法为唐罗主义”^[8]。特朗普政府以极端单边主义的姿态宣称，西半球事务美国皆可随意插手，必要时直接诉诸武力。该逻辑在2025年已充分显现，例如制裁哥伦比亚总统及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向巴拿马施压运河治理，加强对尼加拉瓜、古巴制裁，向阿根廷提供约200亿美元援助提振米莱政治前途，赦免在美被判涉毒罪的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与前阶段相比，唐罗主义几乎消除了传统叙事中的条件与边界。门罗主义仅针对欧洲列强殖民，未授意

对邻国随意动武；罗斯福推论虽扩展干预权，仍需不稳定、失序等触发条件并借“监管”维持表面合法性。特朗普则奉行需要即可获取的占有逻辑，比如宣称“我们需要格陵兰岛”，将地缘与资源诉求置于话语中心；多次威胁对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不排除军事行动”。唐罗主义在规范意义上将主权国家降格为可胁迫、可处置的对象，为干涉内政、胁迫政权更迭乃至公开动武提供舆论铺垫，加剧国际秩序危机。当强权以“需要”取代规则，国际法底线持续被侵蚀，规则秩序随之动摇。《新政治家》杂志称，特朗普已使美国堕落为“流氓超级大国”^[9]。

（二）美国霸权流氓化的深层原因

其一，空前的债务压力暴露了美国深层脆弱性。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冲击后，美国依赖扩张性财政与超宽松货币维持增长，赤字货币化趋势加剧，债务规模急剧膨胀。2025 年联邦债务突破 38 万亿美元，接近 GDP 的 130%。高债带来双重危机：一是财政可持续性屡遭市场质疑，通胀与加息政策陷入两难；二是美元信用持续透支，安全资产叙事裂痕扩大。IMF 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占比长期呈下降趋势——从 2000 年前后近 70% 高位，回落至近年 50% 区间^[10]。多国推动本币结算与“去美元化”，削弱美国金融红利攫取能力。尤其是 2022 年美欧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后，全球对美元工具化风险的警觉上升，反噬效应显著。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部分精英将内部危机向外部转嫁。传统财政金融手段边际效用递减，于是诉诸打劫式“创收”。特朗普多次流露将武力转化为经济收益的思路。他声称，美国将在“抓捕”马杜罗后接管委内瑞拉，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将进军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11]。唐罗主义将强制力产业化、主权视为可变现资产，通过资源控制、政权重塑与收益攫取，为国内财政与政治困局短期“续命”。

其二，全球技术优势动摇加剧美国霸权焦虑与强硬姿态。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依赖科技领先、知识产权体系与高端产业链获取超额收益，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综合霸权红利。但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这一状况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 5G、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持续突破，削弱了美国技术霸权安全感。在人工智能领域，DeepSeek、千问等中文语境大模型展现强劲竞争力；量子通信、6G 等研发进展也引发美国战略焦虑。美国《2025 年国家安全战略》声称“过去对华经贸与技术外包假设失败”，要求在供应链与关键领域重建优势^[12]。美国转向两类激进应对策略：一是高强度遏制与封锁，围绕先进计算与半导体制造出口管制持续升级、体系化；二是将竞争延伸至资源与供应链端，通过掌控关键矿产卡住源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30 年超过 90% 电池级石墨、约 77% 稀土冶炼产品仍源自中国，近 50% 精炼环节市场价值集中于中国，供应链集中度本身构成地缘政治博弈焦点。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格陵兰矿产与战略位置“必须拥有”的诉求，正是将地缘安全与资源控制直接捆绑的政策外化。美国霸权从技术自信滑向焦虑驱动的进攻性，加速了强权逻辑外溢与国际秩序动荡。

其三，能源与战略资源争夺推动美国拉美冒险主义回潮。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大国在无政府体系中必然围绕生存资源展开竞争。对美国而言，掌控能源直接关乎经济安全和石油美元体系稳定。一旦石油贸易更大范围“去美元化”，美元霸权与金融优势将同步承压。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制裁、颠覆来维护对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资源控制。2017—2020 年间，全面制裁使委内瑞拉石油产量骤降 75%，人均实际 GDP 下降了 62%^[13]，这客观上压缩了其外汇能力与国际空间。制裁也构成双刃剑：产量锐减反推高全球油价，加剧美国国内通胀与政治压力。当长期施压边际效用

递减，特朗普便转向更直接、粗暴的终局手段，即将强制行动视为商业式野蛮收购。委内瑞拉资源禀赋进一步放大美国冒险冲动，除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储量外，其锂矿、关键矿产潜力及加勒比交通要冲位置均具战略价值。贸易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约 80% 石油销往中国，其余折价出售^[14]。一旦外部力量接管委内瑞拉能源体系，既可为美国资本打开巨额利益通道，也能直接牵制中国能源获取与关键矿产布局。资源焦虑与地缘贪欲叠加，使美国政策语言滑向赤裸掠夺逻辑。美国霸权从规则约束滑向资源本能驱动，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动荡与全球治理赤字。

（三）美国霸权霸凌对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冲击

其一，国际法根基受损，宪章原则遭到深度破坏。《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平等（第 2 条第 1 款）、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第 2 条第 4 款）等战后秩序底线^[15]。这些原则构成国际法权威的共识性基础，约束所有成员国行为。美国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且缺乏有效自卫要件的情形下对他国领土实施武力行动，跨境拘押现任国家元首，绕开集体安全机制，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置于事实废黜状态，对联合国宪章体系形成直接冲击。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框架下多位特别程序专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行动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款，甚至触及“侵略罪”范畴^[16]。强权公开越界迅速侵蚀国际法权威的共识性基础，使宪章原则从对各国的共同约束滑向“对弱者有效、对强者可选”的双重标准，导致原本依赖广泛认同运转的国际法出现权威塌陷效应。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全球法律挑战中心主任奥娜·哈撒韦（Oona Hathaway）指出，如果各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推翻其认为不合法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以及更广泛的武力使用法律限制都将失效^[17]。何况国家元首人身豁免等国际惯例本来承担着最低安全阀的功能，保障国家间交往不至于坠入赤裸报复与无序冲突。对现任国家元首跨境拘押触碰了国际交往底线，释放出所谓“强权即正义”的危险效应。

其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遭遇掣肘，治理缺口推高自助化倾向。委内瑞拉危机暴露出联合国安理会在常任理事国自身涉入争端时的结构性困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27 条，实质性事项需包括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否决权机制）。当美国作为争端当事方或其核心利益涉入时，联合国安理会难以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实质处置，集体安全机制明显失灵。即便多数会员国明确反对，也无法转化为有效行动，能力与意愿的落差持续削弱联合国权威与威慑力。如制度失灵后果难以自动修复，各国将转向更强烈的自保与自助逻辑，提前布局替代性安全依托，强化区域与跨区域协作，分散对单一秩序供给者的依赖。集体安全制度失灵同时反噬美国的联盟体系。即使部分盟友在政治层面维持配合，西方内部舆论与社会力量也难以完全接受明显越界的行动。委内瑞拉危机发生后，欧洲多国出现议会争议与公众抗议，美国国内跨党派反战声音显著上升，凸显联盟内部价值黏合面临严峻压力测试。

其三，粗暴改写规则，安全焦虑外溢并触发军备与对抗螺旋。国际秩序依赖可预期性维持稳定。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警告，当一个大国领导人成为“首席破坏者”、持续制造不稳定与不可预测性时，局势将迅速失控^[18]。委内瑞拉事件中，美国公然突破底线，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无自卫要件地实施武力并跨境拘押现任元首，等于将规则粗暴改写为“强者可选”。美国的赤裸行径迅速改变各国风险评估——当侵略与绑架可能低成本甚至

无后果，潜在受胁国家必然提高威慑投入，通过军备竞赛、战略结伴、前置部署降低被突袭概率。若此类行为被容忍，冲突门槛将显著降低，误判概率急剧上升，地区紧张随之抬升。大国竞争更易走向以强制手段改写规则的高风险轨道。联合国维持规则秩序能力将遭遇持续消耗，多边机制威慑力进一步衰减。如各国为自保而强化实力对抗，国际秩序将从相对稳定滑向高度碎片化与对抗化。

三、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与驱动机制

委内瑞拉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态度呈现鲜明两极分化。美国极少数盟友对突袭行动表示支持或保持沉默，而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则深感不安，纷纷通过声明、投票或外交渠道表达谴责与抗议。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受阻的情况下，区域与跨区域自主联合迅速兴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协同抵制霸权的清晰态势，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加速成形。国际统一战线就是统一战线理念在国际领域的延伸和应用^[19]。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为反对和抵制霸道行径而形成的广泛联合阵线，核心是面对某些大国恃强凌弱、干涉内政或单边制裁等霸凌行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选择团结协作、共同发声，维护主权独立与国际公平正义。近期多起冲突中，几乎没有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支持西方单边制裁措施，反而普遍谴责强权干涉，倡导通过对话合作解决问题。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蕴含着守护主权平等、反对强权政治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当今世界多极化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共同意愿，表明了恃强凌弱不得人心、公道正义众望所归。

（一）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初露端倪

委内瑞拉危机触发的反霸共振首先在拉丁美洲集中释放。拉美国家长期承受外部干预压力，受国内政治轮替、对美依赖与历史记忆等因素影响，涉美立场难以完全统一。但在本次事件中，美国以直接粗暴强制手段向区域传递信号，任何不合美国心意的政权，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最基本安全保障。这促使“今天对委内瑞拉动手，明天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预期迅速在拉美地区形成共识，激活区域的集体安全焦虑与主权自觉。1月4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与西班牙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对美方在委内瑞拉领土上单边实施的军事行动表达深切关切并坚决反对，指出其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并将之界定为“极其危险的先例”，同时呼吁以对话、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危机^[20]。巴西总统卢拉称，轰炸委内瑞拉和抓走马杜罗“跨越了不可接受的界线”，“公然违反国际法攻击国家，是迈向暴力、混乱和不稳定世界的第一步”^[21]。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美方威胁背景下公开回应并“叫阵”式表态：“来抓我啊，我等着呢！哥伦比亚人民将捍卫自己的总统和尊严。”^[22]无论是古巴、巴西等左翼政府，还是政治取向更为保守的国家，都在反对域外强权干涉这一底线上形成共识。当国家生存尊严受到威胁时，意识形态光谱便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反外部干预立场。

委内瑞拉危机引发的反霸共振迅速扩展至非洲、亚洲、中东等广大南方国家，形成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霸凌行为的广泛抵制态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表达坚定声援。王毅外长表示：“我们从不认为哪一个国家可以充当国际警察，也不认同哪一个国家可以

自诩为国际法官，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受到国际法的充分保护。我们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将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23]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方行径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24]。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称美国此举为世界秩序提供了“危险的先例”^[2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迅速发表声明，谴责对委内瑞拉主权和领导人安全的侵犯，呼吁遵守《联合国宪章》。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大国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反对强权干涉。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家也以不同方式表达关切与不满。美国此次越线行为突破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心理底线，触发了第三世界联合反弹。在1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除英法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实质立场上站在委内瑞拉一边。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政治协商平台之一，不结盟运动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袭击，指出美方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属于战争行为，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威胁到委内瑞拉人民的生命权。以南南合作为基础、以新兴大国支撑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雏形正在显现，潜在政治能量不容低估。

即便在西方阵营内部，美国行动同样引发明显裂痕。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及随后各方表态中，欧洲主要盟友普遍强调遵守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原则，并对行动“合法性”表达保留意见或质疑声音，没有明确背书。法国公开称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原则^[26]。丹麦、西班牙等国领导人公开表达强烈担忧，警告国际法体系正遭受侵蚀。欧洲舆论场也出现国际关系可能倒退到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担忧性叙事。除极少数铁杆盟友外，几乎没有西方国家公开为美国背书，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由此暴露出前所未有的内部分歧。美国国内反战与批判声音同样迅速上升，多地爆发跨党派反战示威，抗议“非法战争”和对拉美的持续干涉。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等多个美国城市爆发了反对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抗议活动^[27]。一些西方战略家和知名人士同样发声指责特朗普政府决策失当。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将行动称为无端侵略，并批评西半球“只有美国主权算数”的霸权心态^[28]。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美国已成为最不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29]。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在搞流氓行动，把美国变成了流氓国家^[30]。

（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驱动机制

第一，安全风险外溢促使国家走向联合自保。委内瑞拉危机以直观而尖锐的方式暴露出现行国际安全体系的脆弱性。当霸权国家本身成为国际秩序破坏者时，现行国际机制几乎无力提供有效保护。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绑架他国元首、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却能利用否决权阻止任何针对其行为的制裁决议，致使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陷入尴尬境地。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从2011年利比亚政权更迭到2026年委内瑞拉危机，美国绕过联合国单边动武已形成某种惯例。每一次，国际社会除了谴责和遗憾，几乎束手无策。对于大量中小国家而言，委内瑞拉危机传递出的信号十分明确：在关键时刻和霸权霸凌面前，规则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安全屏障，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多方合作。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单个国家孤军奋战难免沦为鱼肉。这些经验叠加的后果是把大量中小国家推向更强烈的自助逻辑，一旦它们将规则保护评估为不稳定预期，就会更早寻求区域/跨区域协作、分散对单一

秩序供给者的依赖,并把政治宣示转化为更具韧性的利益与机制纽带。历史经验表明,当霸权压迫达到一定程度时,被压迫者的联合反抗就会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唇亡齿寒”的生存焦虑构成了建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最直接现实驱动力。

第二,权力转移加剧霸权冒险倾向。从国际体系演变宏观视角看,当前世界处于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关键时期,而这一转型期往往伴随更高的不稳定性与风险。从经济权重维度看,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口径计算,2025年中国占全球PPP产出约19.84%,美国约14.52%;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PPP份额合计约34.75%,主要发达经济体(G7)合计约28.22%^[31]。它意味着全球经济重心持续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但同时,美国保有显著军事优势与全球投送能力,2024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球37%^[32]。在相对优势收窄与硬实力仍强的张力之下,衰落预期更容易诱发以高风险行动重申支配地位的冲动。同时,新兴力量尚未形成足以制衡美国的集体力量。旧秩序已破、新秩序未立,国际体系处在一个混沌空窗期。这一阶段往往成为霸权冒险的温床,因为霸权国家可能以冒险方式来试探对手边界与反应,从而重新确立自身主导地位(或至少延缓衰落的势头)。历史经验表明,霸权衰落期往往伴随冲突风险上升的概率。循此逻辑,美国在“后院”展示硬实力、对其他国家发出强硬信号,旨在震慑潜在挑战者,但也会引发更广泛的反弹与不信任,促使更多国家转向联合自强的安全策略。

第三,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多边合作重构。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与债务压力、数字鸿沟等跨国挑战,规则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交织叠加,客观上要求更强的国际协调。但近年美国多边参与呈现明显工具选择性特征,直接削弱治理的可预期性与制度信誉。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2026年1月声称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等做法,严重冲击了全球治理效能。在经贸与规则治理层面,美国一方面以“301调查”等国内法工具对外加征关税并引发连锁反应;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自2019年因法官遴选受阻而陷入无法运转的事实状态。在国际金融层面,美国对外制裁与金融限制措施显著扩张,2000—2025年被纳入制裁的个人与实体数量大幅增加,制裁工具的溢出效应与第三国连带影响问题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引发争议。提升全球治理效能,需要约束单边霸凌与制度破坏行为、修复多边主义权威,并通过全球南方更紧密的制度化协作重塑规则供给。实际上,围绕本币融资与结算、发展融资自主性、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等议题倡议正在增多。例如,金砖机制与相关声明持续强调扩大本币使用与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新开发银行年报披露2024年批准项目中本币融资占比约43.5%^[33],体现出降低对单一货币体系依赖的制度化尝试。这些趋势与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深层目标相互契合,即要以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对冲治理赤字,将反霸凌转化为重建治理的可持续机制。

第四,道义共识凝聚国际正义力量。道义共识是推动统一战线形成的软性纽带。若将安全困境、权力转移与治理赤字视为硬性结构性因素,道义共识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合与动员作用。它以“否定性共识”形式表现为全球南方在反对霸权问题上立场趋同,各国具体主张虽有差异,但在“反对什么”的底线问题上高度一致,反对单边武力、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双重标准,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实的道德与政治底盘。道义共识首先体现为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共同尊崇。各国普遍认同,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等准则必须普遍适用、不打折扣,不能出现“要求他国遵守、自己却肆意践踏”的双重标准。道义共识

的形成还深植于共同的历史记忆。殖民主义、冷战时期的大国干预、近现代霸权干涉的系列案例，使亚非拉国家对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原则产生深刻认同。委内瑞拉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触发广泛民意共鸣，反霸凌、反强权逐渐成为现实政治与公共认知的核心议题，为国家层面决策提供了强大社会基础，也显著强化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在道义领域的权威性与凝聚力。

四、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主要特征与内在张力

委内瑞拉危机迅速外溢揭示，在单极优势叠加国内政治极化背景下，霸权国可能将规则工具化乃至抛弃，使国际社会陷入“有法不依、无力执法”的境地，进而显现主权与干涉、道义与现实利益、多元主体与统一行动等三组矛盾。

（一）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主要特征

第一，防御性联合为核心。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不以建立一个同盟性军事集团为目的，更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民族，核心出发点是维护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以此应对和遏制霸权主义行径。它本质上是一种自发、以规则为导向的聚合，旨在抵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对全球秩序的侵蚀。它不追求取代现有霸权以谋取自身利益，也不以政权更迭或价值观输出为手段，通过多边场域议程设置、规则动员、外交协调以及经济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系统抬升霸权越界的政治、声誉与经济成本，而不是通过共同防务条款形成自动卷入的战争承诺^[34]。防御性联合内在要求广泛包容与非排他性。参与其中不设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门槛，各国只要基于对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与国际法治的共同认同，皆可成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参与者。包容性使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能够汇聚最广泛多元力量，形成最大公约数，有效制止霸权行径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捍卫国际法权威与尊严，最终维护地区与全球的稳定与和平。防御性质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带来显著道义优势与战略韧性。由于行动逻辑根植于维护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与原则，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能够获得广泛国际认同与积极参与，有效避免被污名化为“反西方集团”。

第二，议题导向保持灵活性。与要求全方位一致的传统同盟不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倾向于在反对霸权干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规范上形成共同议程，而在其他议题上允许差异共存甚至正常竞争。该机制可用“minilateralism（小多边）/议题联盟”理论来解释。当普遍多边机制因否决权与利益分化而行动受阻时，国家更倾向围绕具体问题形成目的导向的协作组合，以降低承诺成本、提高行动效率^[35]。它更接近“对齐而不结盟”模式，在反对单边强制、维护主权平等与国际法等核心问题上实现协调一致，但不要求在所有问题上绑定立场或交换高风险安全承诺。“求同存异”的方式扩大了合作空间，提高参与灵活性。例如，沙特和伊朗历史上矛盾重重，却能在地区自主权议题上形成共识。议题集中模式降低了参与门槛，不要求在所有问题上步调一致，不强求放弃核心利益或改变根本立场，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或发展道路选择，只需在反对霸凌、维护主权、捍卫国际法等核心议题上协调行动、相互支持，便可让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差异、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都能找到合作基础，增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避免刚性同盟易引发的内部分裂与外部污名化风险。

第三，开放性网络形成多层参与结构。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是一种低制度化、可变几何的网络化协作，维系方式不依赖硬性承诺，而是围绕共同底线（主权平等、反对武力威胁与干涉、维护国际法），通过议程协调、政策呼应，以软法、倡议、声明、项目融资、标准对接等弱约束方式，形成可叠加、可扩展的制度组合，在无单一中心组织情况下实现集体行动。在实践层面，一是以联合声明、共同提案、联署投票等方式，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域进行规则制定与合法性动员；二是依托既有南南合作平台开展议题型协作，例如以平等协商为运行原则的区域机制，为跨地区政策协调提供了组织接口与对接通道；三是以项目与制度供给作为连接器，把政治立场转化为可持续合作网络。以“一带一路”为例，迄今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与中方签署共建合作文件^[36]。因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更像是一个开放的合作生态系统，成员可按能力与意愿选择参与深度，避免了“领导—追随”的刚性等级，同时强化多节点联动，提高霸权越界行为的政治与声誉成本。

第四，建设性力量导向国际秩序演进。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要避免滑入情绪化对抗，关键是要把反对霸凌与建设秩序联结起来，在捍卫《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与禁止使用武力等原则同时，提供能够使各国广泛受益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把道义共识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绩效。多中心治理研究强调，应对跨国公共产品不足问题（气候、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往往需要多层级、多主体、多节点协同供给^[37]。从可核验的制度实践看，新兴多边金融与合作平台正在形成建设性供给能力。例如，新开发银行 2024 年批准项目金额约 45.11 亿美元，其中气候融资批准额合计约 24.93 亿美元，显示在基础设施与气候公共品领域的真实投入。又如，亚投行（AIIB）年度报告披露，2024 年获批项目中绝大多数纳入气候要素，并持续实现超过一半融资投向气候领域目标。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向世界展示，无需依赖霸权逻辑，国际合作同样可以高效运行；国家间可以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实现共赢，推动全球秩序更加公正、包容和民主化，为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内在张力

第一，主权与干涉的两难。捍卫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成立的规范底座。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确立主权平等与不得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基本规则，构成反对霸权越界共同语言；另一方面，《联合国宪章》强调联合国一般不得介入一国国内管辖事项，但第七章允许强制执行措施，使不干涉与集体安全在制度设计上并置冲突。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一旦从理念共鸣走向行动协作，可能会触及不干涉边界：当某一成员遭遇外部武装侵略或强制性干预并请求支援时，是否支持、以何种方式支持成为集体决策难题。若仅停留在声明谴责，将削弱威慑力与存在意义；若采取跨境军事或安全行动，则可能被霸权方歪曲为集体干涉，损害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以宪章原则为旗帜的合法性。关键是如何获得可核验的法律与程序支撑，将行动嵌入可辩护规则轨道。从国际法操作路径看，至少存在三类稳健合法性接口：一是受害国请求下的集体自卫；二是非武力的集体反制与责任追究；三是在安理会被否决阻滞时，通过联大程序争取政治授权。因此，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需将集体支持程序化、证据化、限度化，以受害国请求、事实门槛、比例原则、透明报告和多边程序为行动边界，使援助呈现为执行宪章原则，而不是破坏原则。同时，警惕以人道保护名义的概念泛化，避免走向干涉主义。

第二，道义与利益的兼顾。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始于道义动员。霸权越界行为（如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并绑架总统）越显性化，各国越容易在价值判断上形成快速共识。但道义共识并不必然转化为稳定集体行动，因各国政策选择最终受机会成本与外部约束影响。在以美元与跨境金融为核心的全球网络中，各国对霸权国市场、金融通道的依赖，直接抬升参与反制预期成本。多数国家虽愿在原则层面谴责霸凌行径，但面对涉及金融、贸易与安全领域实质性反制时，常出现风险规避与态度分化。这种分化根源在于国家利益结构差异与理性选择，深度依赖霸权国的国家，担心经济制裁、市场丧失或安全压力；资源有限者则倾向降低参与强度。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规模大、成员异质性高，更易陷入搭便车与低贡献均衡，即成员倾向观望，让他人承担代价。特别是经贸、安全与施霸国联系紧密者，其边际成本更高，更易选择低强度参与。同时，霸权国善于运用选择性豁免、双边施压、利益交换或奖励性让步等分化策略^[38]，削弱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内部协作可信度，将其锁定在高声量、低行动状态。道义动员是必要起点，但须把道义共识制度化，为利益协调与成本分担机制。

第三，多样与统一的平衡。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广泛代表性源于成员国在地区位置、制度形态与发展阶段的高度异质性，赋予其包容性和潜力。但是，同一异质性也构成统一行动的内生约束。国家对威胁的主观感知受地理邻近性、历史互动与地区权力结构影响，导致不同区域形成各自安全议程与优先顺序：拉美更敏感于势力范围干预，中东聚焦外部介入冲突，非洲关注经济控制与新殖民，亚洲易受大国地缘竞争牵引。同指向（反霸凌）、异优先（反什么、先反谁、怎么反）的结构，决定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天然存在议程分散与政策偏好差异。从集体行动机制看，异质性越高，越容易产生两类后果：一是议程碎片化与最低公约数策略，各国为避免摩擦倾向象征性一致、实际收缩；二是行动节奏失衡，高风险承受方偏向强硬反制，低承受方选择渐进博弈，导致关键节点难以同步。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需要一定协调，但必须避免“领导—追随”的等级化：协调过弱，易出现方向模糊、各行其是；主导过强，则易触发对替代霸权的疑虑，削弱凝聚力。

五、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价值引领与实现路径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要从同声走向同行，必须依托跨制度、跨文明的规则底线与程序框架。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一套系统性思想框架和行动方案，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构建包容性协调机制，致力于推动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从松散联合走向高效协作。

（一）从共识到机制的价值体系建构

第一，全球发展倡议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不少国家在面对霸凌行为时态度谨慎，根源在于对经济制裁、市场受限和发展受挫的担忧。若缺乏经济韧性与自主能力，道义承诺就容易在成本压力下崩塌，导致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难以从道义联盟转化为稳定利益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普惠包容、行动导向原则，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治理核心，不附带政治条件地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绿色发展和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可感可及的发展收益。

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利益共同体，提升协作黏合度：一是强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增强中小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经济韧性与战略自主，从根本上削弱霸权分化瓦解的空间；二是夯实各国经济根基，提升抗风险能力，为“敢说不”提供物质保障；三是推动互利共赢机制，如基础设施共建、贸易多元化，降低对霸权依赖，转向可持续合作网络。在反霸凌实践中，融入全球发展倡议可化解道义与利益冲突，各国通过联合项目积累互信，共享发展红利，将抽象共识转化为具体利益绑定。最终，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从防御性联合转向主动共建，提升整体韧性，推动全球秩序向公正、包容方向转型。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与主权保护的制度框架。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破除主权与干涉的内在张力，必须解决进行合法、有限的集体行动时不滑向新干涉主义的核心问题。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强调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该框架为反霸凌行动设定了基本前提，任何集体行动服务于规则修复与维护共同安全，而不是权力扩张。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直指霸权以规则之名行强权之实的本质；区分维护国际法秩序与干涉内政差异，确立行动正当性来源；在安全不可分割理念下，否定绝对安全的霸权逻辑，构建以规则共识为基础的共享安全环境，体现新型安全观与霸道的本质区别。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与多元主体的价值融合。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关键难题在于能否在制度形态、文明传统与发展阶段高度异质的条件下，形成可持续的最低共识与协同行动。全球文明倡议为此提供可操作价值框架。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反对将特定价值模式强加于人；强调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思想前提，超越制度分歧、宗教信仰差异、发展阶段差异，让各国在反霸凌议题上找到交汇点。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在不触碰各国制度选择与道路自主的前提下，围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底线型价值形成思想共识与行动基座。一是提供去意识形态化的合作叙事，将反霸凌正当性锚定在《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普遍规范之上，降低霸权国家污名化空间。二是协调学界、媒体、智库与民间社会，通过多轨互动、议程交流与经验互鉴，增强共同体认同与组织韧性；三是化解多样与统一的平衡难题，推动从议程碎片化转向价值融合。

第四，全球治理倡议与制度化路径的创新。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要从立场呼应走向长期稳定，必须把道义共识转化为可复制、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应对权力规则失衡的制度化方案，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为支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倡议对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制度化具有方法论价值：一是将反霸凌行动正当性明确为国际法与宪章原则的普遍适用，反对单边主义与少数国家“家法外溢”，为金融、科技、制裁合规、争端解决等领域协调提供规范基线与共同语言；二是强调改革完善而非另起炉灶，在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激活区域与跨区域多边机制分工优势，以网络化、分层次制度组合降低异质性成员协调成本。实践中可创新路径是建立专题协调机制，如成立联合工作组，处理具体议题；推动规则创新，如共享数据库与透明报告，提升行动可信度；整合现有平台（如金砖、不结盟运动），形成分级治理网络，避免等级化主导。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未来秩序的价值指引。四大全球倡议在功能上分别对应各自维度，但在价值结构上共同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愿景。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直接任务

是约束霸权越界、抬升政治规范成本；更深层意义是以建设性方式回答后霸权时代国际秩序走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愿景，以合作共赢替代零和博弈，强调通过规则、对话与公共产品供给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意义上，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不止于“反对什么”，还赋予“建设什么”的方向性要求。反霸凌正当性一方面来自对侵略行为的否定，另一方面依赖可替代秩序方案供给能力，推动发展合作、共同安全、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改革，为各国形成可持续的协作预期。

四大全球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性价值凝聚，可进一步概括为义利天下观。该理念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内核。其一，道义为魂。坚持原则底线，倡导并践行国际正义。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坚决反对任何侵略行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反对强加价值观和模式；支持小国捍卫正当权益，在多边场合为弱者仗义执言。通过这些行动，中国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使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赢得道德高地。其二，实力为基。强化战略定力和斗争艺术，务求实效。深谙弱者要战胜强敌，不能光凭义愤，还需灵活谋略与坚强实力。对此，既要敢于斗争、亮明态度，又要掌握斗争火候和方式，在确保合理性的同时讲究策略；厚植力量基础，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防力量、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等。其三，义利统一。统筹道义与利益，实现双赢循环。讲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不片面追求道义而不顾自身和伙伴的合理利益需求；通过发展合作、安全合作、技术合作等实实在在的利益联结，让道义共识转化为稳定的合作框架。义利不可偏废，两者统一于合作共赢的具体实践。

（二）从理念到制度化的建构路径

第一，坚定多边主义共识，巩固国际法治的现实支点。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首先要解决的是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应明确宣示，联合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核心平台，《联合国宪章》是不可逾越的行为底线。任何国家不得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由，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围绕反对武力胁迫、非法制裁、政权颠覆等典型霸凌行为，推动形成更具普遍性的政治共识，使之逐步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立场。在操作层面，积极地运用联合国大会舞台，把多数国家意志转化为持续的政治与规范压力，由联大就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建议性集体措施与政治性否定。同时，鼓励成员国在联大框架下发起专题辩论或特别会议，扩大共识基础。而就国际法的价值塑造而言，多边主义更是能够为国际法治提供不可替代的正当性和道义力量^[39]。为巩固法治支点，要推动多边机制创新：强化区域平台（如非盟、拉共体）与联合国联动，形成分层治理网络；建立监测机制，定期报告霸凌案例，推动形成法律咨询意见；整合全球倡议，将多边主义嵌入发展、安全等领域。

第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回应“不安国家”的真实心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取决于对各国真实风险结构的理解与回应。要重塑国际话语体系，降低认知不确定性，提高政策可预期性，并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合作议程。通过融入全球倡议框架，构建正面叙事，提升成员国参与信心。一是持续揭示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在现实中如何被选择性适用与工具化，例如通过案例分析暴露单边制裁的伪合法性，使国际社会把问题重新拉回到规则被谁破坏、如何修复的可检验议题上，削弱霸权道德包装。二是构建能回应多数国家现实关切的替代性概念工具包，把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展权优先、文明多样性、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概念与具体政策供给相连接，清

晰传达反霸凌是为了维护各国基本生存、安全与发展空间。三是通过媒体合作、智库研究与多语种传播,把上述概念转化为国际公共讨论可传播议题,并以数据、案例与可核验事实增强可信度,让全球南方国家的经验与关切成为可见的国际叙事。四是面向西方社会内部的理性力量开展多轨沟通,扩大对单边主义与霸权越界的批判性论证,推动在霸权体系内部形成更持续的合法性反思压力,削弱霸权国对外行动的叙事垄断与道德遮蔽。

第三,深化发展与安全合作,为“敢说不”提供现实底气。深化发展与安全合作是提升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底气的关键路径。要通过融入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互利共赢机制,增强成员国韧性。一是加强南南合作、区域一体化与多边金融机制建设,如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亚投行扩容,逐步降低对单一霸权体系的依赖,提升金融、能源和产业链自主性。二是提供替代市场、应急融资和物资支持,例如在关键时刻通过双边或多边基金援助受制裁国家,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政治信号,使成员国“敢说不”时能承受经济反制代价。三是把安全合作定位为防御性、非同盟化的能力合作,重点投向非传统安全、风险预警与危机应对,强调以协同治理提升共同安全能力。四是加强情报共享、危机预警、人道救援等实际能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基础。五是建立透明、可核验的相互支持协议,确保各国在承受霸权压力时有明确预期,把道义宣示转化为可预期、可依赖的现实选择。

第四,坚持不结盟原则,在王道与霸道之间把握分寸。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避免滑向以同盟对同盟的阵营政治复刻,在王道(合作共赢)与霸道(零和对抗)之间把握好分寸。万隆会议所形成的十项原则(如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为当代以规则为导向的联合行动提供了重要历史与规范资源,强调和平共处与非对抗性合作。可行的制度路径是在坚持不干涉与开放包容的前提下,发展低排他性、高韧性的合作形态。一方面,为伙伴国提供制度协调、发展融资、供应链互济与风险对冲等公共产品,但不以加入某一阵营、承担对外战略承诺为前置条件,例如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项目(如基础设施共建)积累互信。另一方面,明确反对冷战思维与集团对抗,把合作限定为规则修复、风险管控与共同发展导向的协同行动,从而减少外界将其污名化为“新阵营”的空间。同时,融入全球治理倡议,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改革,激活区域机制(如东盟、非盟)分工优势,形成网络化协作。具体做法可以包括:设立专题对话平台,促进跨区域经验分享;强调比例原则,确保行动基于受害国请求与国际法;防范概念泛化,避免以“民主”或“安全”名义干涉内政。

六、结语

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是一个从共识到机制、从呼应到协同、从道义到制度的渐进过程。实践中,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保持高度灵活性的同时增强行动的协调一致性,如何在倡导不结盟原则的同时有效应对霸权主义的分化瓦解?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持续深化。四大全球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完整的价值指引,四条建构路径呈现清晰的实施框架。关键是要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其中,不追逐支配性地位,当然也不缺席关键议程塑造;以稳定、可信、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各方在规则框架内形成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中国基于全球视野,深化对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认识,为积极应对当前美西方国家掀起的

“逆全球化”思潮提供独特智慧^[40]。从更宏大的视角审视,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全球秩序的深层变革与结构优化,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它将引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繁荣的未来,真正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如此,世界才有望走出“强权即公理”的阴影,让主权平等、多边主义、合作共赢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可靠底座。

参考文献:

- [1] 高程. 从塑造到破坏:美国的国际规则战略调整[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2-01(4).
- [2] 蔡翠红,尹佳晖. 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趋势与影响[J]. 国际问题研究, 2024(6): 32-52, 128-129.
- [3] 叶晓迪. 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的生成机制探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4(3): 94-126, 158-159.
- [4] 伏军,范星辰. 金融制裁的法律界定、国际实践与中国因应[J]. 经贸法律评论, 2025(1): 24-41.
- [5] 吴志成,刘培东. 论全球南方精神与中国的实践作为[J]. 国际问题研究, 2025(4): 1-21, 130-131.
- [6] 董一冰,郭益伯. 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J]. 理论探讨, 2024(1): 96-102.
- [7] Sidita Kushi, Monica Duffy Toft. Introducing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Project: A New Dataset on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1776—2019[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23(4): 763.
- [8] Michelle Stoddart, Hannah Demissie, Fritz Farrow, Ivan Pereira. Trump's vow to run Venezuela, sell oil, part of plan to dominate Western Hemisphere[N/OL]. (2026-01-04)[2026-01-09].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trumps-vow-run-venezuela-sell-oil-part-plan/story?id=128873221>.
- [9] Katie Stallard. Trump ushers in a new era of rogue superpowers[EB/OL]. (2026-01-03)[2026-01-11].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nternational-politics/2026/01/trump-maduro-sphere-of-influence-venezuela>.
- [10] IMF Data Brief: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EB/OL]. (2025-12-19)[2026-01-12]. <https://data.imf.org/en/news/imf%20data%20brief%20december%202019>.
- [11] Trump says U.S. will run Venezuela after U.S. captures Maduro[N/OL]. (2026-01-04)[2026-01-1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loud-noises-heard-venezuela-capital-southern-area-without-electricity-2026-01-03/>.
- [1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OL]. (2025-11)[2026-01-1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13] Jeffrey Sachs. Venezuela: Peace, survival of humanity depend on UN Charter remaining a living instrument[EB/OL]. (2026-01-05)[2026-01-16].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26-01-06-venezuela-peace-survival-of-humanity-dep-depend-on-un-charter-remaining-a-living/>.
- [14] Jillian Ambrose. What role could the US play in Venezuela's 'bust' oil industry[N/OL]. (2026-01-04)[2026-01-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6/jan/04/venezuela-oil-industry-bust-what-role-could-the-us-play>.
- [15] 联合国宪章(全文)[EB/OL]. [2026-01-18].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 [16] OHCHR. UN experts condemn US aggression against Venezuela[EB/OL]. (2026-01-07)[2026-01-17].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6/01/un-experts-condemn-us-aggression-against-venezuela>.
- [17] Isaac Chotiner. The Brazen Illegality of Trump's Venezuela Operation[EB/OL]. (2026-01-03)

- [2026-01-20] .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the-brazen-illegality-of-trumps-venezuela-operation>.
- [18] Mecklin, J. Interview: Harvard's Graham Allison on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der [EB/OL]. (2025-09-04) [2026-01-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interview-harvards-graham-allison-second-trump-administration-and-international-security>.
- [19] 曾向红, 田嘉乐.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129-137.
- [20] Minist é rio das Rela ç ões Exteriores (Brazil). Joint statement of Brazil, Chile, Colombia, Mexico, Uruguay and Spain regarding the events in Venezuela [EB/OL]. (2026-01-04) [2026-01-20]. <https://www.gov.br/mre/en/contact-us/press-area/press-releases/joint-statement-of-brazil-chile-colombia-mexico-uruguay-and-spain-on-the-events-in-venezuela-4-january-2026>.
- [21] Lula condemns attacks on Venezuela, Brazilian diplomats discuss crisis [N/OL]. (2026-01-03) [2026-01-21]. <https://agenciabrasil.ebc.com.br/en/internacional/noticia/2026-01/lula-condemns-attacks-venezuela-brazilian-diplomats-discuss-crisis>.
- [22] Julianna Bragg. " Come get me " : Colombian president's war of words with Trump escalates [EB/OL]. (2026-01-05) [2026-01-21]. <https://www.axios.com/2026/01/05/trump-colombia-gustavo-petro-venezuela-maduro>.
- [23] 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中巴外长战略对话 [EB/OL]. (2026-01-04) [2026-01-21]. 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601/t20260104_11804759.shtml.
- [24] 2026年1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 [EB/OL]. (2026-01-05) [2026-01-21]. https://www.mfa.gov.cn/fyrbt_673021/202601/t20260105_11806730.shtml.
- [25] Statement attributable to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enezuela [EB/OL]. (2026-01-03) [2026-01-22].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s/2026-01-03/statement-attributable-the-spokesperson-for-the-secretary-general-venezuela>.
- [26] France remains faithful and committed to respec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EB/OL]. [2026-01-22]. <https://onu.delegfrance.org/france-has-continued-to-stand-in-solidarity-with-the-venezuelan-people>.
- [27] Eric Berger. Protests in US cities over Trump'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N/OL]. (2026-01-04) [2026-01-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jan/04/venezuela-trump-protests-us-cities>.
- [28] Former US official denounces American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Venezuela as illegal,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EB/OL]. (2026-01-11) [2026-01-23]. <https://www.cctvplus.com/news/20260111/8461251.shtml>.
- [29] Anna Leach. Jeffrey Sachs: ' The US doesn't lead the world any more ' [N/OL]. (2017-09-28) [2026-01-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7/sep/28/jeffrey-sachs-the-us-doesnt-lead-the-world-any-more>.
- [30] Yasmine El-Sabawi. ' Spectacle of empire ' : US has no day-after plan for Venezuela, experts say [EB/OL]. (2026-01-06) [2026-01-23].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spectacle-empire-us-has-no-day-after-plan-venezuela-experts-say>.

- [3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 October 2025: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PPPSH) [EB/OL] . [2026-01-23] .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OEMDC/ADVEC/WEOWORLD/CHN>.
- [32]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4 (Fact Sheet) [R/OL] . (2025-04-28) [2026-01-24] .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4/2504_fs_milex_2024.pdf.
- [33]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 Annual Report 2024 [R/OL] . [2026-01-25] . https://www.ndb.int/annual-report/2024/pdf/NDB_AR_2024_complete.pdf.
- [34] Robert Anthony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J]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5 (1) : 7-45.
- [35] Naím M. Minilateralism: The magic number to get real international action [EB/OL] . (2009-06-21) [2026-01-25] . <https://foreignpolicy.com/2009/06/21/minilateralism/>.
-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2023年10月) [EB/OL] . (2023-10) [2026-01-25] . <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32678/index.html>.
- [37] Elinor Ostrom.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3) : 641-650.
- [38]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J]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1 (4) : 155-156.
- [39] 廖凡. 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 [J] .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8) : 60-79, 205-206.
- [40] 何玲玲, 王春玲.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化人类社会规律认识的“全新的视野” [J] .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5) : 1-9, 233.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王京菁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限度与应对

王京菁 林华山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重庆 400064)

摘 要: 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服从于美国总体对华战略, 自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奉行“美国优先”理念, 在多领域以高强度、新策略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特朗普 2.0 时期, 美国延续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的战略取向, 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呈现领域扩散、议题反复、程度加深、危害抬升等新趋势。在经济领域, 美国围堵打压民营企业, 污名贬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在政治领域, 美国翻新花样打“港台藏疆侨牌”, 危害我国的政权安全、制度安全; 在文化领域, 美国推行文化霸权, 渲染意识形态对抗叙事, 通过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和错误观念大搞思想殖民与文化侵略; 在国际领域, 美国破坏我国正常国际合作, 捆绑对华遏制条款, 妄图打造国际反华阵线。特朗普 2.0 时期, 虽然多重风险抬升, 但是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并非无边界、无阻碍, 会受美国国内、国际环境和中国应对三重因素制约, 存在干涉限度。新形势下, 我国要以制度优势与法治建设防范风险, 维护政治安全; 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维护经济安全; 以增强“五个认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维护文化安全; 塑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 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坚持大统战、大安全和大宣传一体,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中, 牢牢掌握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主动权, 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关键词: 国家安全; 统一战线; 风险; 特朗普 2.0 时期; 中美关系; 新门罗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6) 02-0252-21

DOI: 10.13946/j.cnki.jeqis.2026.02.019

作者简介: 王京菁,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 林华山,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执行主编、编审,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 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统战工作重点项目“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一战线领域的干涉风险与应对研究”(2025TZ01)

引用格式: 王京菁, 林华山.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限度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6 (2): 252-272.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抵御外部渗透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都离不开统一战线发挥的巨大作用^[2]。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特朗普2.0时期的开启。特朗普2.0时期延续第一任期以打压和遏制为主基调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推出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政策，从贸易制裁、科技封锁、文化侵略、国际对抗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与全体系的干涉，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遏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整体上服从对华总体战略，既承继了第一任期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政策惯性，又推出“美国至上”和霸权扩张理念主导的高强度干涉策略，在理念、范围、烈度和方式等方面发生全新变化。统一战线内嵌于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关系，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与政治共同体安全形态，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枢纽机制^[3]。系统梳理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新风险、新趋势、新特征，有利于科学应对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作用，为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参考。

当前，学界对特朗普2.0时期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4]、“同盟政策”^[5]、“气候政策”^[6]、“叙事政策”^[7]等领域，研究视角大多聚焦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的整体战略^[8]和全球影响^[9]，或者围绕经济贸易^[10]、技术发展^[11]、印太战略^[12]等方面分析中国战略应对，但对特朗普2.0时期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理论研究深度不够、内容较散，仅有部分学者论及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台政策”^[13]、“政党政治干预”^[14]、“民营企业出海”^[15]等议题，缺乏对特朗普2.0时期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系统化、整体性研究。本文在时间维度上大跨度梳理了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整体干涉态势，聚焦特朗普2.0时期对华总体干涉动向，全角度分析特朗普2.0时期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并系统化总结其干涉特征，综合比较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变与不变，从限度和策略两个方面提出防范和化解干涉风险的对策建议。

二、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整体态势

特朗普1.0时期的诸多政策体现出对我国统战领域的介入、干涉与制裁做法，给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给我国发展利益带来严重威胁。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服从于美国总体对华战略，整体性梳理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有助于深度分析其对我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态势。

（一）理念转换：以“美国优先”统摄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基于战后国际秩序确立了“全球主义”理念，认为一国发展不

可能与其他国家彻底分割开来,应从国际化视野筹谋经济外交政策。特朗普 1.0 时期,美国政府调整全球战略,以“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美国优先”的粉墨登场反映了美国民粹主义抬头、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横行的政策走向,试图从现实实用主义视角重塑美国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优先”体现了美国对自身实力下降与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的焦虑,实质是美国不愿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企图建立基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单极世界,维护日渐式微的美国霸权。有美国学者声称,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越来越不安^[16]。“美国优先”驱使美国政府在政治对抗、贸易政策、舆论叙事等方面对华态度愈发强硬,频频炒作民族、宗教、港澳台等议题,全面干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拜登上台后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多项国内政策,却保持了对华强硬基调。一方面延续并调整了特朗普 1.0 时期的“美国优先”理念,以“美国回来了”取代“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辞令,对中国采取“竞争性共存”策略,企图以价值观为纽带联合盟友排斥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将中国放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对抗的“专制与民主”叙事语境,毫不遮掩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即使历经总统大选和国会换届,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非但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升级,折射出美国两党对华态度的整体性趋近。

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思维策动污名化中国的统战工作,试图消解中国统战工作价值以阻遏中国发展。其在整体叙事上把中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度性工作机制和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理念曲解为对外投射影响力,热衷炮制和炒作各类反华议题,污蔑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在国际上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破坏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动摇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政治基础。在具体操作上翻新花样打“疆藏港澳台侨”牌,制造和放大“统战威胁论”叙事,反复操弄民族、宗教等议题,编造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谎言,试图破坏中国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与此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鼓吹的“美国优先”更加关注美国自身的利益盈亏,把干涉中国统战领域放在对外战略的突出位置,以遏制和打压中国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美国优先”从理念上改变了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策略,不拘泥于“全球主义”模式下的隐蔽性干涉,放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依托多边框架和非政府组织的柔性渗透,转而走向利益计算、极限施压和公开对抗为核心的强硬做法,以“全政府”姿态系统干涉中国正常的统战工作,呈现出更强的公开性、功利性与对抗性。

(二) 领域扩张:以“多管齐下”广泛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奉行商人理念与利益导向的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初期着重从经济领域单向遏制中国发展。经济发展与统一战线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民营企业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特朗普 1.0 时期的经济干涉策略主要是提高民营企业的“关税壁垒”,限制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从而深度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16 年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提出要将中国输美产品关税增加 45%。自 2018 年 5 月开始,美国对中国连续加征三次关税,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多起中国企业对美企业的收购案,试图通过关税壁垒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目的,干涉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打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拜登政府执政后表面支持自由贸易,事实上仍以不公平竞争为借口对中国产品施加“战略性关税”。然而,美国经济压制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拥有强大制造业能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许多国家深度依

赖中国供应链。在面对关税威胁时，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正当采取“对等关税”反制策略，向其他被任意加税国家发出合并队伍、组织抵抗战线的倡议^[17]，使美国政府“关税闪电战”的意图落空。据有关数据统计，特朗普 1.0 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超过 90% 的成本转嫁给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美国国内通胀率不断攀升，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加剧，大量就业岗位流失^[18]。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及拜登政府在关税战受阻后，开始在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多管齐下”，立体化多层次干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度介入中国统战工作。一是政治上无端指责。彭斯、蓬佩奥等人在多个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美国标榜西方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刻意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团结、合作、协商、监督等优势，编造所谓“一党专政”等话语陷阱。2017 年以来美国陆续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国防战略》等报告，均声称大国竞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外部威胁，并将中俄两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2019 年 8 月，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用政治手段抹黑中国，违背自身标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施压中国以背离市场规律的方式升值人民币。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及中国内部各方面关系。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时期，美国国务院定期发布各类涉藏报告，如“西藏谈判年度报告”；美国国会涉藏立法活动也较为频繁，如“2018 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19]，美国国会也通过相关法案干涉新疆事务，如 2022 年对新疆棉花的禁令就是通过国会法案实施。二是在科技上极限施压。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谋求与中国“全面脱钩”，拉拢盟友构建针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联盟，通过主导技术话语权阻碍中国民营经济正常发展。拜登政府采取“小院高墙”策略，精准封锁中国关键技术领域，维护西方国家的所谓技术领导地位。美国联合西方盟友组建了排他性“技术联盟”，强化与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技术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与博弈力度^[20]。美国国会出台《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排他性产业政策，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发展。美国组织建立“技术 12 国”（T-12）集团，从技术维度全面阻击中国的数字化产业发展，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技术主导地位。三是军事上围追堵截。特朗普 1.0 时期，火速终结了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推销深度干预亚太的“印太战略”，公开鼓吹南海“自由航行”常态化，频繁派遣军舰军机在南海开展“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中国主权与海洋权益，激化地区矛盾。其在台海问题上肆意践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力度与频次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加码提升对台军售等级，在第一任期内共发布 6 份重要对台军售文件。如 2018 年 7 月美国参众两院定稿发布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建议国防部着手推进美台联合军演，严格限制美国军事部门与中国的来往。拜登政府上台后全盘沿袭并升级了“印太战略”，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组建排他性军事小圈子，密集访问中国周边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地区阵营化、对抗化，严重破坏中国地缘发展环境和亚太地区安全格局。

（三）烈度升级：以“极端对抗”加剧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特朗普第一任期伊始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以防御性政策为主，奉行战略收缩策略。回溯历史，美国对外战略政策在扩张与收缩之间不断反复，对外战略倾向深度影响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烈度，使之呈现同质化发展趋势。特朗普在执政初期是坚定的战略收缩鼓吹者，这既缘于美国经济

军事地位在全球战略格局中面临的严峻压力，也受特朗普本人的零和博弈思维影响。例如，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为维护同盟国家军事安全的巨额费用开支，认为美国难以同时兼顾国内庞大的福利支出体系和与日俱增的对外援助费用，不应继续追求世界永久的主导性地位和冷战后确立的全球责任，而是更加重视国内发展和治理^[21]。在收缩战略影响下，美国频繁退出多边国际合作机制。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职首日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1月签署加强边境安全和收紧移民政策的行政令，修建旨在隔离非法移民的边境墙；2017年6月，特朗普以造成“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为由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10月，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又连续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多个组织和协议。这一时期，中国统战领域总体上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干涉。

从本质上看，特朗普的战略收缩策略并不是想要隐藏美国对外力量，而是要根据他的标准重新选择力量输出方向。2018年特朗普将贸易领域作为对外战略重心，把中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在打击烈度上远超以往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的风格，加剧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18年7月，特朗普对价值约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额外关税，拉开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序幕。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真实意图并非简单地提升商品准入门槛，而是借助关税与贸易协商手段迫使中国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性调整，降低“2025中国制造”的实施条件与发展预期，逐步将先进产业生产线移出中国。不仅如此，美国还针对中国贸易与中国民营企业加征惩罚性关税和行政罚款，如采用反倾销、反补贴、“301调查”等手段维护美国贸易优势，将中兴、华为等50多家公司列入禁止出口清单。美国海关不断加大中国人才入境审查力度，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加大对参与“千人计划”的学者的调查，监视中国学者在美国的科研活动。美国国务院严格控制中国学者签证，取消了大量在美研读机器人技术、航空航天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拜登执政期间对华战略政策与特朗普1.0时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并重新提出对华“三轨战略”，即“该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在必要时对抗”。2019年，美国通过资金支持等方式，策动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冲击“一国两制”底线，这些行动是美国政府根据其战略重心重点打造，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不良影响^[22]。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后期与拜登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改变防御性干预政策，经过战略酝酿期、实施期和推进期逐步进入强化期，以“极端对抗”提升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烈度。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呈现激进化趋势，对华遏制行径持续升级^[23]。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首要影响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与技术交流^[24]，利用所谓的投资审查、控制市场准入等措施肆意泛化技术安全概念，限制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民营企业等赴美经营因法律意识不足、数据安全隐患、贸易保护壁垒等问题承担较高的诉讼风险，极易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特朗普1.0时期以来不断升级的战略打击策略，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单一维度的对抗，涉及政治、经济、技术、安全和地缘战略领域的全面博弈，深层次干涉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涉疆、涉藏、港澳台侨等统战领域工作，成为区别于以往美国政府干涉我国统战领域的重要特征。

（四）策略翻新：以“盟友捆绑”联合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作为“美国优先”的政策延伸，特朗普第一任期采用了更具有对抗性的单边主义策略，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借口横加干涉中国统战领域。如2020年特朗普政府以可能侵害美国公民个人信息

和言论自由为由，分别对 TikTok 和 WeChat 施加制裁。拜登政府抛弃了特朗普全方位、宽口径的干涉做法，采用传统有序的干涉策略，通过联合传统盟友、扩展新型盟友等联合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21 年拜登政府在演讲中宣称“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在任期内迅速调整特朗普 1.0 时期的多项“退群”政策，重新融入国家多边合作机制，意在修补特朗普 1.0 时期因“美国优先”议程而受损的联盟体系^[25]。拜登直言，特朗普执政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国际地位，破坏了所谓的民主同盟关系。他把“民主价值观”等同为“全球力量的接地线”，将联盟吹捧为“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希望继续深化和拓展美国全球盟友体系。

美国联合盟友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美国根据世界不同国家的国情以及同中国的关系，多次编造虚假话语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布林肯在访问非洲期间，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企图破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干扰中国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与发展。日本无理指责中国“不尊重国际法”，反复渲染“中国发展威胁论”，借以强调日本“作为民主国家的先进性”^[26]。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中国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长期威胁。2022 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当天，美国媒体炒作所谓中国“非法捕捞”旧闻，抹黑中国形象。美国热衷于联合盟友在各类“民主峰会”等政治秀场中，拉帮结派诋毁中国，特别是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作为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借口。

美国建立“民主科技联盟”限制中国民营企业创新。拜登政府不寻求与中国经济的全面脱钩，采用更为审慎的部分脱钩策略，注重联合盟友构建“民主科技同盟”，试图从国际规则制定上孤立和压制中国。2021 年 3 月，美国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国首脑峰会上，联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成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计划形成涵盖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新兴技术的排他性合作机制。2021 年 6 月，美欧峰会联合声明中表示要确保美国和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领导地位，大力布局数字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竞争，并严格审查中国对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2021 年 9 月，美英澳宣布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准备联合开展深层次技术合作，抢占人工智能、外太空等高精尖技术领域，对华意图昭然若揭。2022 年 3 月，美国提出构建“芯片四方联盟”，试图推动半导体设计研发在封闭的“小圈子”内共享，降低半导体的研发成本与迭代阻碍，实现对半导体产品的长期技术垄断。

三、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风险表征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日益固化且长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调整。统战领域作为美国对华总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将呈领域扩散、议题反复、程度加深、危害抬升等趋势，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持续带来重大风险隐患。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国际领域，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一）加剧经济脱钩：围堵打压民营企业，污名贬低基本经济制度

特朗普 2.0 时期，在经济方面，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将从 1.0 时期的全面贸易战转向

“精准化、体系化、长期化”的遏制战略，核心目标是围堵打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削弱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全域干预中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试图干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网络，进而瓦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第一，实施关税策略限制民营企业对外贸易。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值比重高达55.5%，连续6年稳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民营企业当之无愧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主体^[27]。相对于特朗普1.0时期，特朗普2.0时期采取“无差别攻击”策略和更为激进的关税贸易政策，但重点针对中国。特朗普对中国企业输美商品实施“基础关税+‘对等关税’”叠加课税模式，试图以加征高额关税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特朗普宣誓再次当选总统首日立即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确定了关税政策的战略规划定位，随后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芬太尼税”。当选后，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令的方式，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0%，部分商品如钢铁和铝则征收25%关税，而后采取“对等关税”政策，美国对华“对等关税”从34%增加为84%，并继续加码提高至125%，叠加之前税率，美国实际对华商品总关税税率已提升至145%。该政策以“全域覆盖、强度跃升、高频威慑”为特征，通过分阶段加征关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强化转口贸易审查等组合工具，并依托技术封锁与供应链重构形成系统性遏制。2025年8—11月，中美经过磋商，表示在一年内继续暂停实施部分双边加征关税。关税武器化、工具化是特朗普2.0时期关税贸易政策的鲜明特点，其服务于特朗普推行的所谓“制造业回流”目标，试图以关税武器重构对华贸易规则。特朗普极具个人专制风格的关税政策变化，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正常贸易秩序，对中国民营企业出海造成了不确定的风险预期，导致中国企业国际出口份额萎缩。

第二，加紧技术封锁遏制民营经济创新链升级。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既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源泉，更是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美国长期盘踞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地位，享受核心技术控制带来的利润垄断，谋求中国永远停留在全球产业链中下游环节，沦为其核心技术的应用终端、廉价零部件供应基地和高净值产品消费市场，从而维系美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顶端主导权。特朗普2.0时期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技术封锁不断收紧，一方面扩大出口管制清单，在超级计算、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等关键技术领域实施技术封锁，阻碍民营企业进口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和高端制造设备，胁迫美国本土企业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友好国家”。如2025年3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5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实施所谓的“穿透性规则”，自动将与制裁实体存在50%以上股份联结的实体纳入管制范围^[28]。另一方面加大投资审查力度，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限制民营企业对美国关键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甚至直接干预中国民营企业在第三国的投资合作。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29]，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严格限制中国实体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投资活动，对违反规定的中国企业处以最高与交易金额相当的罚款。

第三，贬低基本经济制度污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实行符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美国假借自由主义口号持续攻击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诬称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复炮制“国有企业垄断”等论调，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经济发展模式。2024

年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遵守 WTO 情况报告》，妄称“中国在变本加厉地采取措施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将中国市场经济直接污蔑为“掠夺性非市场经济”^[30]。特朗普 2.0 时期以来，美国多次公开贬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污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试图为其发动贸易战和“去中国化”策略提供正当性。2025 年 10 月，美国政府公开对中美洲国家同中国正常交流指手画脚，威胁中美洲工商界人士不得与中国国有企业开展合作^[31]，指责中国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控制，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执行各类产业政策，并借助隐性补贴在内的各类激励措施保障国有企业的利润回报。2025 年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将中国认定为美国当前面临的“系统性战略挑战”，宣称中美之间正由局部贸易摩擦全面迈向结构性长期对抗。报告认为中国已经形成高度活跃且国家主导的制造业体系，在对外出口中存在“产能外溢”，污蔑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产业补贴政策将冲击其他国家产业发展。特朗普在 2026 年 1 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演讲中，指责“中国制造了几乎所有的风机，却看不到中国有风力发电场”，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污名化为“狡猾的搭便车者”与“技术倾销者”，离间中国与全球能源转型国家的合作关系。美国炮制的“产能扩张论”“产业冲击论”并没有什么新意，而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叙事谎言的衍生和变种，意在证明西方制度的“优越”与“民主”，贬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热衷政治挑拨：制造国家分裂风险，干扰政治制度正常运行

特朗普 2.0 时期，在政治方面，美国对我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体现在否定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妄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通过国内渗透和国际舆论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影响中国的政治共识。同时，美国以“以台遏华”为核心手段，继续大打“台湾牌”，不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与武装台湾，歪曲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继续虚化掏空“一中政策”。

第一，加码推进“以台制华”制造国家分裂风险。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在打“港澳台疆藏”组合牌中更加重视台湾议题，利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国际舆论等多种手段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意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通过外部干预、内外勾连制造分裂风险。首先，大打台湾牌虚化“一中政策”。2025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的“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32]，并声称台湾有参加国际组织的“独立地位”，“包含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反复在“一中”立场上搞政治倒退。2025 年 3 月下旬以来，美国亚利桑那州、阿拉斯加州等州州长接连窜台，搞各种拙劣“政治表演”。美日联合声明、美日韩外长会、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声明均妄议台湾，炒作“台湾人权”议题。2025 年 5 月，美国众议院以口头无异议方式通过了所谓《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两项法案，声称“没有在大陆与台湾关系上采取立场”，试图为美台官方交往松绑。2025 年 12 月，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 8 次提及台湾，宣称“对台湾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并认为“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威慑并防止台湾冲突是优先事项”。其次，酝酿对台军售危害台海稳定。2025 年 2 月，美国政府宣布解冻 53 亿美元“援外资金”，包括高达 8.7 亿美元的对台军援。2025 年 7 月，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6 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内容包括 5 亿美元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向台湾提供防御物资及军事教育与训练援助。2025 年 12 月，美国防部安全合作局发布声明，宣称批

准对台湾总额逾 111 亿美元的军售。该军售规模为历史上最高规模，美国此举实际上是推动“以武谋独”。最后，逼迫“台湾当局”经济“献媚”。特朗普在第二次竞选总统期间就多次主张向台湾地区收取“保护费”，声称中国台湾地区的“军费”应增加至 GDP 总额的 10%。民进党当局“卖台媚美”，表态要提升“军费”总额达到岛内经济总量的 3% 以上。特朗普上台后，逼迫台积电追加对美国 100 亿美元投资数额，对台湾半导体、机械等产品加征 32% 关税（后调整为 20%），并威胁将台湾企业从美股市除名。2026 年 1 月，美台进行关税谈判后宣布，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商品适用“对等关税”，税率总体不超过 15%，但台湾的半导体与科技企业须对美进行至少 2 500 亿美元的新增直接投资，台当局还要提供至少 2 500 亿美元的信用保证。

特朗普 2.0 时期延续了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对台湾的一贯定位和策略，继续将台湾问题作为钳制中国的棋子。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政府更加重视打“台湾牌”，加码“以台制华”战略，通过反复炒作人权议题、虚化“一中政策”、加大对台军售、榨取经济价值等手段，不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议题进行政治操弄的根本目的是掣肘中国，制造分裂风险，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影响国家统一。

第二，恶意操纵政治议题干扰政治制度正常运行。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政府通过持续运用立法施压、非法制裁、资金渗透、舆论抹黑、代理人操弄等手段，全方位干扰我国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重点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给我国制度安全与政治稳定造成风险，干扰我国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运行。

首先，恶意抹黑中国共产党形象，攻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宏观层面，美国政客及媒体长期渲染反华、反共言论，营造“中国不如西方”和“中国摧毁西方”两种极端叙事环境，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塑造了带有攻击性的形象^[33]。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多次操弄谎言诋毁中国共产党，如 2020 年 7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发表所谓的“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特朗普 2.0 时期重拾敌视中国共产党的论调，2025 年 4 月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妄称中国为“敌对贸易国家”，随后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思在 2025 年中美洲安全会议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发表攻击言论。在微观层面，美国将签证政策政治化，对中国共产党员入境移民采取歧视性措施。美国参议院提议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留学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目前已经处于立法进程当中。2025 年 5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指责哈佛大学助长校园内学生暴力活动、反犹太主义和支持恐怖分子活动，竟将原因编织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其次，操弄民族议题，扰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美国早在 1983 年就开始介入我国新疆事务，污名化、标签化新疆人权状况，歪曲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2025 年 5 月，在普利策中心和调查新闻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纽约时报》《外交政策》等媒体集中炮制涉疆谎言，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大肆炒作新疆人权议题。2025 年 9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白皮书显示，美国过去几年把 140 多家中国公司列入涉疆法案实体名单，假借所谓的“强迫劳动”制裁涉疆企业和个人。特朗普 2.0 时期多次杜撰涉疆涉藏等涉民族议题的不实报道，企图破坏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干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25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妄称，因中方“限制外国人入藏”，将采取措施限制西藏官员的签证，禁止其前往美国。

美国限制签证的本质是在国际舆论场中炒作涉藏议题，服务其对华战略竞争和遏制打压中国。同年7月，鲁比奥在美国国务院网站和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开祝贺十四世达赖90岁生日，并发表有关涉藏言论。十四世达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美国公开支持“藏独”分子和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这一行为体现了美国分裂中国的真实意图，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

最后，炮制涉港澳法案，破坏特别行政区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其规定特别行政区在宪法和基本法框架下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对本地区事务实施自我管理。2025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025年《香港政策法报告》，报告延续抹黑香港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状况的陈词滥调，并对6名中央驻港机构及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非法单边制裁，公开诋毁《香港国安法》与特区司法体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开脱。2025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025年《国别投资环境报告》，诋毁香港和澳门营商环境，罔顾事实真相诬称《香港国安法》威胁正常商业活动、澳门修订国安法损害经济自由，扬言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有关待遇。2025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部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抹黑香港的特别行政区角色定位，无端指责香港成为“支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规避的全球中心枢纽”，建议国会立法严格审查香港官方离岸美元清算中心地位，妄言对香港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

（三）推行文化霸权：渲染意识形态对抗叙事，大搞思想殖民与文化侵略

特朗普2.0时期，在文化方面，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以传播虚无主义为主要目标，加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利用互联网、书籍、游戏、电影、新媒体载体等进行文化渗透，企图在污名化中国的同时实现意识形态颠覆目的。

第一，意识形态渗透与舆论宣传攻讦。特朗普2.0时期，美国持续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自由对抗专制”的二元叙事框架，将中美战略竞争简化为意识形态对决，把中国抹黑为“威权扩张”的代表，而美国自诩为“民主世界”的领袖，将冷战思维带入大国关系中，排斥合作共赢、挑起对抗竞争。相对于传统建制派政治家，特朗普在对华战略上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思维和短期交易理念，表面上基于社交艺术保持对华友好关系，对华意识形态攻击主要由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等对华鹰派人物承担。2025年初，鲁比奥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中宣称“中国模式的崛起并不是西方体系的平行延伸，而是对自由秩序的系统性削弱”，呼吁美国对华战略必须回归到“价值优先原则”。2026年2月，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美欧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军事和安全合作，需要升级为“西方共同继承的认可的联盟体”，在演讲全文中充斥着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具体操作上，特朗普2.0时期推动对华意识形态攻击舆论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把意识形态的外交辞令转化为舆论宣传语料，利用其掌控的国际媒体话语权，对我国大肆进行抹黑与歪曲。美国媒体刻意断章取义，将我国正常的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恶意解读为所谓“文化扩张”“意识形态输出”，企图削弱我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的竞争力。美国还借助网络平台和人工智能载体，针对我国年轻一代开展思想文化渗透。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授权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起高度机密的行动，散布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信息，目的是煽动中国公众反对政府的舆论。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谷歌公司在YouTube频道中移除了约700

个中国频道，这些频道的共同特点是传播中国正能量或者发表与美国有关的政策评论^[34]。2025年4月，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使用后期合成的海洋垃圾照片，蓄意将太平洋海洋污染问题归咎中国^[35]。

第二，传播历史虚无主义与消解文化认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战略，其实质是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破坏民族团结。特朗普执政时期恰逢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各类信息平台 and 人工智能技术层出不穷，促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及言论沉渣泛起，并借此加强对广大网友尤其是青年一代网络原住民的思想渗透。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信息产品掩盖粗俗简陋外观，打着“学术争鸣”的幌子登堂入室肆意兜售虚假叙事，海量信息内容加大了信息接收者辨识真伪的难度，使得偏离真相的历史信息扰乱青年心智。如在202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期间，部分美国媒体根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限度，系统性刻意淡化、无视甚至抹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夸大美西方国家对二战胜利的战略地位^[36]。虚无真实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消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破坏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共识。在国家层面，历史虚无主义编造“无中国说”和“去中国化”话术，以民族历史为切口制造民族矛盾，意图否定中华民族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在民族层面，历史虚无主义刻意放大民族之间的差异属性，遮蔽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肆意放大少数民族特殊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习惯，将中华民族发展史曲解为“民族斗争史”^[37]。长期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毒害的青少年会出现“文化自卑”“价值迷茫”等问题，在纵向维度上逐渐消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性，在横向维度上依附西方外来文化，诱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认同危机。

第三，人文交流“断链”与敌视海外侨胞。中美人文交流是维系两国正常关系的重要纽带，普遍被认为具有“托底”功能。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持续强化对赴美留学生和海外侨胞的审查，中美人文交流面临“脱钩”风险。一是赴美留学生数量锐减。自特朗普1.0时期以来，因美国当局增设的种种不合理门槛，中美人文交流受到冲击，留学生的流动规模急剧下降，2023—2024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比峰值下降了近10万人，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留学生的来源国。特朗普2.0时期进一步收紧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条件。2025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称将吊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签证申请的审查。再如美国国会炮制中国利用美国大学从事“间谍”活动谎言，非法获取中国留学生海外研究信息，严格审查斯坦福大学等6所高校的留学生申请、录取情况。二是海外侨胞面临准入障碍。2025年8月，美国政府启动大规模签证审查，涵盖旅游、工作、学生等各类签证，审查内容新增“社交媒体内容”“原籍国执法记录”“国家安全”等指标，重点排查“反美”言论，将签证审核从“准入时审查”转变为“动态监控”，华侨华人作为合法居留群体被纳入“潜在风险群体”，面临合法移民准入障碍和持续的签证资格复核压力。2025年9月，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涉及重启“中国行动计划”的法案。美国以“打击经济间谍”“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无端将华裔科学家、华侨技术人员、中美合作科研人员等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损害我国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三是中美文化交流频次放缓。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文化、学术交流进一步设限，缩减甚至叫停部分中美之间文化交流项目，如富布赖特交流项目，延续并强化了对孔子学院的政治化定性。这种做法意图污名中华文明，阻碍中美正常民间文化交流互动和海外文化传

播，试图让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局限于美国所塑造的片面、歪曲形象之中。

（四）破坏国际合作：捆绑对华遏制条款，打造国际反华阵线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还通过在国际层面推行“新门罗主义”、重塑伙伴关系网络、武装中国周边国家的方式，试图孤立中国，诋毁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为国际和平、合作、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妄图打造国际反华阵线。

第一，推行“新门罗主义”，排斥人类命运共同体。2025 年 12 月，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明确美国国家战略中的排他性逻辑，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这被称为特朗普版的“新门罗主义”或“唐罗主义”。“新门罗主义”是指美国反对任何非西半球国家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获得该地区重要资产，主张美国对西半球的绝对控制和优先地位^[38]。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战略》细化了“美国优先”的制度性表达，确立和巩固了美国在主权国家中的“首要民族国家”地位，并将“反自由主义”和“反跨国主义”价值观念内嵌其中^[39]。报告激烈批评了美国历届政府对全球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过度关注，主张维护美国的本土安全和人民福祉，将第一任期中的“美国优先”理念上升为“美国至上”。为了实现美国对西半球的绝对控制权，特朗普延续第一任期“退群”策略，基本否定了拜登政府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举措，抛弃了冷战后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试图构建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框架，甚至成立了意欲取代联合国多边机制的“和平委员会”。2026 年 1 月初，特朗普直接对委内瑞拉开展军事行动并绑架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公开威胁古巴、哥伦比亚政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警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想要保住委内瑞拉现政权并恢复石油正常进出口贸易，就需要驱逐所有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顾问、特工、情报人员和军事教官”，立即停止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并将原油全部移交美国监管。2026 年 2 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意在摧毁伊朗导弹工业、海军力量及核设施，进一步造成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新门罗主义”企图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永远不再受到质疑”，在经济上阻断“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的经贸合作关系，在秩序上挑战以协调合作为基石的多边主义，在军事上以武力胁迫或者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背离。

第二，重塑盟友关系网络，操纵经贸胁迫对华贸易。特朗普 2.0 时期对中国实施多方位的封锁遏制策略，企图在国际上通过大搞政治联盟、操弄经贸胁迫等手段，打造反华阵线。一方面加大盟友关系网络建设，孤立中国发展。特朗普 2.0 时期强化对越南等国家的拉拢，通过外交斡旋、经济示好、合作绑定等方式，重构盟友关系网络，试图压缩中国的国际合作空间，实现“以盟友围堵中国”的战略目标。2025 年 3 月，美国史上最大规模企业代表团访问越南，推动与越南在贸易领域的深度对接，打造美国企业全球生产新基地，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026 年 2 月，美国牵头联合全球 55 个国家组建“关键矿产联盟”，试图打造排除中国的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新格局，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操弄经贸胁迫手段，刻意针对中国并威胁他国正常对华贸易。美国在与越南的贸易谈判中强制要求，对含有中国零部件或者原材料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或者在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协议中加入限制中国间接出口的“毒丸条款”。2025 年 10 月，美国宣布限制与中国合作的部分中美洲国家公民及其亲属获得美国签证，以此威胁中美洲工商界

人士不得同中国国有企业开展合作。2026 年 1 月，特朗普威胁如果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将对所有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100% 关税。

第三，武装中国周边国家，构建多层次对华围堵体系。特朗普 2.0 时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威慑军事威胁”作为美国的亚洲战略目标，强调的两个方面“主要威胁”均与中国密切相关。一是针对“第一岛链也就是台湾问题的威胁”，报告认为台湾“直接连接第二岛链”“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需要建立能够在第一岛链内任何区域阻止“侵略”的军事力量。二是针对“南海的威胁”，报告认为南海处于全球重要贸易通道的隘口，一旦失去控制会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美国将持续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特朗普 2.0 版国家安全战略并不是“战略收缩”，而是将核心战略竞争对手和威胁始终瞄准中国。为了实现其威慑中国的战略目标，美国的主要军事动作就是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太盟国的军事合作，并持续强化推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打造所谓的“印太威慑计划”。2025 年，日本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公然将中国台湾与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关联，妄图借助“集体自卫权”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对华高强度、高对抗性的军事围堵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态势，挑起了区域内国家矛盾，最终目的是将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扼杀中国对外发展的战略空间。

四、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限度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等领域干涉我国统战工作。但这种干涉并非无边界、无阻碍，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制约下的“有限博弈”，存在干涉限度。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限度受到三重制度因素的制约，即美国内部结构性困境、国际环境多极化与合作趋势、中国的战略应对与统一战线的制度韧性。这三重因素决定了美国难以实现其对我统战领域干涉的既定战略目标，无法改变中国发展崛起的历史大势，更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一）美国内部结构性困境：制约干涉能力的核心原因

美国的任何对外干涉政策，都产生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服务于美国本国发展目标，因此必然受到美国内部环境的诸多限制。第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秉持“美国至上”的实用主义，强调运用经济政策，对关涉的议题边界有所取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强调经济安全和文明安全^[40]。2025 年 12 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竞争的主战场划定在经贸与科技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比更重。这种认知使得政府资源与政治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关税战、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供应链回流等经济议题，而在新疆、西藏、香港等核心统战领域上策动系统性议题及大规模行动并非其战略优先项。第二，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行动与美国国内经济利益存在冲突。中国是美国众多农产品、能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对华贸易战与经济脱钩已对美国农业和农民、制造业企业、消费者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 1.0 时期的关税战清晰地表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其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承担，导致了持续的通胀压力。美国农业州作为特朗普的关键票仓，因中

国针对性反制而蒙受巨大损失，在选举时将直接转化为政治压力。第三，美国内部分裂与政策分歧，影响美国对我国统战领域干涉政策的连续性与执行力。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态势进一步加剧，两党之间、府会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冲突。在两党之间，尽管两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在具体干涉手段、重点领域、资源投入等方面仍存在分歧：民主党更倾向于通过盟友联动、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渗透等“软实力”手段进行干涉；共和党则更强调单边制裁、军事威慑、经济脱钩等“硬实力”手段。在府会之间，特朗普政府偏好使用灵活、可逆的行政工具来实施对华压力，如总统行政令、商务部实体清单、签证限制等，以保持其作为谈判筹码的弹性和个人决策权威。然而，美国国会则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将部分对华政策制度化。如 2025 年 2 月，共和党众议员华格纳等人推动的“台湾保证实施法案”，旨在突破美国与台湾当局交往的红线，要求美国国务院每 5 年审查一次“对台交往准则”，该法案最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同时，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内部社会矛盾增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这迫使美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此外，美国的选举周期也将影响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政策。为赢得选举，特朗普政府可能将新疆、西藏、港澳台等议题作为“政治秀”，更多关注短期政治效果，忽视长期战略规划，这也限制了干涉的深度与可持续性。

（二）国际环境多极化与合作趋势：压缩干涉的外部空间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不仅受制于美国自身的内部困境，也被当今国际环境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合作成为时代主流的大趋势所制约。多极化进程中新兴力量崛起、传统盟友离心、各国对合作发展的迫切需求、国际社会对单边干涉的普遍反对，共同挤压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外部空间，构成其干涉限度的重要外部维度。第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压缩了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外部空间。世界多极化已成为现实，这一结构性变化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球。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孤立中国，但这在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遇冷。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等，提供了发展方案，其务实、高效的特点契合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需求。第二，美国传统盟友内部分歧削弱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主导能力。美国的盟友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显著分歧，并非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干涉战略^[41]，这限制了美国通过盟友联动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效果。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将对华关系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在经济层面，中国是欧盟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供应链关键环节，“脱钩”对欧洲而言在经济上弊大于利。在政治层面，欧盟虽在人权、涉疆等问题上有所响应，但在台湾这一核心问题上，其官方立场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欧盟的防务与战略重心仍在北约与俄乌冲突，无力也无意在印太地区承担主要军事角色。在外交层面，欧盟更倾向于多边主义与规则外交，对特朗普政府单边、交易性的风格深感不适。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亚太盟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但在涉及中国统战领域核心议题上的态度较为谨慎。再加之特朗普政府“美国至上”“交易性”的单边主义作风，美国传统盟友圈对其在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支持呈现有限性和条件性。第三，美国霸权主义、保护主义行径背离全人类共同价值，不符合和平、合作、开放、共赢的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本质上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体现，遭到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反对。2026 年 1—3 月，

特朗普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干预,以及对加拿大、格陵兰岛领土的无理诉求,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共识。

(三) 中国的战略应对与统一战线的制度韧性:化解干涉风险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根本上受制于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包括统一战线的强大制度韧性。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已经从简单的被动防范干涉风险,转向主动应对、精准反制,这是化解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风险的内在基础。第一,中国已构建起应对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战略体系。我国应对各领域各方面风险挑战、确保到 2035 年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和新型举国体制,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国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于 2025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利用军事、法律、外交等综合工具箱,对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行为实施精准反制。在港澳台、涉疆、涉藏等关乎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在军事方面,中国国防力量的现代化,特别是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和核威慑可靠性的提升,使得美国对台海的军事干预面临限制。在法律体系方面,中国已建立起反干涉、反制裁、反“长臂管辖”的法律体系,通过出台《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有力反制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26 年 3 月,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保障^[42]。第二,中国为国际社会提出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营造反干涉的国际环境,形成合作共赢的国际共识。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进行话语建构和议程设置。中国积极提供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将国际社会的焦点从地缘政治对抗引向发展合作、共同安全与文明互鉴。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领域,中国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至上”“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等基于自身实践的理论总结,并通过白皮书、国际论坛、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广泛传播。第三,统一战线的制度韧性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程度。美国政府对我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本质上是试图破坏我国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动摇我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制度基础。我国已构建起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全域覆盖的统战网络,实现了对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全方位调节,从制度层面压缩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空间。大统战工作格局实现了对重点人群和关键领域的全覆盖。特朗普 2.0 时期,当美国试图渗透、拉拢特定群体,如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精英、海外侨胞时,大统战工作格局能够迅速反应,通过思想引导、利益协调和情感联系,增强其国家认同与制度认同,筑牢抵制美国干涉的心理防线。针对美国借涉疆、涉藏议题进行炒作、污名化攻击、舆论施压,并借助相关势力干扰我国民族工作和边疆稳定的企图,中国通过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使“五个认同”日益深入人心。

五、新形势下防范与化解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风险的对策建议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长期化、复杂化，其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呈现出手段更趋多元、领域交叉渗透、内外联动增强的新特点。有效防范化解干涉风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构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等维度的综合治理体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根本转变。

（一）维护政治安全，以制度优势与法治建设防范风险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防范化解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侵害，核心是构建统战领域的风险防范机制和法治保障。

第一，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统战领域风险防范机制。首先，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风险防控体系。在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牵头下，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统一战线风险防控机制。该机制整合统战、外交、国安、公安、网信、民族宗教等部门资源，形成“信息共享—综合研判—战略决策—协同执行—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其次，建立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跨部门整合风险数据资源，针对美国重点渗透和干扰的留学人员、少数民族、宗教界、民营经济、港澳台胞等统战成员群体，搭建动态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识别美国以“民主”“人权”为幌子的资金渗透、舆论煽动、代理人培养等风险信号。定期开展统战领域风险评估，对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的潜在风险进行动态扫描与分级预警，实现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最后，健全统战风险动态跟进机制。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方式，在风险点出现时就进行跟进处理，防止风险扩大化。提升统战工作者的政治敏锐性和风险鉴别力，使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第二，健全反干涉、反渗透的法律法规体系，运用法治武器划定清晰红线。加快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将反干涉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首先，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为核心的反制法律工具箱。加快出台配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明确“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认定标准、反制清单的动态管理程序、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作流程。其次，强化国家安全领域立法与执法。适时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将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统战领域，以及通过网络攻击、数据窃密、恶意影响活动危害我国政治安全的行为纳入依法打击范围。最后，推进统战重点领域公共事务治理法治化。在民族工作领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在宗教工作领域，深入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干预活动。

（二）维护经济安全，以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是抵御风险挑战的压舱石。美国对中

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往往伴随着经济胁迫和技术封锁。我国要紧密团结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推进制度型开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第一,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系统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在坚定保护自由贸易、有理有节反制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话语构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系统增强经济发展韧性。要从高标准协定出发,在经济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建立“先行先试”压力测试区,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经济贸易制度改革^[43]。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市场基础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有序参与竞争。

第二,夯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依照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科学部署实施科技创新项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技术升级,不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高地^[44]。以创新为导向突出企业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业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编制,推动构建覆盖产业上下游和产学研一体的创新联合体。

第三,广泛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企业家预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深刻把握“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們自己人”的身份定位,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把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最广泛最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融入国家大局、响应国家战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培养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用得上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金融环境和法治环境,落实落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度要求,破除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壁垒。同时,利用经济手段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为民营企业出海发展提供政策指引与支持^[45],如为受美国关税制裁、技术封锁的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研发补贴,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等。

(三) 维护文化安全,以增强“五个认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社会和谐之魂。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往往从历史虚无、价值扭曲、认同解构入手。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断增进全体人民的“五个认同”,构筑起抵御风险的坚固思想长城。

第一,巩固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针对统一战线成员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学院、网络统战教育平台等线上线下场域开展分众化宣传教育。如针对民族宗教界人士,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露美国炒作“新疆人权”“西藏独立”等议题的真实目的,讲清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对港澳同胞,结合历史史料与客观现实,阐述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巨大优势。建立统一战线成员思想动态跟踪机制,加强思想领域风险防范。

第二,构建统战宣传和话语叙事体系。对美国关于中国统战领域的言语干扰,建立健全统战话语叙事体系。依托数智平台分类梳理典型言论、案例、数据,联合高校、智库、媒体反驳相关论调。丰富统战话语叙事的内容和方式,如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圆”“石榴籽”等为核心概念,将统战工作实践转化为具象化叙事,用客观实践成效、灵活平台媒介传播替代笼统宣传。创新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46]。针对美国在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的污名化叙事,主动设置

议题，构建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利用短视频、微纪录片、动漫、游戏等融媒体手段，进行精准、柔性、跨文化的传播。

第三，坚决抵制错误思潮侵蚀。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对四史的研究和正面宣传，坚决抵制任何歪曲历史，否定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和行为。依法管理史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和传播，审慎审查相关内容。有效应对西方思想渗透。揭露西方民主、自由、人权话语背后的双重标准和霸权逻辑。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学理支撑。加强对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知识社区等新业态新应用的监管。聚焦涉港澳台、涉民族宗教、涉历史虚无主义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四）塑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行动离不开其构建的同盟体系和掌握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宽广的全球视野和更主动的外交作为，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最大限度深化开放合作、多边主义的国际共识。

第一，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让更多国家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夯实反干涉的民意和利益基础。在全球发展议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中国家紧迫的民生问题，加大资源投入，打造合作项目，赢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认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

第二，运筹大国关系，分化遏制美国塑造的干涉联盟。正确处理与主要大国，特别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是化解外部压力的关键。坚持对美斗争与合作“两手”都要硬。对美方的干涉行径和错误言行，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明确划出红线。同时，要保持沟通渠道，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充分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管控分歧、减少误判设置“护栏”。实施对欧务实外交。深化与欧盟核心大国的务实合作，加强与欧盟对华友好国家的联系。深化周边睦邻友好合作。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人文交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多边场合提出“反干涉”国际行为准则，推动制定关于不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裂他国、反对滥用单边制裁等国际规范。主导或参与设立新的多边治理平台^[47]。例如，推动完善全球安全倡议下有关数据安全的具体细则，防止数据被用于干涉他国内政。主动设置国际议程，回应国际关切。针对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统战核心及国际舆论焦点议题，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组织境外记者实地参访，用事实和数字粉碎谎言。善用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针对个别国家某些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干涉行为，如对新疆产品的无端制裁，研究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或其他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的可能性。通过国际法律和国际规则，实现法律的反制效果，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六、结语

长期以来,美西方有关国家对中国统战领域的介入与干涉,本质上是世界格局演进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与涉华战略中的深层反映。美国的相关做法绝非孤立断续的挑战,而是其对华总体遏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破坏中国内部团结、削弱制度与文化认同,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系其全球霸权。特朗普 2.0 时期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尤为典型地折射了百年变局下的大国博弈,是一场超越传统疆域、深入社会肌理与思想领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视,其已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等领域形成了多维交织的复合型安全风险。这深刻提醒我们,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今天,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已同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深度嵌套。坚持和运用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不仅是凝聚复兴伟力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复杂严峻挑战、在风高浪急中稳住阵脚、赢得未来的战略基石。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更为强大的治理效能;同时以胸怀天下的理念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大统战、大安全和大宣传一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中,牢牢掌握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主动权,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2] 陈家刚, 赵佳豪. 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1-13.
- [3]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4] 魏玲, 王清晨. 经济治国方略下的特朗普2.0贸易政策——兼论其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互动 [J]. 东南亚研究, 2026 (1): 1-29, 154.
- [5] 刘丰. 从仁慈盟主到掠夺霸权: “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联盟战略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26 (1): 42-68, 166.
- [6] 刘慧. 特朗普2.0美国气候政策与全球气候治理 [J]. 当代世界, 2025 (12): 33-39.
- [7] 胡文涛. 特朗普2.0“叙事武器化”的表现、动因及影响 [J]. 当代世界, 2025 (12): 62-67.
- [8] 陀才进, 孙慧, 杨巨星. 特朗普2.0“对等关税”政策与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效应 [J]. 消费经济, 2025 (5): 19-43.
- [9] 朱民, 巩冰, 杨斯尧. 从里根经济学看特朗普2.0的全球影响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 17-36.
- [10] 高丹, 王双, 王栋.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 “特朗普2.0”时期的重点与中国的应对 [J]. 国际贸易, 2026 (1): 23-36.
- [11] 郭畅, 冯晓青. 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 [J]. 太平洋学报, 2025 (11): 58-73.

- [12] 蒋芳菲. 从特朗普1.0到2.0: 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与新动向[J]. 国际经济评论, 2026(1): 97-134, 6.
- [13] 钟厚涛.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157-167.
- [14] 王贯之.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探析: 政党政治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2): 159-170.
- [15] 曾蓼, 周立新, 李文, 等. 特朗普2.0关税政策对中国民营企业“出海”的冲击及突围策略[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7[2026-02-10].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512.1604.005>.
- [16] 李辽宁. “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J]. 红旗文稿, 2018(16): 13-15.
- [17] 俄媒: 特朗普“关税闪电战”受挫的五个原因[EB/OL]. (2025-04-25)[2026-01-2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3ODc4NQ==&mid=2651557183&idx=2&sn=3e4769f051d7b220ddf0b739bfde1e9a&chksm=bc2ca79c12c6b7868a679ceb7ddae89359fa9e0f9747f7f98dc88b36619781a82aeb1673dc4b&scene=27.
- [18] 纽约联储报告: 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特朗普关税成本近九成[EB/OL]. (2026-02-13)[2026-02-20]. http://news.cnr.cn/sq/20260213/t20260213_527525068.shtml.
- [19] 郭永虎, 朱博. 从特朗普到拜登: 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1): 95-105.
- [20] 余南平, 戢仕铭. 西方“技术联盟”组建的战略背景、目标与困境[J]. 现代国际关系, 2021(1): 47-54, 64.
- [21] 凌胜利. 特朗普2.0同盟政策调整的动向、原因与影响[J]. 当代世界, 2026(1): 57-64.
- [22] 严明. “占中运动”与“香港修例风波”比较分析[J]. 西部学刊, 2024(4): 18-21, 63.
- [23] 朱锋, 凌邦皓. 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透视[J]. 国际展望, 2025(2): 1-24, 180.
- [24] 文昌. 外部环境变化下的企业应对[J]. 新经济导刊, 2018(12): 36-42.
- [25] 周明, 周文婧. “美国至上”: 特朗普2.0时期美国联盟策略重构与中国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4): 167-182.
- [26] 刘华. 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华舆论战[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7(1): 122-123.
- [27] 潘士远, 王思宇, 陈秀茂. “新三期叠加”下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机遇与路径[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6): 5-20.
- [28] 孙博珣. 美国更新实体清单 直指中国人工智能和先进计算产业! 中方坚决反对![EB/OL]. (2025-03-27)[2026-02-20]. <https://mp.weixin.qq.com/s/7HLB5vUiX9-Yg2wo4k4sg>.
- [29] 武长海, 黄静怡. 《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 国际贸易, 2025(8): 5-14.
- [30] 李因才. WTO框架下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J]. 太平洋学报, 2025(11): 74-86.
- [31] 美方威胁不得同中国国有企业开展合作, 中方发声[EB/OL]. (2025-10-21)[2026-02-22]. https://mp.weixin.qq.com/s/hRMprUuf9gW4fHugq_9CYg.
- [32] 徐子洋. 2025年两岸关系综述[J]. 北京对台工作, 2025(6): 42-44.
- [33] 刘小燕, 李静, 程畅.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5(7): 27-44.
- [34] Zach Vallese. YouTube wipes out thousands of propaganda channels linked to China, Russia, others[EB/OL]. (2025-07-21)[2025-10-25]. <https://www.cnn.com/2025/07/21/youtube-channels-propaganda->

china-russia.html.

- [35] Global Times. Trump's 'Gift from China' posts debunked: images of ocean debris proven to be outdated and altered [EB/OL]. (2025-04-27) [2025-10-24].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504/1332952.shtml>.
- [36] 卢旭东, 陆惜. 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全链条解构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6): 182-192.
- [37] 邓观鹏, 顾友仁.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样态、危害与治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49-164.
- [38] 严谨, 王飞. “新门罗主义”的内涵、缘起和前景初探 [J]. 和平与发展, 2025 (5): 48-70, 184-185, 190-192.
- [39] 袁征, 关成龙. 从“自由主义霸权”到“首要民族国家”的蜕变——特朗普政府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论析 [J/OL].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1-17 [2026-02-23]. <https://link.cnki.net/urlid/32.1544.F.20260213.1306.002>.
- [40] 孟维瞻. 美国国安战略巨变: 特朗普为何不再热衷“对华意识形态战争”? [EB/OL]. (2025-12-13) [2026-02-20]. <https://news.qq.com/rain/a/20251213A00GSF00>
- [41] 岳圣淞. 美欧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 互动逻辑、内在分异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J]. 东北亚论坛, 2026 (1): 54-71, 127-128.
- [42] 张淑娟, 王硕. 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必然性、可行性及需把握的重大问题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5 (4): 141-149.
- [43] 胡加祥. 国际经贸规则变革时代下的我国制度型开放 [J]. 当代法学, 2025 (5): 17-30.
- [44] 刘冬梅. 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J]. 人民论坛, 2025 (21): 42-47.
- [45] 常玉, 赵芹, 段雪凝. 中国跨国企业应对海外污名的韧性形成机制研究 [J].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 (6): 20-39.
- [46] 邱卫东. 数字时代西方话语霸权的运行体系及中国应对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6 (1): 142-157, 172.
- [47] 孙吉胜. 全球治理挑战与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主要路径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5 (12): 3-23, 161.

责任编辑: 杨稀琴 校对: 卢媛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共同提高稿件论证质量和审稿效率，以期形成更好的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统一战线学科和学术共同体建设。

一、常设专题

- (一)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
- (二)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
- (三)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 (四)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五)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 (六) 研究现状与动态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立足大统战，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建构统一战线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投稿注意事项

- (一) 篇幅。不少于13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5 000~20 000字左右。
- (二) 文风。贯彻加强和改进文风要求，聚焦问题、论述晓畅，坚持讲道理和摆事实相统一。
- (三) 版式体例。提倡稿件用宋体5号字、1.5倍行距统一排版体例，不需要做过多格式设置，确保版式清爽和良好审稿阅读体验。详见本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投稿模板和体例规范》。
- (四) 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敬请条件允许作者投稿时附上查重报告。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 (五) 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 (六) 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 (七) 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唯一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 (八) 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yj。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6年第2期

共56期 第十卷

双月刊

2026年3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 / 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汪奇峰 苏 慰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定 价：20.00元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